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 新政革命与日本

## ——中国，1898-1912

[美]任达 著 李仲贤 译  
刘东 主编

当庞大的中华帝国在甲午之战中败给“蕞尔岛国”日本后，它不得不面对现实，派遣大量留学生东渡扶桑，探求日本的富强之道；同时又聘请了大量的日本专家来华，作为晚清新政的顾问。在这种社会转型、组织创新的时期，日本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书便将焦点聚集于此，对这种文化模仿、组织平移等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总策划 周文彬

---

# 新政革命与日本

## ——中国, 1898—1912

[美] 任 达 著      李仲贤 译

本书责任编辑委 刘 东

*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opyright © 1993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据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年版译出

**书 名**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 1898—1912 年  
**编 著 者** [美] 任达  
**译 者** 雷 颐  
**责任编辑** 汪振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印 刷 者** 阜宁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 插页 2  
**印 数** 1—6130 册  
**字 数** 226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975-2/G·575  
**定 价** 13.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

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 中文版序

这中文版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不仅是英文原著的译文，而且也对原著作了修订，或可称之为“修订中译版”。

1993—1995年间，我曾三次访问中国，累计历时一年多，期间收集了不少资料，包括我写作时未能直接引用的原始资料，这就可以在这“修订中文版”中引用。这些资料对在中国的学者来说，应是案头常备的。

译者李仲贤先生非常细致，为了翻译准确，乐于让我阅读他的译稿，加以增删校改，包括对英文原著的修订，这就是我认为本书可称为“修订中译版”的原因，而这也完善了原著。

李先生是退休人士，按退休前的职业，如果称他为学者或翻译工作者，他会感到不自在的。但他像学者般热爱历史和学问，也像专业教师或翻译工作者般热爱语言文字。这是我在1996年9月和他在广州第一次会面时，在近来我们的通信中得到确证的。

每当我想到李仲贤时，我觉得他在精神上是一个学者和翻译工作者。由他翻译我的书，我是感到非常幸运的。

## 前 言

如果没有众多的机构和个人及时而慷慨的支持,本书的一些概念不可能得以发挥,这本书也不可能写成。1986年,我获得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sup>①</sup>的暑期津贴,又得到亚洲研究会东北亚委员会<sup>②</sup>的资助,得以进入史坦福大学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sup>③</sup>进行研究,构思了1898至1907年近代中日关系中“黄金十年”的概念。感谢雷蒙·迈耶斯<sup>④</sup>,伊米高·穆菲特<sup>⑤</sup>,和马克·道格拉斯<sup>⑥</sup>,以及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sup>⑦</sup>同人的帮助,使那年夏天我在胡佛的研究,各方面都非常圆满。

1986—1987年度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及美国学术学会的日本研究联合委员会<sup>⑧</sup>的学术研究津贴,使我得以到日本全力研究。出于东京大学退休教授、现任亚洲大学校长卫藤沈吉的好意,安排我在东京大学。东京大学社会科学院的石井明教授为我打点一切,使我在不是一年而是两年里都感到宾至如归。认识东京国立教育研究所<sup>⑨</sup>的阿部洋教授,使我喜出望外,我们在许多研究问题上都有相同的兴趣。

我在日本的第二年,1987—1988年,得到纽约亨利·鲁斯基金会<sup>⑩</sup>赞助的“基督教在中国历史研究计划

(1985—1991年)”的研究津贴,我的研究题目是《日本佛教在中国传播中的冲突与对抗,1873—1945年:与基督教相比较》,这一研究深化了我对“黄金十年”的理解,因为在1904至1908年间,中国对日本佛教布道团的抗拒达到高峰,成为普遍性的和外交的问题。

我在亚特兰大任教的乔治亚州立大学,对我施惠良多,不但资助我在1987—1988年第二次出国研究,而且还在今后合约订定每年有三个月假期,使我每年有整整六个月时间能和妻儿共聚,妻子从1987年起便任美国国务院外交官。这一切的安排,历史系主任格雷·M·芬克教授<sup>①</sup>都起了重要作用。我借此机会表示衷心感谢。

我长期受惠于已故费正清教授,和卫藤沈吉教授,安特鲁·里敦教授<sup>②</sup>,史蒂芬·列文教授<sup>③</sup>,多年来,他们不断写信支持我的研究,包括对本书各项问题的研究,并提出建议,我万分感谢他们不断的支持。

在我第一次到日本研究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的妻子泰凯乐和我的孩子莎拉和安梅对我的帮助,不仅是他们觉得“在日本过得愉快”,而且每天和我一道分享成就。莎拉和安梅在日本公立学校学习了三年,和同学们结成很好的友谊,也许她们能借此了解更多的日本生活。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出版委员会的佛罗伦斯·特里弗顿<sup>④</sup>经常对我指点,她的同事凯瑟琳·肯南<sup>⑤</sup>对编辑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乔治亚州立大学历史系学生卡露·施拉克尔<sup>⑥</sup>校对了初稿,并对定稿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谨以此书奉献给我的双亲、文化人类学者任乐德博士和任瑞德博士<sup>⑦</sup>,在我两岁时,他们作为教会的教育工作者在中国和菲律宾工作,带我第一次到了亚洲。抱憾的是,慈母在1988年6月12日庆祝金婚纪念后仅仅六周便辞世,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



## 注 释

- ①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 ② Northeast Asia Counci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 ③ Hoover Institution for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 ④ Ramon Myers
- ⑤ Emiko Moffitt
- ⑥ Maxine Douglas
- ⑦ Hoover Institutions' East Asian Collection
- ⑧ The Joint Committee on Japanese Studie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nd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 ⑨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Tokyo
- ⑩ Henry Luce Foundation, Inc., of New York
- ⑪ Gary M. Fink
- ⑫ Andrew Nathan
- ⑬ Steven Levine
- ⑭ Florence Trefethen
- ⑮ Katherine Keenum
- ⑯ Carol Schlenker
- ⑰ Drs Hubert and Harriet Reynolds

## 序言 概念的形成

“黄金十年”虽未用作书名，本书却是围绕着这概念而展开的。在中日关系史上，1898—1907年间，确曾普遍存在着出人意外地融洽而有建设性的十年。“黄金十年”的概念，最先形成于1986年，在当时，这是全新的甚而似乎是荒谬的概念。谁都知道1945年前的现代中日关系，就是日本不断地侵略中国，很难或绝不可能为之翻案。

这概念没有受什么特别资料或事件所启发，而是我在钻研1870—1945这75年的中日关系时，从过去10多年的考证积累中形成的。从1978年开始，我研究1898—1946年的东亚同文会和它在上海的学校——东亚同文书院（1900—1945，1939年改为大学）<sup>①</sup>。事后我认识到，这些机构和它们承担的责任，以及它们牵连着的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和构建“黄金十年”的概念，也有助于锻造我自己对这一阶段中日关系的观点。

在这10多年研究中，有助于我观念形成的，还有美国从事中日研究的前辈、马里乌斯·詹森的著作<sup>②</sup>，和中日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已故的实藤惠秀，他的著作都依据丰富的材料写成<sup>③</sup>，对我影响极大。此外还有中国学者黄福庆和林明德<sup>④</sup>。以下学者的著作，对我

了解晚清时期发展有极大帮助<sup>⑤</sup>，包括 H. S. 伯鲁纳特(Brunnert)，V. V. 哈格尔斯特朗(Hagelstrom)，梅里贝斯·卡梅伦(Meribeth Cameron)，拉尔夫·鲍威尔(Ralph L. Powell)，马里乌斯·J·梅佐(Marinus J. Meijer)和玛莉·克纳宝格·莱特(Mary Clabaugh Wright)等，其中对日本持独特见解的唯有拉夫尔·鲍威尔。最深入广泛研究日本对晚清特别影响的，莫过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东亚：现代的变革》<sup>⑥</sup>。在我写这本书时，总是反复查阅这本费正清的著作，回想较早时对我的影响。

在研究初期，我强烈地回忆起王风冈 1933 年写的《日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1895—1911》，它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愿望，更多更深地了解在 1895—1911 年间日本对中国的特殊影响。这是 1986 年春的事。

这年夏天我遇到良机，获得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的暑期津贴，在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及在史坦福大学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研究。半个世纪前，王风冈也是在史坦福大学进行研究的。依着王的注释条目，我加以资料补充，这些资料说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远不只在教育方面。

到两个月的研究结束时，我已毫无疑问，认定那些年间中日之间关系是密切的、具有独特成果的，尤其是对中国方面而言。破坏这种特别关系的是日本帝国主义。1905 年日本战胜俄国后，骤然摆明姿态，集中对中国侵略。到了 1915 年日本提出 21 条要求时，关系已经糟到如此程度，一切美好的回忆都在迅速地消失，任何善意都越来越不得人心，而且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要深入进行研究，就要细查 1911 年前中国的、日本的和西方的纪录。

幸运的是，史坦福只是我到日本进行一年研究旅途的第一站，第二站是夏威夷的檀香山，美国历史学会太平洋沿岸分会第 79 届年会(8 月 13—17 日)在那里举行。我在会上第一次发表了我在夏天形成的概念，当时使用的词语是“十年蜜月”，论文的题目是

《粉碎了的崇高愿望：东亚同文会与中国，1898—1945》，论文提交“日本面对亚洲”专题小组，该组组织者及主席是俄立冈大学教授拉尔夫·福尔康纳利(Ralph Falconeri)，参加该组的有东京大学卫藤沈吉教授和平野健一郎教授，他们两位帮助我开始了十年前的中日研究。

平野教授评审我的论文，他是研究1906—1931年日本在满洲活动的一流权威，谨慎而深思熟虑的批评家，他温和却严格地批评“十年蜜月”的概念。他告诫说，动机必须按行为而评断，当时日本的行为差不多完全出于关心日本的安全和利益，而不是罕有的“恶毒意图”。他指出“十年蜜月”用词不当，因为它暗示存在着“中日之间真正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而充其量也只存在相互自我获益或彼此共同利用的关系”。

这些批评不但没有使我丧失信心，反而加强我的决心，更系统地全面地探索我的观点，了解问题的核心。年会结束后平野教授对我说，他批评的目的之一是要激励我前进。所以，当我对他的坦率意见表示感谢时，我完全是真诚的。

1976—1980年间，我曾在东京研究及教书，旧地重游，又重逢我的朋友和同事。其中一位特别的朋友是薛龙博士(Dr. Ronold Suleski)新任HARPER AND ROW亚洲出版社的主编，当时又任赫赫有名的日本亚洲学会会长，他邀请我把看法写出来，在该社的论文系列月刊上发表。他还提出“黄金十年”一词，帮我拟定文章题目：《被遗忘的黄金十年：日中关系，1898—1907》。文章于1986年12月8日发表，增订稿以同样题目刊登在《日本亚洲会社学报》<sup>⑦</sup>。

该文于1987年末发表后，一些进展促使我增编成这本书。首先是日本、中国和西方的各种评论，当他们看到这些从未集中整理的资料时，都极感兴趣，表示好评。对我的鼓励来自日本的学者们，他们不满那些井蛙之见，这些见解或则藉以引申为保守政治，

或则把受嫌疑的看法排斥在学术主流之外(例如像我的研究那样,自1949年以来,日本盛行就中国革命、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现代化等问题向学术观点提出挑战,这些问题在中国已受狭隘的解释及框架所支配);来自《东亚》月刊<sup>⑧</sup>约稿写日文的文章;来自“辛亥革命研究会”邀请在1988年9月的例会<sup>⑨</sup>上发表三小时的演说并参加讨论;还有来自平野教授出面邀请,于1988年11月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表演说。日本一些令人振奋的、富于开拓性的研究,对我帮助极大,丰富了我的研究内容,特别是阿部洋教授及其助手们在国立教育研究所的研究成果<sup>⑩</sup>。

还有来自中国方面的鼓励,中国学者们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会的研究生们,对我的研究公开表示兴趣(和怀疑态度),使我印象十分深刻。这研究会在东京国际文化会馆每月的例会,我都参加了。在1988年3月到6月为期12周的研究旅行中,行程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中国学者们都对我倍加鼓励<sup>⑪</sup>。在这次旅行期间及1988年10月25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时<sup>⑫</sup>,我得以了解中国最新的观点,获得了中国在过去十年间就中日关系发表的大部分文章。

总而言之,即便从日本及中国学者的观点看,1988年的气候似乎适于继续探索“黄金十年”的概念。1972年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进入了恢复友好关系、热切地重新检讨过去关系、追求新的友谊和合作的时期<sup>⑬</sup>。令人印象深刻又富于学术风范的研究进展,大大地丰富了我研究的每一方面,看看注释就完全明白了。只不过这些学术成就,一般都只狭隘地拘泥于常规的解释,对我的“新政革命”观念构架帮助不大,这一构架是在我研究后期才出现的。

去了日本两年后,1989年初,我又回到乔治亚州立大学,很高兴受到历史荣誉学会“Phi Alpha Theta”(费·阿尔法·施塔)的邀请,宣讲我的研究论文。这迫使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对那些并非

研究中国的专家,即如我的同事和学生来说,在我的研究中,哪方面最具历史价值和相对地具有意义呢?我长期讲授世界文明史,也为它自1500年以来的进程着迷,各种类型的、暴力和非暴力的现代革命都无不具有它的特征。沿着这思路,很容易便找到答案:革命。我和我的朋友高谔博士(Dr. Edward Krebs)商量,把现代革命的概念运用到中国晚清时期。他是近代世界史教师,研究中国20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的专家,一下子就理解我的意思。当我问及题目时,他沉思片刻,随即满脸生辉,微笑着回答说:“《是谁进行了革命》,怎么样?”题目也就这样定了:《中国,1898—1912:是谁进行了革命?》<sup>①</sup>。

研究成果概见于《中国思想和体制的革命:内容和意义》,这是为1990年4月5—8日在芝加哥召开的亚洲研究学会第42届年会《伟大的年代:中国,1901—1910》专题小组而写的<sup>②</sup>。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围绕着1901—1910年晚清新政或“新体制改革”问题,就突然作为革命时期出现了。我后来的工作重心是研究那时的改革和日本从中所起的辅助作用,并构建新政革命的概念,这革命包含了思想和体制两方面内容,是悄悄地进行的。

1990年8月10—12日在香港召开的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研讨会上,我提交了论文《中国新政革命与日本(1901—1910)现代中国之学术与制度基础》<sup>③</sup>,那些发展了的概念已综合在这论文中。本书充分表述了论文中的概念,其内容将在《导言》中讨论。

#### 注 释

① 该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任达著《战前的中国地区研究:日本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1900—1945年》(Douglas R. Reynolds, “Chinese Area Studies in Prewar China: Japan’s Tōa Dōbun Shoin in Shanghai, 1900-1945”,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5:945-970 (1986));及任达著《训练年轻的中国通: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先驱者,1886—1945年》(Douglas R. Reynolds,

“Training Young China Hands; Tōa Dōbun Shoin and Its Precursors, 1886-1945”, in Peter Duus,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Princeton, 1989) pp. 210-271)。

- ② 马里乌斯·詹森的经典性著作是《日本人与孙中山》(Marius Jansen,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Cambridge, Mass., 1954)), 书中收集了日本人与孙中山合作的大量事例, 和日本人诡诈的鲜明例子。詹森渊博的著作是《日本和中国: 从战争到和平, 1894—1972年》; 新著是《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1975)); and *Japa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in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I: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1980) pp. 339—374)。这些著作都关乎某段时期中日之间的特殊关系, 但未涉及“黄金十年”。
- ③ 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及《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增补》。后者已由谭汝谦及林启彦精心译成中文, 并更正了若干错误, 添补了学术注释。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 1982年)。
- ④ 见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台北, 1975年); 黄福庆著《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 1982年); 林明德著《清末民初日本政制对中国的影响》, 载谭汝谦编《中日文化交流, III: 经济及思想方面》(香港, 1985年)第187—213页。
- ⑤ 见伯鲁纳特及哈格尔史特朗著《中国目前的政治组织》; 梅里贝斯·卡梅伦著《中国的改革运动, 1898—1912年》; 拉尔夫·鲍威尔著《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马里乌斯·祖翰·梅佐著《中国对现代刑法的引进》; 及玛莉·克拉宝格·莱特编《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1900—1913年》第1—163页(H. S. Brunnert and V. V. Hagelstrom, *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 (1912; Taipei, 1971); Meribeth E. Camer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1912* (Stanford, 1931); Ralph L. Powell, *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 (Princeton, 1955); Marinus Johan Meijer,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Criminal Law in China* (Batavia, 1950); and Mary Clabaugh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1968))。

- ⑥ 参阅费正清等合著《东亚：现代的变革》中，《晚清改革运动》一章（“The Late Ch'ing Reform Movement” in 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1965), pp.613-633)。尤须注意费正清的论述：“从 1898 至 1914 年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人们看到日本巨大的影响……日本在这短暂期间的影响，较之 19 世纪时英国的、或 1915 至 1949 年美国的影响，甚至人们可以认为较之 1949 年后苏联的影响都更为直接，更为深刻，更为久远。”（第 631—632 页）本研究正是为这博大的论断提供论据。
- ⑦ 任达著《日中关系史中被忘却的黄金十年：1898—1907 年》（Douglas R. Reynolds, “A Golden Decade Forgotten: Japan-China Relations, 1898-1907”,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fourth series, 2:93—153 (1987)）。
- ⑧ 任达著《近代日中关系史中被忘却的黄金十年》（Dagurasu Reinoruzu, “Kindai Nit-Chū kankei shi no naka no wasurerareta ōgon on jūnen”, *Tō-A* 250:9-11 (April 1988)）。
- ⑨ 题为《日中关系史中被忘却的黄金十年：1898—1907 年》（“Nit-Chū kankei shi no wasurerareta ōgon no jūnen, 1898—1907”）。
- ⑩ 对我帮助极大的，是阿部教授指导下精心研究的两本著作：《日中教育文化交流与冲突：战前日本在华的教育事业》（东京，1983 年），和《受雇的日本教习之研究：亚洲教育近代化和日本人》。阿部洋新编的《明治后期教育杂志刊载有关中国、韩国教育文化关系文章索引》，是目录学的里程碑。
- ⑪ 1988 年 3 月 17 日，作者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及发言要点，见作者著《日中关系的新观点，1870-1945 年》（“New Perspectives on Japan-China Relations, 1870-1945”），刊登于《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88 年 3 月号。在香港，我的东道主是著名的中日关系史专家、香港中文大学谭汝谦教授。1988 年 3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汕头、厦门、泉州、福州、杭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长春和沈阳，会晤了近代中日关系的学者，参观了大学。有关此行情况，见作者著《中国之旅随笔》（“Chūgoku kikō zuisō”, *Shin'gai Kakumei kenkyū* 9:93 and 20 (1988)）。
- ⑫ 由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赞助，该会于 1984 年在北京成立。



- ⑬ 自 1980 年以来,中国全国性及地区性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相继成立,尤以东北及华北为最,足以充分说明这种变化。而对问题作平和的、批判的分析,采取探讨性的方法,则是这些研究会应有的导向。见刘天春著《关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作者对该文的英译本,载 *Sino-Japanese Studies*《中日研究》1990 年 5 月号。
- ⑭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观点的(这些观点对日本有很大影响),是史远芹、曹贵民、李玲玉的《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演变》(北京,1990 年)。这本细意精心的著作认为,1901—1910 年的新政改革,是中国封建社会内的架构,是一个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的专制政府挣扎求存,是出现了中国资产阶级要求参与全国及地方事务的声音。我是把新政改革放在这样的架构内:一个由帝国体制和思想控制了 2100 年的中国,主要受到外来思想和体制的影响,发生了突然而持久的转变。这就明显地提出问题:人们如何评价这不同的取向?这两个架构是无需论战的。但它们以提出不同的问题开始,查察不同的资料,并导致对近代中国不同的见解。
- ⑮ 该组由 Ernest P. Young 主持,提交论文的有谭汝谦, Roger R. Thompson 和我。Mary Backus Rankin 和 Ernest Young 一道参与讨论。
- ⑯ 该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研究所及日本研究计划,南伊利诺斯大学国际服务计划,及中国纪念中日战争殉难者联合会(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Japan Study Progra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Programs and Service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 and the Chinese Alliance for Commemoration of Sino-Japanese War Victims)共同组织。

# 目 录

---

中文版序 1

前言 1

序言 概念的形成 4

---

导言 1

---

第一章 “黄金十年”？新政革命？ 7

“黄金十年”？ 7

新政革命？ 13

---

第一编 日本的作用及其背景 20

---

第二章 “黄金十年”的序曲 21

---

第三章 两面开弓的日本战略：军事的和非军事的 29

军事策略 29

非军事策略 32

百日维新 37

百日维新以后 39

---

---

**第二编 新政思想革命：新载体，新概念 48**

---

**第四章 中国学生及其人读的日本学校 50**

- 提倡到日本学习 51
  - 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人数 53
  - 为中国学生在日开设的学校 57
  - 中国学生在日本的生活 65
  - 赴日学习的鼓吹者 67
  - 对中国的贡献 68
- 

**第五章 在中国的日本教习和顾问 77**

- 日本人在华从事教育的启端 79
  - 中岛裁之领导的北京东文学社, 1901—1906 83
  - 在中国的“日本教习时代”的主要教师和顾问 87
  -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88
  - 京都帝国大学教授 89
  - 早稻田大学教授 89
  - 编纂语言教科书及华日辞典的先驱及中国在日学生的顾问 89
  - 其他 90
  - 合同条款及教学条件 91
  - 语言障碍及日语教学 94
  - 在教育方面的中日合作 96
  - 南京三江师范学堂的日本教习 101
  - 在“日本教习的时代”中国新的师范学堂 107
  - 为什么不是西方人？……基督教的因素 111
  - 并非“失败” 113
-

## **第六章 翻译及现代词汇 128**

工作的促进 128

教科书及百科全书 132

出版业与商务印书馆 134

翻译者：现代化的经纪人 135

现代词汇：从日本流入中国 136

---

## **第三编 新政体制革命：新的领袖，新的管理 145**

---

### **第七章 中国的教育改革：日本的模式 148**

训练人才 148

考察团的特别影响 150

“同文”和“体用”：保守改革的生命力 154

科举制度的废除 160

---

### **第八章 中国军事现代化与日本 169**

中国人在日本的军事训练 170

在中国的日本军事教官、顾问及日本军事模式 172

中国军事史学家的观点 175

---

### **第九章 中国新的警察及监狱系统 181**

中国新的警察系统 181

警察的职能 182

在日本受训的警察 183

在中国训练的警察：川岛浪速和北京警务学堂，1901—1912  
184

在袁世凯管治下，直隶省的警务改革 186

有名有实 187

“组织性移植”对比研究的必要性 188

北京警务学堂与对比性研究 189

中国新的监狱制度 190

直隶一例 191

国家级的改革和小河滋次郎博士 192

---

## 第十章 中国的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日本的蓝图和顾问 200

中国的法律改革 200

刑法改革与冈田朝太郎博士 203

民法与松冈义正 204

商法改革与志田钾太郎 204

中国的司法改革 205

中国的宪政改革：来源与解释 205

向立宪政府迈进 206

---

## 结束语 215

对晚清革命的解释 216

日本：缺掉的关键 217

今后研究的方向 218

---

## 附录：《新政改革上谕》 222

---

## 参考书目 225

## 译后语 264

---

## 导 言

本研究建构在实证上,这些实证主要取自原始材料及引证日本和中国的学术成果,把长期受忽视或大量遗忘的事实第一次集中起来。这些事实表明了令人吃惊的情况,并要求按如下线索,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分析架构作根本性的修正。 1

粉碎了经历 2100 年中国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学基础的,不是以孙中山(1866—1925)及其同伴为中心的 1911 年政治革命,相反地却是 1901 至 1910 年以晚清政府新政为中心思想和体制的革命<sup>①</sup>。按本书分析,1911 年革命的主要意义,是保证了新政年代思想和体制改革继续存在——既不后撤,也不走回头路。同时,新政革命及其成就,自 1911 年后一直成为实际的基石,虽然不受承认也没有公开宣告。结束帝制后的中国,正是在这基石上决定思想和体制的方针,以至今时今日。

如果以人们更为熟悉的方式表述,那就是中国仅仅在 12 年内——从 1898 年百日维新的“失败”到 1911 年革命的“失败”——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按本书研究,1898 年与其说是失败,毋宁说是中国经受世纪之交的转变、“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第一大步<sup>②</sup>。

- 2 在不少重要方面,保守的改革都努力取得了成就。1899至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后,慈禧太后(1835—1908)不得不下定决心,发起并推动了彻底的新政改革。从朝廷到各省,一批官员把改革推向前进,他们主要有张之洞(1837—1909),袁世凯(1859—1916),庆亲王奕劻(1838—1917),张百熙(1847—1907),赵尔巽(1844—1927),端方(1861—1911),岑春煊(1861—1933)和沈家本(1840—1913)等<sup>③</sup>。这些重要的和其他成千上万次要人物的事业和成就,为结束帝制后的中国,以至今日奠定了基础。为了强调其影响超越1911年,本研究至1912年止<sup>④</sup>。

新政革命主要有思想和体制两方面,如果不以日本明治为参照,对两者都难于理解。事实上,日本是作任何分析的关键。如果没有日本在各种各样的幌子下、在不同的层次表示合作,中国不可能打破传统控制而向现代道路迈进。中国思想和体制转变得如此顺利快速,甚而超过日本明治维新的进程。日本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对日本模式和对个别人士令人惊奇的信心,将在第一、二、三章逐一解释。

理解近代中国在学术上的主要障碍,是对革命的定义规限得太狭窄,这蒙蔽了学者们的眼睛,难于理解延续最长的中国近代革命、静悄悄的新政思想和体制革命。1500年以来的世界史不断地提醒人们,革命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大多是非暴力的、不流血的。正如汤玛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指出,革命可能悄悄地进行,令人感觉不到,从农业、商业、经济革命,扩展到思想、科学、技术革命,以至政治、社会甚而性革命。就中国而论,晚清时期不仅有推翻政府的政治革命,而且有更具深远影响的女思想和体制的转变。

- 3 把清王朝的最后十年,从有关1911年革命的因循思想中解脱出来,从那些对革命粉饰之言中解脱出来,对中国帝制后期的和帝制结束以后的真正革命转变,便较为容易理解了。

1911年后,置身舞台中央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改写了历史,藉清王朝突然崩溃而索取荣誉。他们,无论是清朝的对立者或充其量只是沾了点边的人,对晚清改革既无认识也并不感兴趣。真实的历史纪录还未来得及详细查证或整理前,中国已陷入1916至1928年狂暴的军阀混战。由于混乱被弄得稀里糊涂,由于清王朝在人们记忆中迅速消失,因而极少有人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军阀和晚清的创新改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军阀混战的十年中,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他至死仍忠于他的信念,要摆脱军阀和帝国主义,鼓励人们支持他的事业。他生前是“受挫折的爱国者”,死时仍是受挫折的爱国者<sup>⑤</sup>。

孙的逝世,促使人们更热切地寻求困惑了孙一生的答案:如何填补结束帝制后在精神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绝望的真空。那些早期的亲密伙伴如汪精卫(1883—1944),胡汉民(1879—1936),和蒋介石(1887—1975)等<sup>⑥</sup>,他们宣传孙,只是把孙看作团结全国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独一无二的有效的象征;更重要的是把孙视为基础,他们在此基础上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成为正统而下赌注<sup>⑦</sup>。到了本世纪20年代末期,孙因1911年革命获得哀荣,被尊为“国父”,以至把那次革命也变成“孙的1911年革命”。这观点成了中国的信条。

在因循袭旧的历史上,那些站在“孙的1911年革命”之外的人们,总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或敌人。头号敌人是袁世凯,他是新政改革的骨干人物,1912—1916年的民国总统。他没有大吹大擂,却在结束帝制后的中国继续进行改革。在1915至1916年,他企图建立君主制而没有成功,这就注定了他要贴上民国叛徒的标签;由于他和新政改革关系密切,那些改革和改革支持者们也成了协同犯而埋进坟墓。至于日本,它在新政期间所起的核心作用完全被遗忘了。在那1915年不光彩的21条要求后,任何回忆都只能起相反的作用,遭受批驳。



在历史上有过重大成就、使人惊叹的中国新政变革,就这样被遗忘了。教科书和专题著作,都没有把清朝革命性的转变,看作从1898年传统的中国政治形态,到1911—1912年近代的、调合日本—西方—中国的政治形态的飞跃<sup>①</sup>。新的政治形态尽管有缺陷和实施时摇摆不定,它终究是应时而生。事实上,我们所认识的今日(而且在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正是完全以新政年代思想和体制为基础。离开新政革命,20世纪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本书第四章以后逐章为日本参与新政革命提供证据。本研究仅仅是个开端。差不多每一章都需要单独的专著加以发挥。希望这一研究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 注 释

- ①“新政”一词,是19世纪80年代时的中国赴日考察者们,用以表述明治维新时期的各种改革措施的。例如,1887年底,顾厚琨奉派游历日本,经半年考察,“遍观学校、商务、军制、制造工业诸新政”,于1888年编成《日本新政考》一书。引文见王晓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197页。“新政”一词又累见于其他著作的书目,如《新政丛书》(上海,1897),及何启、胡礼垣撰《新政真铨》(上海,1901)。按韩国历史学家闵斗基的研究成果,1895年时,“新政”一词表述“新的政策”;在1898年则表述“新的制度”,或“体制改革”。见闵斗基著《国家政治形态和地方势力:中国末代王朝的改革》(Min Tu-ki,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1989) pp. 120, 125)。

在本研究中,“新政”表述“新的政治体制”。发起新政改革的1901年1月29日的上谕中,并未出现“新政”一词,但重心集中在社会生活中“新的政治体制”,明确地要查核“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引自《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4601页。又见本书附录)。新政改革也确在教育、军事、警务及监狱、法律、司法方面,成功地建立了“新的体制”。从上谕提出的目标以及上谕颁布以后的成就看,“新的政治体制”、

即“新政”一词，概括了清末十年间的改革情况。因此，本研究把1901年1月29日的上谕称为“新政改革上谕”。

- ② 我使用这些词语时是这样考虑的：“传统”指的是过去的整体，它不断变化而复杂，却总是中国特有的。它肯定中国过去一系列的经验，包容了国家和社会、现在及将来一切问题的答案。“现代”指的是新的思想状态——从回顾过去以寻求指引，到采取开放的调查研究态度对待一切，包括对中国以外的事物，藉以在敌意的世界中谋求生存策略。中国传统不是静态的、单一的，而是动态的和多向的，正如它的现代也是动态的和多向的一样。这些概念不但对新政年代明显地富有深意，也适用于本杰明·施瓦茨在《“传统与现代的对垒”，作为解释范畴的界限：中国知识分子的案例》一书中提出的问题(Benjamin I. Schwartz, “The Limits of ‘Tradition versus Modernity’ as Categories of Explanation: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Daedalus* 101.2:71-88 (Spring, 1972))。“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语，读者可能从柯文的重要著作《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中国晚清的改革》已经熟悉了(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书中的这些概念，是用以探讨先行者王韬(1828—1897年)的事业的。
- ③ 关于张之洞，参阅苏云峰著《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1976年)，及丹尼尔·贝斯著《中国进入20世纪：张之洞与新时代的产生，1895—1909年》(Daniel H. Bays, *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 1895-1909* (Ann Arbor, 1978))。关于袁世凯，参阅侯宜杰著《袁世凯评传》(郑州，1986年)；渡边惇著《清末袁世凯与北洋新政：北洋派的形成》；特别是史提芬·麦克金朗著《中国最后王朝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京津》(Stephen R. 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 (Berkeley, 1980))。关于赵尔巽，参阅罗杰·汤普森的两篇著作，《未来的幻想，当时的现实：地方行政改革，选举的策略，及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传统社会》和《管理能力与自治政府：中国末代王朝和社会竞争的幻梦》(Roger Thompson, “Visions of the Future, Realities of the Day: Local Administrative Reform, Electoral Politic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85); and "Statecraft and Self-Government: Competing Visions of Community and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14.2:188-221 (April, 1988)。有关沈家本,参阅岛田正郎著《清末中国对近代法典的编纂:东洋法史论集》第三辑。

- ④ 新的政府体制延续到 1911 年后的民国时期,已为一系列重要研究所确认,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 年》。然而该书的时间架构虽是 1860—1916 年,却对延续到 1916 年的问题,没有就任何省或地区作单独的或系统的研究。
- ⑤ 见马丁·威尔伯著:《孙逸仙:受挫折的爱国者》(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⑥ 1988 年韩国出版了由闵斗基编写的专著,研究了孙的六名主要伙伴,把孙神化的主要人物——胡汉民,蒋介石,廖仲恺(1878—1925),戴季陶(1891—1949 年),陈公博(1892—1946 年),及甘乃光(1897—1956 年)。闵斗基为这著作写的导言已译为日文:“Chūgoku kokumin kakumei no rikai no hōkō”, *Chikaki ni arite* 16:63-86 (November, 1989)。
- ⑦ 中国的政治文化是高度个人化,似乎需要一个放大了的人物或象征,把信奉的人们团结在他的周围,并组成特别的关系网络,才能工作。日本的政治文化是高度制度化和非个人化,总是围绕着已经建立起来的机构和等级制度运作,中国式的“个人崇拜”差不多是不存在的。由于这种差别的影响,博闻广见的美国人,今天都知道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但有多少同样博闻广见的人们,能说出或知道一个日本明治年代的领袖,或者说得出现在日本首相的姓名呢?
- ⑧ 兰保·沃雷著《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从 1800 年到现在的历史回顾》一书 (Ranbir Vohra, *China's Path in Modernization: A Historical Review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92)), 方向正确,备受欢迎。沃雷指出,“王朝的改革计划包括五方面:军事,教育,行政管理,国家宪法及法律。一切进程都是带根本性的和严肃认真的。在军事、教育及宪法方面所取得的实质性进步,改变了中国未来社会及政治形态的性质”(第 95 页)。

## 第一章 “黄金十年”？新政革命？

5

中国在 1898 至 1910 这 12 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从取得。和惯常的想法相反，日本在中国现代化中，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的角色。不管怎样，从 1898 至 1907 年，中日关系是如此富有成效和相对地和谐，堪称“黄金十年”<sup>①</sup>。这黄金十年的关系，一再证明了对中国新政改革的成功具有何等作用。本章以回顾这一概念开始，于第二、三章详述日本扮演的角色及其背景，进一步为“黄金十年”提供确证。

中国的新政改革的结果很不平衡，也的确带着缺陷，但多方面同时举行、迅速而不动声色的改革，彻底地永远粉碎了中国 2000 多年的帝制历史，把中国置于延至今日的帝制后的过程。对中国而言，成效是革命性的，或者可称之为“新政革命”。本章的第二部分，将检核“新政革命”这一概念。

### “黄金十年”？

表面看来，“黄金十年”的概念似乎不可理喻。在

- 6 惨痛的中日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不久,中日双方似乎不可能有密切的关系。这概念与一切逻辑都背道而驰,而这些逻辑又已深深地植根于中日人民心中。在中国人民中,它触发起 1937—1945 年日本野蛮地反对中国全面战争的焦灼回忆;在日本人民中,则触发起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那次嚣张至甚战争中的犯罪感。时至今日,中日学者仍未能从这些往事中摆脱出来。

某种怀疑主义当然是必要的。例如,从 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到 1945 年日本投降的整段时间内,完全可以毫不犹豫地视之为日本从未间断地对中国和中国周边侵略的时期。在 19 世纪末期,从 1874 年开始,日中之间的军事对抗规律地十年一次:1874 年,日本对台湾惩罚性的远征;1884 年,中日军队在朝鲜冲突;1894 至 1895 年,日中爆发全面战争。

到了这个世纪,冲突的步伐加快了,日本每五年左右便挑动一次军事行动:1900 年,日本参加反义和团的八国联军,及由于日本的阻拦造成厦门事件惨败\* ;1904 至 1905 年日俄战争,日本取得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特权;1910 年日本完全吞并朝鲜;1914—1915 年,日本军队接收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和特权,和德国在太平洋的领土;1918—1922 年,日本远征西伯利亚;1927—1928 年,日本在山东武装干涉,反对中国北伐军;1931 年满洲事件;1932 年日本军队攻击上海;1933—1937 年,日本在华北发动一连串军事行动,导致 1937—1945 年全面战争,为时长达八年,毁灭性

---

\* 译者注:指义和团运动期间,兴中会准备武装起义,日本企图乘机占福建,答应供给武器。1900 年 10 月初,兴中会在惠州起义,起义军曾发展到 2 万人。这时八国联军已入北京,列强相互牵制,日本感到不可能割取中国领土,对革命党在台活动又有戒心,遂改变主意,不但不供给兴中会军械,并禁止其在台活动,起义军弹尽粮绝而失败。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 年版)第 144 页。

的战争遍及全中国,在战争中牺牲者数以百万计<sup>②</sup>。

然而即使在日本侵略扩张的 30 年代,仍有个别人回忆现代中日关系较为美好的时光,1936 年,研究中国学者神崎清在《支那》月刊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他写道:

“日本在义和团事件中参加了八国联军,使日本在中国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得以提高,它在处理军事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公正态度,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日本主要通过军事、警务和教育方面的领导,直接参与了清政府的改革,扩展了新的日支关系。清政府正想方设法避免西方侵略,日本政府也正千方百计遏制西方的渗透。在日俄战争前后,围绕着这一共同利益,出现了日本人称之为对支外交的黄金时代<sup>③</sup>。”

1943 年,实藤惠秀把 1896 至 1905 年间称为中国“纯粹的亲日时代”<sup>④</sup>。而在四年前,1939 年,实藤就写道:“只要注意现代时期,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到日俄战争之间的年份,是无比的日、中两国的亲和时代。关系密切得使其他外国人妒忌。”<sup>⑤</sup>

他最后一句说得绝不夸张,那是事实,在 20 世纪初期西方刊物中就说得非常明显。例如早在 1901 年 7 月,在上海敏感的潘慎文牧师(Rev. A. P. Parker)在题为《日本对中国新的侵略》一文中就提出:

“思想的侵略取代武器的侵略,教育的宣传取代压迫。狡狴地企图以思想力量多于物质力量以征服中国。

“简言之,这就是在日本人的程序下,现正迅速地摆到中国面前的事态,在过去短短几年中,日本人的行径已经充分表明了<sup>⑥</sup>。”

潘慎文的文章特别注意为日本学生在上海(于 1901 年 5 月

---

\* 译者注:据 1995 年 5 月 10 日《人民日报》,“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五百多万人”。

底)开设的东亚同文书院(后升格为大学)开业典礼,报导了中国官员发表的热情洋溢的欢迎词,预期书院对中国长远的价值是“反抗白种人对东亚统治的重要支持<sup>⑦</sup>”。东亚同文书院的确发展为出色的学院,不过从根本上说,日本的得益是远远超过中国的<sup>⑧</sup>。

8 西方的嫉妒和焦虑,在乔治·林奇(George Lynch)《中国的日本化》一文中,表露无遗<sup>⑨</sup>。无独有偶,雷里·宾茹(Rene Pinon)也写了《中国的日本化》,文章宣称,“这个新的中国将是日本人的中国”,他继而解释道:

“在日本影响下,(中国)已决定进行改革并付诸实施,(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有关‘大清国之教育改组’的报告……是直接受日本体系启发的……宣布除外语教员外,全部教员都应在日本选聘。事实上,最近成立的师范学堂,所有外籍教师都是日本天皇的臣民……不用说,这些日本人的教育使命必定产生巨大的影响<sup>⑩</sup>。”

上海德国总领事 1905 年的秘密报告,同样感到忧心忡忡:

“除了日本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足以令人吃惊外,我仅指出两方面以提高我们的警觉:第一,日本以庞大的国库补助,促进海运繁荣,保护并奖励贸易扩张;第二,通过东亚同文会等机构,热心发展中国教育,同时通过开办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锐意培养能在中国活动的自己人。为了对抗这一切,德国政府必须提供大量补助,积极保护航海,并在扬子江地区,尝试大规模设立培养华人的学校,放手传教<sup>⑪</sup>。”

再引述一段,就足以代表消息灵通的西方舆论对当时日本在中国的看法。与清廷联系密切的著名的英国新教徒、教育学家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于 1906 年著文称:

“然而,北京可能注视着东京,很明显,日本对中国 18 省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日本的旅游者、商人、教员、军事教官,在帝国无远弗至。中国贵族和统治阶级成千上万的子孙在日

本受教育,回国后按在日本所学,依样画瓢。中国本地最好的报纸是日本人控制的,而本地报业蓬勃发展,本身就最具革命现象的意义……我们希望日本影响的扩张不会令人猛然一惊,相信日本真正的政策不是要强迫中国成为西方文化或思想的虚伪模仿者,而是使用西方的配件,以保存东方生活和政体的根基”<sup>⑩</sup>。

在这种西方(通常是传教士的)评论的背后,表明了西方(首先是与传教有关的)对中国改革影响迅速减弱的严重关注。在1895至1898年间,西方的影响曾达顶峰,而结果却是中国耻辱地被日本战败。立志改革的中国爱国人士,曾经向具有改革思想的或以前的传教士们请教,例如李提摩太,林乐知(Young J. Allen (1836—1907)),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傅兰雅(John Fryer, 1839年生),及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等。他们正像历史学家柯文(Paul Cohen)写的,“在动荡不定的时刻”,欣赏那“超出了他们最狂热梦想”的影响<sup>⑪</sup>。

构成这些影响的原因之一,是某些老传教士视野开阔了。例如,李佳白于1897年就中国政府和外国顾问的问题,提出一些老于世故的想法,邹明德综合如下:

李佳白认为中国改革者需要向西方学习,因为中国已经进口了不少西方的机器,出版了西方的科学著作,他说有必要评估其有利和不利方面。他还强调,遴选足具资格的西方人士担任中国官职的重要性,这是李提摩太已经提过的……李佳白强调,指派外国人为中国官员时,除他们的能力、威望和德行外,不应担当令中国人敏感的职位,而必须对“中国古代仁政”有充分理解,乐于坚守“中国的圣道”。他们还应有能力区别哪些是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的,哪些是不合适的<sup>⑫</sup>。

这明智的忠告马上面对一个无从解决的难题:中国政府到哪里一下子找那些具有专业资格、文化修养甚高、通晓中国语言和经



典的西方人士呢？

10

在 1899—1900 年义和团之乱期间及以后，西方传教士的影响骤衰。柯文指出的两点有助于了解这一变化。首先是政治分裂事件出现，老一辈的改革者反对激进派和革命分子，导致大多数传教士及其他人黯然离去；其次，更具决定性的是，“要获得中国以外世界的讯息，还有可供选择的途径（也是大多数中国人较易接受的途径）”，突然出现<sup>⑩</sup>。

本书验证了“可供选择途径”的开通和它的惊人后果。必须强调的是，那些“可供选择的途径”走得更远，绝非只向中国提供“讯息”，随着讯息而来的，就是方针、具体实施和协助训练。最好的“选择途径”，十居其九是日本来的。它们以个人服务方式，显示其兼具专长与文化素养，完全符合李佳白的要求。的确，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谁符合李佳白提出的标准呢？李佳白的忠告，不妨读作“非日本人毋庸问津”。中国官员们对此是充分认识的，在 1901—1911 年间，雇用了数以百计的日本人，而大量的西方人却离开了中国新政改革。

雇用了日本人，西方人的恐惧便接踵而来，担心日本人取代了白种人和他们的思想在中国的优势，甚而想象出黄种人联合起来反对白种人的幻象。不要忘记，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这样的年代，总过分担心白种和有色人种大规模的种族斗争迫在眉睫。“黄祸”之说在德国盛行；日本自身早在 1898 年 1 月，就宣扬种族战争的思想。高贵的近卫笃磨公爵（1863—1904），就在当时日本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杂志《太阳》<sup>⑪</sup>发表煽动性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剑拔弩张的《同人种同盟，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sup>⑫</sup>。

近卫写道：“我认为，东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外交策略虽然可能‘一时变态’，但仅是‘一时变态’。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这一

难点铭记心中<sup>⑮</sup>。”这位日本公爵的作者信念坚定，与日本和国外联系甚广，是中日紧密合作鼓吹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这就掀开了“黄金十年”，不但履及剑及，而且赋与深意<sup>⑯</sup>。

针对日本人在华取得的成就，英、美、法、德改变策略，对中国发动强大的文化外交和文化争夺。1908年11月，美国即将离任的罗斯福总统参与争夺，他宣称：“治疗‘黄祸’的药方，不管它叫什么”，都必须使“(中国人的)教化和生活准则”依循美国的教育和基督的教义<sup>⑰</sup>。为了付诸实施，罗斯福于12月28日以行政命令宣布，将中国1100万美元的义和团事件额外赔款，指定作为教育专用<sup>⑱</sup>。他所以这样做，除了其他原因外，是1906年3月一个美国教育家向他建议，促请他运用美国教育为手段，以达致“在思想和精神上统治(中国的)领导者”<sup>⑲</sup>。

西方在中国利益的增长和主动进取的增强，构成了对日本在中国特殊地位的挑战。离开当时西方的进取和追求，就难于理解中国何以于1908至1909年决定在寻求先进的教育和训练方面，由依靠日本转向西方。

## 新政革命？

12

西方历史学家运用“革命”一词时，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血腥的动乱——反对英国统治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静悄悄的”革命——农业革命、商业革命、科学及思想革命、工业革命、以至性革命和通讯革命，不那么具有戏剧性，但重要性却毫不逊色。

撇开不同的情况，怎样才能使用“革命”一词，汤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基本论点。他认为，人类思维以特殊方式构建世界，这就是典范(paradigm)。科学革命的结果，是“相对新的典范全部或部分取代旧的典范”。把这论断延伸到政治

领域,库恩认为,政治革命源于“增长中的观念……现存的架构已不足以应付存在的问题……在政治和科学发展中,失灵的观念导致危机,是革命的先决条件”<sup>②</sup>。库恩甚而把各章的标题都使用“危机”、“对危机的反应”、“世界观转变的革命”,革命的“无形性”及“革命的解决”等。

换句话说,革命是架构的根本变化。或则是架构中现存关系的变化(例如政治的或社会的),其过程是可以观察到的;或则是架构的转变过程已经完成,例如农业和商业。变化时间可能极长而难于察觉,例如农业革命;或者变化突然而来,但却无需暴力,例如今日的通讯革命;又或者变化既突然而又暴力的,例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13 本研究的焦点是 1911 年前中国“静悄悄的革命”,在 1898—1912 年,特别是 1901—1910 年间,中国在思想和体制方面,把长期形成的典范变为不同质的外来典范。中国统治阶层的精英,方向转变得如此激烈和持久,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它定性为革命,或者说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1901 年 1 月 29 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慈禧太后颁发了赫赫有名的新政改革上谕(全文见本书附录),发出震动朝野的指令,发动了这场转变。上谕提出:

“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sup>③</sup>

梅里贝斯·卡梅伦(Meribeth Cameron)称之为“改革运动宪章”的<sup>④</sup>、雄心壮志的上谕,在精神、意图和成就上,都堪与大名鼎鼎的、简洁的 1868 年明治《五条誓文》相匹敌。后者的第五条内容,便是“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sup>⑤</sup>。订定《五条誓文》以后,便

开始明治维新时政治上的扫荡,社会及思想上的转化,明治维新其实应称为“明治转变”或“明治革命”的<sup>⑦</sup>。

明治《五条誓文》和晚清的改革上谕,都是寻求外国知识以加强“皇基”,绝非削弱他们既得的成就。日本现代史学者普遍把1868年的《五条誓文》作为日本向外部世界开放精神的信号,确立了延续到今天江户时代以后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史学者却忽视1901年的改革上谕,虽然它所完成的恰恰是帝制后中国所要做的事:向外部世界发出中国开放精神的信号,把中国置于帝制后的进程。它的结果是革命性的,它把中国历史的进程根本而永久地改变了。 14

才华出众的梁启超(1873—1929)于1898—1912年流亡日本,在14年间,撰写了当时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论著。他在1904年4月发表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写道:“革命主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sup>⑧</sup>他探讨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类型,把革命规限于武装起义反对政府的最狭义上,因而对本研究毫无补助,但他的意见仍然是恰当的。本书论及的新政革命,介乎梁论述的第一和第二种定义之间:开辟了新纪元,超出了狭隘的政治范畴,包括思想和体制根本转变的革命。

清廷从未提“新政”一词,也未对改革的目的系统地解释,其真实含义近似于“新的政治体制”,包括教育、军事、警务、监狱、法律、司法和立宪政府—新政改革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发起者的意图或想象。虽然未能达到梁启超提出的革命最广义,改造“社会一切无形有形”的因素。无论如何,它终归提供了理解新世纪中国的必不可少的基线。

## 注 释

- ① 见任达著《被忘却的“黄金十年”》(Douglas R. Reynolds, “A Golden Decade Forgotten”)。
- ② 据张振鵬统计:“在这(1871—1945年)期间,日本以武力反对中国(包括直接对华战争,在中国土地上与其他列强的战争,武装干涉中国,及占领中国领土)共计11次,先后共计历时36年,其中几乎18个年头是日本对中国直接进行军事侵略的。从1894年至1945年这52年内,日本在华军事行动共计10次,前后共计历时35年。换句话说,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这半个世纪期间,30多个年头是日本以武力反对中国。”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张只限于在中国土地上的军事行动,遗漏了1884年在朝鲜的冲突和1918—1922年的西伯利亚干涉,因而他列举的较我的为少。见张振鵬著《近代日中关系的特征》,载井上清及卫藤沈吉编:《中日战争与日中关系:卢沟桥事件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记录》第155—157页。
- ③ 参阅神崎清著《日语在华北的文化势力(上)》,载《支那》1936年8月1日号。
- ④ 参阅实藤惠秀著《新日时代物语》,载实藤著《明治时期日中文化交流》第359—393页。“完全亲日年代”一语,见360页。
- ⑤ 参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第141页。
- ⑥ 潘慎文著《日本对中国的新侵略》(A. P. Parker, “A New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Chinese Recorder* 32.7:356 (July, 1901))。
- ⑦ 见注⑥第357—358页。在我未读根津一的两篇文章前,潘慎文对东亚同文书院长远图谋的敏锐洞察力,曾使我大惑不解。根津一于1923年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文章早在1900年以中国文言文写成,标题是《兴学要旨》和《立教纲领》,论述日本希望在教育方面与中国合作,阐明了潘慎文所指责的日本意图。1901年为准备东亚同文书院5月26日正式开办,两文在上海重新发表,这就方便了潘慎文。两文均载入《东亚同文会史》(东京,1988年)325—327页。日文译本收入《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东京,1982),第715—718页,及第71页,第88—89页。
- ⑧ 见任达著《战前中国的地区研究》与《训练年轻的中国通》(Douglas R. Reynolds, “Chinese Area Studies in Prewar China”; and Douglas R. Reynolds, “Training Young China Hands”)。

- ⑨ 乔治·林奇著《中国的日本化》(George Lynch, "Japanization of China", *Nineteenth Century* 54:216-224 (August 1903))。
- ⑩ 雷里·宾茹著《中国的日本化》(Rene Pinon, "La Japonization de la Chine", *Revue des Deux Mondes* (August 1905))。引文见王风冈著《日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 1895—1911年》(北平, 1933年)第107页。
- ⑪ 日文译文摘自1905年12月根津一给东京东亚同文会秋季会员大会报告, 载入《东亚同文会史》第403页。
- ⑫ 李提摩太引语见注⑩王风冈著第106页, 摘引自《生气蓬勃的年代》(*Living Age* 248:637 (1906)), 着重点为作者所加。
- ⑬ 保罗·柯文著《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Paul A. Cohen, "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00, Part 1* (Cambridge, 1978))第586—587页及第590页。
- ⑭ 邹明德著《从传教士到改革鼓吹者: 李佳白与晚清改革运动》第23—24页。引用时略加删改, 并经作者同意。
- ⑮ 见注⑬第589页。
- ⑯ 有关《太阳》的历史, 分析该刊对中国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的态度, 及1895年1月5日至1928年2月1日每期内容的综合目录, 见铃木正节著《博文馆《太阳》之研究》。
- ⑰ 见《近卫笃磨日记》第62—63页《同人种同盟, 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 该文又载于《东亚同文会史》第180—181页。
- ⑱ 见马里乌斯·詹森著《近卫笃磨》, 载入江晃(音)编: 《在政治及文化交流中的中日文著》第113—114页。
- ⑲ 詹森著《近卫笃磨》是使人爱不释手的著作, 可与《东亚同文会史》第48—67页资料丰富的有关近卫的章节并读。尽管近卫在1904年42岁时过早去世, 但在40年代初期, 在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中, 就“谁是现代中日关系著名的日本先驱”问题进行投票。反应强烈的调查结果是: 代表官方层次的近卫笃磨, 和代表非官方层次的岸田吟香。这充分表明了近卫公爵的重要性。卫藤沈吉著《日本人和中国革命: 岸田吟香的案例》, 引证了这次调查。卫藤这著作载入《日本社会与文化的历史丛书》第七卷《日本在世界上》(Miwa Kimitada ed. Tokyo: Kōdansha, 1974 p. 214)。岸田

吟香有助于引入“黄金十年”的概念,评述岸田的英文著作,见任达著《前帝国主义:岸田吟香,谋求中国市场的先驱》。

- ⑳ 见罗斯福著《觉醒中的中国》(Theodore Roosevelt, “The Awakening of China”, *The Outlook* (New York) 90.13:666 (28 Nov. 1908))。
- ㉑ 迈克尔·亨特著《美国减免庚子赔款的再评价》,及阿部洋著《美国运用庚子赔款的对华文化事业》。
- ㉒ 引自上注亨特著第 550 页。
- ㉓ 见汤马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
- ㉔ 《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 4602 页,见本书附录。
- ㉕ 见序言注⑤卡梅伦著第 57 页。
- ㉖ 论述近代日本历史,必然参考《五条誓文》。罗纳特·斯普尔定断言,英译本“误译者比比皆是”。见 Robert M. Spaulding, “Charter Oath” in *Kodansha Encyclopedia of Japan* (Tokyo: Kodansha, 1983) I.267(中译按吴杰主编《日本史辞典》,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年——译者注)。
- ㉗ Tetsuo Najita 令人信服地断言,明治维新的标准英译“Meiji Restoration”,“是对维新一词极不合适的译文。由于误译,已相当程度地影响西方对明治维新的观点。在表意文字中,‘维’是指把社会上不同的立场聚结,并重新组合为原样;‘新’是指从全新的方向开始,而 Restoration 却没有表达‘维新’一词的革命性内涵……”他进而说到,明治维新“完全重组了(日本的)政体,包括经济、教育和意识形态体系”。见 Najita Tetsuo, “Conceptual Consciousness in the Meiji Ishin”, in Nagai Michio and Miguel Urrutia, eds., *Meiji Ishin: Restoration and Revolution* (Tokyo, 1985), pp. 83 and 85, respectively. For elaboration, see pp. 83-86, 101-102。

在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中确定地使用(Meiji Restoration)一词,就把曾经历最完全革命之一的明治维新,从革命的概念中排挤出去了。但问题终究存在于革命的静悄悄性质中(in the quiet nature of the revolution):即使明治维新更为血腥,即使它超越阶级界线而较少贵族式的,即使它延续时间更长及更为痛苦,即使它产生更多殉难者和“革命英雄”——即使一切确然如此,毫无疑问,结果也绝对相同,它总是在所有值得庆贺的和“成功”的现代革命中的一篇特写。(据《辞源》“维新”条:“诗《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维,为语词,言周至文王,乃成新国。……

后称变旧法、行新政为维新”——译者注)。

- ⑧ 见梁启超著《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46/48，1904年4月，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1901—1904年）第803页（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



## 第一编

### 日本的作用及其背景

## 第二章 “黄金十年”的序曲

17

值得注意的是,1898—1910年间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是事前从未料到的。1894—1895年,中日两国是战敌;而到1898年中,却彼此成了朋友,甚至差不多是盟友了。如何在短短的三年里,从不共戴天的敌意化作表面的友谊,这是个复杂而难解的问题。既然整个“黄金十年”是依据1898年后的态势和关系而论断的,这就需要对战后的变化及其意义进行专门的论证。

1894—1895年,日本在海上和陆上都决定性地战败了中国,整个中国蒙受羞愧、震惊和耻辱,受到全面反对的马关条约更加深了对日本的痛恨。马关条约于1895年4月17日签署,南方的台湾和北方的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承认朝鲜自主,赔款白银二万万两,日本向中国榨取这前所未有的巨额赔款,相当于清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的8900万两的两倍多<sup>①</sup>。

在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签订前,在战争开始时小心翼翼地持中立态度的俄国<sup>②</sup>,告诫日本不得在朝鲜或中国攫取领土,因为俄国视此为其利益范围。日本军方对俄国的警告置之不理。俄国在签订和约两个多月前,就在国内及和欧洲盟友商讨对策,决心采取行动。条约签署后6天,俄、德、法三国驻东京公使便于

18 4月23日与日本外相会晤,表示特别反对日本割取辽东半岛,如果不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便将对日采取军事行动<sup>③</sup>。这就是1895年声名狼藉的三国干预,中国因此得回辽东半岛,也因此使日本受辱而愤怒。

从中国人观点看来,俄国干涉是一种恩惠,清廷因而给最积极的俄、法、德公使等13名有关外交家颁发了奖章,为的是他们对中国作出了贡献<sup>④</sup>。俄国又进一步对中国提供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应付头一年的一万万两赔款。亲俄情绪的浪潮掀起来了。中国当局一位领导人在30年代初缅怀往事时称:“慈禧与李鸿章(李鸿章<1823—1901>,是枢廷外最有势力的官吏)固夙主亲俄,迨经三国索还辽东,内而廷臣,外而疆吏,乃无不以联俄拒日为言矣。”<sup>⑤</sup>事实上,签署马关条约的全权大臣李鸿章,1896年6月就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以防御日本,密约规定中国允许俄国的中东铁路通过满洲北部直达海参崴<sup>⑥</sup>。这一切引起日本军方不安,担心遭受国际“孤立”<sup>⑦</sup>。

与此同时,中国深感1895年后恶运当头,开始反思国内形势,从1895年开始,尤其是1896—1898年间,在相辅相成的三方面大力发展,大致上把日本作为现代改革的样本。学者、官员和“绅士—文人”开始在全省各大城市提出修改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课程;各地精英分子组织的“学社”,在此期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横跨省界,为数75个以上;新办的报纸全国约60份<sup>⑧</sup>,其中湖南尤为有声有色。始于1895年的各省自强运动<sup>⑨</sup>,在1877—1880年驻日参赞黄遵宪(1848—1905)<sup>⑩</sup>及青年学者梁启超的影响下,于1897—1898年间进入带根本性的阶段,鲜明地突出要求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内容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sup>⑪</sup>。

在这历史背景下,1897年末至1898年初,中日两国在各自单独的发展中,突然产生了共同感觉到的需求:在中国,以复杂的心情谋求在日本帮助下,进行现代化改革,特别是加强军力<sup>⑫</sup>;而日

本则甚而更为迫切,谋求在中国帮助下,阻止俄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可怕的推进。日本在1897年末的恐惧,其焦点依然是1895年在辽东半岛干涉日本的三角同盟:俄国在中国的东北,特别是在满洲和朝鲜;德国在华北、山东省;法国在东南,与日本的新殖民地台湾隔海相望。这与英国的忧虑不谋而合,担心外国对中国领土的要求会危及英国在亚洲庞大的商业利益<sup>⑬</sup>。英国关心的是不妨碍商业机会,这有助于美国1899年门户开放政策的形成<sup>⑭</sup>。英日两国在此期间有着共同的安全需要,为1902年英日同盟奠下基础,这是英国第一次与非西方强国结成联盟<sup>⑮</sup>。

1897年11月14日,德军以报复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害为借口,占据了长期梦寐以求的山东南部胶州湾及青岛炮台;俄国人在11月15日又以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侵略为借口,开进旅顺、大连。德国驻北京公使随即在11月22日提出强硬要求,终于在1898年3月6日签订条约,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并有权征用自胶州至省会济南的土地,修筑铁路和矿山。俄国方面则于1898年3月27日,在把日本人逐出旅大后仅仅3年,取得了旅顺、大连的25年租借权,及兴建南满铁路。6天以后,英国在4月2日获得租借威海卫25年。威海卫位于山东海岬北部,陆地与在青岛的德国人相望,越过渤海便是在大连的俄国人。

20

1898年2月11日,英国迫使中国答应,不得将长江流域割让与其他任何外国。4月10日,法国取得与法属印支相接的广州湾99年租约;4月10日又取得中国承诺,不割让广东、广西及云南三省(值得注意的是,同日总理衙门电飭驻日公使抄寄日本武备、水师两学堂章程。)。日本对此极具戒心,于4月24日迫使中国承诺不割让福建省;同一天,英国取得毗邻香港的九龙99年的租约<sup>⑯</sup>。

就在德、俄首次采取行动“分割中国”前,主要担心俄国的日本军方,谨慎地主动向中国示意,1897年10月底首现契机,日本驻天津领事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1830—1908)传话<sup>⑰</sup>,日

本参谋本部邀请中国军事观察团参观 11 月中旬在九州举行的盛大军事演习。当王派遣的代表团抵达长崎时, 欢迎他们的正是陆军中将参谋次长川上操六(1848—1899)。代表团自始至终受到贵宾式接待, 特意挑选的陪同官员更悉心关照。王文韶对接待非常满意, 建议向川上操六为首的九位主人, 授以中国宝星勋章<sup>21</sup>。

1898 年 1 月升任为参谋总长的川上操六, 不但是这次活动的主要幕后活动者, 也是主动对中国提出军事方面建议的首脑。这应称之为“川上主动”, 那是川上于 1899 年 5 月死后仍在执行的一整套政策和行动<sup>22</sup>。他依照没有永久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久利益的原则, 恢宏地论述了在战胜中国后, 日本战略思想的弹性。按照他对启动“黄金十年”的特殊作用, 那是颇具讽刺性的, 正是这川上操六, 在 1894—1895 年日本战胜中国时被誉为主要策划者和英雄, 而且他还被认定是“特殊的军事人材, 在煽动战争方面, 他的活动和影响总远远高出于他人之上<sup>23</sup>。”

然而到了 1897 年, 川上已不再将中国视为日本的主要“假想敌”, 注意力已转向俄国。10 月时对中国的邀请, 表示了日本修好的愿望。当华北的活动仍在进行时, 川上便考虑派代表团到华中。他挑选了神尾光臣(1855—1927)大佐(后任大将)担任团长<sup>24</sup>。这位神尾也列在王文韶的授勋名单中, 而且仅在川上之下, 他是军队中罕有的“支那通”, 1882—1886 年曾在中国工作, 1892—1894 及 1895—1897 年间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 任满时受川上指示, 经从长江中、下游返日, 沿途联系当地主要官员。川上还另外派宇都宫太郎(1861—1922)到同一地区, 他是川上忠诚的下属(后升为大将), 可能曾为川上制定未来对俄作战计划。他完成此次任务后, 被认为“开拓了日支亲善的端倪”<sup>25</sup>。

1897 年 12 月至 1898 年 2 月间, 神尾、宇都宫和其他官员, 闪电式地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高级官员, 举行了一连串关键性的会议, 包括在南京的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及江西)兼南洋大臣刘

坤一(1830—1902),在武昌的湖广总督(管辖湖北及湖南)张之洞等。

起初,刘张二人似乎并不附和日本人的建议,仅在两年半前,于1895年7、8月间,他们都曾分别上奏朝廷,促请联俄拒日<sup>③</sup>。张担心日本人这次又要求商业和军事特权,故意于1897年12月中旬离开官邸,让助手挡驾,然而神尾切实的留言,使他大为惊讶,立即致信神尾为未能会晤而道歉,并表示大致同意神尾的意见<sup>④</sup>。 22

张之洞于1898年1月2日把神尾的意见电奏总理衙门,称“倭参谋部副将神尾光臣到鄂,洞出省未回……大略言前年之战,彼此俱误。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东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sup>⑤</sup>。”

由于俄德两国在北方的行径,这些论点虽则有点似是而非及诡诈,却获得赞同并具有迫切感。按张报称日本人的说法,说战争“彼此俱误”,但既没有人提出减少削弱着中国的战争赔款,或将台湾归还中国以改正错误;也不见这些日本人批评本国政府,为了经济上支持扩张军备,强硬坚持支付赔款期限。日本人的任何道歉,充其量也不过是礼貌性的言辞。日本人习以为常的礼节,寒暄时总是以这样那样为由,道歉一番。张和他的幕僚不了解日本人的礼节,把表面价值当真了(在张的报告中,仍蔑视日本为“倭”(矮子),将日语模糊地称为“东文”)。

撇开美丽的言词来看,派到中国的日本军官都是极为能干、严谨任事,予人印象深刻的官员,神尾光臣就是他们尽忠职守的范例,1898年1月,他在其父丧事结束后便返回华中,继续完成川上交付的任务<sup>⑥</sup>。极具诱惑的承诺层出不穷,吸引着中国人。张之洞在其1898年1月2日的报告中,就说宇都宫太郎“极其殷勤”;并称“致其提督川上操六之命”,向中国提供有关日本地图及政治书籍;还说宇都宫“并言今日武备最要。嘱派人到彼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地近,费省。该国必优待切教”<sup>⑦</sup>。 23

就这样,在1898年底,中国人热衷改革,日本人不断劝诱,两国共同对西方再次侵略的戒备,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克服了深深的敌意,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中日合作的新纪元——“彼此共同利用”的时代<sup>⑩</sup>,这就是我说的“黄金十年”。

### 注 释

- ① 见徐中约著《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载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107—110页。
- ② 佐佐木杨著《1894—1895年中日战争时的国际环境:英、俄远东政策及中日战争之开端》,载《蹇蹇录》(*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42:1-74(1984))。
- ③ 参阅陆奥宗光著《Kenkenroku: 1894—1895年中日战争的外交纪录》(Gordon Mark Berger, ed. and tr. (Tokyo, 1982), pp.203-255);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史辞典》(Tokyo, 1979), pp.333-335, App., pp.22-23。
- ④ 授勋建议由中国驻东京公使裕庚于1896年11月22日提出(法国5枚,德国4枚,俄国4枚),受勋外交家的姓名、职衔及受勋等级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卷50第7页,第13—14页,下册总第963—966页。
- ⑤ 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3,北京,1980—1982),第三卷,第94页。
- ⑥ 见注①徐著第110—112页。该条约英译本见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概览》第130—131页。
- ⑦ 见南里知树编《中国政府雇用之日本人:日本人顾问人名表与解说》第10页,第17页。
- ⑧ 张灏著《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载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330—336页。又见闻小波的极其重要文章《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载《学术月刊》1993年第3期第55—60页。
- ⑨ 刘易斯著《湖南名流与维新运动,1895—1898年》。
- ⑩ 有关黄遵宪,见蒲地典子超卓的研著《中国的改革:黄遵宪与日本模式》。黄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日本国志》,尤其值得注意。该书成书于

- 1887年前后,1895年出版,当时正是中国对日本及其政治变革的思想形成期。黄对中国改革提出许多具体建议,因而他的著作成为“中国改革的参考书”(见蒲地典子著第148页)。
- ⑪ 注⑧张灏著第300—318页;里查·霍华德著《日本在康有为改革方案中的角色》;彭泽周著《康有为的改革运动与明治维新》及《日本明治改革的影响及效果》,载彭著《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京都,1976年)第1—79页,第81—158页;又见刘易斯著《中国革命的序幕:湖南省思想和体制的转变,1891—1907年》(Charlton M. Lewis, *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 1891-1907* (Cambridge, Mass., 1967))。
- ⑫ 从1860年至1894年战争期间,中国力主自强的人们对日本的认识程度,参阅刘学照、方大伦著《清末民初中国人对日观的演变》(近代史研究54:124—133,1988年11月)。秦凯乐·雷诺著《东方与东方相遇:中国人对日本明治初期的看法(约1870—1984年)》,在那些年间,即使最有见识的中国人,对日本真正认识的限度,也绝不超过雷诺该文披露的。
- ⑬ 日英两国关注点的相同,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6—9页,下册总第973—975页,它记录了当时来自英国和日本的讯息。
- ⑭ 见玛莉莲·布列特·杨著《帝国的花言巧语:1895—1901年美国对华政策》。
- ⑮ 有关这次联盟的环境,见伊恩·尼什著《1894—1907年的英日同盟》。
- ⑯ 按日期排列,见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台北,1963;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又见小岛昌太郎著《近代中国大事年表》第245—246,第251页。
- ⑰ 总理衙门于1897年10月29日收到王文韶有关日本邀请的报告,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5页,下册总第973页。“北洋大臣”的英译,相当普遍而有误导之弊的译文是“Superintendent of Trade for Northern Ports”(北方口岸贸易监督),依据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我主张译为“High Commissioner for Military and Foreign Affairs”(军务及外事高级专员),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英译本中,对在天津的北洋大臣和在南京的南洋大臣的职能,有简要解释,见第283页注⑳(黄原著中并无此注)。此注说明何以“High Commissioner for Military and Foreign



Affairs”远胜于其他英译。

- ⑱ 王文韶于 1898 年 1 月 9 日向总理衙门的建议,包括受勋者姓名、军阶及建议授勋等级,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51,第 10—11 页,下册总第 975—976 页。
- ⑲ 见小林共明著《中国早期派日留学生》。
- ⑳ 欧内斯特·杨著《导致 1894—1895 年中日战争若干事件的日本组织和个人之研究》。
- ㉑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Ⅲ第 243—244 页。
- ㉒ 同上注第 390 页,又见小林共明著《中国早期派日留学生》第 5 页。
- ㉓ 奏折内容见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三卷第 94—96 页。英译本见邓嗣禹、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 127—130 页。
- ㉔ 致神尾信的日期为 1897 年 12 月 27 日。本段据本章注⑪霍华德著第 340 页注⑫。
- ㉕ 见《张文襄公文集》,王树楠主编(1928,北京:中国书店,1990)卷 79 第 19 页(第二册,第 348 页);又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51,第 8—9 页,下册总第 974—975 页,注有“1898 年 1 月 3 日到”。
- ㉖ 小林共明著《中国早期派日留学生》第 5—6 页,第 15 页注⑫。
- ㉗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79 第 19 页(第二册第 348 页);又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51,第 9 页,下册总第 975 页,摘引自注⑳小林共明著第 5 页。
- ㉘ 平野健一郎语,引语见本书《序言》。

### 第三章 两面开弓的日本战略： 军事的和非军事的

24

1897 至 1898 年间,日本和中国打交道时,为使中国依附日本,开始运用两面开弓的战略,一面是军事的,另一面是非军事的。每一面各有不同的演员,甚少重叠。军事方面由参谋本部策划;非军事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多年来没有(尽或试图制定)统一的中国政策,并没有类似的协调中心。

尽管缺乏协调,军事的和非军事的因素却都受整套相同的动机所推动,这包括民族自大,民族私利,和文化上对中国的密切关系和受惠感。在与中国人交往中,日本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两国共同的利益。

#### 军事策略

神尾光臣是军人的典范,他坦率地把日本战略的动机告知中国。1897 年底受邀到武汉时,他代表川上操六向张之洞声言,“故今日急欲联英联中,以抗俄、德而图自保”<sup>①</sup>。1898 年 2 月中旬,神尾、宇都宫和步兵大尉梶川重太郎(1902 年生)<sup>②</sup>在与湖南改革者谭嗣同(1866—1898)会晤时,说的也是同一腔调。他们在

对中国战争表示遗憾后,便建议中日结成联盟或联邦,日本向中国提供援助。他们强调,日本这样做仅是为了自身最佳利益<sup>③</sup>。

张之洞于1898年1月2日呈报总理衙门称,“倭人此举,利害甚明,于我似甚有益”<sup>④</sup>。写这些话的人是个谨慎的现实主义者。由于在困难的岗位任职多年,他从国家的角度,视野开阔了不少。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时,他任两广总督,必然尽力支持战争,战争失败后转而致力于“自强”。最初在广州及1889年后在武汉,他都致力于地方武装、教育及工业企业<sup>⑤</sup>。

在1894—1895年对日战争中,张再次全力以赴,最初在武汉,当刘坤一暂时领兵到北方时,他在南京署理两江总督,接二连三提出建议和办法,以维护从北方黄海、华中长江流域,远及南方台湾的中国利益<sup>⑥</sup>。战事失败促使他倍加努力,战争刚刚结束,他立即提出成立自强军的初步方案,在南京成立第一所现代化的江南陆师学堂(1895—1909),在湖北成立湖北武备学堂(1896—1906)。由于认为日本的军事胜利是采用了德国兵制,张在1896年2月2日奏请中国应同样采用德国兵制,建立新型陆军军官学校<sup>⑦</sup>。与此相应,他按德国模式制定军事训练计划,为他的南京陆师学堂雇请了35位德国官员和顾问,为武昌武备学堂雇请了6位<sup>⑧</sup>。然而1896年后,武昌一些德国顾问态度傲慢,盛气凌人,引起学生不满和职员反抗,导致1898年至少有一名军校的中国高级行政官员被迫辞职<sup>⑨</sup>。1897年11月德国占据胶州后,对德国的怀疑便进一步增加了。

日本的主动迎合,中国人认为是大好时机。对张之洞而言,日本的军事上帮助可能减少对德国顾问的依赖;他还进一步认为,与日合作可能开辟接近英国人的道路。作为扩展援助和协调的代价,英国会要求租借长江流域以对抗俄德。因此张在1898年1月的报告称,“倭肯出力劝英与我联,则英不能非理要求,而我可藉英之援助矣。”<sup>⑩</sup>

1898年2月初,神尾、宇都宫和梶川与张之洞及其湖北现代革新者会晤时,共同商定派遣中国教育考察团赴日。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由吏部姚锡光(1856—192?)领队,宇都宫陪同,行期共约两月。姚返国后,于1898年4月22日向张之洞提交了此行报告,这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东瀛学校举概》。该书既总论日本的官立、公立、私立等学校,又分类叙述了日本的普通学校(小、中、师范学校),各陆军学校,各专门学校(高等、大学、学院、工业、技术学校),及其他各种学校(商业、师范音乐、盲哑、女子高等、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华族女学院)等。该书于1899—1900年间发行了三版,说明是流传甚广的<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掺合了日本人提出到日学习意见、颇具影响的《劝学篇》,就是在姚返国以后写成的<sup>②</sup>。

1898年,主管中国人在日军事教育的官员是步兵大佐福岛安正(1852—1919,后任参谋次长,随即升为大将)。他是非凡的天才,就像神尾一样,某些方面也是“支那通”,在王文韶的授勋名单中排列第三位,仅次于川上和神尾。他在柏林曾任武官5年,1892—1893年间回国,曾以504天的时间,主要靠骑马,从柏林起行,横跨西伯利亚到达海参崴,行程15000公里。这创历史的事迹吸引了日本人的想象力,他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sup>③</sup>。在1894—1895年对华作战期间,在 frontline 表现杰出,然后参与统治新近攫取的台湾<sup>④</sup>。更直接有关的是,1899年春,福岛任参谋本部情报长官,受川上派遣,打探长江沿岸官员对中国有被西方瓜分危险的态度。四月间,他会见了总督刘坤一、张之洞和他们的高级幕僚,彼此都认同西方威胁中国的严重性,尤其是北方;都赞同中日合作,通过改善军事训练,进行对抗。

福岛和张彪举行了秘密会谈,张彪(1860—1927)是张之洞的高级将领和助手,据说曾于1897年到日本视察军事系统<sup>⑤</sup>。福岛和张都认为需要加强长江的陆、海军,但认为地方“不应在政策上

与北京政府疏离”，宁把“它的力量用于不动声色地迫使北京为国家进行紧要的事业”<sup>①6</sup>。从他其他会谈的秘密报告判断，在福岛的心目中，是要为长江沿岸的六省：四川、湖广（张之洞管辖的湖北、湖南）和两江（刘坤一管辖的江苏、安徽、江西）训练现代化的军队，作为抗衡在北方俄国的砝码<sup>①7</sup>。

福岛的报告是写给参谋总长川上操六的，但就在福岛返回东京前一天，川上于1899年5月11日逝世了<sup>①8</sup>。然而由于神尾、宇都宫和福岛等天才的军官帮助下，这位有才干的战略家当时已经构建了震动世人的形势，建造了中日之间军事的和非军事的合作基础，这在两年前的不可想象的。

## 非军事策略

与日本在国外主动开展军事协作活动的同时，在国内也有人倡导非军事的协作活动，一些杰出人士发出“支那分割”的警告<sup>①9</sup>，  
28 号召“支那保全”<sup>②0</sup>。“支那分割”的说法，在1898年1月1日出版的《太阳》中，近卫笃磨公爵在谈及种族联盟的评论中已有论述。近卫认为，中日两国的命运不可分离，要求日本摆脱战后对中国的鄙视心理<sup>②1</sup>，通过旅游、社会接触、土地调查等直接了解中国。他提出不应犹疑观望，使白种人反对黄种人的侵略得以加速进行，让大规模的种族冲突迫在眉睫<sup>②2</sup>。

在4月20日出版的同一刊物中，东京帝国大学校长、教育家、哲学家外山正一（1848—1900）发表《支那帝国之命运与日本国民之任务》一文指出：“我的观念是，支那的存亡对所有日本国民自家的安危有切实的关系。”外山提出，政治家、外交家、军人、学者、技师和佛教僧侣都应为中国作出贡献，推动中国新思想和教育，“鼓吹国家观念”<sup>②3</sup>。

颇为明显地持自助观念、随任农商务大臣的大石正已（1855—

1935),在其刊载于5月5日出版的《太阳》中的评论《东洋的形势及将来》中称:“如果希望彻底的实现此方针(以保护我在华既得的权益),首先必须防止清国分割的危机而确保其平和,诱促其进步,增长其资产及实力。这样,我帝国与列强的对立中,才能维持东洋的均势<sup>④</sup>。”

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1867—1937),在为8月20日《太阳》写的评论《关于清国留学生》中指出,中国战败后的四五年来,“一朝反省”,使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由轻蔑嫌恶转为尊敬。由于这样的原因,也由于中国正进行朝气蓬勃的改革(6月11日—9月21日的百日维新),中国已决定依赖她的学生在日本所受的现代教育。上田提出:“我国应如何觉悟反省一己之重任?”他在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时,提出“务以我帝国全国之力,谋求协助彼等获得成效的方法”。他最后呼吁“日本帝国必须不惜金钱为清国留学生建立完备设施,以避免破坏彼国委托人之大事业”<sup>⑤</sup>。 29

就这样,从1898年年初开始,为了与西方帝国主义直接相关的原因,为了民族利益,杰出的日本人大声疾呼与中国合作,突然成为政治时髦。这是意义深远的新的开端,中国从新的途径进入日本的民众意识。

在政府的层面上,在1897年3月到1899年12月这两年半中,担任日本特命全权驻华公使、颇具名望的谷野文雄(1850—1931),是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人物。他是明治初年自由民权运动的老手,日本众所周知的作家和新闻记者,与党魁和教育学家大隈重信(1838—1922)在政治上关系密切<sup>⑥</sup>。谷野以驻华公使的身份自行其事,为政府承担责任,鼓励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1898年四五月间,谷野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写信给中国官员,表示日本政府承诺支付两百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的费用。由于事前未获授权,马上受到外务大臣西德二郎(1847—1912)申斥,认为承诺过

多。不过西德虽然申斥,但仍确认日本既已作出承诺,便有责任如数支付<sup>②</sup>。

虽是如此这般地付出了“代价”,也赢得了中国的好感。几个月后,1898年9月7日光绪皇帝致函日本天皇时,便力赞谷野。信中写道:“贵国驻京使臣谷野文雄到华以来,凡遇两国交涉之事,无不准情酌理,归于公平,已征邻好。曩复贻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述贵国政府关念中国需才孔急,愿中国派学生前赴贵国学堂肆习各种学问,尤佩大皇帝休戚相关之谊,曷胜感谢。朕已谕令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与贵国驻京使臣商订章程,认真选派,以副大皇帝盛意。”<sup>③</sup>

相信谷野对中国的承诺绝非出于天真,他的思想可算灵敏型的典范,为民族本身利益而精于盘算,这充分体现在他1898年5月14日致外相西德二郎的秘密函件中,他在信里是盘算着对日本反复循环的利益的: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军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20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sup>④</sup>。

还在这些日本人表示关注之前,若干重要人物在中断了一段时间后(最后是1890年组织的东方协会<sup>⑤</sup>),又再组织有关中国的新的会社。1897年春,长期以来对党派活动非常积极的犬养毅(1855—1932),聚集了明治中期新闻界的重要人物,如陆羯南(1857—1907),三宅雪岭(1860—1945),志贺重昂(1863—1927),池部吉太郎(1864—1912);政治家如议员平冈浩太郎(1851—

1906), 江藤新作(1863—1910);及中国留学生的积极分子,如最著名的井上雅二(1877—1947,原东京专门学校学生,后转早稻田大学)组成东亚会,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当前形势,发表他们的看法。有意义的是,东亚会同情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等改革者的努力。1898年9月,康、梁在百日维新失败流亡日本后,东亚会欢迎康、梁加入为会员<sup>①</sup>。

1898年年中,那些独自努力的人们是以精力充沛的近卫笃磨公爵为中心的。由于近卫一直公开发表他对中国的观点,因中国问题积极分子荒尾精(1859—1896)<sup>②</sup>于1896年英年早逝而不知所措的人们,便围绕在近卫的周围,形成日本的星座。1898年6月,近卫及其同道组织了同文会。同文会这一名称是颇具深意的,它源于当时相当普遍的和富于情感的概念: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相互联结(这概念也见之于张之洞在1898年1月2日给朝廷的奏折中)。然而在组建同文会的成员中,部分人根本不存在情绪化的、抽象的理想主义。原来荒尾精的伙伴们,他们具有在中国当间谍和商人相传的经验,强调需要收集中国更多的准确数据,需要与中国的敌方交换情报,需要在中日两地从事教育和出版活动,需要在中国进行特殊的投资和交易<sup>③</sup>。

东亚会和同文会受人尊敬的组织者们很快便发现经费不足,无法达到原来建会的目的。乘着日本从1898年6月—11月间短命的首届内阁成立的机会,犬养毅和近卫凭着与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相熟,分别向政府请求补助金。大隈同情地聆听,却告诉他们政府没有资金资助不仅目的相同,成员亦相互交错的重叠的组织<sup>④</sup>。他要求两会合并,1898年11月2日也终于合并了。

新的东亚同文会将原来组织的名称合二为一,统由大卫公爵领导。然而联合却非轻而易举的,在11月2日的合并会议上,两派就政策问题激烈争论,一派是原东亚会成员,包括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彻底改革者和对孙中山革命的同情者;另一派是原同文会成



员,他们更着眼于商业和教育而不是采取政治行动。

大卫公爵凭个人调停而打破僵局,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面临被西方瓜分的危机,说服与会者把“支那保全”作为压倒一切的急务,密切注视。在随后数年中,反对“支那分割”成为激励东亚同文会的有力口号<sup>⑤</sup>。该会还极其体面而恰当地制定了四项建会原则:1.“支那保全”;2.“支那改善”;3.研讨支那时事及决定适当行动;4.唤起社会舆论<sup>⑥</sup>。

东亚同文会是按大隈要求合并的,合并后也和外务省官员的思想相近。从1899年开始,每年从外务省机密费中获得4万日元津贴。津贴是从不间断的,东亚同文会也忠实地向外务省汇报情况和报告,这使该会打上半官方的印记,成为本世纪初20多年间日本对中国进行研究及文化事业最重要的机构<sup>⑦</sup>。

33 在大隈重信方面,他在1898年6月底至11月初的第一届大隈短命内阁期间,表明了他自己对中国的一些观点,有时被称为“大隈原则”,他认为日本长期从中国文化中获益良多,是负债者,现在该是日本报恩,帮助中国改革与自强的时候了<sup>⑧</sup>。

大隈原则反映了、或较大范围地可能影响了日本军界及非军界的思想。例如,1899年5月5日《太阳》发表了大鸟圭介(1832—1911)题为《对清国今昔感情之变化》的讲词,大鸟于1889年任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翌年兼任驻朝鲜公使,他在讲话中称赞近期大量中国学生赴日,认为这是为未来锻造友谊和互助的纽带,是“以酬往昔师导之恩义”<sup>⑨</sup>。1899年10月27日,两位四川省派遣的武官拜会日本新任参谋总长大山严(1842—1916)元帅时,也表述了实质相同的看法。其中一位武官在其日记中写道:“拜会参谋总长大山元帅,言今日协力之事,谓唐以来,日本饮食、衣服、起居、学问之事,皆中国赠之。今日之愿助力者,不唯辅车唇齿之义,亦以报往日之赐。意至谦笃。”<sup>⑩</sup>“辅车唇齿”是中国惯用成语,日文把这复合词互调为“唇齿辅车”。在这世纪的转换期,这寓意丰富

的成语被两国在一切问题上广泛应用。例如在百日维新最盛时，光绪皇帝于1898年9月致信日皇时，亦以此语盛赞谷野文雄公使<sup>④</sup>。

## 百日维新

34

从1898年6月2日到9月21日著名的百日维新，由于是最高层合法地确认对日本新的评价，不应等闲视之。对日本一向极感兴趣的激进改革者们，诸如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都直接参加了。由于光绪皇帝决心支持，1895年后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高潮<sup>⑤</sup>。在103天内，颁发上谕一百多道，下令在经济、军事、文教及行政事务等方面进行改革。9月初，光绪命谭嗣同等四人任军机章京，协助处理改革事宜。这引起了朝廷顽固分子的恐惧，空穴来风的阴谋、火上加油的谣言都加在康有为身上。其实，他在这整个运动中所充当的角色，被大大地夸张了<sup>⑥</sup>。

无论康、梁、谭及黄遵宪个人在百日维新中的作用如何，由于不断地把日本作为范例加以宣传，结果是使许多改革都受明治原型的启发。得意洋洋的日本人，以强烈的兴趣注视着中国大胆的尝试<sup>⑦</sup>。在9月中，改革即将结束的时候，三度担任首相的伊藤博文(1841—1909)，以非官方身份到中国观察改革情况。和他同船到天津的辻武雄(1868—1931)，是发行《教育时论》的公司的副社长，后来又担任重要的顾问、教习及长期对中国戏剧性事件的评论员<sup>⑧</sup>，专门收集中国教育改革的情况。返日后，他向日本读者报导称：“清国维新方针，不但大体根据我国，特别是教育一切都仿效我国制度，并派帝国大学(京师大学堂)视察员赴日，派遣留学生赴日，招聘日本的教员。”<sup>⑨</sup>从改革期间中国驻东京公使裕庚(1905年死)的官方交往看，中国高层明显地是关注教育的<sup>⑩</sup>。

伊藤博文9月11日抵天津后，不少人向他要求日本给予援 35

助。个别热心人士,甚至比李提摩太提出让伊藤任政府高级改革顾问的建议更为大胆,竟奏请皇帝任命伊藤为中国首相<sup>④</sup>。9月20日光绪皇帝接见了伊藤<sup>⑤</sup>,于是加油添醋的流言四起,其中一说甚至担心就在眼前的日本人,要攫夺朝政大权<sup>⑥</sup>。慈禧太后感到不得不采取行动了,就在伊藤觐见皇帝的第二天即9月21日,慈禧在间断了9年之后,正式恢复监政(即所谓“政变”)<sup>⑦</sup>,下令逮捕主要维新派,其中六人包括谭嗣同及康有为之弟,于9月26日即时处死。这轻率而又毫无证据的行为,使激进分子成为烈士,并赢得广泛同情;义愤和恐惧马上被善于宣传的康有为、梁启超所利用,康、梁只求利己的盘算,至今仍影响着我国难于正确理解全部事件<sup>⑧</sup>。

与长期以来的观点相反,9月21日并非改革的全面撤退或完全废除,而且也从未这样考虑。按陆光的看法,首先,“在百日维新时期,并未真正实行根本革新”<sup>⑨</sup>。根据丹尼尔·贝斯(Daniel Bays)的研究,各省在“政变”后,“许多夏天颁发的上谕仍准许执行,特别是对工商业更有效的管理,国立学校体系的扩张,军队的改革等”<sup>⑩</sup>。然而最重要的是,正如苏仿春指出的,就全国范围而言,9月26日的上谕否定了一些最为极端的方法,重申在大多数领域改革的承诺。她写道,“这样,9月26日的上谕标志着过激改革的结束,恢复和缓改革的精神”<sup>⑪</sup>。对最激进的分子而言,这几乎意味着暂时的冻结了。

36 贝斯提及的1898年的“改革呼声”,及相继而来的“改革赞同者”<sup>⑫</sup>,从两方面来说,对本研究都是重要的。它们规限了“黄金十年”的时间和地点。时间是1898年,激进的和温和的改革者一同向日本寻求实践的模式和灵感;地点是整个中国,从中央到各省。在9月21日后,公开排斥激进的变革道路,清政府重申温和变革的承诺,使日本对保守的改革者更具吸引力。中国还能从世界哪个角落找到像19世纪末期的日本“明治式融合”呢?沿着“文化保

守主义”的道路<sup>⑤</sup>走向现代化,又能成功地保存传统,常常是中国式的价值观念和模式。

## 百日维新以后

在9月21日“政变”后,中国朝廷似乎决心扭转来自日本的批评。以无穷无尽的各种理由,给这个那个日本人赏赐一连串的宝星勋章,就是有力的明证。10月4日给日皇寄赠最高宝星勋章,随后10月10日总理衙门又请赏给伊藤博文。可正是他和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1860—1939),应对梁启超和康有为乘日船逃亡日本事件负责的<sup>⑥</sup>。接下来的4个月内,至少有50名日本人获得宝星勋章,他们有日本国会议员,陆海军将领,外务省官员,还有从各方面曾帮助中国的教育家<sup>⑦</sup>。由于百日维新及其后果,为使中国对外关系“极度正常化”,究竟有多少授勋提名,那是无从稽考的。

谷野文雄公使在百日维新后,于1898年11月26日向新外相青木周藏(1844—1914)报告称:“尽力从事睦邻友谊,并试图忠告和诱导,扶持(变法之动向),此乃我国之义务。”这谨慎而友好的对待中国的意见,引起外务省的不安,担心谷野还提出其他的承诺。外务次官都筑馨六(1861—1923)在报告上批注称:“清国内政无论 37  
是改进主义还是守旧,都与我国无关。我们必须纯粹以我邦人的利害为唯一标准,利用机会”<sup>⑧</sup>。

至于伊藤博文,尽管他私下的观点是要在中国冒险<sup>⑨</sup>,他公开说的“我国道义上的义务”,是向中国提供帮助。这是他在1899年2月14日向海外教育会会议发表演说时说的。意味深长的是,他把这帮助和日本自身的战略利益联系在一起。他宣称:“我相信,尽我国力的最大限度,向(朝鲜和支那)提供帮助,不但对保全我国自身利益,而且对整个远东大势,都是正确的、必要的。”<sup>⑩</sup>同月,著名的新闻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在《东亚时论》发表社评称:

日本目前讲求“支那保全”，正是谋求支那的“变法自强”<sup>①</sup>。

总而言之，在 1898 年末至 1899 年初，日本为了自利的原因，积极寻求扩大对中国的帮助；中国也为了自利的原因，热烈地响应。“黄金十年”开始了。到 1900 年 5 月，中国对日本广泛地信任，兴起“日本热”浪潮<sup>②</sup>。同年底，日本亦兴起“清国热”<sup>③</sup>。

如果把潮流和狂热放在一边，那么事情就不那样简单了。很明显，至少日本舆论就分为绝对为了友谊和赤裸裸地为了扩张两派<sup>④</sup>。因此，可以罗列狭隘自私的言论，轻易地“否定”存在什么友好关系；也可以摘引由衷地热情和谐的话语，加以反证。我拒绝走这样的道路。我不忽视或否定存在着不友好的观点和态度，但集中注意于主流实际的相互作用及其真实的结果。这样才可以摆脱抽象思索和既往挑选的意见，转而分析那些在中国前所未有的、激动人心的、全新的事实，这些事实在难以置信的极短时间内，把中国全面地、不可逆转地带到现代世界。

38

#### 注 释

- ① 据张之洞 1898 年 1 月 2 日报告，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79 第 20 页（第二册，第 348 页）。
- ② 见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第三卷，第 248—249 页。
- ③ 见理查·霍华德著《日本在康有为改革计划中的作用》（Howard, Richard C. "Japan's Role in the Reform Program of K'ang Yu-wei"），载罗荣邦编《康有为：传记及论丛》（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Jung-pang Lo, ed.）第 280—312 页。
- ④ 见《张文襄公文集》卷 79 第 20 页（第二册第 348 页）。
- ⑤ 见丹尼尔·H·贝斯著《中国进入 20 世纪：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1895—1909》（Bays, Daniel H., *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 1895-1909*）第 7—10 页。
- ⑥ 有关张之洞在中日战争之前，战争期间，及战后马上提出的建议和采取的行动，参阅关捷、徐迎前著《论中日甲午战争的张之洞》，载东北地区中日

关系史研究会及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合编《中日关系史论集》第二卷第 399—416 页。

- ⑦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41 第 8—9 页(第一册第 744—745 页),又见拉尔夫·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Ralph L. Powell, *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第 67 页。
- ⑧ 见上注鲍威尔著第 61—62 页;注⑤丹尼尔·H·贝斯著第 11—14 页;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第 240—242 页,第 248 页;朱有璩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 541—547 页。
- ⑨ 见小林共明著《中国早期派日留学生》第 4 页;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第 252 页;苏云峰著《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第 117—118 页。有关德国军官及教师在南京及武昌情况,参阅注⑦鲍威尔著第 68—69 页。
- ⑩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79 第 20 页(第二册,第 348 页),又参阅注③理查·瞿华德著第 284—287 页;注⑨小林共明著第 6 页。
- ⑪ 见《东瀛学校举概》第 1—13 页,载朱有璩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第 27—35 页;又见王晓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 388 页;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第 42 页,第 173 页;田正平、霍益萍著《游学日本热潮与清末教育》。
- ⑫ 见注⑨小林共明著第 6—7 页。引人兴趣的是,对《劝学篇》产生影响的另一人物,是日本著名记者、喜爱中国文化的西村天因(1865—1924),1897 年 12 月及 1898 年 1 月,他在武昌多次会晤张或张的高级部属。参阅陶德民(De-min Tao)著《西村天因长江流域之行,1897—1898》,载《中一日研究》1991 年 10 月号。又见注⑩王晓秋著第 203、209 页。
- ⑬ 见渡边龙策著《近代日中民众交流外史》。
- ⑭ 有关福岛传略,参阅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 262—284 页。
- ⑮ 见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地区研究:湖北省,1860—1916》第 240、244、246 页。
- ⑯ 引自注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 276—277 页,及注⑨小林共明著第 11—12 页。
- ⑰ 见注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 274—275 页,及注⑨小林共明著第 12 页。

⑬ 见注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 278 页。

⑭ 日语“*bunkatsu*”(分割)一词,亦指“分裂”。有意义的是,查里斯·伯特斯福特勋爵于 1899 年出版了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的分裂,依据目前其商业、货币、航道、陆军、铁路、政治及未来前景的报告》(Lord Charles Beresford, *The Break-up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its Present Commerce, Currency, Waterways, Armies, Railways, Politics and Future Prospect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99)), 引证周锡瑞著《义和团骚乱的起源》一书 (Joseph W.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1987), pp. 73 and 361n15), 也引人注目地使用了相似的词语, 只不知有没有谁受谁的影响。

⑮ “*Shina*”(支那)一词于日本明治时普遍使用,基本上相当于受西方影响的中性的“China”。使用这词语的原意是要避免涉及特指的王朝(清)或称为“清国”(Shinkoku),也就是要超越政治。许多中国留学生及激进分子,为表示反清情绪,在 20 世纪初也热衷于使用。到 1912 年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大多数中国人视之为异物而停止使用,并要求日本亦代之以“中华民国”或简称“中国”。当日本出于习惯势力,或出于恶意、蔑视而拒绝时,便出现水火不容之势。这个曾一度使中国人和日本人结合的词语,最后却使他们分离。1946 年,中国政府要求,并得到日本政府承诺停止使用“*Shina*”。今天,除了偶然见于餐室的“*Shina soba*”(中国荞麦面)外,这词实际已是废弃了。有关这词语的详细历史,见佐藤三郎著《对日本人使用“支那”指称中国的考察》,载佐藤三郎的《近代日中交涉史的研究》(Satō Saburo, “Nihonjin ga Chūgoku o ‘Shina’ to yonda koto ni tsuite no kōsatsu”, in Satō Saburo, *Kindai Nit-Chū kōshō shi no kenkyū* (Tokyo, 1984), pp. 25—26)。较近期的英文著述,有乔舒亚·A·福高的《论日语对“中国”的表述》,载《中日研究》1989 年 12 月号 (Joshua A. Fogel, “On Japanese Expressions for ‘China’”, *Sino-Japanese Studies* 2. 1; 5-16 (December 1989))。

⑯ 有关日本人战后的卑视心理,见唐纳德·坚尼才华横溢的文章《1894 至 1895 年中日战争及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载唐纳德·H·雪弗利编《日本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化》(Donald Keene,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Its Cultural Effects in Japan”, in Donald H. Shively, ed.,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Japanese Culture* (Princeton, 1971), pp. 121-175)。

- ⑳ 见《东亚同文会史》第 180—181 页载近卫笃磨的“Dojinshu domei”(“同人种同盟”)
- ㉑ 摘引自细野浩二著《清末中国之“东文学堂”及其环境：明治末期日本对夺取中国教育权的伦理概略》，载阿部洋编《日中教育文化交流与冲突：战前日本在华的教育事业》(Hosono Kōji, “Shinmatsu Chugoku ni okeru ‘Tōbun Gakudō’ to sono shūhen: Meijimatsu Nihon no kyōikuken shūdatsu no ronri o meguru sobyō”, in Abe Hiroshi, ed., “*Nit-Chū kyōiku bunka to masatsu*”, p. 53), 外山发表了一些令人费解、困惑的, 自相矛盾的言论, 这是在明治中期不少日本人的表现。例如在 1890 年参观了北洋舰队的旗舰后, 外山意味深长地声称, “中国和我们就像长兄幼弟, 我们应确认中国不会成为我们的敌人。”但仅在四年后战争到来时, 外山又极为骄傲地声称自己写了最先的第一首战歌《Battotai》(拔剑队)。在他后来写的战歌《Yuke Nihon danji》中, 煽动反华情绪, 称中国人是“恶魔”, “窃贼”, “狼群”, “我们母亲的敌人, 我们妻子的敌人, 我们姐妹和女儿的敌人”, 极力主张“神圣土地的纯洁血液, 不能被敌国野兽玷污”。见注㉑第 123—124 页, 134—135 页。
- ㉒ 摘引自注㉑细野浩二著, 第 72 页注(18)。
- ㉓ 摘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 44—46 页, 16 页。又见中译本《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谭汝谦、林启彦译(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2)第 1—2, 17 节。
- ㉔ 见陈应年著《梁启超与日本政治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及评价》, 载《中日文化与交流》(1984 年第一期)。
- ㉕ 见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第 15—16 页。又见注㉑王晓秋著第 350 页。
- ㉖ 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下册第 994 页, 引自注㉑第 17 页。
- ㉗ 引自阿村一夫著《驻清时代的矢野龙溪氏》, 载河村著《近代日中关系史中的问题》第 58—59 页。亦引用于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第 8 页。
- ㉘ 见《东亚同文会史》第 28—29 页。
- ㉙ 见酒田正敏著《近代日本初期对外政策强硬路线的研究》第 110—111 页。
- ㉚ 对荒尾精最全面的最新研究, 是保罗·C·司各特的《日本—中国：荒尾精



与合作的悖论》(Paul D. Scott, *Japan-China: Arao Sei and the Paradox of Cooperation* (Osaka, 1988))。

- ⑳ 见《东亚同文会史》第30—32页, 265—266页。有关荒尾精与这一事件的联系, 参阅大森史子著《东亚同文会与东亚同文书院: 成立的环境, 性质及活动》, 及加藤祐三著《东亚时论》载入小岛丽逸著《战前之中国时论志研究》第8—10页; 又见本书作者著《训练年青的中国通》第224—227页。
- ㉑ 有关这一事件, 见哈佛大学, “东亚—地区研究, 近代日本历史研究”的未发表论文《荒尾精与东亚同文会成立过程: 对促进中日贸易早期的倡导》(Ken'ichirō Hirano, “Arao Sei and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ōa Dōbun Kai: An Early Advocacy of the Promotion of Sino-Japanese Trade”)。
- ㉒ 在义和团骚乱达到高潮时, 东亚同文会于1900年8月15日的全体会议上通过决议, 再次确认最先赞成的主张、“支那保全”。见《东亚同文会史》第298—301页, 329页及678页。
- ㉓ 见注⑩第120—127页; 注⑫第81—83页; 及《东亚同文会史》第32—33页, 51—56页, 266—268页。在新的东亚同文会, 中国人不受承认为“会员”, 只被称为“会友”。
- ㉔ 见本书作者著《训练年青的中国通》第226—227页, 第236—241页。
- ㉕ 见马里乌斯·詹森著《日本与中国1911年革命》第346页, 349页, 365页。
- ㉖ 见大鸟圭介著《对清国今昔感情之变化》, 载1899年5月5日《太阳》,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208页; 又见中译本第115页。
- ㉗ 按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208页翻译。中文原文见中译本第115页。
- ㉘ 见注④第994页。1880年, 王之春参加了为期一月的日本考察团回国后, 发表了《谈瀛录》, 书中有诗云: “国比辅车盟莫溃, 谊联唇齿气相投”。引自注⑩王晓秋著作第179页。
- ㉙ 陆光透过晚清朝廷的内部运作, 令人钦佩地考察了皇帝所起的核心作用。见陆光著《百日维新的交织图: 1898年的人物、政治及观念》(Luke S. K. Kwong, *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Ideas of 1898* (Cambridge, Mass., 1984))。他的研究更正了对百日维新牺牲者的歪曲评价, 也更正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宣传, 使我们对百日维新有新

的认识。又见阎小波重要著作《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载《学术月刊》1993年第3期。第55—60页。

- ④③ 对神话式的和现实的康有为的批判性评价，见上注陆光著第175—200页。最新的观点，见王晓秋颇具价值的论文《近代中国仿效日本变法的蓝图：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的研究》，载入王著《现代中日启示录》（北京，1987年），第192—210页。
- ④④ 从当时报刊中汇集日本对改革的不同角度的评价，见志村寿子著《戊戌变法与日本：日清战争后的新闻报导》（东京都立大学法学会杂志6.2：253—290（1966））。
- ④⑤ 在第五章中将再提及辻武雄，他在日本人经营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长期担任戏剧性事件评论员，以“辻听花”笔名而著名。
- ④⑥ 辻武雄的报告刊载于1898年11月15日《教育时论》，摘引自注④②细野浩二著作第55页及71页。
- ④⑦ 见注④第991—996页。
- ④⑧ 见彭泽周著《伊藤博文与戊戌变法》，载彭著《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第279—280页；又见注③第301页。
- ④⑨ 见邓嗣禹，费正清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79—180页；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三卷229—231页；注③第301—302页。
- ④⑩ 具体详情及9月18日给慈禧的奏折见注④②陆光著第204—209页。
- ④⑪ 见上注陆光著第30—40页。
- ④⑫ 在上注陆光著第5—13页、第223—224页中，提供了批判性的见解。直到最近，以自我为中心的、言过其实的康有为，其主张仍被日语学者及大多数英语学者凭表面价值而接受。其主要错误、把整个事件说成“1898年康有为的改革”，仍然为各种语言滥用。因这一错误而造成对历史的歪曲，甚而超过了“孙的1911年革命”。《导言》一章已有论述。
- ④⑬ 见注④②陆光著第174页；又见注④②阎小波著作。
- ④⑭ 见丹尼尔·贝斯著《百日维新后的张之洞：改革赞同者的转变期1898—1900年》，载柯文与约翰·施卓格编《中国19世纪的改革》第317页。（Daniel H. Bays, “Chang Chih-tung after the ‘100 Days’: 1898-1900 as a Transitional Period for Reform Constituencies”, in Paul A. Cohen and John E. Schrecker, eds.,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 Mass., 1976)。又见孙应祥、皮后锋著《论维新运动的上、下限》，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1993年第3期第99—104页。
- ⑤⑥ 苏仿春著《慈禧太后的形象》，见上注柯文与施卓格编著第103页；又见马勇著《清政府对百日维新的检讨与反省：1898—1901》，载《人文杂志》1993年第1期第94—100页。
- ⑤⑦ 两语见注⑤④贝斯著第317及318页，见注⑤④。
- ⑤⑧ 两语见注⑤④詹森著《日本和中国》第138页。
- ⑤⑨ 伊藤和林权助所起的作用，见谢俊美著《戊戌政变时期日本营救中国维新派的活动》，载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日本的中国移民》（北京，1987）第194—203页。
- ⑥① 1898年10月至1899年1月四个月内，受勋名单及日期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第12—23页（下册，总996—1002页）。
- ⑥② 都筑馨六的批注，见南里知树编《中国政府雇用的日本人：日本顾问的名单及说明》，载入《日中问题重要关系资料集第三卷：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二集》，第24—25页（东京：龙溪书舍，1976）。
- ⑥③ 伊藤从北京到了上海，又溯长江到了武昌，受到张之洞的热烈欢迎（张是对康有为恶毒批评者之一，而伊藤却是刚刚协助康逃离中国的）。两人就保证煤铁矿的交货及日本参与管理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讨。在1903至1930年间，日本给武昌汉冶萍煤铁公司贷款累计超过5000万日元。见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编《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第1—3页，1112—1121页。张之洞对康有为尖刻的看法，见注⑤④贝斯著第25—28页、第45—46页、第51页、第59—61页。
- ⑥④ 引自注⑤④第52—53页。伊藤的私下看法，见彭泽周著《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第286—294页。
- ⑥⑤ 见内藤湖南著《帮助支那改革的手段》，载《东亚时论》1899年2月号，引自注⑤④第55—56页。该文发表的当月，内藤受任为《东亚时论》主编，但仅于两个月后便辞职。见《东亚同文会史》第269页，273页。
- ⑥⑥ 《东亚同文会史》第291页。
- ⑥⑦ 见上注第309页。有关1902年情况，参阅神保小虎著《速成支那语会话》，载《太阳》（1902年8月5日），摘引自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第144页。

⑤ 1900年义和团事件,造成了日本舆论的分裂。野原四郎收集了三位日本著名人士的材料,他们批判在义和团事件中的日本军事行动,甚至同情义和团的仇外主义。另一方面,菅野正研究报刊社评及重要人物和组织的大众舆论后,得出结论,认为义和团危机是日本的转折点:从公开要求在国际政治中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到要求对中国处于优势地位。见野原四郎著《日本人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载入菅沼正久等编《现代中国讲座》(东京,大修馆书店,1966),1—37—53;及菅野正著《义和团事变与日本舆论》(Hisutoria 44/55:26—50(June 1966))。又见注①王晓秋著作第449—456页。

## 第二编 新政思想革命： 新载体，新概念

39

新政思想革命——中国帝制结束以后的思想基础——曾使学者们大惑不解，一方面是由于 1917—1923 年的五四“思想革命”转移了学者们的注意力<sup>①</sup>，更具说服力的原因则是学者们未能毫无偏见地充分研究新政年代。

研究新政年代必须依据事实，至少把如下事实估算在内：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和在中国的日本教习及顾问，他们是对中国影响的“新载体”；翻译包括学校教科书在内的日文书籍，是流向中国“新概念”的源泉。由于新概念使用汉字，在译成中文时用不着再加以说明。以汉字为基础的现代术语从日本移植到中国，本书对此有着浓烈的兴趣。

关于“新载体”问题，本书拒绝那种认为靠一两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知识分子或领袖，便可以莫名其妙地改变整个时代的英雄史观；同样，在“新概念”问题上，本书也不认为某些译著或著作便可改变中国。无论这些英雄的活动或重要著作的影响有多大，都不能仅靠这些来理解新政革命。

改变中国的是那些难以数计的人们——是一切热衷于变革的精英人物，一旦获得朝廷认可，他们便准备行动。中国各地和各阶层的人们欢迎新思想，并将这些思想转化为行动目标。换句话说，改变中国的不是纸面上抽象的思想，而是全国各地不同方面、不同阶层的精英人士，在同一时间殚精竭力地朝这一目标推动。这一目标得到朝廷认可和鼓励，自有助于粉碎反对激烈改革的传统的靠山，使新思想涌入并获得体制上的立足点。新思想及其体制化的表达形式，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得以幸存，这应归功于那期望中的目标。

新政改革的体制部分，将于第三编论述。这里只需说明，在1901至1910年间，在中国高层及中层有权势的精英分子，持续地构建思想上和组织上体系的过程中，思想和体制的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到了1911年，中国已进入新时代，具备了与帝制结束后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因素了。

1911年的革命结束了中国2100年的帝制政府，并废弃了它的哲学基础。由于新的民国无可选择，把新政的各项改革小修小补后，全部接收过来，这将在第三编论述。这样，那些改革便延续下来，作为帝制结束以后思想和体制的基础。

## 第四章 中国学生及其入读的日本学校

41

中国学生涌向日本,是1898年后中日关系上最戏剧化的发展。从历史上说,它是公元607年模式的颠倒。过去的1300多年来,通过包括留学在内的各种途径,教育、文化和技术是从中国流向日本的<sup>②</sup>。而现在反过来了,中国人到日本去。他们不是为了提供最高深的中国道理,而是寻求达致西方式富强的奥秘和捷径。他们的意图是赤裸地功利主义的,也就是要达到张之洞在1898年写的《劝学篇》中常说的“事半功倍”<sup>③</sup>。到日本的中国学生成绩优良,不少人成为中国20世纪历史的重要人物,包括革命领袖孙中山及其政党的创建者。其中自然也有不少无足轻重的人物,由于他们未能完全理解中国现代革命的演变(本书研究的也正是补其不足),也就只能写写他们自己、同样不重要的同道和亲朋友好们,谈论些蝇头琐事、日常杂务。

而学者们对中国在日学生的关注,也部分缘于孙中山。据李喜所写道:“辛亥革命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由留日学生来完成的。孙中山曾十分形象地讲过,对辛亥革命作过重大贡献的有三部分人,一是华侨,二是留日学生,三是会党。具体则是华侨出钱,留日学生搞

舆论宣传,会党出力。”<sup>④</sup>

这些留学生对本研究确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却并非因为他们参与孙中山推翻清政府的活动。说这些学生“为削弱以至推翻清政府作出卓越贡献”,事实上是受到质疑的观念。历史学家丹尼尔·贝斯(Daniel Bays)在研究了一些来自张之洞辖下湖南和湖北的学生后,发现他们“(作为青年激进分子)有着逐渐倒退为政府服务的倾向”,或“趋向于建立政治秩序”。贝斯坚持认为,这些学生“是无能的革命力量”<sup>⑤</sup>。对本研究而言,他们的重要性和贡献,在于既是新思想的载体又是新思想的实践者,大多数都与清政府或地方保守改革派联合。

粗略估计,从1898至1911年间,至少有2.5万名学生跨越东海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虽然这数字比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留学生遍及全球,以及近期流向日、美之中国学生的数目,相形见绌,然而在这世纪之交之际,确是极具深意的。只有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Jansen)在1975年才恰如其分地评估其意义,他认为中国学生到日本的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sup>⑥</sup>。五年后,詹森又指出,这一浪潮是“到那时候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最大规模的海外学生群众运动”<sup>⑦</sup>。汪向荣认为,在1894至1895年战争前,哪怕派遣一个学生到日本都是不可想象的<sup>⑧</sup>。

由于各种原因,已有不少书籍、论文、文章论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他们的政治活动。重要的中文著作,有黄福庆的精心大作《清末留日学生》(1975)等<sup>⑨</sup>。

## 提倡到日本学习

到日本学习之前的概念,是向日本学习。那是康有为和梁启超19世纪90年代初、中期著文提倡的,但接受的不多。其后,御



史杨深秀(1849—1898,戊戌政变中被认为与康有为关系密切,成为受害的“六君子”之一)的1898年6月1日《游学日本章程》奏折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奏折建议总理衙门挑选合资格的学生,经由日本驻华公使谷野文雄<sup>①</sup>协助到日本留学,并提出了广泛的学习科目,指出“中华欲留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sup>②</sup>。”

然而在1898年年中、保守改革派张之洞建议到日本和向日本学习之前,这观念并未真正如法进行。有重大影响的张的意见,见之于《劝学篇》。该书于1898年6月上报皇上后,7月25日的上谕便下令印刷40份,分送总督、巡抚及各省学政<sup>③</sup>。

《劝学篇》使用了保守的格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体用”)<sup>④</sup>。从影响力及重要性看,《劝学篇》堪与福泽谕吉(1835—1901)于1872至1876年间写成的《劝学篇》相比美<sup>⑤</sup>。用实藤惠秀的话说,它的重要性在于成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sup>⑥</sup>。

《劝学篇》中《游学·第二》一章论称: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博文)、山县(有朋,1838—1922)、榎本(武扬,1836—1908)、陆奥(宗光,1844—1897)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sup>⑦</sup>。”

在同一章中,张之洞还提出一些实际理由,认为到日本学习胜于到西方。和后来的一些论点相比,张之洞提出的理由既未润饰,也未充分展开,但却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为后来学者不断引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日本)。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张接着以典型功利主义语气指出,“中东(日)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sup>⑧</sup>无过于此”<sup>⑨</sup>。

引用《劝学篇》的著作,大都是到此或前一句为止<sup>⑩</sup>。接下来一句却总被忽略,“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在当时和以后,张及其他人的这一思维模式是一再重复的。人们考虑到日本留学,并非因为日本比其他地方更好或有什么内在价值,而是当时通过学习日本,能够更为便捷和便宜地走向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日本是块垫脚石,是获得西方知识、导致中国富强的捷径,使用后便遭抛弃。这种态度对近代中日关系牵连极大,坦率地说,这是傲慢的和麻木不仁的,说明了并未把日本以其本身资格作为一个国家,或作为一种文化而表示兴趣或适当评价<sup>⑪</sup>。中国的这种态度一直为两国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 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人数

在张之洞撰写《劝学篇》的两年前,中国总理衙门派了十三名年龄由 18 至 32 岁的学生到日本学习。按中国驻日公使裕庚的事前安排,日本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1849—1940)把教育他们的责任,交付给能干的嘉纳治五郎(1860—1938)。嘉纳是著名的国立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讲道馆柔道(目前世界柔道界视之为柔道标准)的创始人,长期关注着在日本的中国青年的教育<sup>⑫</sup>。不幸只在第一个月内,四名学生由于无法适应日本的食物,由于不能忍受日本孩子以至成年人的辱骂,骂他们“猪尾巴”、“猪尾和尚”或“和尚头”(当时学生留着辫子,前额剃光,其后激进学生大多剪辫)<sup>⑬</sup>,收拾行装回国。不管怎样,留下来的 9 人中 7 人完成了二至三年的基本课程,其中一人还于 1905 年获得日本大学给中国学生颁发的第一个学位<sup>⑭</sup>。

随着这最先派出的 13 人之后,各省派出不少公费留学生赴日,自费留学生也日渐增加。由于迟迟未能拨款资助,首先派出留学生的不是张之洞辖下的湖北、湖南,而是浙江。1898 年 6 月初,

经由浙江巡抚和日本驻杭州领事的安排,4名军校学生及4名普通学生由两名官员陪同办理旅行事宜,派赴日本。当时6月11日的百日维新还未开始,还没有8月2日的上谕:“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着即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随后才是8月18日的上谕,诏令各省督抚“挑选聪颖学生”具报总理衙门,核选派日游学<sup>④</sup>。6月20日,4名军校学生正式入读川上操六属下的成城学校新成立的留学生部。成城学校非常著名,极受尊敬,是日本赫赫有名的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sup>⑤</sup>。中国人不想冒险,在派出学生前,先在三月份派官方考察团视察了成城学校<sup>⑥</sup>。普通学生也同时入读专门建立的日华学堂。

1898年5月,就在浙江的留学生启程前,谷野文雄公使和清政府官员达成协议,日本将为中国培训上官。由于戊戌政变影响,协议未能如期执行。但在政变后仅仅一个月,华北、华南21名文武官员组成的中国考察团到达日本<sup>⑦</sup>,清楚地表明改革的连续性。11月30日,张之洞小心翼翼地当时访问武昌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1866—1934)呼吁,要他敦促北京政府实行派送学生赴日的计划<sup>⑧</sup>。日本驻武昌领事得知张的要求后,于12月2日致电东京,请向总理衙门重提有关留学生问题,并报告了张为免受指责而不愿自己提出<sup>⑨</sup>。日本外相青木周藏反应迅速,12月6日便电告武昌领事,将与北京联系学生问题<sup>⑩</sup>,12月下旬,驻北京谷野公使便向青木报告,总理衙门已保证关注有关协议进程<sup>⑪</sup>。

戊戌政变前,张之洞已自行与日本达成协议,派遣军校及普通学生100名赴日<sup>⑫</sup>。这协议本来也得推迟,但张在取得朝廷授权后,迅速行动,首次派出的20名军校生于1899年1月7日离沪赴日<sup>⑬</sup>,同船的还有刘坤一选派的13名军校生及7名普通学生。3月中,他们和北洋派送的8名军校生及12名普通学生会合,军校

生都安排入成城学校,普通生则进入日华学堂<sup>④</sup>。张之洞在派出第一批学生后,继续派遣学生赴日接受军训:4月派送4名下士到陆军户山学校受训半年;11月派出黎元洪(1864—1928,后任民国总统)率领将校及下士29人,到近卫师团各队当见习将、校或见习下士半年;同月,又派约50名武备学生、制革业研究生、炮兵工厂实习生和农、工、商各科研究生赴日<sup>⑤</sup>。

尽管小林共明细心分析,但由于他未能弄清1898年的全国情况,因此把1898至1899年间中国学生赴日的始发日期推后了,也将首先行动的中央政府说成是省<sup>⑥</sup>。但小林的发现描画了中国形势的微妙处,指出了其后赴日留学洪流的特点。

1899年1月赴日学生中的特殊人物,是张之洞的长孙张厚琨。为了明显地表示友好关切,通过个人和各种机构的渠道,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和在东京的副外相都筑馨六、外相青木周藏,很快说服近卫笃磨公爵,同意张厚琨入读学修院——近卫掌管的贵族学校,并同意作为这个16或17岁少年的监护人<sup>⑦</sup>。应该看到,近卫公爵的愿意担承,和两个月前在近卫领导下成立的东亚同文会在中国教育问题上的努力,是完全一致的<sup>⑧</sup>。还应进一步看到,位居高层的中国人把心爱的亲属送到日本学习,已是屡见不鲜。例如备受尊敬的教育家,后任京师大学堂辅佐总教习的吴汝纶(1840—1903),他的儿子1901年就在日本学习<sup>⑨</sup>。鼓吹改革的黄遵宪,1904年便把儿子、孙子、表弟及侄儿送到日本学习,并许诺他们日后在新的师范学堂任职,那是黄计划为故乡湖南开设的<sup>⑩</sup>。

日本青木外相在1899年2月17日致日本驻英公使加藤高明(1860—1926)的信中,阐明了日本所以愿意接待中国学生的观点: 48  
“我相信,在当前形势之下,迅速改善清国军备而巩固其振作基础,极其有利于维持东洋时局。根据矢野公使(前就日清间有关留学生事宜)协商的旨趣,[日本]帝国政府立即接受、训练清国派遣的

武官学生。请将此意旨通知南北两通商大臣及湖广总督,立即向清国提出派遣学生<sup>④</sup>。”事态发展已经清楚了,但仍需进一步作系统研究的是,中国学生涌到日本不是偶然发生的,是随着日本人反复地保证、邀请和承诺而来的<sup>⑤</sup>;是在日本接待中国学生、军事代表团时,表示了热切和真诚,迁就他们的特殊需要,只有在这以后,留学生数目才大大增加。中国人必须信服,必须被日本人说服。他们也确实是这样的。

最初他们来得小心翼翼,然后就不大在乎了。涓涓滴水成了洪流。关于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人数,本世纪70年代国际学者按照当时实藤惠秀的估算<sup>⑥</sup>,已经达成共识。但在1987至1988年间,三份不同的中国学术著作中引用的数字,却远远大于实藤的估算<sup>⑦</sup>。似乎有了答案的问题又再提出来。表一分列出三组数字:实藤惠秀的;二见刚史和佐藤尚子于1978年据实藤的数字修订的<sup>⑧</sup>,和李喜所于1982年调查的。不管接受哪一组数目,都清楚说明1905至1906年间,中国学生到日本是最多的。

表一:在日本的中国学生,1896—1914

年份	实藤 a.	二见与佐藤 b.	李喜所 c.
1896	13	—	13
1897	9	—	—
1898	18	—	61
1899	202	—	—
1900	—	—	—
1901	280	—	274
1902	500	—	608
1903	1,000	—	1,300

续表

年份	实藤 a.	二见与佐藤 b.	李喜所 c.
1904	1,300	—	2,400
1905	8,000	—	8,000
1906	8,000	7,283	12,000
1907	7,000	6,797	10,000
1908	4,000	5,216	—
1909	4,000	5,226	3,000
1910	—	3,979	—
1911	—	3,328	—
1912	1,400	1,437	1,400
1913	2,000	—	—
1914	5,000	3,796	—

资料来源：a. 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 544 页；b. 二见刚史、佐藤尚子：《中国人留学史关系统计》第 101 页；c. 李喜所著《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 126—127 页。

## 为中国学生在日开设的学校

49

马里奥斯·詹森(Marius Jansen)注意到，“没有学校会准备应付这股人潮，而日本和学校，本身也只刚刚开始按明治现代化的要求而调整，因而应接不暇。许多日本有识之士……提出为中国学生设立特别课程，学校和资金，强调努力使中国学生全面了解日本生活的重要性<sup>④</sup>。”根据中国学者李喜所的研究，在所有问题中最难处理的是，如何接纳这些突然而来的、彼此截然不同的大量中国人。“最大的困难是对留日生的分班教育问题。因为赴日的中国留学生成份十分复杂，有的是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的毕业生，有的是刚脱离私塾大门的旧书生，有的是各类专业学堂的高才生，

还有的是官绅子弟、新军士兵。有的可以讲流利的日语、并可以用日文写漂亮的文章,有的则连一个日文假名都不会发音<sup>47</sup>。”解决的办法是在原有学校设置新的课程,更多人认为应该开设全新的学校。留学生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1906年,中国学生超过50人的学校已超过50间<sup>48</sup>。其中不少是“学店”或“学商”,是热衷于牟利而降低标准吸引学生的文凭工厂,这使整个事业蒙羞<sup>49</sup>,但历史学家不会因之而错误判断日本努力取得的卓越崇高的成就的。

如上所述,在文部相西园寺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关注下,1896年首批13名学生获得妥善安排,嘉纳个人更注视着对他们的教育,安排了专门的住处、合资格的教师,给他们安排的三年课程相当于日本的中学教育<sup>50</sup>,但直至1899年10月,也未为这安排计划命名。嘉纳认识到,为适应行将到来的学生的需求,应安排较大规模和较长远的设施。他为使教育方案正规化,命名为亦乐书院。“亦乐”出自《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sup>51</sup>。亦乐书院随着中国学生人数增加而发展,1902年1月搬迁到较大的校舍,改名为宏文学院。

为使一切努力有所遵循,嘉纳于同年7月至10月间到了中国,与中国高层的教育改革者们商讨。他与张之洞、张百熙等人会见后,认为日本要帮助中国,最好实行双轨制训练,亦即近似于明治早期的制度:对成年学生开设半年至一年的速成科,课堂设有翻译,专门研究某一方面,例如教育,警务行政或科学;对较年轻的学生,则为他们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及中国长远的发展作准备,依据日本现代学校的标准课程<sup>52</sup>,开设三年的普通科。

与嘉纳访华同时,中国著名教育家吴汝纶到了日本,从文部相菊池大麓(1855—1917),到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1842—1915),所有人都鼓励吴的政府走加速发展的道路,都认为这方法在明治维新初期相当成功,尤其在训练师资方面<sup>53</sup>。

加速培训,或者倒不如说是为了回国后取得职业市场的认可,这正是中国人最需求的,这需求压倒一切。从事实看,即使在受尊敬的嘉纳的宏文学院,从1902年到1906年的1,959名中国人毕业生中,速成科的1,830人,占93.4%,而普遍科的只有129人,占6.6%<sup>④</sup>。

日本方面,教育企业家们很快便对市场作出反应,也受到接二连三的讽骂。到了1906年,速成课程受到中国人和日本人、官员、教育家和学生的普遍攻击。同年底,在日本政府压力下,宏文学院和其他接受中国学生的学校,除了已经开办的以外,所有速成课程被迫取消<sup>⑤</sup>,造成所有学校的入学人数急剧下降,1905—1906年的高峰期就过去了。

在由于缺乏认真的学生而衰落前,宏文学院已非常著名,既倡导日文系统教学,又有为学生及其中国赞助者的特别需要而设的多样课程。1906年初,宏文学院在东京有六处校址,1,615名学生,分别入读速成师范科和普通师范科,普通科,速成普通科,警务预、本科,理科及高等预科等专门课程<sup>⑥</sup>。宏文学院因而被称为“留学生教育的大本山”<sup>⑦</sup>。

1906年后入学学生人数锐减,迫使这一奇特的学校关闭。在1909年7月28日最后一届毕业典礼上,嘉纳治五郎的致词颇具哲理,他说:“本院最初系受中国之依赖而设,今日已无依赖之处,乃宣告停办。本院应尽之义务,至此结束”<sup>⑧</sup>。到结束时为止,宏文学院共录取了7,192名中国学生,其中3,810人取得毕业证书。男生中(该校没有女生)著名的有民国期间教育官员范源濂(1876—1927),革命家黄兴(1874—1916),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1879—1942)和文坛巨人鲁迅(1881—1936)<sup>⑨</sup>。

最早期为中国学生而设的学校——日华学堂,是1898年为从浙江来的四名非军校生而建的,目的在使他们能接受日本高等教育。创始人是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的僧侣学者、其后任大学校长



的高楠顺次郎(1866—1945)。他在1890—97年间在牛津大学学习四年,在德、法两国大学学习三年多。日华学堂可以选修课程,编班也完全按每一个人的情况,学生的质量甚高,因而声名卓著,不少学生得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继续深造<sup>⑤</sup>。

东京同文书院是另一所为中国学生而建的主要学校,成立于1899年10月。当时近卫笃磨公爵任东亚同文会会长,凭着他的阅历,从张之洞的长孙到日留学中感到大有可为;这时又因东亚同文会支持的、在福州的学校有两名赴日学生需要安置(其中林桢(1884年生)于1905年清政府对留学生考试时名列百名之内,1906年受任为重要的京师法政学堂的提调)<sup>⑥</sup>,于是近卫和东亚同文会便成立了东京同文书院。这不是一所普通学校,而是注重德育、体育,奉行儒家礼仪(包括祭孔)的寄宿学校。开始时稳重地只收取福州的学生,近卫公爵于11月4日与张之洞在武昌会谈后,又接待了以他个人名义邀请的一批学生<sup>⑦</sup>。东京同文书院为学生提供两年预备课程,以便接受日本高等教育。书院的首任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和评论家杉浦重刚(1855—1924)。由于关注到教育水准和中国学生情绪稳定,日本文部省于1902年指定三所学校为中国学生考上日本官立学校的“认可的”预备学校,其中就有宏文学院和东京同文书院。在1922年结束前,入读东京同文书院的中国学生约在二、三千人之间<sup>⑧</sup>。

53

在1903至1904年间,研究国际法的先驱,法律博士,在法国受教育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寺尾亨(1858—1925)成立了东斌学堂,是专为自费生提供军校预科教育、普通教育及师范教育的学校,它声言宗旨是为“清国留学生教授日语及普通、专门诸科,兼磨练德行,以期成全才<sup>⑨</sup>。”寺尾博士为了办好学校,在该校1909年结束前,花费了不少私人积蓄。辛亥革命后,他担任了中国政府的法律顾问。

最后列举两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以说明日本人如何回应中国人对教育的需求,这就是法政大学和明治大学于1904年同时制定的庞大方案。法政大学的方案被称为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sup>69</sup>。方案于1904年5月着手进行,提供法政科、法律科、政治科、财政及外交的补习科等课程。课程一般分三期,每期半年。计划训练新一代的政府行政官员,有计划地逐步淘汰中国的文官考核制度。如同其他速成课程一样,课室内使用即时传译。

法政方案的构思,可以回溯到1903年近卫笃磨公爵和东亚同文会副会长长冈护英子爵(1906年逝),与留日学生首席监督汪大燮之间的商谈<sup>70</sup>。近卫公爵于1904年1月英年早逝,其后事情就由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1860—1910)和在日本留学的范源濂和曹汝霖(1877—1966)推行,曹、范其后于民国初年任要职。梅谦次郎是支持方案的热心人,1885—1890年在法、德研究,是现代民法权威,明治民法及商法的起草者。法政方案的最后协议是由梅谦次郎和中国驻日公使杨枢(1844—1917)达成的。杨枢本人相信,日本的宪法、现代法律制度是适合中国的。他的1905年1月9日奏折称:“考其立宪政体,虽取法于英、德等国,然于中国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坠,是以国本不摇,有利无弊。盖日本所变者,治法而非非常经,与圣训正相符合。即中国舆论亦以日本之变法参酌得宜,最可仿效<sup>71</sup>。”

法政方案以1904年5月接受第一批94名学生开始(其中67人于1905年5月毕业),以1906年年底接受第五批843名学生结束(其中385人于1908年4月毕业)。以学生人数而论,少于宏文学院;但以教师水平而论,则绝不比任何学校逊色。教师“皆日本最有名之学士、博士”<sup>72</sup>,包括:法国法学博士、法政大学校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梅谦次郎讲授民法;法学博士,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一桥大学前身)及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志田钾太郎(1868—1951)讲授商法;法学博士、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冈田朝太郎(1868—1936)讲

授刑法；法学博士，学修院及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教授中村进午（1870—1939）讲授国际公法；法学博士，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1873—1948）讲授宪法；文部省参事官松浦镇次郎（1872—1945）讲授行政法；司法省监狱局监狱课长小河滋次郎（1862—1925）讲授监狱法。其他知名人士分别讲授国际私法，裁判所构成法，民刑诉讼法、政治学，经济学，财政学及警察学等<sup>56</sup>。

通过这个方案，大量日本现代行政及法律词汇直接传送给中国。授课内容撮要以讲义录的形式，在中国公使杨枢赞助下，于1905年2月5日首次发行以后，每两周一次定期发行。经法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严谷孙藏（1867—1918）安排，中国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其后单独成立为京师法政学堂）95名1906年的毕业生到日本进修，使词汇的传送更为方便。严谷于1902年至1912年间，相继任仕学馆，进士馆，京师法政学堂的正教习（实为主任教师，其后意为高级教授）。1907年的一份大学刊物，公正地赞扬了法政大学，为中国一流的大学生提供先进教学，也为塑造中国“士绅”的“学识和社会形象”提供了机会<sup>57</sup>。1906年末以后，中国政府按法政大学1904年的12人名单中，以高薪聘请了三位为顾问，指导中国法律改革。这样，现代概念和日语新词汇最后又进一步以“智力外流”方式，直接传送到中国。这三位顾问是：志田钾太郎，冈田朝太郎和小河滋次郎。在有关中国法律与监狱改革两章中，将作详细论述。

开始时，中国各省在清廷催促下，官费派送日本的学生学识极高，堪与高水准的法政大学教职人们相匹配，不少人是举人或进士。法政大学的毕业生中，就有后来政界的大人物，如广东的汪精卫和胡汉民，浙江的沈钧儒（1875—1963）和湖北的汤化龙（1874—1918）<sup>58</sup>。

至1908年4月止，当第五批也是最后一批学生于法政大学毕业时，毕业人数共计1,145人。378人于1905及1906年毕业于

法政科,400人于1907及1908年毕业于法律科,296人于1907及1908年毕业于政治科,71人于1907年修读完补修科<sup>72</sup>。

明治大学于1904年9月建立经纬学堂,由明治大学校长岸本辰雄(1852—1912)命名。岸本是1876年至1880年间赴法国留学的法律学者,1881年以来,率先倡议在日本开展法律教育。岸本的命名是寓意深长的,他在1904年向杨枢解释时说:“(教学)宗旨以中国先圣之道为经<sup>73</sup>,外国各科之学为纬,故名之曰经纬学堂。”杨枢深为感动,于1905年1月9日上奏称:“洵属体用兼赅,一归纯正<sup>74</sup>。”一份来源不明、当时的中国文献,称赞学校的指导原则,再次重申中日两国“同文”<sup>75</sup>。

经纬学堂与直隶、山西两省达成协议,除设立为考入明治大学的预备科及警务速成科外,还开设为期十个月的师资速成科。像宏文学院一样,经纬学堂设立双轨制课程;但也像宏文学院一样,学生全都入读速成科。1907年7月第一届1,086名学生毕业时,85%的毕业生是修读速成课程的。有意义的是,经纬学堂因而著名的七个月特别警务速成科,有毕业生618人,超过毕业总人数一半以上。经纬学堂于1910年结束时,前后共收取学生2,862人,1,384人毕业<sup>76</sup>。

早稻田大学于1905年9月成立清国留学生部之前,派了两名大学高级人员到中国,和张百熙、袁世凯、张之洞及其他主要改革者讨论中国教育问题。中国方面对留日学生中的危险思想极为关注,对此,这些日本人答称:“我国过去派遣学生到西方学习的经验表明,努力追求学问的人,不会接受共和主义或其他(颠覆性的)思想。回国后鼓吹极端危险议论的,都是些不用功的学生”。他们认为,只要把学习放在首位,危险思想问题会自然解决的<sup>77</sup>。 58

从这一思想出发,早稻田慎重地不给中国学生开设速成科,而是实行单轨教学的三年学制:第一年是预科,学习日语及标准的中学课程;随后两年是师范科的本科,亦可选读政法理财科或商

科。

收录首批 762 名学生匆忙开课后,早稻田把课程收缩为三年的普通科或三年的师范科,这对于当时主要倾向于随时入读正规大学的学生而言,仍保持其吸引力<sup>⑧</sup>。早稻田的师范教育强调更好地为中国服务,因而它的方案为中国培育了无数日本式的新教育体系的优秀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sup>⑨</sup>。到 1910 年,早稻田的清国留学生部因缺乏学生而结束,前后约有 4,000 名学生入学,但获得学位的寥寥无几<sup>⑩</sup>。

59 下田歌子(1854—1936)为中国妇女教育所作的努力,虽然响应的不多,但仍然很有意义。下田出身于武士家庭,与贵族结婚,长期从事宫廷贵族妇女教育。1899 年她开设实践女学校,办校宗旨是“启发女德”,“养成贤母良妻”<sup>⑪</sup>。女校于 1901 年开始吸收了几名中国学生,出于范源濂的个人要求<sup>⑫</sup>,于 1904 年欣然接纳了 20 名湖南女生。随后,在奉天省熊希龄(1867—1937)到日考察期间,下田与熊议定,奉天每年派 15 名或以上学生到实践女学校入读师范速成科。因而实践女学校于 1908 年开设独立的“支那部”,并有自己单独的校舍。

下田歌子浸润了儒家道德价值,作为日本皇室的忠实支持者,她以促进中国现代女性奉行“东洋女德”为己任,她亲自讲授必修课“修身”,并演讲、著文宣扬她的宗旨<sup>⑬</sup>。她自然可以在她的学校对现代中国妇女演讲,却无法控制她们的思想和行为。至 1914 年止,在实践女学校学习的 200 多名中国女学生中,其中就有秋瑾(1875—1907),因返国后反对儒家教义及坚持这教义的帝制而牺牲<sup>⑭</sup>。如何评价下田的教育原则和培育出秋瑾式人物的矛盾,有待进一步探索。

中国最重视的军事教育,其初依赖成城学校,1903 年改由福岛安正掌管的振武学校负责。由于事关中国全面致力的军事改革,将于《中国军事现代化与日本》一章中详述。

从1906年底至1913年,中国留学生人数全面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之一,是1905年11月日本政府公布《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针对不合标准的学校,收紧学生注册及入读的条件,中国学生非常反感,称之为《取缔规则》,号召罢课并大规模回国<sup>⑤</sup>。这次日本主动伤害感情,是得到中国政府全面支持的,而深怕引起日本反清种族主义<sup>⑥</sup>的清朝学部,1906年3月和8月的指示又推波助澜。指示要收紧出国留学的条件,然后限制、以至完全禁止派遣速成科的新学生到日本。“速成科的时代<sup>⑦</sup>”也就速成地终止了。

从表面上看事情是失败了,但中国在日本学生数目锐减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实藤惠秀认为是从量到质的转变<sup>⑧</sup>。1907年8月签订的15年协议、《五校特约》,规定日本五所最好的公立高等学校或专门学校,每年招收165名中国学生,一切费用由中国政府负责。在1908至1911年间,中国学生按协议规定全数入读指定的五校:(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和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协议一直执行到1922年<sup>⑨</sup>。

## 中国学生在日本的生活

根据李喜所的分析,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四大特点:第一,学习科目的广泛性,包括所有的学科;第二,随着“完美的中国秩序”观念的崩溃,极受社会科学和文学吸引,学文科的占绝大多数;第三,由于受新政政策影响,为了寻求高官厚禄的捷径,法政、军事

---

\*按《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406页,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按《中国现代史大事记》(知识出版社,1984年),为《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译者注

成了当时热门的学科；(例如据 1902 年调查,过半数的中国留学生最初都打算学法律、行政、军事和警务。)第四,留日学生百分之九十以上进入中等学校学习,许多学生只想尽快取得证书,回国求职。“学问较深的专业人才百无一二。”<sup>62</sup>

62 姑勿论书本上学习的水平或质量如何,在日本的经历本身就是教育<sup>63</sup>。首先是在船边泪眼汪汪地远眺马关,那是中国 1895 年含羞忍辱的签约地<sup>64</sup>。随后见到和听到正在迅速工业化、都市化的日本,“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1901 年 9 月 26 日发行的《北京新闻汇报》刊登了一篇留学生的观感,文章称“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sup>65</sup>。一份中国学生的杂志感慨万千地说:“昔日之师傅(中国),不如今日之弟子(日本)”<sup>66</sup>。中国的落后和衰弱,使每个学生都非常痛苦,激发了混和着耻辱、民族自尊和危机感的意识<sup>67</sup>。“对中国主权和尊严实际的和想像的损害”<sup>68</sup>,都使学生们情感激荡,以至神经过敏。

不说精神世界,中国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可能也是难堪的和令人烦躁的。嘲弄、不公平的待遇,不习惯的食物都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最令人沮丧的可能是日本日常生活的诸多规矩。日本生活对某些人可能颇为惬意,而对大多数非日本文化的人便感到繁琐麻烦。从 1905 年前后广为散发的《留学生自治要训》中,不但可见范围之广,也是够逗弄人的。一些告诫对到日本的游客今天依然有效,例如入屋前要脱鞋,入厕所才能穿著厕所拖鞋,到風呂(澡塘)前必须洗刷干净等。以下有关公众及私人行为的训诫是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

不可随地吐痰。

不可随地小便。

大小便要排在便器中。

在路上遇见友人,不可扬声呼唤,也不可久立路边闲聊,

稍作倾谈，行过礼即宜分手。

夏天也不可赤身露体。

进入陈列所时，不可随便打听价钱。

不可随便打听别人的年纪。

同住者写信或温习时，不要在旁打扰。

他人书桌上的书籍或抽屉中的物件不可乱翻。

在室内应坐下，不可徘徊打转。

出入房之时，应要行礼。

出入之时，要记得关上门户。

不可吃冰。

食物掉落在席上时，应该拾起放在厨房一角，不能再放回口里。

室内要打扫干净。

夜间不要大声呼叫。

对下女(女佣人)要庄重(不可开玩笑)<sup>⑧</sup>。

## 赴日学习的鼓吹者

重视自己在日本学习经验的人，常常成为到日留学的鼓吹者。章宗祥(1879—1962)是1899年由浙江派到日本的，190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1916—1919年任驻日公使，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的北京学生视之为日本傀儡，被赶下台。他在1901年写的《日本游学指南》热烈地赞成到日本留学。他像张之洞的《劝学篇》那样，念经似地列举了路程较近、费用较廉的好处，然后热诚地称，“以言学校，则政农工商武备技艺等，无一不备。故欲游学外国，为吾国求未开之学问，其便益当无出于日本之右者矣”<sup>⑨</sup>。

热衷于让同胞分享他们新的知识，鼓舞同胞们的爱国思想，中国学生在黄金十年期间，出版了不少定期刊物<sup>⑩</sup>。例如1903年3



月的《游学译编》，刊登了湖南学生长篇大论的《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sup>①</sup>。同年7月，《浙江潮》发表了浙江留日学生的《敬上同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留学生书》<sup>②</sup>。这是无数事实中的两例，其中心是促请中国同胞前赴后继。

## 对中国的贡献

前赴后继到日本的留学生回国后，不少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杭州大学的田正平和霍益萍特别指出了三个方面：第一，赴日留学生翻译及编纂了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现代教科书，这是有重大意义的。田和霍写道，“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各类学校高、中水平的教科书大都是直接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或主要是根据日文本编写的”<sup>③</sup>。第二，赴日留学生翻译了大量文章，出版了不少论著和日记，他们引入的词汇和概念，形成了新一代中国教育家及知识分子的教育思想<sup>④</sup>。第三，这些回国学生不但在思想转变上，而且还在体制的转变上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促进了中国新教育机构的建立，成为无数新型学校的创建者、管理者和教师<sup>⑤</sup>。

田和霍又称：“各种类型的人才，通过不同渠道到日本学习后，回国后在不同层面工作，从根本上蚕食了封建教育本体，为现代教育注入了新的血液”<sup>⑥</sup>。这一严正的评价，同样可以引伸到清末各个方面的现代化进程。

### 注 释

- ① 《思想革命，1917—1923》，是被广泛地用作教科书的徐中约著《近代中国的兴起》其中一章的题目。
- ② “ryūgaku”（留学）一词，首次见之于797年成书的“Shoku Nihongi”（《续日本纪》），见诸桥辙次著《大汉和辞典》（东京，1955—1960）。第一批派到中国的日本学生详细情况，见木宫泰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由胡锡年译成

中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第57—61页。

③ 见张之洞:《劝学篇·外篇》。

④ 见李喜所著《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北京,1987)第168页,195页。有关孙中山与日本关系,见马里乌斯·詹森的经典性著作,《日本人与孙逸仙》。

⑤ 见第三章注⑤贝斯著第131、159、162、217页。

⑥ 见序言注②,马里乌斯·詹森著《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第149页。

⑦ 见序言注②,马里乌斯·詹森著《日本与中国1911年革命》第348页。

⑧ 汪向荣著《日本教习》(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51页。

⑨ 见黄福庆名著《清末留日学生》;实藤惠秀的名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和他较早期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注④李喜所著第117—206页;波拉·西格丽德·哈里尔著《传播变化的种子:中国学生与日本教师们,1895—1905》(Paula Sigrid Harrell, *Sowing the Seeds of Change: Chinese Students, Japanese Teachers 1895-190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至于对思想作用的简洁论述,马里乌斯·詹森著《日本与中国》书中第149—158页《流向日本的学生》一章,那是无与伦比的。

⑩ 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42—43页。杨深秀的奏折可能反映了事先已和谷野商讨,是由谷野主动提出并作出承诺的。

⑪ 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34页,下册总第987页。杨深秀6月的奏折,导致1898年8月18日军机处电寄各省督抚谕旨,挑选聪颖学生,电咨总理衙门。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第5页(下册,总第993页)。据阿部洋著《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第61页称,杨的奏折实际上是康有为写的,当时康还未够资格直接上奏。杨于1898年9月28日被处决,官方的罪名是他误用职权而便于康有为施展“阴谋”。见第三章注⑫陆光著《百日维新的交织图》第212页。

⑫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201—202第四册,第543页,又见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第14页。又见沃尔夫冈·弗兰克著《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第41页(Wolfgang Franke,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Cambridge: Centre for East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60))。

⑬ 闵斗基著《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再评价》,载入《导言》注①闵著《国

家政治形态与地方势力：中国王朝晚期的改革》(Min Tu-Ki, "Chinese 'Principle' and Western 'Utility': A Reassessment," in Min Tu-ki,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1989))第51—81页。这是英文撰写的文章第一次对“体用”思想作系统地重新评估。《劝学篇》中对“体用”这一公式的不同表述, 闵在该书第51页注①有所论述。对这一词语、张之洞及其《劝学篇》的深入研究, 见闵著第74—76页、第80—81页。

- ⑭ 林明德著《清末民初日本政制对中国的影响》, 载入谭汝谦编《中日文化交流, 第三卷: 经济与思想方面》(Yue-him Tam, ed., *Sino-Japanese Cultural Interchange, III: The Economic and Intellectual Aspects* (Hong Kong, 1985))第206页。阿部洋把《劝学篇》译作《Gakumon no susume》, 载入《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
- ⑮ 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42页; 引自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第14页。
- ⑯ 《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6页(第四册第568页); 亦引用于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第2页。
- ⑰ “事半功倍”一词屡见于在日学习或向日学习的论点中。例如, 见于中国驻日公使杨枢于1905年1月9日有关在日学习法政的奏折, 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8第35页, (总第1317页); 又见于伍廷芳等最卓越的法律改革者于1905年10月15日有关中国法律改革应依据日本样本的奏折, 见《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431页; 本书引自《导言》注③ 岛田正郎著作第25页。
- ⑱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7页, (第四册第569页)。译文参阅汪一驹著《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 1872—1949》第53页。张之洞一部分的话, 使人回想到宇都宫太郎于1897年的看法, 见本书第二章末段引语。
- ⑲ 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著作, 都有节录《劝学篇》的这段话。日文的有: 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41页, 及《中国留学生史谈》(东京, 1981)第9页; 小林共明著《中国初期派日留学生》第7页; 《东亚同文会史》第80—81页。英文的有: 注⑥ 詹森著第150页; 注⑱ 汪一驹著第53页。中文的有汪向荣著《日本教习》第41页, 第52页注①, 145页; 田正平, 霍益萍著《游学日本热潮与清末教育》第2页。

- ⑳ 中国对凭本身所有资格的日本缺乏兴趣,是近代中国在评价日本古典文献上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有关中国对日本文学倾向于“厚今薄古”的透彻研究,见谭汝谦著《中日之间翻译事业的几个问题》,载谭著《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第171—173页。有关日本对中国思想与文学,相反的倾向是“厚古薄今”,见谭著第172页、第173—179页。
- ㉑ 实藤惠秀《中国留学生史谈》第2—3页,10—11页。又见中村义著《嘉纳治五郎与杨度》。
- ㉒ 实藤惠秀《中国留学生史谈》第11页;第三章注㉑黄福庆著第109—110页。1894至1895年战争后,日本儿童在街上嘲弄中国人事,见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218页,及实藤在211—217页的评论。
- ㉓ 这7个人的概况,见实藤著《中国留学生史谈》第13—20页。部分人的学校成绩,见荫山雅博著《晚清期间宏文学院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
- ㉔ 见第三章注㉑小林共明著第2页、第8页。1898年8月2日上谕见第三章注㉑朱有燾主编第二辑上册第17页;8月18日上谕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第5页。
- ㉕ 见中村义著《成城学校及其中国留学生》,载入《辛亥革命史研究》(东京,未来社,1979),第251—252页。留学生部是1898年主要为朝鲜学生而设,他们在1895年已有入读成城学校。
- ㉖ 见上注第253页。
- ㉗ 见第三章注㉑小林共明著第9—10页。
- ㉘ 见上注第8页。
- ㉙ 见第三章注㉑贝斯著第60—61页。
- ㉚ 见上注第61页。
- ㉛ 见第三章注㉑小林共明著第9页。
- ㉜ 宗方小太郎著《宗方小太郎文书:近代中国秘录》(东京:原书房,1977)第45—46页。
- ㉝ 见第三章注㉑小林共明著第10页。来自武汉19名学生的姓名,原读学校及籍贯见上注第53—54页,引用于注㉑第257页。
- ㉞ 见第三章注㉑小林共明著第10页。
- ㉟ 见上注第10—11页。
- ㊱ 同上注第10页。

- ⑳ 近卫笃磨著《近卫笃磨日记, II》第 256—257 页,又见于 253—271 页。及见马里乌斯·詹森著《近卫笃磨》第 108 页。
- ㉑ 详情见《东亚同文会史》第 265 页,及《近卫笃磨日记, II》有关章节。
- ㉒ 容应莫著《吴汝纶之〈东游丛录〉:洋务派之教育改革方案》,载平野健一郎编《近代日本与亚洲:文化交流与冲突》第 47 页。
- ㉓ 蒲地典子著《中国的改革》第 241 页。
- ㉔ 引自第三章注⑨,小林共明著第 8—9 页。
- ㉕ 1898 年 8 月 18 日给各省督抚的谕旨称:“日本政府允将该国大学堂、中学堂章程酌行变通,俾中国学生易于附学。一切从优相待,以期造就。”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52 第 5 页(下册,总第 993 页)。
- ㉖ 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 544 页附表及第 137—143 页说明。其数字与黄福庆的估计相近,见《清末留日学生》第 84 页,第 92 页注⑧。詹森在《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一书中,采用了实藤的数字,但认为这些数字是根据“当时很保守的估计”(第 150 页)。
- ㉗ 这三组数字是:1. 李喜所的著作第 126—127 页,引自他自己 1982 年的研究;2. 汪向荣的《日本教习》第 54 页,引自 1936 年上海的研究结果,未加说明;3. 田正平与霍益萍发表的卓越著作,《游学日本热潮与清末教育》第 2 页。
- ㉘ 二见刚史与佐藤尚子《(附)有关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统计》,这是据日本外务省记录整理的,可惜只包括 1906—1932 年。汪向荣的《日本教习》第 117 页引用了 1906—1911 年的数字,但认为估计偏低。1987 年,阿部洋重申,“即使在 1905—1906 年的高峰期,人数在 7000—8000 之间”。见阿部洋著《向日本贷入:中国第一个现代教育体系》,载露斯·海浩及玛丽安妮·巴斯蒂特编《中国的教育与工业化的世界:文化转移的研究》(Ruth Hayhoe and Marianne Bastid, eds.,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 (Armonk, N.Y., 1987))第 75 页。有意义的是,阿部于 1990 年作了修正,把 1906 年高峰期的数字订定为“超过一万”,见《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第 70 页。
- ㉙ 见注⑥第 151 页。
- ㉚ 李喜所著《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 129 页。
- ㉛ 见阿部洋著《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第 120 页。

- ④ 见上注第 120—121 页,及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 83 页。
- ⑤ 见实藤著《中国留学生史谈》第 10—13 页。
- ⑥ 见《论语·学而第一》。
- ⑦ 见注④第 75—76 页。
- ⑧ 同上注第 118—119 页。
- ⑨ 同上注第 76—77 页。
- ⑩ 同上注第 78—79 页。
- ⑪ 分读不同课程的数百名中国学生的名单,见荫山雅博著《论宏文学院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二)》(吻沫集 5:116—189,〈1987〉)。对留学生教育总的看法,见该文(一)第 134—144 页,及注④第 72 页。
- ⑫ 见注④第 72 页。“大本山”为佛教用语,意为“总管寺庙”。
- ⑬ 第三章注⑦黄福庆著第 124 页。
- ⑭ 见上注,及注④第 72—73 页。
- ⑮ 这些学生的姓名及他们入读的大学,见第三章注⑦黄福庆著第 125—126 页;又见注④第 62 页,及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 65—66 页,第 208—209 页。
- ⑯ 见注④第 146 页、第 179 页。
- ⑰ 《东亚同文会史》第 73—74 页,282 页,283 页;《近卫笃磨日记,Ⅱ》455 页;及大内畅二著《近霞山公与东亚同文书院》,载《支那》25.2:144(1934)。1899 年,近卫在他为期七个月成功的世界之行末期,向张之洞提出邀请的。他在 4 月离东京,11 月 25 日返国,他访问的地方,见詹森著《近卫笃磨》第 115 页。
- ⑱ 《东亚同文会史》第 73—81 页。这是根据记录的准确总结。
- ⑲ 见第三章注⑦黄福庆著第 132 页,又见注④第 95 页。
- ⑳ 法政大学大学史资料委员会编《法政大学史资料集、第十一集,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特集》,是全面性的、极具价值的历史文献,它把学生名册等大学记录,以及当年出版物的摘要,传记概略都分门别类编入。我十分感谢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中国区的专家 Mi Chu Wiens,把她的这套非卖品的史集借给我。她的祖父居正(1876—1951)就是第四届毕业生之一。见上注第 152 页,178 页。居正任司法院院长长达 16 年,自 1932—1948 年,其传记见包华德著《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I (Boorman,

Howard L.,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 Press, 1967 1971)第 469—475 页。居正的一生是个例子,足以说明在中国结束帝制后,在日本受训的学生仍持续影响中国的现代体制,尽管日本的侵略迫使许多人掩饰或抵赖他们与日本的联系。

⑤⑥ 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68 第 35 页(下册总 1317 页)。

⑤⑦ 同上注下册总第 1316 页;《导言》注③;岛田正郎著《清末中国对近代法典的编纂:东洋法史论集》第 257—258 页。

⑤⑧ 引文与注⑤⑥同;关于学生人数,见注⑤⑥第 263—264 页;及注⑤⑧第 71、83、131 页。

⑤⑨ 有关法政方案在 1904 及 1906 年的教师名单,他们的学位及渊源,他们在法律方面擅长的范畴,以及授课内容,见注⑤⑥第 91 页及 114—116 页,又见注⑤⑧第 82—83 页。请注意法政课程使用的日本标准语汇,是怎样由日文直接引入中文的。

⑤⑩ 见注⑤⑥第 148 页、第 93—94 页;又见注⑤⑧第 176—178 页。

⑤⑪ 见注⑤⑧第 83—84 页。

⑤⑫ 见第三章注⑤⑦黄福庆著第 138—139 页。黄福庆的统计,超过注⑤⑥的资料,有待调整。

⑤⑬ 中文是“中国先圣之道”。(按:此注为针对英语读者而加。)

⑤⑭ 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68 第 36 页(下册总第 1317 页)。

⑤⑮ 引自注⑤⑦,岛田正郎著第 262 页。

⑤⑯ 见注⑤⑧第 81 页,注⑤⑦第 134 页。

⑤⑰ 引自注⑤⑧第 87 页。

⑤⑱ 同上注第 86 页。

⑤⑲ 同上注第 88 页。

⑤⑳ 其中有代表性的 8 人姓名及其教育职务,见上注第 90 页、170 页。

⑤㉑ 见注⑤⑦第 139—140 页,注⑤⑧第 88—90 页。

⑤㉒ 引自注⑤⑧第 98—99 页。日本标准的表述是“良妻贤母”(ryosai kenbo)。这一套道德准则,也由推动中国妇女教育的日本人带到中国。见上注第 189—205 页。

⑤㉓ 见上注第 100 页。

⑤㉔ 有关引语,见上注 101—102 页。

- ⑤ 参阅小野和子著《下田歌子与服部宇之吉》，载竹内好与桥川文三编《近代日本与中国》（东京，1974），1，202—212页；小野和子著《1850—1950年，革命世纪的中国妇女》，载乔舒亚·A·福吉尔（Joshua A. Fogel）编《史丹福，1989》，第54—65页；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75—79页；注④第102—105页。第三章注⑩王晓秋著作第486—491页。
- ⑥ 有关中国学生的反应，见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461—494页，中文译本第270—289页；实藤著《中国留学生史谈》第219—283页，及注⑦第276—311页。
- ⑦ 见注⑦第277页，第86—87页。
- ⑧ 见注④第117页。有关提高中国留日学生质量的办法及日本迅速的反应，见注⑦第117—128页。
- ⑨ 见实藤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第201页，及《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104—110页。并参阅第三章注⑩王晓秋著作第358页，十分出色的《1907年日本各学校中国留日学生在籍人数统计表》。
- ⑩ 详见注④第128—130页。协议条款和预计中国各省每年开支的冗长报告，见注⑥卷72第21—25页（下册总第1381—1383页）。
- ⑪ 见注⑦第143—148页。中国留日学生的总体水平低得可怜，见之于学部1908年1月3日奏折称：“比年以来，臣等详查，在日本游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2第21页（下册总1381页），亦引于注④第119页、第三章注⑩王晓秋著第359页。
- ⑫ 马里乌斯·詹森写道：“毫无疑问，学生们经受的经验，远胜于他们接受的正规教育”。见注④第152页。
- ⑬ 注⑦第155页。
- ⑭ 以上引语见注⑦第107、108页。
- ⑮ 引自注⑦第154页。
- ⑯ 对这问题的深入研究，见上注第154—161页，及注④152—156页。
- ⑰ 同上注第156页。
- ⑱ 摘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第107—108页。
- ⑲ 引自注⑦第6—7页。实藤惠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172—192页，



及实藤著《中国留学生史谈》第103—131页、第43—45页中,对章著《指南》的引用,处处可见。

⑩ 1898—1911年留日学界发行刊物表,列举了刊物名称,创刊时间,出版地,编辑及发行人与宗旨及内容,见第三章注⑩王晓秋著第369—373页,及注⑰第188—195页。

⑪ 实藤著《中国留学生史谈》第155—186页载有全文译文。

⑫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581—594页,载有全文译文。

⑬ 田正平、霍益萍著《游学日本热潮与清末教育》第17页,对这一要点的论据,见第17—20页。

⑭ 同上注第20—22页。

⑮ 同上注第22—24页。

⑯ 同上注第24页。有关在中国培训的学生对新中国的贡献,见桑兵著《1905—1912年的国内学生群体与中国近代化》,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9月号,第55—76页。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范源濂,辛亥革命后曾三度出任教育部长,随任美国庚子赔款基金会理事及主席,他在1924年说道,当编写中国教育史、论及师范教育的起源时,应以服部博士(服部宇之吉,1867—1931)之事业为第一页<sup>①</sup>。此后,教育史是写成了,但服部博士和其他众多的日本教习和顾问都没写进去,在记忆中和历史里,完全忘记了<sup>②</sup>。

半个世纪以前,实藤惠秀著文论述在中国的日本教习和顾问,使人耳目一新<sup>③</sup>。在其后的35年间,这一主题又被搁置。到了1968年明治维新一百周年,日本学者又有兴趣研究明治维新初期日本雇用的外国专家<sup>④</sup>,进而研究明治末期受雇于外国政府(例如中国)的日本专家。初步的调查后,增加了了解也提高了兴趣<sup>⑤</sup>。1975年在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阿部洋的指导下,开展了连续两三年的共同研究计划,探索这些被忘却的人们的历史地位<sup>⑥</sup>。

1988年10月,中国出版了研究同一问题的论著,标志着中国已在回忆近代教育史中被遗忘的一章。资深的中日问题学者汪向荣,直截了当地把论著定名为《日本教习》。40年代时,汪向荣已和实藤惠秀在日本

67 有密切的工作联系,以后彼此通信到 50 年代。在 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汪向荣和绝大多数与外国有接触的学者一样,被迫断绝联系,中止学术活动,汪个人的藏书和文稿也受尽破坏,严重地阻碍了他的研究<sup>⑦</sup>。

尽管汪备受折磨,他的著作赢得了世界第一本论述在中国的日本教习专著的称誉,已被译为日文。著作的重点和最有价值的是一份长达 28 页的《日本教习分布表》,表中分地区、校名、教习姓名、备考等项<sup>⑧</sup>。但《分布表》又暴露了惊人的事实,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等所有保存的名单,缺了上海一地,尽管明明知道有日本人在上海工作的<sup>⑨</sup>。由于清末期间,日本人自由往来中国,无需签证或登记;也由于中国官员在挑选新的教习和顾问时,惯于只凭身边的日本人推荐介绍,究竟有多少日本教习和顾问受地方聘用而不留官方记录,不可能有明确答案<sup>⑩</sup>。希望寻求准确统计是徒然的。

简单的数字就这样几乎否定了学者的苦心孤诣。1983 年,细微认真的荫山雅博依据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文献,作出了一系列的估算<sup>⑪</sup>,其数字与 1976 年南里知树同样以外务省文件为依据的所得数目相同<sup>⑫</sup>。其后还有人不断地研究,但较稳妥的还是依据日本外务省记载,如表二荫山综合的数字。但得强调这充其量只是包括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所知道的在华教习及顾问。统计在内的,应是已在中国颇有建树,极具才干,几经筛选,又职位相当的日本人。

表二: 1903—1918 年在中国的日本教习及教育顾问

68	1903	1904	1909	1912	1913	1918
日本教习及教育顾问	99	163	424	63	84	36
其他顾问及技术专家 ("技师")	49	71	125	96	93	394
合计	148	234	549	159	177	430

材料来源：荫山雅博著《清末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与日本教习》第9页。（见注⑩）

1905—1908年的记录不知怎的不幸地遗失或销毁了，使我们无从证实藤惠秀在1939年的说法，他认为1906年是日本教习和教育顾问到中国的高峰期，荫山亦作如是说<sup>⑬</sup>。我个人倾向于高峰期应是1907—1908年间。有必要说明的是，其他顾问及技术专家的数目于1918年骤然增加，绝非由于中国正常地对日本专家倍加尊敬，而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效法西方列强，于1915年提出“21条要求”前后，强行向中国派出官方指定的“专家”，诸如海关官员、盐务监督等<sup>⑭</sup>。

在日本对华推行帝国主义的初期<sup>⑮</sup>，日本教习到中国工作，既是由于日本推的效应，也是由于中国拉的结果。有趣的是，中国的拉似乎先于日本的推。1896年12月，中国驻日公使裕庚代表两广总督，请日本外务省协助招聘“东文教习”到广东同文馆新设东文馆任教，可能涉及日后续约时的薪酬底线（外务省拟订的目标是月薪与西教习同），经过颇为艰巨的谈判后，外务省推荐了能通华语的长谷川雄太郎（1865—1904）<sup>⑯</sup>。长谷川出身于武士家庭，有在中国藉着贸易从事情报工作及军事间谍的经验<sup>⑰</sup>。虽说他在中国执教至1903年，但他的姓名并未列入汪向荣的教习分布表内。 69

## 日本人在华从事教育的启端

如上所述，日本人于1897年便开始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办法，对抗西方侵略及帝国主义；中国方面，受到1897—1898年间被瓜分的威胁，骤然热衷于寻求外界帮助，在四面楚歌中确保生存。

日本人涉足中国教育领域，可谓历史的偶然。开始时是日本人在中国建立、或和中国人共同建立了一些东文学堂（东文指东方的语言——中国以东人民的语言），这些学校一半是佛教徒以基督教的教会学校为榜样建立的。日本大谷派本愿寺主办的金陵东文

学堂说得清楚：“目的是一面教育国人的子弟日语及普通课程，一面注入佛教教义。”<sup>⑧</sup>由于缺乏经费，大多数学堂结束了或由中国人接管了。无论这些学校的命运如何，总是为中国带来第一批日本教习和顾问，培养了中国学生，使他们能到日本继续深造。

1898年3月，东本愿寺亦即净土真宗大谷派<sup>⑨</sup>，为要在长江流域弘扬佛法而组团调查，其后佛教学校便相继建立，仅仅在一年内，东本愿寺便在三个主要城市建成学校：杭州日文学堂（1898—1906）；苏州东文学堂（1899—1900）；及南京的金陵东文学堂（1899—1904）<sup>⑩</sup>。然而，这些学堂的作用并不长久。

具有历史性持续影响的，却是非佛教人士早期所作的努力。福建省福州东文学堂（1898年7月—1903年12月）成立于百日维新高潮期间，是当时称为东文学堂的众多学校中最早的一所，由中国当地杰出的改革人士和日本的积极分子共同发起组成，中国方面70 有当地银元局官员及前南洋大臣、杰出的教育官员陈宝琛（1848—1935）<sup>⑪</sup>，日本方面，主要是东亚会的积极分子和记者中岛真雄（1859—1943），中岛于1899年任东亚同文会福州分会首届会长，1901年到北京，其后筹建并编辑《顺天时报》——日本人办的颇受时重的华文报纸，本世纪30年代中期，任东亚同文会出版的《对支回顾录》编辑，这著作是本书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sup>⑫</sup>。

福州东文学堂最重要的总教习，负责课程设置安排及管理日本教职员，由冈田兼次郎（1867—1901）担任。冈田出身武士家庭，曾在京都基督教学校同志社就读，其后入上海荒尾精主持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1894年毕业。中日战争期间，冈田在军队任翻译并获授勋，随后受任台湾民政官员<sup>⑬</sup>。

福州东文学堂开设的课程有日语、依据日本现代课程的“普通学”及中国文学；学生30至40人，据说主要是当地乡绅的子弟<sup>⑭</sup>；经济上本来一直应付自如，戊戌政变后，中国方面突然停止支持，迫使冈田向日本方面寻求资助。1899年5月，他作为东亚同文会

的董事,成功地获得这新建的组织把该校列为对华教育事业,按月发给津贴。除此以外,东亚同文会还赞助桑田丰藏(1872—1923)到东文学堂任教。桑田为东亚同文会会员,对中国事务非常热心,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他在东文学堂任教达七年之久<sup>⑤</sup>。1899年7月,东文学堂举行第一次毕业考试。按原来设想,这类学校的毕业生可以送到日本深造<sup>⑥</sup>。东文学堂的两名毕业生十月到了东京,东亚同文会为履行计划,把他们安置在新的东京同文书院<sup>⑦</sup>。 71

由于东亚同文会的资助,不足以应东文学堂的开支,冈田因而向台湾求助。新的日本殖民政府一意要与福建沿海乡绅建立联系,因而表示同情,到了1900年,台湾开始对东文学堂按时资助<sup>⑧</sup>;但福州银元局却终止了支持。无论东亚同文会或台湾政府,都没有把学堂开支的缺额补足。桑田丰藏深感受挫于财政困难,其后不无遗憾地写道:“美国和法国都相信跟随语言而来的是国家利益,都计划建立更多的法语学校、英语学校,我是坚决和它抗衡的。我并且强烈地感到,我们必须固守优势地位,作为(日本)利益的一部分。不过,汽车没油是开不动的……我深怕同文会对我们在福州的事业已在丧失兴趣了。”<sup>⑨</sup>

在研究这问题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世纪之交,日本及其众多的机构都无一例外地在努力奋斗,却又资金不足,这包括了佛教社团,台湾日本殖民政府,东亚同文会这样的半官方组织,日本商人及中央政府的机关。壮丽崇高的希望和梦想着着需财,又总是力所不逮。为了教育海外的外国人,债务却不能及时清付,这困难确是难于解释和承担的。

到1902年年底,福州东文学堂约有160名学生入读,分为普通科和政治科。此外,在350名申请者中,34名学生获准于同年夏天入读新的课程,该课程由陈宝琛提出,并获省里资助<sup>⑩</sup>。这标志着中国人开始计划提高东文学堂,改成培训中国师资的基地,加

建新校园及校舍<sup>①</sup>。

72 东文学堂于1903年扩充,改名为全闽师范学堂,在陈宝琛领导下,于1903年12月11日正式开办,依据日本最好的体制,开设四年制师范课程,第一年为预科,其后三年为本科;另外还开设一年半的讲习科,全部课程由日本教职员负责。据1903年年底两份日本人的报告称:

“中等以上家庭的子弟,通过入学考试后,入读预科,主要学习日语。完成预科后,升读培养教育家必需的本科,全部用日语教授。毕业后分派福建各府、县开设的中、小学。讲习科的课程都是中国教育界所急需的。

“本学年挑选(原东文学堂)成绩最好的30名学生编为本科第一年级,并招预科、讲习科学生100名(每班50人)。

“各科的学生都是官费生<sup>②</sup>。”

桑田丰藏报告中称,有1000多人申请入学,远远超出陈宝琛和他自己的设想<sup>③</sup>。

冈田兼次郎于1900年已因病而辞职,由中西重太郎(1875--1914)出任总教习。中西也和冈田一样,曾就读于荒尾精在上海办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是战时受勋的译员<sup>④</sup>,因病辞职后,中国随即指派桑田任总教习。在该校任职的本有五名日本人,但在汪向荣的分布表内,只有上述三人<sup>⑤</sup>。

73 桑田及全闽师范学堂一直获得东亚同文会的支持,直至1906年桑田辞职为止<sup>⑥</sup>。1904年中国全面接管学堂后,台湾日本殖民政府便停止了对学校的资助<sup>⑦</sup>。桑田是欢迎中国接管的,他在1903年11月23日给东亚同文会的报告中,盛赞中国计划将学校提升为高等师范学堂,并断言该校将是“中国学界的主要势力”<sup>⑧</sup>。1905年,该校在校名和课程方面都的确升格了,易名为福建优级师范学堂,不久又改名为福建高等师范学堂<sup>⑨</sup>。虽然日本人在创建该校中明显地担当重要的角色,但中国人却认为该校历史始于

1902 或 1903 年,把所有有关的日本人全部抹煞了<sup>④</sup>。

除上述四校外,根据记录,1899 至 1901 年间还办了五所日语学校:天津的天津东文学堂<sup>⑤</sup>;与日本军方有着若明若暗关系的成都四川东文学堂(1899—1900)<sup>⑥</sup>;台湾政府慷慨资助的厦门东亚书院(1900—1909)<sup>⑦</sup>;真正中日合资兴办的北京东文学社(1901—1906);及在福建泉州的佛教彰化学堂,该校属台湾东本愿寺的外展事业,获台湾政府的秘密协助<sup>⑧</sup>。

霍姆斯·韦以奇以幽默的口吻,评论日本人建立这些学校的动机和向中国人推销时的信口雌黄:“学校以尖刻的口号招生,例如‘国家兴亡靠人才,人才靠教育培养。’他们开办的课程是日语和标准现代科目。于 1898 至 1899 年间,至少开办了四所学堂。人们怀疑,与其说日本人的唯一目的是帮助中国培养人才,振兴国家,毋宁说是要确保一些人才是亲日的。”<sup>⑨</sup>

## 中岛裁之领导的北京东文学社, 1901—1906

在上述各学校中,最富时代特色、最具研究价值的是北京东文学社<sup>⑩</sup>。该校校长中岛裁之(1869—1939)在建校之初似乎预示前景辉煌,事后看来,又似乎失败是命中注定的,整个过程颇像希腊的悲剧。

中岛裁之是该校创建者,正人君子,热诚地希望在“报中国对日本庞大的文化恩惠”上有所作为<sup>⑪</sup>。1897 至 1898 年间,在因吴汝纶而知名的保定莲池书院教授英语及日语,期内与中国人相处不错,和著名教育家吴汝纶结成挚友,两人曾共同商议符合现代教育标准的、新型学校的计划。然而当吴汝纶于 1899 年慷慨地建议中岛到一所新的附属学校任教时,中岛以家庭为由拒绝了<sup>⑫</sup>。

1891 年,中岛毕业于其后发展为京都帝国大学的佛教西本愿



寺学校,随即首次到中国游历。他的行踪甚广,到过许多省份和寺庙,靠着售卖“大陆浪人之父”、上海的岸田吟香(1833—1905)及荒尾精提供的物品,赚取生活费<sup>④</sup>。1899年6月返回东京,参加东亚同文会。岸田吟香是该会参议和特约会员,中岛也曾短期协助该会制订教育计划<sup>⑤</sup>。在1899年10月东亚同文会为中国客人举行的宴会上,中岛以流畅华语发表演说,这在他的同辈中是罕有的<sup>⑥</sup>。

中岛曾在成都四川东文学堂任教,但不久该校便办不下去。1901年初,他在返日途中路经北京时拜访吴汝纶,两人决定立即在北京重新编织现代中国教育的梦想。吴的交游广阔,介绍中岛会见一些适合的中国人,让他们帮助筹措经费、物色校址及推介办事人员。吴为避免与朝廷官员身份不符,置身事外<sup>⑦</sup>。

1901年3月20日,东文学社正式开学。选的也真是良辰吉日,由于义和团动乱,许多学校仍然关闭,对教育的需求是爆炸性的,原来估计可收取30人,结果三天之内涌来了120人,很快又像吹气球似的增为280人<sup>⑧</sup>。一个教师是教不了这样多人的,设备和资源也无从应付。

汪向荣指出,东文学社的这批学生包括了各种背景的人物,有75 “翰林,也有进士、举人和秀才,更多的是白丁和小学生;至于职业和社会地位,更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sup>⑨</sup>。”中岛本着佛教的慈悲为怀,来者不拒,免收学费。只坚持两项条件:基本上能读能写;身体健康,没有鸦片烟瘾的<sup>⑩</sup>。

日本学校录取学生是严守标准、精心安置的,中岛放手收录的政策是反日本之道而行<sup>⑪</sup>。既不加筛选又无力安置学生,构成了东文学社直接的难题<sup>⑫</sup>。但问题被掩盖了,盲目的乐观主义却受大肆渲染,由于学校特别是第一班的若干人受袁世凯及李鸿章信赖,这使学校赢得声誉,认为袁是承诺资助学校的<sup>⑬</sup>。

由于东文学社没有明确的标准,学生人数变动之大超乎想象,

特别是1902年<sup>⑤</sup>。1901年度全年共有学生601人(第一学期280人,第二学期321人);1902年度331人;1903年度141人;1904年度189人;1905年度137人;及1906年度168人<sup>⑥</sup>。坚持就读的人数比年度总人数更能说明问题,1901年进校的601名学生中,1902年只剩152人,1903年剩下38人,1904年只有8人,而到1905年就仅剩一人了。1902年入学的331人中,到第四年的1906年只剩2人,而且还未能完成学业<sup>⑦</sup>。换句话说,由于种种原因,在建校的五年半内,能够读完四年课程的,一千多人中只有一个<sup>⑧</sup>。

问题的产生不是由于缺乏远见,中岛亲自草拟的《创立东文学社章程》说明:“欲求振兴中国,非整顿学校不可。今与志同之士议定,创设东文学社……以定维新之基。”中岛还在《将来的希望》明确表示他的愿望:“养成具有学识、资格之人材,以当十八省各府州县等复兴之任之教师,养成能为各省开设师范学校所期之师资。”<sup>⑨</sup>这些确是急迫的目标<sup>⑩</sup>。

问题也不是由于中岛是个坏人,他似乎没有什么坏心眼。在人们记忆中,他特地和教职员共进午餐,参加他们的演讲会,对学生们亲切,乐于和学生一道参加学校规定的中国式的课外劳动,以至有时使自己出了洋相<sup>⑪</sup>。

76

学校始终无法解决的是财政问题。中国官员认为,经济拮据就应收取报名费或学费。但中岛置若罔闻,认为收取费用就会赶走学生,四川东文学堂的瓦解就是前车之鉴,坚持不能把收取费用当成学校稳定运作的依靠<sup>⑫</sup>。他的办法是四处托钵化缘,凡是想到的都去请求资助。东亚同文会去了,并不成功;日本军方、日本西本愿寺也去了,都只有一点收获;找袁世凯,开头是成功的;找在北京的日本人,一无所得;三次找日本国会,都两手空空<sup>⑬</sup>。在绝望之中,他筹划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弄钱计划,不但完全失败,他自己反而引起别人的猜疑<sup>⑭</sup>。

心地善良的中岛裁之,压根儿就是个好人,他简单地只想学校

能办下去。管理上的幼稚,教学上的不胜任,计划上的不周详,僵化的理想主义又使他无从看清严峻的现实,把自己捆在无法解开的死结上。由于学生未经筛选、教师又未经训练,他纸面上的计划毫无实践价值。问题不在于意图,而在于概念能否实现。

面对着庞大的入学新生,他在第一学期把学生分为高、低班。他自己成了万能教师,讲授历史、地理、政治、国际关系和日语,每天五小时,每周授课六天<sup>77</sup>,这自是中岛无法承担的。为了找人协助授课,他向参加过反义和团联军仍留下来的日本人求助。教师们都不发给工资,只有少量津贴及提供食宿,(中岛自己除生活开支外,也不要任何薪酬,)此外还有点吸引力,就是由受薪的中国督学向他们讲授中国语文<sup>78</sup>。

在五年多期间内,先后有 56 名年轻日本人到东文学社任教<sup>79</sup>。中岛对他们只要求三条:不许在校内喝酒,不许出入花街,不许穿着日本服装和木屐,避免激怒中国人<sup>80</sup>。但这些日本年轻人中,有些算得上中国东海那边最坏的流氓,个别人不但藐视一切规定,甚至公然当着中岛的面犯规,一个特别讨厌的教师竟然当着中国学生的面用日本刀威胁中岛,有些人公开互相打骂。1902 年中岛到日本筹款时,极其愚蠢地把管理权交给一个出名的捣蛋分子,造成了派别活动,以至在 1903 年公开分裂,差点断送了学校<sup>81</sup>。

一个曾在朝鲜工作、有殴打学生恶癖的教师,打伤了御史的儿子,其父马上向皇帝弹劾学校的中国主要赞助人<sup>82</sup>。这一事件加上住在北京的日本人的蛮横行径,再加上中岛真雄在《顺天时报》对他们的指责,形成了“东文学社流氓”的新“形象”<sup>83</sup>。

如果不是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这一群难于驾驭的教师制造了这许多麻烦,定必葬送了东文学社。战争爆发后,两名捣蛋头子和四名跟随者组成特别爆破组和俄国人作战,当他们准备炸桥时被俄国人逮捕,并被马上处决,这些流氓立即被抬举为光荣的战争英雄<sup>84</sup>。

有人把学校的那些事端归罪于中岛,甚至在袁世凯面前污蔑,说“中岛在日本是个无法找到工作的无赖、流浪汉”<sup>⑦</sup>。这显然对他是不公平的。如果说他任命的日本人,无论能力及品质方面都不足以担任教师<sup>⑧</sup>,该是较为合理的指责。

中岛如果重视 1902 年春东亚同文会的忠告,他可能把事情办好的。东亚同文会鉴于日本的地痞流氓不断涌到中国,便以近卫公爵的名义,向中国所有督抚遍发通电,标题就是“(日本)教师用聘的注意”,电文中警告,由于他们“玉石相混”,选择日籍教师务必“极为注意”。袁世凯、端方及不少中国主要官员,都对公爵的知会表示谢意<sup>⑨</sup>。只知道中岛是否不知道有此通电,或者置之不理。

由于原有资金用尽,新的又无以为继,中岛于 1906 年 7 月以自己健康为由,宣布学校结束。这个悲剧的形象,不切实际梦想家,放弃了仅有的个人财物回到日本,细舔自己的伤痕,整理自己的思想,坦率地写出失败的教训<sup>⑩</sup>。他的墓碑该是这样写的:“一个热爱中国、志大才疏的人”。

中岛的东文学社渴望成为中国新教育制度的开路先锋,却不按制度常规,成为可悲的异端。比中岛和他的梦想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已成新主流的各类学校工作的日本教习和顾问的工作。“代表既成体制的”日本教习和顾问们,对中岛的惨败深感颜面无光,在中岛离去后,便在服部宇之吉等人领导下组织起来,恢复日本在华北的声誉<sup>⑪</sup>。汪向荣说的,中国新教育制度“不停留于纸面文章”<sup>⑫</sup>,应归功于这些专业教育工作者;实藤惠秀能把 1901 至 1911 年间的新政年代称之为中国的“日本教习的时代”<sup>⑬</sup>,也应归功于他们。

## 在中国的“日本教习的时代”的主要教师和顾问

新政年间,在中国工作的一连串“伟人”的名单,读起来就像一

79 本近代日本教育学家及学者的名人词典。以下人物摘引自汪向荣所列的名单,小传则主要依据阿部洋的论著<sup>⑧</sup>。名单虽按所属学校编列,但也有个别人在中国工作后才到校任职的。

##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服部宇之吉,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博士,1900—1902年在德国学习,1915年曾任哈佛大学教授一年,1924年起任东京帝国大学,1926年任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总长。1902—1909年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教习。师范馆于1904年重组为单独的优级师范学堂<sup>⑨</sup>。

冈田朝太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博士,1897—1900年在德、法进修刑法,1906—1915年在中国任各种法律改革顾问,《大清刑律》草拟者,京师法律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及京师法政学堂法律教授<sup>⑩</sup>。

吉野作造(1878—1933),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学系毕业,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以宣传民主、多产的随笔作家而著名。1906—1909年到中国,任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的政治法律学教习<sup>⑪</sup>。

藤田丰八(1869—1929),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文科,1920年文学博士,1928年任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长,1897—1912年到中国,其初在上海与罗振玉(1866—1940)一道从事教学及翻译工作,1904年到广州学务处任教育顾问,1905—1909年任江苏两级师范学堂总教习及江苏学务处教育顾问,1909—1912年于京师大学堂农学科讲授东文文学<sup>⑫</sup>。

## 京都帝国大学教授

80

严谷孙藏(1867—1918),法学士,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随后赴德、奥学习法律及法庭系统。1902至1916—1917年间在中国,历任京师大学堂仕学馆(1904年改称进士馆)正教习(1902—1906),京师法政学堂法学教习(1906—1912),后任民国政府法典编纂会调查委员<sup>⑧</sup>。

矢野仁一(1872—1970),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后为文学博士,中国近代史的一流权威,1905—1912年在华,任京师大学堂、京师法政学堂的政治及外交史教习<sup>⑨</sup>。

织田万(1868—1945),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1896—1899年在欧洲学习。约于1910年任京师大学堂法政教习<sup>⑩</sup>。

## 早稻田大学教授

中岛半次郎(1871—1926),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开拓者,1906—1909年任天津北洋师范学堂教育心理学讲师。后任早稻田高等师范的部长<sup>⑪</sup>。

渡俊治(生卒年份不详),毕业于东京善邻书院,任保定直隶师范学堂教习<sup>⑫</sup>。

氏家谦曹(生卒年份不详),1904—1909年任京师大学堂理学教习<sup>⑬</sup>。

## 编纂语言教科书及华日辞典的先驱 及中国在日本学生的顾问

松本龟次郎(1866—1945),于静冈县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日本

任教师,从事方言研究、日本国语教育,1903年开始于宏文学院任中国学生的日语教师,1908—1912年任京师法政学堂日语教习<sup>⑧</sup>。

井上翠(1875—1957),研习英、法、中文,1905年任宏文学院日语教师,并研究语言学,1907—1911年任京师法政学堂日语教习,大量汇编了基本华语词典,包括他的《井上辞典》系列<sup>⑨</sup>。

81 服部操(生卒年份不详),成都东洋预备学堂日语教习,其后任《日华大词典》编辑<sup>⑩</sup>。

## 其他

岛田俊雄(1877—1947),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毕业,昆明法政学堂法政教习,其长期担任日本国会议员,几次出任农商务省大臣<sup>⑪</sup>。

杉荣三郎(生卒年份不详),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毕业,随后任职于日本大藏省。在华工作11年(1902—1912),与严谷孙藏一道,历任京师大学堂仕学馆、进士馆和京师法政学堂的法律及经济学教习。返日后任宫内省官员及顾问<sup>⑫</sup>。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上述人士抵华之前、在华期间或以后,大多写出论文及教科书,这些著作以中文写作或译成中文,即便在作者身后仍具重大影响。据谭汝谦等研究,初步统计,服部宇之助有五部著作,冈田朝太郎四部,吉野作造一部,严谷孙藏一部(指导翻译),藤田丰八五部(翻译或共同翻译),中岛半次郎五部,松本龟次郎四部,井上翠、服部操各一部,杉荣三郎两部<sup>⑬</sup>。

在上述人士中,最杰出的是吉野作造,1911年后,他是著名的政治分析家,坦率地鼓吹日本民主。1909年初从中国返日后,应邀演讲及著文论述中国问题。1909年4月21日他在经济研究联合会发表演说,题为《清国在勤之日本人教师》<sup>⑭</sup>,五月公开发表,吉

野依据 1908 年秋季的调查,指在华的日本教习及顾问约共 500 人,具体分类是:师范教育 125 人,军事教育 100 人,普通教育 95 82 人,实业教育(主要是工业技术及农业)80 人,法政经济教育 45 人,警察教育 30 人,医学教育 15 人,日语学教育 10 人<sup>⑩</sup>。

吉野的资料是有用的,但日本外务省的记录更为可靠详尽,可以互为补充。例如在 1909 年 7 月外务省记录的名单中,与中国各机构签有合约的教习和教育顾问共 424 人,另有教育外的顾问及技师 125 人(见表二)。教习及教育专家遍及中国各省,最多的直隶有 114 人,最少的新疆 1 人。教职也遍及不同层次,从幼稚园到高级专科学校及大学。科目亦包罗万有,从普通教育到军警教育、艺术、工艺、农学及医学<sup>⑪</sup>。

## 合同条款及教学条件

日本教习和顾问都和中国官方签订了合同,合同一般为期两年,也有一年、三年、四年以至五年的。不少人因工作优良而获续约,雇用者如不满意,可以提前中止合约,受雇者通常可以领取整个合约期的全部薪金。

薪酬是接受雇请的最大诱惑,据 1905 年统计,“通常是他们在日本工资的三四倍以至六倍”<sup>⑫</sup>,相当于中国教师的五至十倍。汪向荣认为,“对应聘而来的外籍专家、教师给予高于本国同样工作人员的薪俸、待遇,是理所当然的,不仅中国如此,就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也是这样的”<sup>⑬</sup>。中国当局付出如此悬殊的薪酬,自是期望有好的结果和引起应有的重视。

合约附有严格的条款,详细列明教学及其他职责,指明对中国督学负有严格的义务。这一切都按照 1904 年 1 月《奏定学堂章程》的精神,《章程》规定:“各省中学堂以上,有聘用外国教员者,均应于合同内订明:须受本学堂总办监督节制。除所教讲堂本科功 83



课外,其余事务,概由总办监督主持,该教员毋庸越俎干预。”<sup>⑧</sup>合约规定强硬到如此程度,应归功于一位日本学者,为的是使中国避免日本图谋“夺取教育权”<sup>⑨</sup>。

渡边龙圣(1865—1945)是东京音乐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1902年受目光远大的袁世凯雇请,任在保定新成立的直隶学校司高等学务顾问。(学校司于1904年7月改为学务处,1905年迁到天津。)渡边1887年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英文科,随即入读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其后到美国进修,1894年获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返日后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899年开始兼任东京音乐学校校长<sup>⑩</sup>。

1902年初春,渡边受日本文部省委派调查华北教育情况,调查期间会晤了袁世凯,渡边知识广博,英语流畅,富有大学管理经验,袁对他印象极深,向他提出极高月薪400两的两年聘请合同<sup>⑪</sup>。袁十分需要渡边这样的人才,实现全省现代普通教育及师范教育的计划,这计划在渡边抵达时就已经拟定了<sup>⑫</sup>。

渡边接受了袁的建议,赢得日本教育界的庆贺。日本权威性的教育刊物《教育时论》当即指出渡边的决定意义重大,能大大提高“我国名誉及我国人的声价……这责任惊人地重大。更重要的是,直隶为中国各省之首,如其教育事业发达,定必对其他省教育事业产生巨大影响。渡边自必热心诚意地为自己国家竭尽全力<sup>⑬</sup>”。稍后,《教育》于1902年8月3日发表文章,号召读者效法渡边,加入应聘赴华的教师行列<sup>⑭</sup>。

渡边的合约于1902年9月生效,另有12人的合约则于10月生效。这12人中包括三名直隶省学校司的翻译官,9人则在总教习渡边领导下于保定新办的直隶师范学堂任教<sup>⑮</sup>。

在随后的八年间,直隶省的中国教育官员此去彼来,但渡边一直稳定地留任,实实在在地继续工作<sup>⑯</sup>。凭藉他的职位,也依靠数以百计的其他日籍合约教习和专家多年来直接间接的帮助<sup>⑰</sup>,渡

边在教育行政方面起着中枢的作用：编辑教科书，建立并管理学校。在此期间，直隶省的学校骤然增加，1903年的初等小学堂及高等小学堂的数目不详，在校学生分别约为6000及1000；到了1908年，初等小学堂共计8534所，高等小学堂174所，在校学生分别为180,489人及8,639人<sup>⑩</sup>。

为向这些学校提供师资，渡边调动了直隶师范学堂的力量。早在渡边抵达之前，袁世凯已拟定了提高全省教育的方案<sup>⑪</sup>，渡边执行了并充分发挥方案的想象力和弹性。他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学堂监督工作，幸而在他任职期间，得到关本幸太郎（1873—1959）的协助。关本是嘉纳治五郎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同事，经嘉纳亲自介绍，任直隶师范学堂有实无名的总教习<sup>⑫</sup>。

新的直隶教育系统是如此成功，慈禧太后于1904年称之为全国楷模<sup>⑬</sup>。这对渡边龙圣是极大的荣誉，中国朝廷十分重视渡边的贡献，于1903年及1906年两次给渡边授勋<sup>⑭</sup>。

在实际工作中，渡边似乎在职位上已享有随意而为的权力，也赢得了尊敬，如果他不是心满意足，也就不会三次续约，一直做到1909年。然而，正式合约是规定不许他有自主权力和任意行事的。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有他的第一份合约的日文本，摘录如下：

87

第一条，该员于本大臣指挥之下，必需遵守本大臣定立规条。第二条，该员必须时刻谨守道德严正，博学多闻，性情平和。……第六条，本处有要事与该员面商时，必须随传随到。第七条，该员应经常与学校司督弁及参议商定一切教育事宜，并向督弁报告巡视各类学堂学务及教学情况，转报本大臣<sup>⑮</sup>。

关本幸太郎在直隶师范学堂工作至1911年，续约四次，时间比渡边还长。他的1904年的新约，加上了授课时间及职责条文，这在教师合同中是颇具代表性的。据日文本摘录如下：

第一条，直隶学务处总理聘关本幸太郎任直隶师范学堂

教员,由光绪 30 年 9 月 27 日至光绪 32 年 12 月 15 日。在此期限内,每月俸支給湘平银二百两。……第二条,该员于契约期内于师范学堂教授化学科,每周授课时间不超过 24 课时。但该员能胜任本条记载外之学科,得随学堂之便宜,嘱托该员教授。第三条,该员必须服从监督及教务长之领导。第四条,该员对所授课程之任何(不同)意见,应向师范学堂监督及教务长申述,意见接受与否,概由监督及教务长决定。第五条,学务处或师范学堂就有关教员会议或教育研究事项咨询意见时,必须诚意陈述己见,为中国教育尽力。第六条,学堂分配教学时间,裁定课程,概由监督及教务长会商决定。该员有接受忠告之义务,无干涉之权<sup>②9</sup>。

换句话说,日籍合同教习——即使像关本幸太郎的高级教习——只能按白纸黑字的合同,像佣工似的行动,绝无权利而只有义务:服从指示;有意见只能向当权人上表达,而且只有在咨询意见时才能表达,加以授课时间过多等等。难怪一位日本学者赞同乔纳森·史宾斯(Jonathan Spence)在《改变中国》中的结论,与其说是外国人“利用中国人,无宁说是受中国人利用”<sup>③0</sup>。

## 语言障碍及日语教学

合同订定的课室授课时数,往往只是表面文章。为了合符合同规定,在中国“双重讲授”的制度下<sup>③1</sup>,实际工作时间要长得多。由于甚少日本教习能说中文,反之,也极少学生能听懂日语授课,因此,日籍教习授课时要靠中国译员协助,译员多是在日本学成后回国的。

1905 年初,《教育时论》发表了直隶师范学堂一位教习的来信,诉说“双重讲授”对教习的要求和教习的困难:

“除外国语外,此地教学课程与日本师范学校相同。从晨

早8时至午后3时半,每日授课6个课时。我每周授课22节,已多于日本师范学校,更由于授课要靠副教习将日文译为汉文,所以上课前的晚上,得向副教习用日语讲述授课内容及图解、实物等。虽每周耗费8小时,而副教习往往还理解不透。更有甚者,我的译员虽曾在东京工科大学留学,却是中国南方人,他译出来的话,学生们往往都听不懂<sup>⑧</sup>。”

89

语言障碍起码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提高学生的口语水平,无需翻译。全闽师范学堂就是这样的打算。1906年从京师大学堂分出来的京师法政学堂也打算这样做。该校两年制预科的学生,第一年在每周的36课时中,日语占17节,第二年则占14节<sup>⑨</sup>。到了1908年,日语课的比例在该校课程中下降了<sup>⑩</sup>,然而,按1909年6月15日政府规定还得下降,规定中国学校必修的外语为英语,其次是德语及法语<sup>⑪</sup>。

减少日语学习是突然而来的。《东方杂志》于1907年底,还发表了《学部奏派调查直隶学务委员报告书》,认为当时天津的北洋师范学堂预科中,日本语的课时太少,建议增加。说“预科课目有东文语一门最合,盖一可收直接听讲之益,二可参阅东文书籍。宜增改钟点为每星期七小时,原定四小时,即以三小时增入。本学堂用日本教员甚多,如入本科时,一切学科必需译员传达,既费时又易失真,不如于预科中增多日本语课时为宜<sup>⑫</sup>。”

解决语言障碍的第二个办法,是以新近在日学成回国的中国人取代日籍教师,这同样可以免除课室翻译。早在1904年,直隶师范学堂已开始进行取代。当年九名合同期满的日籍教习中,六人未获续约,学校只留下四名日本人。有分析说是由于雇用了新近回国的中国人任教习<sup>⑬</sup>。1906年后,北京警务学堂也戏剧性地发生同样事情,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取代了高薪聘请的日本专家,这些专家从1901年开始,就在监督川岛浪速(1865—1949)领导下工作了<sup>⑭</sup>。(有关这一重要机构情况,将于第九章详细研究。)松本

90

龟次郎在其回忆录中,列举了京师法政学堂的中国教习,其中包括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1876—1941)和范源灏,他们都在日本受教育并在日后成为国家领导人物<sup>91</sup>。这些人为新近从日本回国的学生开辟了道路,可以与在华的日籍教习和顾问共同工作,共同巩固新的教育体制,并最后取代日籍教习。

## 在教育方面的中日合作

1901年教育政令颁布后,随即清楚地看到,要将纸面的东西变为现实,中国还缺乏基本的条件。例如,1901年9月14日上谕称,“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sup>92</sup>可见,这上谕规定将所有传统书院改为学堂,但教师从何而来?谁对现代学校的课程有所认识?到哪里去找教科书?中国对一切都毫无准备,茫无头绪。

工业家、教育家张謇(1853—1926)是力主改革的,他在1911年回顾时说,“若谓其时(1894年,中国)无一人熟知教育学及教育组织,绝非夸大其词”<sup>93</sup>。在突然急需专家和培训人才时,日本提供了既孚众望又易接受的帮助,为中国在日华两地培训师资。好像为了表示诚意,日本一开头就依中国需要设计了新的教育方案,在日本建立了全新的学校,在中国为全新的方案配备人员。中国方面是全国上下齐头并进,地方的主动性,国家的配合与支持,情况是空前的、动人的。特别重要的一环是师范学校,而提供师范教职员的就是日本。

刘坤一于1890年任两江总督,直至1902年10月6日逝世,由于管辖江苏、安徽及江西三省,成为晚清改革的主要人物。如上所述,1899年1月,刘已联同张之洞派遣学生赴日留学。同年4

月,刘与福岛安正在南京会晤后,便热衷于雇请日籍教师及专家来华,在军事、矿务及工业等方面实现现代化。他断言,不但他掌管的三省需要,全中国也需要日本专家<sup>⑧</sup>。(差不多与此同时,张之洞在武昌的自强学堂至少已聘用了三名日本教习。据称到1899年末时,日语在武昌比英语、俄语、法语及德语流行得多<sup>⑨</sup>。)同年10月,刘在南京会见了到访的近卫笃磨公爵,近卫表达了通过教育推动两国联系的强烈愿望<sup>⑩</sup>。

随后,刘于12月在上海会晤了日本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和东亚同文会代表<sup>⑪</sup>,会晤的成果是1900年5月成立东亚同文会的南京同文书院,招收中日两国学生。然而三个月后,鉴于义和团在长江流域活动,在刘坤一总督的坚决催促下,日本学生撤到同是刘管辖下的安全的上海。1901年5月,该校在上海重建,易名为东亚同文书院,并改为只招日本学生<sup>⑫</sup>。

在1900年义和团骚乱时,刘与张之洞自行决定,联合其他地区官员推行东南互保,对抗义和团的威胁,也避免突变和国外的惩处。刘向日本人及其他外国人保证,他个人反对与义和团相关的北京仇外政策。针对义和团暴动的后果,刘与张进一步劝说朝廷推行新政改革<sup>⑬</sup>。

92

1901年7月,刘、张回应同年1月的新政改革上谕,会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及《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呼吁设文武学堂、奖励游学尤其赴日本游学等。如上所述,同年7月上谕命各省、城、府、州、县均改设大、中、小学堂。10月2日上谕,命按刘、张所奏,“随时设法,择要举办”<sup>⑭</sup>。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校长兼东京东亚同文会干事长根津一(1860—1927)于《教育时论》著文称,中国即将为新改设学堂,聘用日本教习和顾问<sup>⑮</sup>。形势的发展,鼓舞了东亚同文会会员、教育专家辻武雄,提出了他的《两江学政法案私议》<sup>⑯</sup>。这份意见译成中文后,经小田切总领事转送刘坤一。由于梁启超于12月在日本的《清议报》上

发表,极具影响的上海教育界刊物《教育世界》又于1902年1月重载<sup>93</sup>,因而这份意见传播极广。1901年11月,刘坤一通过小田切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要求,给他寄送日本各类学校的组织大纲、制度、规则及细则、学校课程表等<sup>94</sup>。1902年,东亚同文会翻译出版了刘、张的奏折,书名为《刘、张变法奏议:清国改革上奏》。

1902年间,根津一曾与刘、张两总督讨论长江流域对教育的需求。1902年12月20日根津一向东亚同文会报告称:“支那于未来三年中,各府都设中学,各州各县都设小学……仅张之洞辖内,有50府140州县,如每府每州每县各需一人,亦即中学需50人,小学需140人。”<sup>95</sup>

根津一感兴趣的人员问题绝非书生之见。他在报告中续称:“当问到(刘、张人员问题)如何解决时,都称存在实际困难。我告诉他们,从明年开始,同文书院每年四月将有约一百名学生毕业,何不雇用他们?我说了这样做的好处,也谈到我们乐于见到他们雇用这些人。‘如果这样,我们肯定有兴趣聘用你校毕业生’等等。我们并无签订任何合同,但刘坤一是关注此事的。”<sup>96</sup>

刘坤一于1902年10月逝世,两江总督由张之洞接任。为迅速解决各地新教育及教师问题,张于12月成立两江学务处<sup>97</sup>。翌年1月29日他致电近卫公爵,委托东亚同文会物色十二名“资历较深”的教习,其中包括一名总教习,以应南京开办师范学堂所需<sup>98</sup>。

1903年2月5日,张向朝廷奏报《遵旨改设学堂,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上报提高教育水平方案及聘用一组日本教习<sup>99</sup>。近卫公爵亦马上回应张的要求,指定由上海的根津一办理。到3月中旬,主要教习经已选定,根津一和张之洞亦已签订了合同<sup>100</sup>。行动迅速极其重要,因为1903年3月20日张之洞奉调到北京主持督办政务处,订定全国教育方案,离开南京,以后再也未回南京视事了<sup>101</sup>。

为了完成张对物色胜任的总教习的要求,根津一舍弃了东亚同文书院自己的主任教师(教头)菊池谦二郎(1867—)。菊池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在日本文部省工作,平步青云,不久便提升为在仙台的国立第二高等学校校长<sup>⑭</sup>。这是一所甚有声望的,是为学生考取著名国立大学的预备学校。菊池能干却固执,似乎难与上级相处,多次发生冲突,结果辞职并调换工作。他受任为东亚同文书院的“教头”,是出于他的良师益友、极有影响的教育家、东京同文书院校长杉浦重刚的促请,可能是有意让菊池转换环境,不管怎样,菊池总是于1901年5月,在学校正式成立时到达上海<sup>⑮</sup>。

1902年4月,杉浦重刚接替根津一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校长,仍兼东京同文书院校长。近卫笃磨可能为了减轻根津一兼职的负担——既任同文书院教长又任东亚同文会的干事长,但奇怪的是又似乎为了绕过根津一。在与杉浦签订的协议中,指定杉浦单独对近卫负责,“毋受同文会干事之干涉”<sup>⑯</sup>。(根津一作为干事长,就是干事之长!)杉浦在中国只有一个月,1902年5月16日便离沪返国,返日后身患重病,无法返沪复职,于是菊池谦二即便成为东亚同文书院实际的校长<sup>⑰</sup>。

情况摆明是要派新校长来的,菊池因此于1903年3月致函近卫公爵,促请根津一复任校长,并认为只有根津一能与中国联系,为日后同文书院毕业生寻找职业。在信末附言中还要求辞退同文书院的职务,以便他就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习<sup>⑱</sup>。菊池的两项要求均获同意,于当月生效。

1903年5月27日,菊池到南京任职,一身兼任两江学务参议及三江师范学堂总教习。对于学堂,他全力投入学校开办的通盘计划,草拟规章;对于学务处,他受权处理如下事务:统筹建立各类学校,检定学校全部课程,监察教习和学生,雇请华籍及外籍教习,筹办各类教科书等<sup>⑲</sup>。

在渡边龙圣到直隶前一年,《教育时论》于1903年5月赞扬了



在中国这重要地区近期的努力。该刊称：“师范教育的成果，不但与清国文化发达有关，而且对日清两国关系有极大影响，责任重大又极其光荣……诸位诚意热心地承担这任务，江南的文化一边发展，我们日本人的名誉一边提高。同时(三江地区)尽快赶上湖北、直隶的教育事业，各鼎立一方，对彼此国家有益，并对东亚和平有利。”<sup>⑩</sup>

根津一对这番事业的重要性是说之不尽的。1903年5月8日，他作为干事长向东亚同文会提交半年报告中说道，这一学校正成为中国其他各省的模范，这工作对“支那保全”具有极大的重要作用<sup>⑪</sup>。根津一在同年12月13日报告了建筑校舍及职员住宅的进程，及委托东亚同文会购置“整套设备”的情况，并提及学校的目标是在苏、皖、赣三省招收600名学生。他得意忘形地作出颇为自负的结论，“这所学堂的规模不但比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而设备之完整，亦没有任何学校能与它相比。未来几年内，它将成为该区的模范，其他各省亦将以该校为准则。到那时，其成绩对清国教育界将发生极大的影响，我同文会的努力便不会白费<sup>⑫</sup>。”

1904年7月30日，根津一报告称，三江师范学堂初级班已有70名学生毕业<sup>⑬</sup>，成绩优良，有的已赴日深造，有的留校协助教导新生。新校舍多已建成，九月开始便可从三省招收300名新生。根津一称，“如果工作能按计划完成，三省的新学勃然兴起。若其他省能同样努力工作，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看到整个南部、中部教育事业的大进步。”<sup>⑭</sup>这真是令人陶醉的岁月。

根津一，东亚同文会，《教育时论》，外务省等等的言论，有时会把在中国的教习和顾问，当作在文化影响的游戏里微不足道的筹码。这是毫不奇怪的。日本作为刚刚现代化的国家，它的领导人和代表们，对日本国内新成就和在国外的“开拓文明”工作感到骄傲，是有道理的。

然而，常常被忽视的也正是在第一线的教习们，他们是有实在

个性的实在的人,有他们的实在品德和缺点。正是他们与学生朝夕相处,影响着年轻人的思想,塑造着下一代的中国领袖和教育工作者。有关他们的报导是极其罕有的,而以下内容却富于启发性。

## 南京三江师范学堂的日本教习

张沧清是汪向荣于20年代末期在上海读书时的中学老师,是在1904至1905年间在三江日本教习影响下,思想逐步成长的一员。他在1942年给汪的信中,以典型的学童口吻,逐一回忆那时的教习:

我在两江师范学堂,为时不到十月,故所亲炙的,有以下数位:

菊池先生 他人很矮,还是“彼时”的他们民族型。但因为地位关系,态度很严肃。有时到各教室巡视,有些日籍教师们都战战兢兢地,大约因为他是“总教习”也。(他只为日教师的总教,与学校行政方面无关。)

菅虎雄先生 他是教教育学的,人亦不高。因为有一位翻译曾称他为“管”先生,所以我们也抓住了这笑柄,而于背后称他为“管”先生!此外,因他每次上堂,发语总有:“此の前は”(上一课),而我们那时不懂,就谐其音,称他为“哭罗马”先生,幼稚可笑。

松原先生 他是中等身材,教我们物理,但中途被征去参加日俄战争。

大森先生 身材很高,人亦沉着(年龄亦较他们为大),他教我们博物,发语慢而有力,固然作他翻译的不吃力,就是我们抄讲义(从翻译口中)也从容,似一个老教师也。

志田先生 他教我们法制经济,口才似很好,虽然不

懂他的话。

杉田先生 他教我们手工。那时我们脑筋顽固，鄙视此科，又因他语言态度（大约是大阪人）较别位先生欠雅，就有人说他是“日本小木匠”。于是，我们亦呼他“小木匠”，今看他的学历，固知其为工学士。而有一年，他曾有一贺年片与舍亲（远房的），报告其就任大阪工业学校校长。（按此恐非贺年片，而系转任通知之挨拶状之误。——这大概是我加的注，原信中是没有的。）已知其出身并不微贱矣！（舍亲是两江图画手工科毕业，与杉田先生关系较深。）

巨理先生 他是教我们图画的，人性似有点儿“蠢”。可怜那时中国还没有图画范本，还得到东邦买。当范本未到时，第一次叫我们照他在漆板上所画的“操帽”轮廓。天哪！我那时出世二十年，从不曾画过什么画，所以把他那轮廓画好以后，就用粉笔在寝室（那时虽有自修室，无人去）破窗上画来画去，好不容易才把几笔简单的线条记牢。不久，范本来了，大家就临范本。这一下，反害了我了，哪有工夫去画它，有时随便画画，有时拾人家弃物去塞责，于是毫无所得。后来到日本，进清华补习学校（在小石川区，是范源濂和梁任公所组织的，款由我国使馆付，两年毕业，专为考理工科之预备），在末一学期，虽也有自在画，但究因自家底子太差，亦无把握。那时预备考高工，而高工是要考自在画的，所以很为“心配”。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也可以说是“学”字这一字的伟大，居然画题是“军帽”，且注明不要阴影。于是，我等于伍子胥所过的昭关般的“难关”，竟轻轻悄悄地过来了。这个教训给我很大，是天下无侥幸的事，而得到了的侥幸，也有他的“渊源”，并非毫无凭借也。

柳原先生 他是翻译，中国话很好，我们对他所翻译的很放心。因为有几个留学生程度太差，译的有些“那个”。最可笑的，大森先生讲博物时，于漆板上写“明矾”两字，而那位“仁兄”竟读不出那个“矾”字音来。

那部先生 他教我们日语，有时当翻译。他于上课时，见了菊池总教习来巡视，就手足无措，大概不是什么正途出身也。

安藤先生 他教我们农业，人很老成，我们称他为“老农”。又因他嘴里常说“种子の”，我们就称他为“喜喜怒”，谐音也。

岸先生 他是校医，死在两江的<sup>⑩</sup>。

章沧清随即转而评论三江的学生：

那时科举虽尚未废，而一般稍有眼光的八股家，都觉得非新学无以强国，故求知欲很盛，所以上课拆烂污的人很少。记得李梅庵先生（即清道人）作两江师范监督时，曾作了一篇很长的布告，劝生徒不可迟睡去自修，语颇剴切。于此事足以规其学生之态度与精神焉！及科举既废，新政(?)施行，一般投机者，都以留学东邦为终南捷径，于是阿猫、阿狗都盘着辫子去买那什么速成文凭（原注：拆烂污，上海话，不认真，敷衍了事的意思。<sup>⑪</sup>）。

1903年三江师范学堂开办，出之于张之洞个人的特殊安排和计划<sup>⑫</sup>。为了避免骤然直接教学所必然产生的问题，张之洞对近卫公爵解释称：“明年正月中（1903年2月中旬，12位日本教员）到金陵。第一年请贵国（教习）就华教习学中国语文及中国经学，华教习就贵国教员学日本文学及理化学等科。彼此互换知识，作为学友。”<sup>⑬</sup>最后，日本方面有包括菊池的十一位教习，中国方面，有从300名候选人中，经一连串严格考试挑选的20名教习<sup>⑭</sup>，加上特别指定的18人，总计38人。威廉·雅耶斯（William Ayers）在分

析张互换知识的长远目的时指出,“学堂开办后,懂得华语的日本教习,可以排除‘提问和回答’的障碍,可以免除译员,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sup>100</sup>。可是,为日本教习安排的讲演停止了,因为年轻的现代日本人,拒绝坐下来谈论过时的儒家和中国圣贤;但对中国教习的训练则按计划进行。教习和学生共同入住宿舍的意念,在当时日本教育界中颇为盛行,几经尝试,却未完全成功<sup>101</sup>。

学生在第一学期每周要上 36 节课,课程包括修身、教育学、中国文学、历史、地理、数学、理科(自然科学)、图画、手工、日文及体操<sup>102</sup>。在两年制的速成科及三年制的本科,英语是必修课程(每周四节,与日语同)。理科后来分为物理、化学和自然科学。农学、法制和经济是本科生的必修科,速成科生可以选修。除修身、中国文学及体操外,全部课程都完全按照日本师范学校,由日本教习授课<sup>103</sup>。

到了 1904 年 1 月,菊池谦二郎提出计划,要不顾一切地把三江升格为高级师范学校。他的计划和他卓越的工作,使菊池赢得自信和中国同事的尊敬<sup>104</sup>,但他的管理却使日本教习疏离。这是颇具讽刺性的,因为除了柳原和那部是由根津一在中国招聘外,其余都是他一手挑选的<sup>105</sup>。更具讽刺的是,批评菊池最苛刻的是菅虎雄,菅是菊池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时的校友,曾一度任颇有声望的国立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教授,1905 年 10 月,他率领教习反抗,要求驱逐作为总教习的菊池,理由是菊池“专制独断”。根据保存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的资料,争端起自菊池力图控制教习的个人和社交生活,压制教习们“各自独特的长处”<sup>106</sup>。从菊池方面说,他小心谨慎,似乎主要是迫使教习在行为及成绩方面都达到教授的最高水平,以实现中国人的目的,提高三江的教学水平,并避免中国人对日本人努力的误解<sup>107</sup>。

1905 年 11 月,三江的九成日本教师在菅虎雄领导下,写信给东亚同文会要求撤换菊池<sup>108</sup>,于是根津一到南京调解。似乎日本

教习存心自我毁灭,他们略为收敛后,又再次倾轧。听到日本教习又再分裂,张謇和他的江苏学务总会向总督周馥(1837—1921)要求将这些“粗野”的日本人撤职,重组省的学务处<sup>⑩</sup>。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原来并无直接卷入事件中,至此匆忙赶赴援救,1906年1月中旬,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与周总督进行个人会商,由于总领事馆南京分馆的努力,使合作得以继续顺利进行<sup>⑪</sup>。

与此同时,三江的总办李瑞清(1867—1920)总在精神上维护他的同事菊池,强调菊池留任,是按照1904年计划把三江转为高级师范学堂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李试图使江苏学务总会和日本教习之间达成和解,但日本教习使李的努力终于失败了。菅虎雄及其同伙拒绝了李的建议,不同意提升菅为副总教习,以换取辞退大森(讲授自然科学),柳原(日语)和松原(物理、化学)。在这关键时刻,菊池承认失败,宣布打算辞职。李因而决定除两人外,其余日本教习于1906年合约期满时不再续约,只留下杉田稔(手工)和亘理(图画)。

根津一返回东京后,于1906年5月19日向东亚同文会春季会员大会报告时,痛惜这是“同文会深深遗憾”的事件<sup>⑫</sup>。这的确是遗憾的,它把东亚同文会为了中国教育所尽的一切努力完全断送了。

这类的骚动满可以让中国人不再使用这些麻烦的日本人,只是中国仍非用日本人不可,中国还缺乏知识和人才把教育和训练快速地推向较高的水平。教习空缺已是迫于眉睫,李瑞清为了走先一步,不顾个人自尊,亲自率领招聘代表团赴日。他的同事、一位宏文学院的毕业生介绍他认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嘉纳治五郎。就是这位嘉纳,中国人作了明智的选择,把责任委托给他,为三江聘任一组教习。嘉纳治五郎推荐了他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位教授松本孝次郎任新的总教习。到了4月,能干的松本召集了五名大学毕业生,于5月到职<sup>⑬</sup>。

松本抵达三江后便马上工作,主要是贯彻执行1904年菊池的计划,把三江的水平提高到真正相当于日本的高级师范学校。这任务在1907年秋天完成了,三江师范改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反映了它的教育水准提高了<sup>⑩</sup>。

松本果断又独断专行的作风,却激怒了他的日籍教习。1907年7月,松本按李瑞清的指示,向9位日本教习中的两人发出书面通知,由于他们“职务上不勤奋”,依据1906年的合约,立即解雇。其他教师因而暴跳如雷,指责松本“极其傲慢无礼”,“更改课程及其他事务,不但与属下教习毫不商量,专横决定;而且通知时,只写三言两语,交教习传阅”。指责松本“包庇”李瑞清,两人“相互勾结”,损害学校及全体在华日人的“名誉”。留下来的教师中,5人提出辞职,以示抗议<sup>⑪</sup>。

李瑞清一开头就被松本缠进去了。当时还有不少日本社团反对他,当地的“日本人会”一致要求松本辞职;新任驻南京副领事船津辰一郎(1873—1947)进行个人报复,催促松本分别向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新两江总督端方及日本外务相林董(1850—1913)辞职。李瑞清忍无可忍,终于援引1906年合约的终止条款,以“旷废学务”为由,辞退除松本外的所有教师<sup>⑫</sup>。船津在南京只呆了一年,便调到香港。

令人惊讶的是,李再次向日本人求助,松本的两年合约继续执行<sup>⑬</sup>,新雇的7名教习也主要通过松本雇请的。李还是非用日本人不可,中国教育体制的落后状态,他个人对两江教育尚未完成的梦想,都只能借助日本人对高等教育的改革而解决。新聘的7名教习中,其中5人都只签一年期的合同,于1907年9月生效,都全是理学士<sup>⑭</sup>。这是极具意义的,它预示中国从师范教育及法政教育转向1908—1909年的科学教育,也必然地从到日本留学转到工业化程度更高的西方留学<sup>⑮</sup>,中国学校于1909年6月开始,也从学习日语转向学习英、德、法语。

## 在“日本教习的时代”中国新的师范学堂

在充满惊奇的题目下，人们发现其中最惊奇的是 32 所中国师范学堂实际都有日本人，其中 7 所由日本人任总教习，这些学校遍布全国。这些学堂分别由国家、省或地方管理，其中至少有一所，全国师范学堂，早在 1898 年百日维新前就和日本人有关联，但直至 1902 年，没有一所是训练师资的。

把注意力集中在为中国“学堂”培训师资的机构是别具意义的，因为这些新“学堂”大都是“没有教师的学校”。有关中国师资培训和它对中国现代学校及社会的实际影响，我们所知有限。这里关于有日本人的师范学堂的资料，无非是冰山一角。究竟还有多少学校像三江师范学堂一样，完全依赖日本人的呢？除了师范学堂外，大量日本人任职对其他各种类型的学堂——专科的、普通的、高级、中级和初级的——有些什么影响呢？没有答案的问题是不可胜数的。

下列中国师范学校的名单，是已证实有日本人的。加上“\*”号的，表示至少有一名日籍总教习，这就可能有较多的日本人。名单按地区排列，从华北到华南，然后是东北<sup>⑧</sup>。今后如能标出这些学堂到今天发展为什么学校，这将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其中就有今日的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及四川大学的前身<sup>⑨</sup>。

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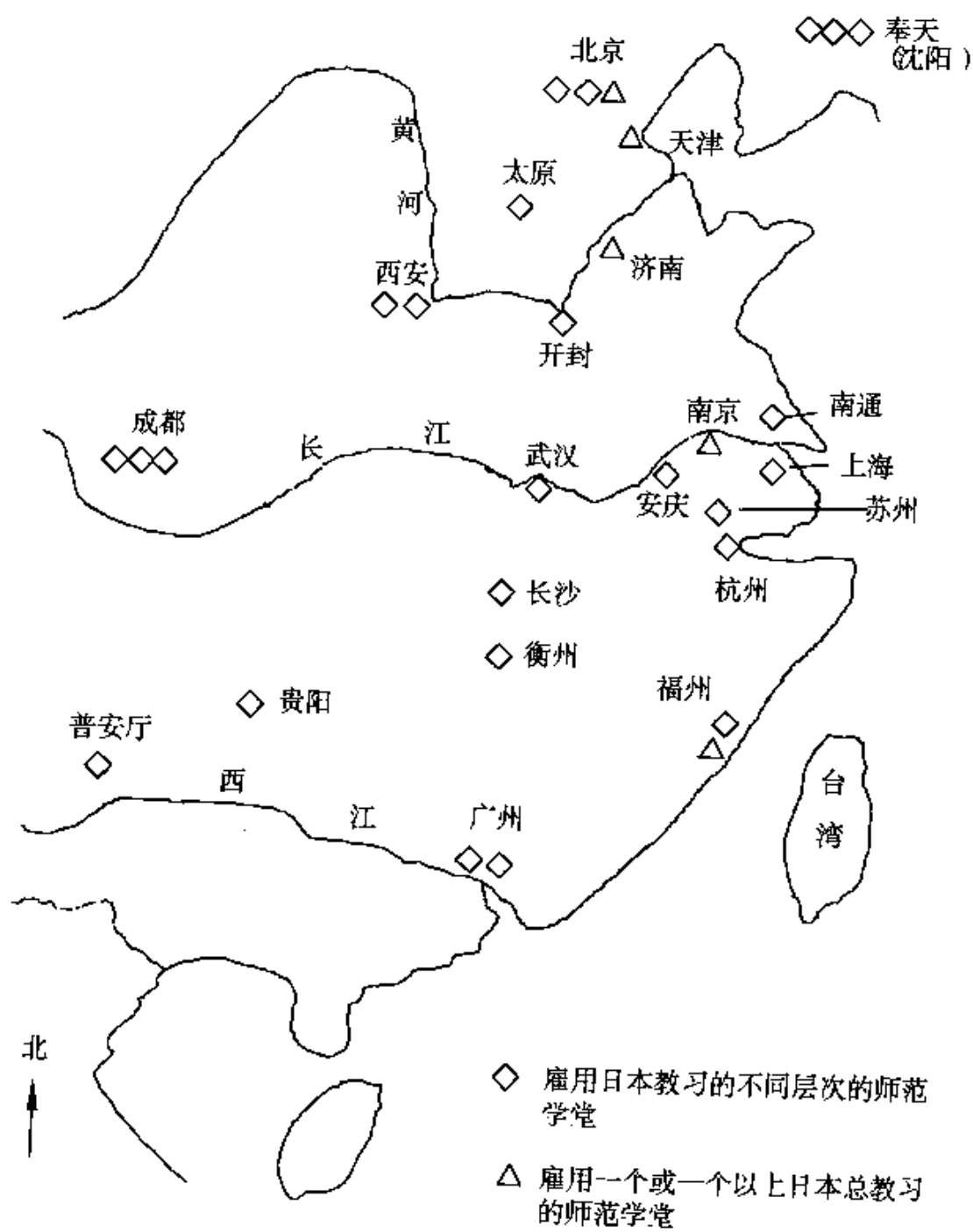
### 北京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1904 年单独成立为优级师范学堂\*)  
京师第一师范学堂  
直隶初级师范学堂

### 天津

北洋师范学堂\*





约 1901 至 1910 年间雇用日本教习的中国师范学堂

**保定**

直隶师范学堂\*

**太原**

山西优级师范学堂

**济南**

山东师范学堂\*<sup>⑧</sup>

**开封**

河南优级师范学堂

**西安**

陕西高等师范学堂

师范学堂

**成都**

四川优级师范学堂

师范学堂

女子师范学堂

**武昌**

两湖师范学堂

**安庆**

安徽师范学堂

**南京**

三江师范学堂\*(1907年起,改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

**江苏省南通**

南通师范学堂

**苏州**

江苏两级师范学堂\*

**上海**

龙门师范学堂

## 杭州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 贵州省普安厅

普安厅师范学堂

## 贵阳

贵州优级师范学堂

## 长沙

湖南优级师范学堂

## 衡州

南路师范学堂

## 福州

全闽师范学堂\*

福州女子师范学堂

## 广州

两广优级师范学堂

女子师范学堂<sup>⑨</sup>

## 吉林

吉林两级师范学堂

## 奉天(沈阳)

两级师范学堂

女子师范学堂

奉天师范学堂

在日本人投身中国师范学堂的历史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如此众多的日本教习和顾问,都是嘉纳治五郎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日本最优秀的官办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或教师(或身兼二者)。这主要是由于嘉纳本人浓烈的兴趣,要选择中国作为教育外展的场地(东亚同文会同样有志于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扮演领导角色,由于缺乏财力及人力资源,加上近卫公爵于1904年逝世,便难以

为继)。据汪向荣估计,师范学校或学院毕业的来华日本教习及顾问中,近 1/4(200 人中有 46 人)出自东京高级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毕业生中,72 人中就有 46 人,差不多 2/3 是该校学生。在中国的日本教习或教育顾问中,每 14 人就有一个是嘉纳学校的学生。把这些人才派到中国,“日本政府是煞费苦心的”,汪在评论中表示了谢意<sup>⑨</sup>。

上述事例已足以表明,中国在这短暂的却又是关键性的时间里,在建设和巩固新的现代教育体制方面,如何倚赖日籍教习和顾问。有两个因素是必须强调的,一是日本给了中国什么,二是中国从日本拿到什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来自日本的,是除了校园建筑物以外的一切一切,是学校的整个系统,连同规章、课程、教师、课本等。对中国来说,这是经外国权威考核并认可、融成一体的一整套各类教育要素的组合,使现代教育的早期赞助者在 1904—1905 年朝廷全面认可现代教育之前,藉此得以打破重重障碍。

如果学者们要全面了解中国现代师资教育及日本对它的影响,那么还存在些专门的问题。在 1902 至 1910 年间建立了多少师范学校?规模多大?属于什么层次的?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日籍教师的学校有多少?他们担任什么职务?他们在教师中占多大的比例?其他国籍的教师有多少?中国学堂从这些新的师范学校招聘的教职员占多大的比例?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待于更深入的分析。

## 为什么不是西方人?……基督教的因素

日本明治初期是从西方招聘专家的<sup>⑩</sup>,而中国晚清则相反,在 1900 年至 1910 年间,为普通及专科教育而招聘的却是日本人而不是西方人<sup>⑪</sup>。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格罗·D·贝利尔(Gerow D. Brill)提供了一条线索,贝利尔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农学

院,1897年受张之洞聘请,指导武昌新的农务学堂。他在1899年的一封信中说到,“日本人愿意拿我们1/3的工资,而且他们和总督(张之洞)很熟络”<sup>④</sup>。他提供另一条线索是他不懂得迎合中国人的要求和需要。他不懂中国语文,而且据说为人太呆板,老是顶撞中国雇主。在三年合同期满前,1900年便被解雇了<sup>⑤</sup>。取代他的是能干的美代清彦,他和其他4位农业专家在武昌工作到1908年。按历史学家苏云峰的说法,这些人“对湖北省的农业教育和农业实验工作有着重大的贡献”<sup>⑥</sup>。

在雇用西方人方面,中国面对基督教的问题。在1842年以来的不平等条约下,中国对基督教布道团有着痛苦的经历,接着又是惩罚性的1901年9月7日的辛丑条约<sup>⑦</sup>。在中国的西方教师大都是基督教传教士,全都受雇于西方人赞助及资助的教会学校,和中国的教育家、政策或机构极少接触。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坚持拒绝承认这些教会学校。用1906年10月5日学部致各省通报的话说,教会学校是“未经注册”和“不受认可”的。中国的教育法规从来不提及它们,它们的学生和毕业生没有资格获得任何政府的津贴或职务<sup>⑧</sup>。《学务纲要》所载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就规定,“(官办学堂的)外国教员不得讲授宗教……违者应即辞退”<sup>⑨</sup>。

回顾1902年初,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信称,京师大学堂校长即管学大臣张百熙“辞退丁韪良及其一切教务职员,力图改弦更张”<sup>⑩</sup>。这位备受尊敬的丁韪良,从1869—1895年,在长达1/4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一直担任总理衙门的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受任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sup>⑪</sup>。他的免职无论对他本人或对所有西方改革者而言,都是重大的打击。张百熙还进一步把打击扩大化,宣布在华的西方教师“或为来华传教之神甫,或为退出海关之废员”<sup>⑫</sup>,要求以有适当专业训练及值得信任的教育家取代他们。

辛亥革命后,新教育部总长蔡元培(1868—1940)于1912年5

月13日在《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中强调：“私立学校，务提倡而维持之。”同年9月3日正式颁行《壬子学制》，法令规定除高等师范外，其他学校均可由私人办理<sup>⑧</sup>。据此，教会学校就获得中国政府认可，原被视为社会贱民一类的教会学校毕业生，到此也才获得在学校或政府就业的机会。

## 并非“失败”

汪向荣比其他学者整理了更多的材料，证明日本通过教育对现代中国的巨大影响，但一再认为日本参与中国教育是“失败”的<sup>⑨</sup>。汪没有给“失败”明确定义。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只能按中国今天的理解，把失败解释为日本要对中国新的教育系统取得帝国主义式的控制。在这严格的意义上说，汪是对的，日本人是失败了。但从其他任何意义上，日本的参与并非失败而是重大的胜利——为了中国的胜利。

必须明确，日本教育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他们回国后从事写作、教书或在政府工作，有些人兼而行之，帮助促进并巩固中国急速的转变。数以百计、遍及全中国的日籍教习和顾问，按照中国人的计划，都在灌输现代思想，重新塑造中国的机构。在最主要的教育改革方面，日本每一步都给予了帮助，详见第七章。在军事、警务及法律改革方面的帮助，见第八、九、十章。

换句话说，受日本影响的中国杰出人物，在使中国脱离旧轨道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旧轨道是头脑封闭的、向后看的和受狭隘传统捆绑的；而新轨道是头脑开放的、向前看的和以现代为基础的。如果认识到（也必须认识到）中国要在现代世界求得生存，就绝对需要在教育及其他方面进行“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那么，哪里是什么失败呢？

## 注 释

- ① 引自大塚丰著《中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的萌芽与服部宇之吉》，载国立教育研究所专刊(1988年3月号)《受雇的日本教习之研究：20世纪初期从事教育近代化的日本人》第45—64页。
- ② 例外之一是苏云峰对湖北省现代化的研究，苏在《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一书第242—256页中，列举了许多签署合约的日本军事专家的姓名。但即使在这一研究中，亦并未说明日本人存在的意义。
- ③ 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第139—200页第六章《(在华)日本教习的时代》。
- ④ 对这方面的学术研究领域，堪称之为“受雇研究”。在英语材料中富于指导性的有爱德华·R·博章普及理查德·鲁宾格著，《日本教育的原始资料集》《第五章·外国对明治日本教育的影响》(chap. 5, “Foreign Influences on Education in Meiji Japan”, in Edward R. Beauchamp and Richard Rubinger, *Education in Japan: A Source Book* (New York, 1989) pp. 57-77)。
- ⑤ 见加藤祐三著《中国按合约雇请的外国人》，载《有关按合约雇请的外国专家的资料》第32—43页 (Katō Yūzō, “Chūgoku ni okeru oyatoi gaikokujin,” in Shiryō oyatoi gaikokujin, Yunesuko Higashi Ajia Bunka Kenkyū Sentā, comp. (Tokyo, 1975)), 文中约略涉及晚清时在中国的日本专家问题。南里知树编著的《中国政府雇用的日本人》则较为深入详尽，并附有十分宝贵的图表和注解。
- ⑥ 有关阿部洋于1975—1977年，1977—1979年，1980—1982年研究计划的概况，见阿部洋编《日中教育文化交流与冲突：战前日本在华的教育事业》(东京，第一书房，1983)每一项研究成果都成为巨著。阿部于1986—1988两年的研究所得，见《按合约受雇的日本教习》(“Oyatoi Nihonjin kyōshū”, a special issue of *Kokuritsu Kyōiku Kenkyūjo kiyō* (March 1988))。阿部对其研究的重要概括，见《序》注⑩阿部著作《中国的近代教育》。
- ⑦ 见汪向荣著《日本教习》第4—5页，第127页，第258—260页。
- ⑧ 见上注第67—95页，资料来源及简要说明，见该书第67页，第128—129页。该书日文译本见 Wang Xiangrong (Ō Kō'ei), *Shinkoku oyatoi*

*Nihonjin*, Takeuchi Minoru et al., trans. (Tokyo, 1991), 可惜日文译本未能改正原文偶然出现的错误。

- ⑨ 见上注第 66 页, 84 页。1902 年底, 确有日语教习在上海学校任教, 见《东亚同文会史》第 358 页。
- ⑩ 日本人没有合约而为中国人雇用的情况, 见上注第 96 页, 100—101 页。
- ⑪ 估算数字见荫山雅博著《清末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与日本教习》, 载注⑥阿部洋编著第 9 页。
- ⑫ 南里知树编《在华日本教师及顾问与在日中国学生(1901—1916)》第 16 页, 表 4。南里对一些年份的估算未得文献证实。
- ⑬ 见注③第 141 页, 实藤是根据 1909 年 11 月的调查; 又见注⑩第 8 页, 荫山曾于 1987 年 3 月 26 日在东京国立教育研究所和我交换意见, 他个人认为 1905 至 1906 年间的数字可能高达 1000。我们并未讨论 1907 年及 1908 年的情况。
- ⑭ 费维恺著《20 世纪初外国在华机构》(Albert Feuerwerker,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n Arbor, 1976)) 第 66—70 页, 77 页中, 就 1905 至 1915 年间, 受外国控制的中国海关、盐务等增加日本人问题提出了暗示性的评论。
- ⑮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或可分为: 前帝国主义期(至 1894 年), 过渡到帝国主义期(1895—1914 年), 加速帝国主义期(1915—1931 年), 及高度帝国主义期(1932—1945 年)。见第三章注⑳作者著第 211 页。
- ⑯ 见《清光绪朝东华录》卷 50 第 12、13 页, (下册)第 965、966 页; 六角恒广著《中国语教育史的研究》(东京, 东方书店, 1988)第 213、211 页, 引自《对支回顾录》Ⅱ第 513 页; 及第三章注㉑第 2、23 页。
- ⑰ 黑竜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 Ⅲ》(东京, 原书房, 1966)第 82 页。
- ⑱ 摘引自第三章注㉒细野浩二著第 66 页。
- ⑲ 对净土真宗的本源、发展及教义的卓著研究, 见詹姆士·C·杜布宾斯著《净土真宗: 中世纪日本的真宗》(James C. Dobbins, *Jōdo Shinshu: Shin Buddhism in Medieval Japan*, (Bloomington: Indiana U. Press, 1980))。
- ㉑ 注⑬第 51、66 页, 高西贤正编《东本愿寺开教六十年史》(上海: 东本愿寺上海别院 1937)第 84—89 页。
- ㉒ 陈宝琛其后是中国最后一代皇帝的教师和顾问, 1912 年后成为清室复辟



的著名支持者。

- ⑳ 中村孝志著《东亚书院与东文学堂：台湾总督府华南教育设施之滥觞》（天理大学学报 124：1—18〈March 1980〉）。《对支回顾录》（“*Tai-Shi kaikoroku*”）。
- ㉑ 见《对支回顾录》II，630。中国人对冈田的尊重，见1899年9月30日一位福建官员在东京的言论，载《东亚同文会史》第283页。奇怪的是，在一份1898年在华的日本人名单中，在福州东文学堂项内并无冈田的姓名。见上注第265页。
- ㉒ 见注㉑中村孝志著第12页。
- ㉓ 同上注及见《东亚同文会史》第274页、291页、386页及417页。桑田于1899年6月被派往福州（见第274页），于1906年辞职（见第417页）。不清楚何以说他在1904年中已在学校服务六年（见第386页）。《对支回顾录》II，第778—779页说桑田于1898至1908年在该校工作是错误的。
- ㉔ 这种催谷效应的最显著的例子，是服部宇之吉于1904年，从已经读完京师大学堂师资培训速成班中挑选的47人中，派送31人到素负盛名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准备送读东京帝国大学。见注①第55页。
- ㉕ 见《东亚同文会史》第282页。这两名毕业生当时年龄分别为18及19岁，于30年代成为傀儡满洲国政府的高官。见《对支回顾录》II，630。他们抵达日本事，见本书第四章。
- ㉖ 见注㉑中村孝志著第12—13页。又见上沼八郎与弘谷多吉夫著《台湾总督府对华南教育对策：福建广东两省日籍教员的代谢》，载注⑥阿部洋编著第266—267页；第三章注㉑第61—64页；及《东亚同文会史》第274页、282页、283页、291页。
- ㉗ 摘引自《对支回顾录》II，第779页，日期不详。着重点为作者所加。
- ㉘ 见《东亚同文会史》第354页；及李国祁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第513页。明显地由于这一课程，李国祁说全闽师范学堂成立于1902年，当年学生有60人。《东亚同文会史》（第331页）称1901年中东文学堂入读学生有200人，是明显错误的。
- ㉙ 见注㉑中村孝志著第13页。
- ㉚ 有关两份报告，其一见上注第13—14页；另一份是桑田丰藏1903年11

月 23 日的报告,载《东亚同文会史》第 364 页。我引用的是后者较低的数字,但仍高于注⑳李国祁著第 513 页中的数字。

- ㉓ 《东亚同文会史》第 364 页。
- ㉔ 《对支回顾录》Ⅱ第 632—634 页。据《东亚同文会史》第 417 页,中西重太郎于 1906 年受任为东亚同文会福州代表,因健康问题未能到职。
- ㉕ 见注⑦第 91 页,而且两人的汉语姓名也有错误,包括桑田。
- ㉖ 有关该校重组后的一些简况,见《东亚同文会史》第 391、398、402、412、417 页。又见注㉑中村孝志著第 14 页。
- ㉗ 同上注。
- ㉘ 《东亚同文会史》第 364 页;东亚同文会对此持赞成态度,见第 366 页。
- ㉙ 见注⑩李国祁著第 513 页。
- ㉚ 李国祁的叙述是真实的,他依据的是陈启天著《近代中国教育史》(台北,中国书局,1969)。
- ㉛ 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 89 页,汪向荣《日本教习》第 249—250 页。
- ㉜ 同上注第 232 页,234—235 页。成都这一学校可能是完全由中国人兴办的。
- ㉝ 见注㉑中村孝志著第 2—12 页。
- ㉞ 同上注第 14—15 页,及注㉑上沼八郎等著第 265 页。
- ㉟ 见霍姆斯·韦尔奇著《中国佛教的复兴》(Holmes Welch, *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68))第 163—164 页。霍姆斯特别提到东本愿寺的学校,事实上,把他的看法用以指日本人的普遍动机则更为合适。汪向荣的《日本教习》第 237—238 页,持有相同的观点。
- ㊱ 主要有佐藤三郎于 1970 年对中岛极表同情的长篇著作《中岛裁之的北京东文学社》,载佐藤的《近代日中交涉史的研究》第 278—337 页。汪向荣的《日本教习》第 225—257 页《中岛裁之和东文学社》一章,更为简明透彻。
- ㊲ 见上注佐藤著第 283—331 页。
- ㊳ 同上注佐藤著第 281—282 页,《日本教习》第 231 页。
- ㊴ 本书作者著《前帝国主义期:岸田吟香,谋求中国市场的日本先驱》(Douglas R. Reynolds, "Before Imperialism: Kishida Ginko Pioneers the

China Market for Japan," Proceedings and Papers of the Georgia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1984 5: 114-120 (1985)); 注④第 281 页; 及第四章注⑦第 230 页。1897 年初受日本外务省派到广东的长谷川雄太郎, 于 1888 年起, 也曾为岸田在汉口及天津的乐善堂分店工作, 见注⑰《东亚先觉志士记传》卅第 82 页。

⑱ 《东亚同文会史》第 267, 270, 272—274 页; 及注④第 281 页。

⑲ 《东亚同文会史》第 283 页。

⑳ 注④佐藤三郎著第 283 页, 注⑦第 232—233 页。

㉑ 注⑦第 234—235 页。

㉒ 同上注第 235 页。

㉓ 同上注第 233—234 页。

㉔ 注④佐藤三郎著第 313 页。

㉕ 注⑦第 250 页。

㉖ 阿部洋著《清末直隶省之教育改革与渡边龙圣》, 载《受雇的日本教习之研究》第 11—12 页; 注④佐藤三郎著第 296—298 页, 第 309 页; 注⑦第 238 页。其后, 袁世凯疏远了中岛, 1905 年时甚而拒绝与他见面。见注④佐藤三郎著第 326—327 页。

㉗ 见注④佐藤三郎著第 313 页每月人数变动表, 及注⑦第 239 页。

㉘ 见上注 246 页。

㉙ 注④佐藤三郎著第 313 页。注⑦第 239 页中, 没有提及只有两名学生留到 1906 年。

㉚ 注⑦第 250 页。

㉛ 引自上注第 246—247 页。我把“维新”或“*ishin*”译为“modern transformation”, 见第一章及第一章注②。

㉜ 注⑦第 247 页。

㉝ 注④佐藤三郎著第 317、325、330 页。

㉞ 注⑦第 234—235 页。

㉟ 有关中岛筹措资金的努力及问题, 注⑦第 240—245 页作了精简的概括; 又见于注④佐藤三郎著第 289、291 页, 第 295—301 页。

㊱ 例见注④佐藤三郎著第 319—324 页。

㊲ 中岛授课时间表见注⑦第 234 页, 及注④佐藤三郎著第 286—287 页。

- ⑩ 注⑦第 236—237 页,第 235 页。
- ⑪ 见上注第 237 页。另有 55 人是去学中文的,学习时间不详,故该校总计共有 111 名日本年轻人。
- ⑫ 见上注第 252 页,及注④佐藤三郎著第 310 页。
- ⑬ 这些事件及内部问题和暴行,见注④佐藤三郎著第 301—312 页,注⑦第 252—255 页。
- ⑭ 注④佐藤三郎著第 301 页。
- ⑮ 注⑦第 252 页。
- ⑯ 注⑦第 237、226、255 页。
- ⑰ 引自注⑦第 251 页,又见注④佐藤三郎著第 294 页。
- ⑱ 注⑦第 251 页。
- ⑲ 中国方面的答复见《东亚同文会史》第 348—350 页,第 354 页。
- ⑳ 注④佐藤三郎著第 332 页。中岛著《东文学社纪要》出版于 1908 年,资料丰富。佐藤三郎和汪向荣的著作全面地整理了该校的历史,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岛裁之基本上是诚实和品性优良的,他们的著作主要以中岛的《纪要》为依据。
- ㉑ 注⑦第 115 页,第 129—130 页。
- ㉒ 同上注第 158 页。
- ㉓ 这是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一章的标题,见该书第 139—200 页。
- ㉔ 见注⑦第 99 页;第四章注④,并据权威性的十卷本《大人名事典》(东京,平凡社,1955)增补。
- ㉕ 见注①第 45—64 页,第四章注④第 155—160 页,及《大人名事典》“服部宇之吉”条目。
- ㉖ 注⑦第 69 页,及《大人名事典》“冈田朝太郎”条目。
- ㉗ 注⑦第 76 页,第四章注④第 181—183 页。
- ㉘ 荫山雅博著《江苏教育改革与藤田丰八》,载《受雇的日本人教习之研究》第 27—43 页;第四章注④第 172—174 页;《大人名事典》“藤田丰八”条目。
- ㉙ 第四章注④第 176—180 页;注⑦第 68、69、99 页。注①第 53 页;及《大人名事典》“严谷孙藏”条目。

- ⑧ 二见刚史著《京师法政学堂之日本人教习》，载《受雇的日本人教习之研究》第 80—82 页；第四章注④第 178、179 页。
- ⑨ 注⑦第 69 页。
- ⑩ 同上注第 75 页；第四章注④第 169—172 页。
- ⑪ 注⑦第 73 页。
- ⑫ 同上注第 68 页。
- ⑬ 同上注第 69 页；二见刚史著《京师法政学堂与松本龟次郎》，载阿部洋编《日中教育文化交流与冲突》第 85—87 页；尤请参阅杨正光、平野日出雄合著《松本龟次郎传》（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
- ⑭ 注⑧二见刚史著第 82—85 页，第四章注④第 180 页。
- ⑮ 注⑦第 87—88 页。
- ⑯ 同上注第 93 页。
- ⑰ 同上注第 68、69 页，第四章注④第 177、179 页，注⑩二见刚史著第 79 页。
- ⑱ 见谭汝谦编，实藤惠秀编辑顾问，小川博助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之有关索引及条目。
- ⑲ 吉野作造著《清国在勤之日本人教师》，载《国家学会杂志》23.5:769—794（1909 年 5 月）。
- ⑳ 同上注第 773—774 页；见荫山雅博著《清末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与日本人教习》第 8—9 页摘要。注⑭费惟恺的著作，对约在 1910 至 1920 年间在华的外国人及外国机构，资料丰富，对日本尤其着重。然而却没有西方人的资料，可与 1900 至 1910 年间日本教习和为中国政府工作的教育顾问相对应的。在第 17 页表一、《（1903—1921 年）在华外国“公司”及长驻人员估计数目表》中，证明 1906 年日本的“公司”及长驻人员（包括在满洲）的数目超过了其他国。
- ㉑ 见注⑩第 9—11 页一系列的图表；阿部洋著《向日本贷入：中国第一个现代教育制度》第 69—70 页。
- ㉒ 夏纳达牧师著《日本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Rev. J. Harada, “Japanese Educational Influence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36.1:356—361 (July 1905)）。汪向荣引用的数字是“三到五倍”（见《日本教习》第 109、112 页）。日本女教习于 1908 年高达 26 人，她们的薪酬仅是最低倍数，见小川嘉子著《清末的近代学堂与日本女子教习：广东女子师范学堂》，载《受

雇的日本人教习之研究》第 109 页,第 112—113 页。

⑩ 注⑦第 109 页,有关薪酬事例见第 110—113 页。日本学者大多认为应是“五至十倍”,见注①第 48 页。

⑪ 见第三章注⑩朱有漱主编第二辑上册第 89 页。原件影印本见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 1972—1976)I.217。

⑫ 见第三章注⑫细野浩二著第 56—60 页。

⑬ 注⑬阿部洋著第 10、12、24 页。

⑭ 同上注第 9、11 页。

⑮ 同上注第 8 页,14—15 页。袁世凯野心勃勃的教育计划,可能是美国教会教育工作者丁家立(Charles D. Tenney, 1857—1930)协助草拟的。丁家立于 1882 年开始在华传教,1895—1906 年受任为天津北洋大学堂(1895 年成立时称“中西学堂”,1903 年改为“北洋大学堂”)总教习,同时任直隶高、中级学堂监督(1902—1906 年)。1906—1908 年任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监督。1909—1920 年在美驻华公使馆工作,曾担任秘书、参赞等多项职务。见罗惠民编《莫理循书信集》(Lo Hui-min,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I: 1895-1912* (Cambridge, 1976))第 241 页注 I;又见注⑭第 28—29 页。

⑯ 见注⑬阿部洋著第 10 页引自 1902 年 4 月 25 日《教育时论》。

⑰ 引文见上注。

⑱ 见上注第 12、15 页。这 12 人的姓名、职位、每月薪酬、工作时间及其渊源,见上注第 11 页图表。

⑲ 见上注第 12 页。

⑳ 据日本外务省记录,1903 年全中国总计共有日本顾问 151 人,仅直隶一省就有 82 人,见第三章注⑱南里知树编著第 16 页表 5。1909 年 7 月,全中国共有日本教习 405 人,其中直隶 114 人,见第四章注⑳第 154 页。

㉑ 见注⑬阿部洋著第 14 页统计表。

㉒ 有关细则见上注第 15 页。

㉓ 关本幸太郎有关情况,见上注 11 页,20—22 页,25 页。

㉔ 见导言注③麦金朗著第 150 页。

㉕ 见注⑬阿部洋著第 12 页。

㉖ 见上注第 10 页,阿部洋节略,作者略作修改。

- ⑫ 见上注第 20 页。摘引自关本幸太郎著作。阿部洋称(见上注第 24 页注⑩),五份合约均见于《关本幸太郎论文集》。湖南衡州中路师范学堂(汪向荣《日本教习》第 168 页中,称之为南路师范学堂)1907 年的合约,也说明签约者对学校监督及教务长负有同样的责任,除教学外,无权干预其他。见注⑩第 42 页注⑬,可惜荫山并未说明资料来源。
- ⑬ 注⑩第 60 页,摘引自史宾士著《为了改变中国:1620—1960 年在中国的西方顾问》(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1969; New York, 1980))第 292 页。
- ⑭ “双重讲授”一语,取自汪向荣《日本教习》第 106 页。
- ⑮ 引自注⑮阿部洋著第 21 页,部分译文见第四章注⑦第 107 页。
- ⑯ 授课时间表见注⑨二见刚史著第 76 页。
- ⑰ 课程表及有关评述,见上注第 78—79 页。
- ⑱ 见注⑯多贺秋五郎编著第 I 卷第 605、660 页。
- ⑲ 引自注⑦第 106 页。
- ⑳ 见注⑮阿部洋著第 18 页。1902 年与 1904 年日籍职员数目的比较表,见该著第 11 页、第 18 页。
- ㉑ 弘谷多吉夫著《北京警务学堂与川岛浪速》,载《受雇的日本人教习之研究》第 101 页。注⑦第 118—119 页,均有提及。
- ㉒ 全部名单见注⑨二见刚史著第 79 页。又见《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 4719 页。
- ㉓ 引自玛丽安尼·巴斯蒂特著《20 世纪初期中国的教育改革》(Marianne Bastid, *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20th-Century China*, Paul J. Bailey, tr.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71)第 139 页。
- ㉔ 《对支回顾录》II,第 273 页。刘坤一与福岛安正会晤是在 1899 年 4 月 9 日。刘关注的并不只是他管辖的地区,反映了他的“民族眼光”,丹尼尔·贝斯因此把刘坤一、张之洞及其他晚清期间赞同改革的官员们,称之为表现“官僚民族主义”的“民族官僚”。见第三章注⑤第 3、24、182、218 页。
- ㉕ 同上注第 276—277 页。日本教师的姓名及学生对日本人的看法,见苏云峰著《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第 99—103 页。

- ⑬ 两人会谈内容,见《东亚同文会史》第199页。
- ⑭ 有关会谈情况,见上注第204—206页。
- ⑮ 有关该校创建及早期情况,见第三章注⑳第227—233页。
- ⑯ 见阿瑟·W·汉梅尔编著《清朝杰出人物(1644—1912)》(Arthur W.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D. C., 1943;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7.)第523—524页,《刘坤一》条目。
- ⑰ 刘、张会奏与10月上谕,本书第三编有详细介绍。
- ⑱ 根津一著《中国教育之评议》,载《教育时论》(1901年10月25日),引文见注①第24页。
- ⑲ 注①第24页中,载有该计划、《两江学政法案私议》的概要。
- ⑳ 见上注第42页注㉑,本书第七章对《教育世界》作较详细研究。
- ㉑ 注①第24页。
- ㉒ 见1902年12月20日东亚同文会秋季大会根津干事长的报告,载《东亚同文会史》第354页。
- ㉓ 同上注。
- ㉔ 威廉·亚耶士著《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William Ayers, *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第229页。
- ㉕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185第35页(第4册,第268页);又见注①第25页。
- ㉖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58第15—18页(第一册,第1005—1006页);又见注①第24—25页。
- ㉗ 见上注①第25页,及《近卫笃磨日记》V,第303、305页。
- ㉘ 见第三章注⑤第116—125页。有关三江学校早期情况,由于没有张之洞的记载,差不多全部依靠日本人的资料。
- ㉙ “第二高等学校”及“第一高等学校”(Daiichi kōto Gakkō)的英译,依照本杰明·C·杜克编著《现代日本十位伟大的教育家:日本的展望》(Benjamin C. Duke, *Ten Great Educators of Modern Japan: A Japanese Perspective*,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9))。
- ㉚ 《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创立八十周年纪念志》(沪友会编,东京:沪友会,1982),及《近卫笃磨日记》IV第80、185页。



- ⑮ 同上注V第8页。协议日期为1902年1月7日。
- ⑯ 注⑮第251—252页,第74页,第98—99页。
- ⑰ 菊池发信日期是1903年3月5日,载《近卫笃磨日记》V,第301页。
- ⑱ 荫山雅博列举了菊池承担的责任,见注⑩第27页,又见注⑦第166—167页。
- ⑲ 见《教育时论》(1903年5月15日)《欢送几位南京三江师范学堂教习》,摘要载注⑩第26页。
- ⑳ 见1903年5月8日东亚同文会春季大会根津干事长的报告,载《东亚同文会史》第360—361页。
- ㉑ 见1903年12月13日东亚同文会秋季大会根津干事长的报告,见上注第366页。
- ㉒ 根津一的数字未核实。据阿部洋称,1903年6月的三江第一班只有35名学生接受“再教育”,见第四章注④第212页。
- ㉓ 根津干事长对1904年7月30日东亚同文会春季大会的报告,载《东亚同文会史》第386页。
- ㉔ 摘引自注⑦第135—137页。注向荣的版本中若干汉字有误,已据注⑩荫山雅博权威性的翻译改正。由于该校于1907年才改名为“两江”,故文中使用“两江”的,都改为“三江”。
- ㉕ 注⑦第137页。着重点为作者所加。
- ㉖ 三江师范学堂的整套训练计划,亚耶士称之为“张的计划”,见注⑩第229页。在同一页上,亚耶士称三江师范学堂的建立,是张“在第二次任职两江时,张对教育最重要的贡献”。
- ㉗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185第64页(第四册第268页)。
- ㉘ 日本教习的姓名、月薪、授课科目、在日本的简历和合约期限,见注⑩第26页附表。经考试挑选的20名中国人教习的姓名,见注⑩第44页注⑳。
- ㉙ 见注⑩第229页。
- ㉚ 见注⑩第27—28页。
- ㉛ 一年制速成科的课程表,见上注第29页。
- ㉜ 两年制及三年制的第一年课程表,见上注第30—31页。
- ㉝ 见上注第34、36页,及第46页注㉞。
- ㉞ 同上注第25页,并见《东亚同文会史》第360页。

- ⑭ 摘引见注⑪第 32—33 页,第 45 页注⑩。有关菅虎雄与菊池的友谊,见注⑪第 25 页。
- ⑮ 同上注第 32 页。
- ⑯ 见上注第 45 页注⑩。
- ⑰ 同上注第 33 页,《东亚同文会史》第 412 页,及第四章注④第 214 页。江苏学务总会,内部组织系“依据日本教育团体”而建,详见第四章注④第 127 页。张睿担任会长所起的作用,见注④第 123—128 页。
- ⑱ 见注⑪第 33—34 页,及第四章注④第 215 页。
- ⑲ 干事长的报告,载《东亚同文会史》第 412 页,及注⑪第 34 页。
- ⑳ 见注⑪第 35 页。同页有这五人的姓名、授课科目、合同期限、薪金及学历一览表。
- ㉑ 同上注第 35—37 页。由于安徽已建立本省的师范学堂,因此“两江”只涉及江苏和江西两省。有关“两江”的教学及 1907 年底入学人数,见第四章注④第 216 页。
- ㉒ 有关情况及引语,见第四章注④第 217 页,及注⑪第 38 页,第 47 页注⑩。
- ㉓ 详情见第四章注④第 216—219 页;有关船津辰一郎情况,见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 832—833 页有关条目。
- ㉔ 见第四章注④第 217—218 页。
- ㉕ 他们的姓名、授课科目、所受训练、月薪及合约期限,见第四章注④第 39 页。
- ㉖ 见第四章注④第 144—145 页。
- ㉗ 名单主要依据汪向荣的《日本教习》第 168 页。奇怪的是汪在书中其他地方提到保定、南京及苏州的师范学堂,名单上却未列入。因而我猜疑还有其他学校未列入名单的。汪在名单上每所学堂都提及一到两名日本教习的姓名,我把它删略了。
- ㉘ 有关成都的四川大学,见霍华德·L·波文编《中华民国人名词典》(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5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1) III, 465。
- ㉙ 见上沼八郎著《内堀维文与山东师范学堂》,载《受雇的日本人教习之研究》第 6573 页。
- ㉚ 见注④小川嘉子著第 105—114 页。

- ⑮ 见注⑦第98—99页。
- ⑯ 见极为有用的《对明治日本教育的外国影响》一文及索引,载爱德华·R·博章普及里察德·鲁宾格著《日本教育的原始资料集》(“Foreign Influence on Education in Meiji Japan,” Edward R. Beauchamp and Richard Rubinger, *Education in Japan: A Source Book*.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89)第57—77页。
- ⑰ 早稻田大学教授中岛半次郎于1906—1909年在北洋师范学堂工作,他在1909年11月作了一次非官式的调查,发现在中国官立学校工作的356名外国教习中,日本人有311人,占85%以上。引自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96页,另见第一章注③第51页。
- ⑱ 引自兰德·E·斯特罗斯著《棘手的土地:美国农业专家在中国,1898—1937》(Randall E. Stross, *The Stubborn Earth: 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 1898-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第47页,又见注②第419—425页。
- ⑲ 见注⑱斯特罗斯著第43页,第47—49页。“顶撞”(confrontational)一词,见第49页。
- ⑳ 见注②第420页。
- ㉑ 见张力、刘镡唐著《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第20—22页,并散见于第275—648页。“基督帝国对中国国家和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是约瑟夫·埃谢力克的著作、《义和团起义的由来》的主题(Joseph W.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㉒ 原件复印见注⑱ I,第613页。
- ㉓ 原件复印见上注第217页。
- ㉔ 见赫德1902年3月8日致金登干的信,载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Letter from Hart to J. D. Campbell, dated 8 March 1902, in John K. Fairbank, Katherine Frost Bruner, and Elizabeth MacLeod Matheson, eds., *The I. 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 2 vol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㉕ 丁韪良在同文馆及京师大学堂的职衔都是“总教习”,英语称之为

“president”(大学校长),如果不是有意欺骗也是歪曲。张静庐编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第二卷(1896—1918)错误地把丁燮良的解雇写作1901年。从1902年开始,由于服部宇之吉等人的原因,日本人的影响便在京师大学堂居支配地位。见注①

⑳ 引自序言注⑤卡梅伦著第69页;第四章注⑳第51页,第70页注㉑;《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第4820页。

㉒ 见喻本伐、熊贤君著《中国教育发展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523页。

㉓ 见注⑦第3、124、125、126、129、138页,第245—257页。

### III 第六章 翻译及现代词汇

在1894年至1895年中日战争之前,中国没有一所学校讲授日语。著名的北京总理衙门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培训中国译员和外交官,开设了英语(1862年)、法语和俄语(1863年)及德语(1872年)四馆,但在1897年前,并无日语<sup>①</sup>。1895年后,由于与日本联系的重要性加强,1896年计划建立东文(日语)馆。著名官员、教育家及工业家盛宣怀(1844—1916)于1902年道破了这一决定背后的打算:“日本维新以后,以翻译西书为汲汲,今其国人于泰西各种学问,皆贯串有得,颇得力于译出和文之书。”<sup>②</sup>

#### 工作的促进

1895至1896年间,康有为、梁启超等已经注意到日本军方通过翻译求取知识。例如1896年初,盛宣怀在上海办的现代学校——南洋公学,出版了按日文翻译、中文版的美利坚著作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1776)<sup>③</sup>,证明了运用日语是获得西方知识的捷径。该书中文译者古城贞吉(1866—1949)在1896年受聘于上海《时务报》,专门翻译日本报刊的社论及文章。

《时务报》由梁启超及日本研究专家黄遵宪任编辑,1897年发表了古城的日本对中国工商业研究的译文,1898年发表了古城介绍日本教育制度、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及华族女学校的文章<sup>④</sup>。古城随后成为东京东洋大学研究中国的受尊敬的教授。

这些精力充沛的人们群策群力,使《时务报》成为与日本相关的大胆鲜明思想的养殖场。1896年,见解独到的思想家章炳麟(1869—1936)应梁启超的邀请,参加了《时务报》的工作,1897年2月,发表了违背正统的文章,题为《互相依存,东亚之利》。他似乎要比川上操六等人还快一步,号召联合抗俄:“亚洲复兴之精神始于日本,中国将依赖日本,日本亦依赖中国。(日本)若能明了中国力量,相互缔盟,远拒西方,近抗俄国,太平洋将风平浪静。此实非言过其实者也”。章还语出惊人,声称中日战争为日本反对俄国威胁必要的“自救”行动<sup>⑤</sup>(章炳麟于1902年及1906至1911年居住日本,其后却批评日本)。

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建立大同译书局,特别着重翻译日文著作。梁在译书局成立的章程中指出,近三十年来,官方翻译部门编译各种文字著作总计只约一百种,更糟糕的是这些译书中,“一切所谓学书、农书、工书、商书、兵书、宪法书、章程书者,犹是万不备一……是以愤懑,联合同志,创为此局,以东文(日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于艺学”<sup>⑥</sup>。

也像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事半功倍”一样,康有为在1898年也提出,“(日本)其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成日文)矣……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因而译成中文时)其费事至少,其费日无多也”<sup>⑦</sup>。主张改革的杨深秀在1898年的奏折中,指出按日文翻译之便,说“臣曾细研日本变法,如彼邦已译就西方佳著。日文书写与我相同,仅若干文法与我相反,苟经数月研习,即可大致明了,故利于我译(西方著作)也”<sup>⑧</sup>。由于对日本认识的加强,在百日维新中成立以梁启超

为首的政府翻译局<sup>⑨</sup>，自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上述引语中，人们不应忽视中国人对明治维新使用“变法”一词，也不应忽视梁启超初期对学习现代知识领域的用语，在1898至1901年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像梁启超这样的人在短短三年内，从基本上使用中国术语转而差不多全部用日本术语，表明中国对日本及日本用语的准确性有突然的领悟。

才华横溢的梁启超于1898年10月流亡日本，得以验证他和其他人曾寄望于日本的需求，可以满足到什么程度。在14年流亡生涯最初的几个月里，梁感受到难以抑制的快乐，他在1899年为《清议报》写的社论，“大声疾呼”《论学日本文之益》：

“哀时客既旅日本数月（他使用正确的国名“日本”，而不是中国的贬义词“倭”，古文的“东瀛”和“扶桑”，或近代的“东洋”）<sup>⑩</sup>，肆日本之文（正确的日式词语，而不是中国式的“东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是用正确的日本用语“维新”，而不是中国的词语“变法”），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经济）、智学（哲学）、群学（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学英文者经五六年始成，其初学成也尚多窒碍，犹未必能读其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之书也。而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有矣……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无不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sup>⑪</sup>。

一年后梁回忆道：“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sup>⑫</sup>。

在1895年前，极少中国人注意及此，更谈不上有多少人关心。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引用原始统计,从1600年至1825年的225年间,从日文翻译的书籍仅仅12册,其中又仅有2册是中国人翻译的,1883年、1889年各译一本<sup>⑬</sup>,其余都是像古城贞吉那样在日本研究汉学的日本人翻译的<sup>⑭</sup>。直到1894至1895年开始觉醒前,中国公众意识的视野中,日本仍未存在<sup>⑮</sup>。

随之而来的是突然转变,钱存训大量运用了创新的研究,戏剧性地证明中国晚清的转变有助于对日文的翻译,虽然这与时论不相符。钱发现了从1850至1899年的567本译著中,只有86本译自日语,占15.1%;而译自英语的有368本,占65%<sup>⑯</sup>。但在1902至1904年间则相反,按钱所列的表格,译自日语的321本,占533本的60.2%<sup>⑰</sup>。香港中文大学的谭汝谦和日本实藤惠秀等合作,统计出自1896至1921年间,译自日文的共958本(不包括教科书及期刊连载的译著),每年平均63.86本<sup>⑱</sup>。

115

谭进一步指出,“尤其是从甲午到民元,中译日书的数量是压倒性的……这批译书在传入新思想新事物的同时,又使一大批日本词汇融汇到现代汉语,丰富了汉语词汇,而且促进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也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开辟了康庄大道<sup>⑲</sup>”。

促进这工作是非常艰难的。大量现代日本词汇用的是中国惯用语,运用时又扩展了原义。张之洞最初使用“同文”一词时,只是指“共同的书写系统”,但很快便扩展为“共同文化”,因为仍然认为中日有着共同的儒教渊源(在本书《中国教育改革》一章《同文与体用》部分将详细讨论),尽管中日语言无论在语法句型和语音要素上都根本不同,两者分属不同的语类。杨深秀也早已指出两种文字语法上的绊脚石了。

由于进入日语研究及翻译阶段,1896年北京及广东同文馆决定开设东文馆是甚为重要的,至少也具有象征的意义。梁启超于1897年写的大同翻译局章程也同样重要,那绝非一般的章程。在



1897年初,在人们从未想到的一角——农业,首先迈出了实践上重要的一步,改革者罗振玉似乎私囊颇丰<sup>①</sup>,在上海组织了农学会,目的是使中国农业现代化,首先是通过《农学报》介绍日本和西方的译著。《农学报》于1897年5月创刊时为双周刊,1898年改为旬刊,到1906年1月,共发行215期<sup>②</sup>。

罗振玉十分幸运,得到能干的藤田丰八合作,负责日文材料翻译。藤田189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文科,1893年已对翻译享有盛誉,译著中有上文提及的12本译书之一、花房柳条著的《蜜蜂饲养法》<sup>③</sup>。从《农学报》第6期(1897年7月)到162期(1901年12月),藤田根据日本书刊及文章,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日本及西方农业方方面面的译著,荫山雅博已在专论中逐一列举了<sup>④</sup>。张之洞于1897年下令,他辖下的大小地区都得订购传阅《农学报》三到十份<sup>⑤</sup>。

1898年3月,罗振玉再接再厉,为了培养中国的日文翻译人才,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以藤田丰八为首席教师。学社的确培育了一批知名人士,其中有罗及藤田的门生、凭自己的知识而著名的王国维(1877—1927)<sup>⑥</sup>;多产的翻译家樊炳青(译书10种以上)、沈紘(译书15种);以及萨端(译书3种)<sup>⑦</sup>。张之洞对罗的工作深表赞赏,1900年把罗带到武汉,担任他的农业学校“监督”,为期一年<sup>⑧</sup>。

1900年后,翻译工作不久便集中于日本,译者都是中国留学生、知识分子和热心人士。各类专门翻译社纷纷成立,大都仿效1900年最先在东京成立的“译书汇编社”<sup>⑨</sup>。为了传播新知识,中国人办的各类刊物在1902至1908年间骤然激增,在1907年一年内,竟创办了22家新的刊物,数量之大,为历年之最<sup>⑩</sup>。

## 教科书及百科全书

在各类翻译材料中,对中国思想及社会最具渗透力和持久影

响的,莫过于教科书。但教科书的来龙去脉又最难探索,它们用廉价的纸张印刷,图书馆也不收藏,新的或较好的版本取代后,旧的就完全废弃。由于中国在“学校没有教师”的同时,“学校也没有教科书”,因此日本的教科书,连同在中国和日本以日语讲授的课堂讲义<sup>①</sup>,都千辛万苦地译印。汪向荣略嫌夸大地写道,“那时中国不但没有一本能用作教材的教科书,甚至连能编写教科书的人,也找不到一个”。因此,“绝大多数……我们学校中的教材是由日本翻译来的”<sup>②</sup>。实藤惠秀于1940年写道,“当时差不多每一本中级教科书都译成中文了”<sup>③</sup>。科学的教科书是最为明显的,谭汝谦写道,“清末自然科学的教科书,几乎全是日文译本”。谭在查察这些书以后,特别称赞它们普遍质量较好,可读性强,插图精美<sup>④</sup>。

日本的一些翻译社专门出版教科书,1902年从“译书汇编社”分离出来的“教科书译辑社”,便着重于中学教科书<sup>⑤</sup>。1903年主要由江浙人组成的“国学社”,也把翻译中小学教科书作为主要工作<sup>⑥</sup>。

要说到实际成就,“会文学社”及其领导人范迪吉可算是无与伦比的。只是我们对两者都了解不多。1903年,该学社就出版了100种中学教科书和有关教育的著作,出版了质量不错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全书分为8大类:宗教和哲学6种,文学1种,教育5种,政治法律18种,地理历史18种,自然科学28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工业)22种,其他2种,所有译著都应归功于不可思议的范迪吉<sup>⑦</sup>。《全书》全都使用标准的现代日本词汇,这些词汇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现代中国词汇了。

今天,范迪吉差不多被遗忘了,直至1987年,他的百科全书才得以重新提起,在这年钟少华的学术论文中介绍了晚清17套百科全书<sup>⑧</sup>,其中就有范迪吉的。钟提醒人们,晚清是思想扩展的年代,扩展到各个知识领域,资料也实实在在地激增。中国人是如此拼命努力,以至一些湖南学生在1903年称之为“学战”<sup>⑨</sup>。

百科全书的出现,反映了对中国传统学科以外的综合知识,骤然有强烈的需求,然而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著作,已经化为乌有,即使图书馆也找不到了。像教科书一样,它们的质量不高,只有部分适于销售,很快便已过时,一有新的版本取代,旧的便烟消云散,它们的主要题目在目录学中也找不到了<sup>④</sup>。最使人懊恼的是,在对 1868 至 1918 年间教科书的调查中,范迪吉的一百题系列著作,连一条题目也未提及<sup>⑤</sup>。

121 幸而这一系列著作偶然得以幸存,使谭汝谦及其合作者能够在他权威性的日译中书目中,列出 98 个题目<sup>⑥</sup>。但由于严格规定了该研究的所有标题必须送检,那些难于通过检查的内容便有意地删除了<sup>⑦</sup>。这样,留下来供研究的,仅是晚清教科书的数目、标题和出处。

## 出版业与商务印书馆

对现代教科书的需求,突然为中国印刷及出版业提供了机会。到 1903 年,出版新的教科书的主要是文明书局和广益书局<sup>⑧</sup>。1903 年后,商务印书馆插手教科书出版业务,并很快取得支配地位,直至 1912 年才被新的中华书局取代。1913 年 1 月,中华书局聘请范源濂当编辑部主任<sup>⑨</sup>,他是刚卸任的教育部长,是很难对付的。

商务印书馆的轶事,极适合被忘却的“黄金十年”一主题,特别是“被忘却”这一面。商务具有 35 年的历史,1931 年开始出版书籍,它的早期可分成两个阶段,1897—1902 年为创建期,1903—1913 年为中日合资期<sup>⑩</sup>。在第一阶段,商务只是小型印刷厂,谈不上和日本发生任何关系。然而经实藤惠秀研究,发现商务在 1903 年前已和日本有实质上的联系:1897 年在日本人帮助下到日本购买印刷设备,1900 年购买了设备优良的、日本在上海印刷厂

的全部股权。实藤还根据1900年商务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中,发现有书写漂亮的“假名”(日文),相信至少有一个日本人受雇于商务印书馆<sup>④</sup>。

商务受1902年清廷新的学校规定和教科书暂行规定所鼓舞<sup>⑤</sup>,和以东京为基地的出版社——金港堂达成了合资经营协议,新的资本额达十万日元,这使商务印书馆的业务,从仅限于印刷发展为印刷兼出版。它全力转向竞争,并非只是因为日本高级师范学校教授长尾雨山受任为编辑主任的。在商务1931年的历史中,既未提及长尾,也未提及其他日本人的姓名,只说与金港堂有“暂时的”安排,雇用了一名日本“技术专家”,还提到一两名日本人不久便被中国人取代<sup>⑥</sup>。实藤认为,长尾似乎“在名单上勾销”了。十多年来,商务是中日合资经营的范例,到1913年,中国股东就把全部股权买下来了<sup>⑦</sup>。

## 翻译者:现代化的经纪人

没有大量热心的翻译者,中国不可能有思想更新。但大多数译者的命运和百科全书编纂者相同,完全被淹没了,在人名词典和基本参考书中都找不到他们的姓名。在这些被忘却了的现代知识的经纪人中,范迪吉只不过是个最突出的例子。然而晚清时百科全书的序言,却是由知名人士执笔的,如李鸿章、张之洞、严修(1860—1929)、黄遵宪和张謇等<sup>⑧</sup>。

不过也不是所有日文著作的译者都鲜为人知,梁启超这位多产译者就是知识界中的巨人<sup>⑨</sup>。现代中国其他许多伟大人物,都是从翻译日文著作开始了解现代学科的。陈应年对他们进行了研究,提及姓名及译著的有章炳麟、蔡元培(1868—1940)、王国维、梁启超、鲁迅及黄炎培(1878—1965)<sup>⑩</sup>。陈还列举了其著作已译成中文的、明治时代伟大人物:福泽谕吉、加藤弘之(1836—1916)、中

村正直(1832—1891)、中江兆民(1847—1901)、幸德秋水(1871—1911)、井上哲次郎(1855—1944)、井上丹了(1858—1919)、大西祝(1864—1900)和清野勉(1853—1904)。陈认为,通过这些译著,把日本的“启蒙思想,自由民权理论,唯物主义哲学,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及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sup>⑤</sup>。这些学科的新词汇,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使用旧词而赋予新意而被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借用的。

## 现代词汇：从日本流入中国

马里奥斯·詹森于1980年写道,“传播文化影响最实在的形式……可能就是通过翻译书籍”<sup>⑥</sup>。清末中国的译著已是包罗万象,从最精炼的、深奥微妙的现代思想、科学和法律行政,到学校每天上课的教科书,这些译著都从根本上重新塑造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其结果是构成了影响中国所有精英分子的思想革命。

流亡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康有为、章炳麟,及革命者孙中山等,都在思想革命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他们的角色到底只是边缘性的,是在中国以外活动的,他们仅能以有限的讯息影响有限的听众,没有参加中国本土新思想的制度化活动。思想革命的真正英雄是千千万万不知名的人们,他们默默地、一步一步地工作,有的担负着在东京及中国出版新书的重任;有的把每一类日文著作译为中文(无论译笔如何拙劣);有的在中国现代学校担任新型教师,他们既有在中国、也有在日本受培训的;还有他们的许许多多的学生们。这些新知识的载体及使之制度化者,在世界舞台上担当一角,把中国从以中国为中心的背景下移到世界历史的主要舞台上。

事态的发展是如此地急速,以至来不及先行考虑或计划,梁启超在1920年回顾这狂潮时写道:

“壬寅、癸卯(1902—1903年)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

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sup>⑤</sup>

疯狂的速度导致了把日本词汇引介到中国时粗心大意，不分皂白。形同抢掠的译者往往不是真的翻译，只是把日本的外来词语用中文串连起来，匆忙地把中文的句子结构、词汇和表达方式加以“日本化”<sup>⑥</sup>，与翻译大师严复(1854—1921)的译著相比，自是天渊之别。严在新政年代，最完美地翻译了好几本现代西方经典著作。本杰明·斯华茨(Benjamin Schwartz)写道，“他(严复)告诉我们，当他着手翻译时，首先掌握整句或整段全部含义中最基本的意义，然后用地道的中文表达。事实上，创造新词是极其痛苦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时‘为一词而沉思屡月’”。斯华茨颇具深意地续称：“总的来说，他并未多用数十年前日本创造的新词……但他自己的词汇，却在与日本词汇的斗争中消失了……全盘采用日本新的词汇，是遇到阻力最少的。”<sup>⑦</sup>

“全盘采用日本新的词汇”的，是李杰良说的“科技文化”。这不但包括严谨的科学著作，也包括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的科学小说等。根据李的文章称，一位翻译这类文体的译者深感自己太密切地依赖日本术语——李说他“深怕有失原意”——听起来就像被迫请求读者“原谅”似的<sup>⑧</sup>。

在法律方面，岛田正郎注意到，明治时期日本的法律术语，通过多种渠道“原样不动”地进入中国语言：翻译，法律词汇表和词典，在日本和中国的课堂用语，及具体的编辑工作<sup>⑨</sup>。在社会科学方面，李又宁在研究社会主义传入中国时写道，“经调查，差不多中国所有文本上使用的基本语汇，都是来自日本的”<sup>⑩</sup>。而在现代哲

学方面,谭汝谦认为,中国人完全依靠日本借出的词语<sup>⑤</sup>。

在1957至1958年间,围绕着现代汉语中的日本词语及其意义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辩<sup>⑥</sup>。在卷入争论的各方中,高名凯和刘正琰对外来词的研究立论审慎,对我们的研究最有帮助<sup>⑦</sup>。在他们的著作中,把源自日本的现代中国词语分为三类:(1)源自纯粹日语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即日语原有的汉字组合,但中国古文里没有这样组合的,如服务、方针、解决、申请、想象。(2)日本人用古代汉语原有的词,去意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根据这些日语的外来词,改造成现代汉语的外来词,如法律、封建、共和、经济、社会、思想、文学和政治。(3)先由日本人用汉字组合,去意译(或部分意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加以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美术、抽象、同盟、现实、原则、科学、观念、政府、社会主义、资本、商业、数学、哲学。

以上词语摘引自高、刘二人开列的更为丰富的单子,仅以表明这是需要更系统研究的课题,但至少也足以证实藤惠秀在1940年说的,“现在的中国,要是不用日本词汇,便委实不能谈高深的学理”<sup>⑧</sup>。

在文学艺术方面,具有20年研究经验的老将、两度(1914—1924年和1928—1937年)政治流亡日本的郭沫若(1882—1978)曾断言,“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日本洗礼的”<sup>⑨</sup>。在新政年间,中国广泛地模仿日本现代的文学、艺术及思想,引发了曹贵明所称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其范畴应属于梅布尔·李(Mabel Lee)说的“文学革命”<sup>⑩</sup>。

作为学者,需要全面检验在新政期间从日本流入中国的一切思想的因素,这就不仅需要分析词汇目录,还要研究动态思想的进程及其意义。虽然现在资料并不齐全,然而人们不妨大胆地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词语本身塑造并规限了人或社会的思想世界,在这方面,日本对塑造现代中国的贡献,差不多是无法估量的。

## 注 释

- ① 朱有璘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新华书店,1983年)第18页,并散见于第1—213页;又见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第147—149页。广东同文馆于1864年成立,1897年开始开设日语教学。
- ② 载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第50页,摘引于注①黄著第152页。
- ③ 见谭汝谦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第348页注550.218。
- ④ 同上注第250页注480.002,及280页注520.062;谭汝谦著《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第6页注④;阿部洋著《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第24页。
- ⑤ 引自岛田虔次著《章炳麟:传统的中国学者与革命家》,收入岛田著《中国革命的先驱:章炳麟与儒家学说》(*Pione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Zhang Binglin and Confucianism*, Joshua A. Fogel, tr. Stanford U. Press, 1900)第49页。
- ⑥ 引自注①黄著第152—153页。
- ⑦ 引自上注第153页。
- ⑧ 引自李杰泉著《留日学生与中日科技文化交流》,载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日本的中国移民》第283页注⑧。1898年6月1日的文献中,提及杨深秀对翻译工作的贡献,见第二章注④第987页。
- ⑨ 见波文编《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二卷第348页。
- ⑩ 有关“倭”的来源、含义范围及学术研究,见《在中国历朝历史上的日本:从后汉到明朝》第4页注②(Ryusaku Tsunoda and L. Carrington Goodrich, *Japan in the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Later Han Through Ming Dynasties* (South Pasadena, Calif., 1951);又见《大汉和辞典》第五册第110页。有关“东瀛”的来源及含义,见上注第6册第173页。以诗的语言“扶桑”指日本,见上注第5册第110页。排外的中国人以“东洋”指日本(并非表示“东方”),见上注第6册第197页。
- ⑪ 引自注①黄著第154—155页。1902年,梁启超列举了学习日语较学习西方语言更为有利之处,见注①黄著第155—156页。又见梅布尔·李著《梁启超(1873—1929)与晚清文学革命》(Mabel Lee, “Liang Ch’i-ch’ao (1873—1929) and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of Late-Ch’ing,” in A. R. Davis,



ed. *Search for Identity: Modern Literature and the Creative Arts in Asia* (Sydney, 1974) 第 208 页。

- ⑫ 引自注①黄著第 109、212 页。
- ⑬ 见第六章注④谭汝谦著第 56 页,第 41 页表 2。
- ⑭ 同上注第 41、56 页。
- ⑮ 对这一问题的有关文献,见泰凯乐著《东方与东方相遇:中国人对日本明治初期的看法(约 1870—1894 年)》(Carol T. Reynolds, "East Meets East: Chinese Views of Early Meiji Japan (ca. 1870-1894)",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86)。
- ⑯ 钱存训著《西方通过翻译对中国的冲击》(Tsuen-hsuei Tsien, *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XIII, No. 3, May 1954) 第 315 页,见注①黄著第 183—184 页。
- ⑰ 见上注钱著第 319 页,表中不仅按原书外语分类,且按科目分列(史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该表见注①黄著第 184—185 页。谭汝谦著《近三百年中日译书事业与文化交流》,对钱所列表格作了极其实用的注解,见该书第 226 页注⑩。
- ⑱ 这里所列的每年平均译数,除了 1938—1945 年战争年代外,均为至 1978 年止的历年平均数超过;1912—1937 年,平均每年 70.36 本;1938—1945 年,平均每年 20 本;1946—1978 年,平均每年 90.50 本。见上注谭著第 41 页统计表,及第 61 页谭的评述。谭汝谦在《近三百年中日译书事业与文化交流》第 218 页上,重新编排了这一表格,并在第 226 页上加以说明。1982 年,陈应年在《近代日本思想家著作在清末中国的介绍和传播》(载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编《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68—269 页中认为,由于合编成册的没有分列,实际应超过谭所列的 958 本而达 1000 本以上。
- ⑲ 见注④谭著第 63 页。
- ⑳ 第五章注⑧荫山雅博著第 43 页中,荫山认为,罗振玉得到张之洞的支持才从事这项工作。而在第三章注⑤贝斯著第 46 页中,则认为是罗振玉的这份杂志才第一次引起张之洞注意的。
- ㉑ 第五章注⑧荫山雅博著第 39 页注④,及注⑨ II 第 426 页。
- ㉒ 注④谭汝谦著第 56 页,第 200 页注 430、140。

- ⑳ 第五章注⑳ 阴山雅博著第 39—40 页。
- ㉑ 第五章注㉑ 第 421—422 页。
- ㉒ 见乔意·邦纳著《王国维：一位知识分子的传记》(Joey Bonner, *Wang ku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王国维的日译中书目，见注③第 838 页。
- ㉓ 樊炳青、沈紘及萨端的已出版译书目录，分见注③第 846、889、896 页。
- ㉔ 第五章注㉔ 苏云峰著第 131—133 页，及第三章注⑤第 46 页。
- ㉕ 主要的翻译社及其出版书籍，见注①黄福庆著第 161—187 页。
- ㉖ 1898—1911 年发行刊物的刊名、创刊时间、出版地、主要编辑者、备注见第三章注⑩王晓秋著第 369—373 页。又见上注第 188—195 页。
- ㉗ 据《教科书之发刊概况，1868—1918 年》(载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第 228 页，在 1903 年时，日本的初、中级学生已有教科书，而“高级专科学校及大学都没有教科书，完全依靠教师口授及学生笔记”。如果情况真的这样，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事业心的学生、学校以至全体教员都参与出版讲义录。例如，京师大学堂的服部宇之助就出版了他的心理学讲稿和参考书，见第五章注①第 58 页。苏州江苏师范学堂学生收集到的 16 册日本教习的讲义录，都是在日本印好的，见《教科书之发刊概况》第 236 页。东京宏文学院就出版了自己的系列讲义录 21 册，供中等水平的学生使用，见第四章注㉓。
- ㉘ 汪向荣著《日本教习》第 156、157 页。
- ㉙ 实藤惠秀著《现代中国文化的日本化》，载实藤著《日本文化对支那的影响》(东京：萤雪书院，1940 年)第 6 页。
- ㉚ 第六章注④谭汝谦著第 62 页。学者傅斯年(1896—1950)于 1919 年断言，“关于翻译作品，最好的是从日文翻译的几本科学书籍”。见注⑧李杰泉著第 263 页。
- ㉛ 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 264—266 页，注①黄著第 170—171 页。
- ㉜ 注①黄著第 172—173 页。
- ㉝ 100 册译著的书目及日本作者，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 268—272 页。《全书》的分类及数目，见注①黄著第 172 页。
- ㉞ 钟少华著《清末百科全书初探》，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8:139—159(1987年)。十分感谢作者于1988年10月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期间,送我这很好的探索性学术文章。

⑳ 见注⑧李杰泉著第265页。

㉑ 见注⑦第139—140页。

㉒ 这是指1934年的调查,学者们一再提及的题目是“教科书之发刊概况”,似乎除此以外,再无其他。例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273—275页;注④谭汝谦著第61页注⑮;及林明德著《清末民初日本政制对中国的影响》,载谭汝谦编《中日文化交流》。

㉓ 见注③第860—861页,第62页。

㉔ 同上注第61页注⑮。

㉕ 《教科书之发刊概况》第220页。

㉖ 同上注第245页;注⑨Ⅱ,第14页。

㉗ 这一分期见实藤惠秀著《初期的商务印书馆》,载实藤著《日本文化对支那的影响》第241页。本人未见过商务原始的正式历史。

㉘ 同上注第242—245页。

㉙ 有关规定见注②张编著Ⅰ,第207—210页。

㉚ 见注⑮第246—247页。张静庐编《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57—564页,载《商务印书馆编年史》,亦采用同样说法。

㉛ 注⑮第248页。在注⑮谭著第60页,谭汝谦还提到其他几家在中国合资经营的出版社。

㉜ 见注⑦第155页。

㉝ 实藤惠秀著《现代中国文化的日本化》第20—21页,对梁启超的翻译风格及范例有中肯的评论。

㉞ 见注⑱陈应年著第269页。

㉟ 同上注第281页。这9人的姓名及已译成中文的著作,见269—281页。

㊱ 见注③第27页,马里乌斯·詹森的“前言”。谭汝谦自己在注④书中第37页写道:“翻译(translation)是沟通不同语言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翻译可将记述于一种语文的知识、学问、思想、感情等,向不懂该种语文的人传播或复述。翻译的对象和译品的数量,往往配合有关的两种语文的文化背景及其社会需求;做译事的人,不但兼通两种语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种文化上的先知先觉者,故从一国的翻译史往往可以透视两个

不同语文国家文化的一些层面,而这些层面常常被一般文化史家所忽视。”

⑤ 引自注①黄著第182页。

⑥ 在注②第20—34页中,实藤惠秀使用“日本化”一词有着多种含义,既指语言方面,也指思想。

⑦ 本杰明·斯华茨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第95—96页。

⑧ 见注⑧第268页。为了仔细研究,李杰泉从民国期间政府发刊的标准科学词汇词典中,找出2677条中文和日文相同的词目,见该文第285页注⑩。有关物理学和生物学方面外来的词汇,见高名凯与刘正琰著《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129—132页。

⑨ 岛田正郎著《清末中国近代法典的编纂:东洋法史论集》第三卷(东京,创文社,1980年)第234页。共22册的系列论著《法学汇编(京师法律学堂讲义)》(北京,1911年)集中地说明了,中国近代的法律概念和词汇,如何在日本人帮助下运用的。本书第三编将详细介绍4位讲义编撰者及其编撰讲义的数目:冈田朝太郎,著五册;松岗义正,著4册;志田钾太郎,4册;小河滋次郎,1册。在上注第232—234页中,岛田正郎列表说明了讲义的名称及作者。有关法律词汇问题,参阅注⑫第6页,及注⑬高名凯及刘正琰著第139页。

⑩ 李又宁著《社会主义传入中国》(Li Yu-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into China*. New York: East Asian Institute, University Press, 1959)第69页。注⑬高名凯及刘正琰著所列政治、哲学、经济及社会方面的词汇表,提供了确证,并散见于第114—124页。

⑪ 见谭汝谦著《现代汉语的日语外来词及其搜集和辨认问题》所列哲学词汇表,载谭著《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第333—335页。及见注⑬高、刘合著第119—120页。

⑫ 对这场争辩,谭汝谦作了概括,引证恰如其分,见注⑭谭著第327—330页。

⑬ 谭汝谦和其他学者一样,认为高名凯及刘正琰的研究既不全面,也不是完全没有错误的,但却是光辉的构想,为今后研究构建了主要的范畴。谭对

今后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新方法和方向,其中之一是中日语言学家共同研究。见注⑥⑩谭著第331—345页。

- ⑥④ 实藤惠秀著《现代中国文化的日本化》第28页。这一启发性思想,见实藤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第395页;注⑥⑩谭汝谦著第328页。
- ⑥⑤ 郭沫若的话引述于第三章注⑥⑩王晓秋著第429页,又见曹贵民著《中国留日学生与“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载《中日关系史研究》2:38(1983)。
- ⑥⑥ 有关中国对日本文化的模仿,见《严复与梁启超,新小说的鼓吹者》,载阿黛尔·里凯特编《中国文学的道路,从孔子到梁启超》(C. T. Hsia, “Yen Fu and Liang Ch' i-ch' ao as Advocates of New Fiction,” in *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 i-ch' ao*, Adele Rickett, ed., (Princeton, 1978));及第三章注⑥⑩陈应年著。有关对日本艺术的模仿,见拉尔夫·克鲁茨尔著《近代中国的艺术与革命:岭南美术学校,1906—1951》(Ralph Croizier, *Art and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Lingnan (Cantonese) School of Painting, 1906-195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及徐星平著《弘一大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有关借用近代日本思想方面,见注⑥⑩陈应年著。“新文化运动”一语,见注⑥⑩。“文学革命”一词,见注⑥⑩梅布尔·李著。

## 第三编 新政体制革命： 新的领袖，新的管理

127

事实表明，中国晚清的体制革命与思想革命是不可分的。如果不是日本人以汉字惯用语翻译西方著作，从而得以直接用于中文，使思想能骤然突破；如果没有中国在日留学生的思想觉醒；如果没有为中国政府服务的日本教习和顾问及时地支援，中国的新政体制改革就不能发生。事后看来，体制革命和思想革命明显地差不多是同步前进的，两者同时互相依赖又相互支持。

就像中国的思想革命一样，体制革命的每一回合，无论是改革蓝图及运作模式，术语及培训，具体指导和专门知识都依靠日本。假如没有由单一来源提供整套方案，假如中国对这来源没有信心，假如日本止步不前，中国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选择也不是没有的，如果中国选择依靠说不同语言的不同国家，意念不一，众说纷纭，又将造成概念的混乱，词义的分歧，激烈的争论，互相对立和抵制。中国幸运的是手头上就有单一的第一手来源，既是文化一致又唾手可得，在1898至1910年这饱受严峻考验的年代，向中国

提供十多年慷慨帮助。

128 要使改革得以进行,首先要使在过去数年因政策摇摆而心惊胆战的中国官员获得保证,朝廷对改革是诚心的、认真的,不会惩罚敢作敢为的人。虽然百日维新的不少改革仍然保留,但根本性的改革在1898年9月被冻结了,新的改革停顿了,使改革派官员惶恐不安。受朝廷一派支持的义和团运动于1899年爆发,改革注入新的动力的残存希望也破灭了。义和团煽动反对外国人的暴行,和在1900年年中围攻北京外国使领馆区,把18000人的联合远征军于8月引入首都,把北京部分地区变成废圩,把慈禧太后和她最亲密的顾问送到西安逃难。这场大灾劫使朝廷在震惊中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它最近的政策,能否单纯“挽救崩溃中的传统体制和满洲王朝”<sup>①</sup>。

朝廷对义和团灾难应负罪责的忏悔,是1901年1月29日改革上谕的部分内容:“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在第一章中已摘引了上谕中包罗一切的命令,要求“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提出变革的具体建议<sup>②</sup>。这一政令似乎与朝廷1898年以来的政策不一致,却对朝廷、对慈禧太后本身改正对1898年改革的观点具有意义,透露了承诺温和而保守的改革<sup>③</sup>。

129 改革上谕命令官员们于两个月内向朝廷提出书面意见,看到毫无反应时(毫无疑问是害怕朝廷报复),慈禧太后于4月21日成立了督办政务处(简称政务处),接受并研究有关建议后向皇帝推荐。具有意义的是,政务处以强有力的庆亲王为首,并包括极具影响力的大学士李鸿章(曾与庆亲王一道谈判《辛丑条约》),荣禄(1836—1903),崑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总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与”,亦即名誉顾问。1903年夏天,张之洞及同是顾问的袁世凯受任为政务大臣(刘坤一于上年10月去

世),同年稍后提为政务大臣的有教育家荣庆(1854—1912)、张百熙及孙家鼐(1827—1909)<sup>④</sup>。

刘坤一和张之洞都是保守的官员,都曾反对朝廷支持义和团,他们早期的积极参与是具有关键性的。1901年7月,刘、张向皇帝呈奏了三道奏折:7月12日的《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7月19日的《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及7月20日的《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sup>⑤</sup>。根据1901年10月2日的上谕,“择西法之善者,不难舍己从人;除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刘、张的奏折成为未来改革的准则,堪称为新政改革的“蓝本”<sup>⑥</sup>。

由于这三份奏折对研究工作非常重要,其内容及成文过程都引起了浓厚兴趣。据邓嗣禹和费正清的说法,“这些奏折草拟的过程是这样的:刘坤一要求张之洞主笔,刘命他的幕僚张謇等人,各草拟一议题送张,张再让他的幕僚各抒己见,然后由张执笔总其成,每日写出一到两题,全文整整化了张一个多月的时间”<sup>⑦</sup>。

随后,系统全新的体制改革可分为四个部分说明。首先,最根本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是第七章探讨的教育改革,中国新的领袖及新的管理由此而生;其次,按年月顺序是军事改革,将于第八章探讨;再次是第九章研究的警务及监狱制度改革;最后是法律及司法的综合改革,其重要性仅次于教育。体制改革促使皇朝于1911至1912年间意料不及地突然崩溃了,它与法律及司法改革同步进行,并有助于促进立宪政体,因而在第十章一并探讨。



## 第七章 中国的教育改革：日本的模式

批判中国科举制度，已是千多年来中国历史的特征。然而直到 1895 年，中国在军事上被日本击败后，才发出从根本上重建整个制度的呼吁<sup>⑧</sup>，导致为百日维新期间的上谕。在这期间，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国民教育计划及教育思想方面，直接向日本寻求指导<sup>⑨</sup>。本书第三章曾引用过武雄观察了 1898 年教育改革后在 1898 年 11 月的报告，认为中国计划体现于京师大学堂，是模仿日本的。田正平和霍益萍认为京师大学堂完全依据日本的计划和规章的原型<sup>⑩</sup>。

京师大学堂的模仿，以及受日本样本启迪的、1898 年教育方面的各种创举<sup>⑪</sup>，于 1898 年改革停顿后，也就丧失了生存的土壤。1901 年 1 月的上谕，表示了朝廷对发现及训练“人才”的关注<sup>⑫</sup>，又把教育推上舞台。

### 训练人才

如果确信要改善国政，就必然关注人才的重要性。改革上谕以不同的说法明确地表示关注：“人才”（两次提及），“治人”（一次），“贤能”（一次）。上谕的最后一段提出，“特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苟无其法，敝政何

从而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sup>⑬</sup>”。

为确保获得人才，就需要现代训练。认识到这一点，改革建议必然要求发展现代教育应比其他方面迅速<sup>⑭</sup>。本章强调教育改革与日本的联系，忽视这一点，就无从理解中国在教育方面的现代转化。与日本的联系，包含了中国急需的外国模式，这模式应是连贯的、容易接受的及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一致的。

在日本方面，它期望伸手帮助中国训练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人员，这是有案可查的。在这世纪之交，日本以新的自信和民族骄傲的语言表示它的期望，例如嘉纳治五郎于1900年1月就说，日本的特殊地位，可以利用其先进的知识和思想资源，“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日本作为东方最先进的国家，必须帮助中国进入20世纪<sup>⑮</sup>。1901年7月25日发行的《教育时论》，发表了题为《清国教育问题》的未署名文章，提出“（在教育方面）清国只能依靠外国专家。这样，我们作为日本人必须尽一切努力，为了彼此两国，利用我们较之欧美人更为有利的、同文同种、唇齿辅车的各种关系，同意清国政府及民间增加雇请日本人或为顾问、或为教师”<sup>⑯</sup>。

1901年间，有关教育改革最具影响力的建议，是刘、张二人7月12日奏折提出的“育才兴学四条”，就是“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劝游学”<sup>⑰</sup>。奏折以中国典型的逐步深入的语气强调，“盖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所不足……今日时势……缓无可缓”<sup>⑱</sup>。

在这份奏折中，日本的影响虽然广泛，但并不深入，对日本系统的特色仍未完全了解。在张之洞的《劝学篇》中，倒曾提到教育的层次：大学、中学及小学。游学则强调到日本学习，并建议学生完成某一阶段学习回国后，经考试可分别授予进士、举人或贡生。朝廷于9月16日颁布的上谕中，采纳了这一意见<sup>⑲</sup>。一年后，1902年8月15日京师大学堂校长及管学大臣张百熙通过《钦定

大学堂章程》，规定学校分为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高等小学堂、寻常小学堂和蒙学堂。虽然用语混杂，但这过渡性的规章较为全面地建立了日本式的教育架构<sup>②</sup>。

刘、张二人7月20日的《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奏折中，提出要矫正“见闻不广之一病，于各国疆域、政治、文学、武备，茫于不知”。奇怪的是像抓了根稻草一样，提出“以后新派总署堂官、章京、海关道员、出使大臣及随员，必选诸曾经出洋之员……若未经出洋者，不得开坊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sup>③</sup>。

且不说纸面上的上谕及奏折，1901年开始，确确实实办起了无数省立或私立的学堂，即现代学校。这些努力也不是没有任何风险的，1898年的冰冻记忆犹新；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仍保留着对学衔及升任高官的实际垄断权。“把学校纳入科学制度”是主要的绊脚石<sup>④</sup>。在1901至1904年间，接二连三的上谕和奏章，把学堂逐步推向生活和思想的主流，越来越赢得其合法地位，再也不想1898年在福州那样受到孤立，或因地方的支持摇摆不定，造成教育计划的不够周详。学堂开始具有现代机构的性质，有了已定的准则，人员和资金都有了长期和可靠的保证。不少学堂获得热心支持，为“积极的新中央政府”培养“新一代的”“国家官吏”<sup>⑤</sup>。新的学校意想不到地被认定是推动未来的浪潮，使国家比原来想象的更快发展。过去的观念已一去不复返了。

## 考察团的特别影响

晚清寻求教育改革的途径可概括为四类：派遣学生到外国留学（见第四章）；派官员考察团到外国考察（见下）；中国教育法规和体制的改革（见下）；雇请外国教习及顾问（见下及第五章）。第一类，政府派遣已有学衔的学生到外国接受培训，主要是军事、师范、警务及法政等。第二类是官员考察团到外国收集学校规章及有关

材料,考察教育机构的运作,参听演讲及会晤专家和负责官员。考察的成功与否视乎东道国的合作程度,日本对此是极为重视的。第三类是参考适用的资料、包括中国考察团所得的资料,改革中国教育规章和体制。第四类是雇请外国教师和顾问协助制定并执行教育改革计划。在外国顾问方面,中国特别着重从日本雇请教育专家;日本方面,在完成自身的明治维新后,也乐于输送“剩余人力资源”,这些人员在充分掌握以汉字构成的日本现代词汇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

中国教育考察团的工作是极严谨并富有成果的。这些代表团一般外出两三个月,向派出机构提交报告,并经常发表他们的所见所闻。最早运用这一办法的是张之洞于1898年派出的第一个赴日教育考察团,由吏部姚锡光任团长,姚于1899年发表了他的见闻录《东瀛学校举概》(第三章已简略介绍)。留居日本的中国人也写了探索性的著作,如1899年起担任东京中国留学生监督的夏偕复,于1901年发表的《学校刍议》;李宗堂按刘坤一指示,于1902年写成的《考察学务日记》<sup>④</sup>。

按照张之洞和刘坤一的共同指示,罗振玉与其他六位教育家组成的特别考察团于1901年赴日,1902年1月返国,卓有成效地对日本教育系统获得全面了解。罗的考察团会见了主要的教育家和政府官员,包括文部相、外务相和近卫笃磨公爵;参加了嘉纳治五郎安排的、一连串有关日本教育及行政管理各个专题的讲演;收集了一整套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日本教育机构的法规和规章;收罗了珍贵的教科书<sup>⑤</sup>。考察团成员陈毅是张之洞教育改革的重要幕僚<sup>⑥</sup>,他在1902及1903年至少发表了三种日本教育方面的译著:《教育行政》,《胎内教育》(《胎儿期教育》),及《教育史》<sup>⑦</sup>。

罗振玉本人写了《扶桑两月记》,综述了考察团的工作<sup>⑧</sup>。有关教育方面的见闻,则刊载于《教育世界》,这是中国第一份近代的教育期刊,发刊于1901年5月,受张之洞和刘坤一资助。它的特

色是把版面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论说》(评论),致力于介绍中国著名人士有关教育改革和现代化的观点<sup>②</sup>;第二部分是《教育规则》,主要介绍日本教育行政系统、法规及各类学校的规章;第三部分是翻译,向中国人提供各类学校的规章和细则,学校行政法、教学法,有关教师的法律,和从幼稚园到中学的教科书,全都是按日文原本翻译的<sup>③</sup>。从1897年开始,罗在出版事业及其他教育工作的得力助手是藤田丰八<sup>④</sup>。

对于《教育世界》在中国读者中传播日本教育制度的作用,也许难于估计过高。从1901年5月的第一期到1905年的第40期,包括分期连载的在内,共刊登了240篇文章。其中193篇或80%以上是按日文翻译过来的,93篇译的是日本教育状况、体系或规章,其他27篇是教科书<sup>⑤</sup>和教育理论的译文。用田正平和霍益萍的话说,这些文章打开了一个最重要的“窗口”<sup>⑥</sup>。

罗的考察团的目的,本来就是带回整套各种类型、不同层次教育机构的法律和规章,教职员的管理规定,及教科书的资料。该团收集了110多份规章,在《教育世界》作了“系统介绍”<sup>⑦</sup>。藤田等人向罗介绍了日本教育方面最主要的学术著作,其中不少是第一次带到中国的<sup>⑧</sup>。罗返国后,与张之洞五次会晤,畅谈日本见闻<sup>⑨</sup>。张、刘对罗的意见和收集的资料,备加赞赏,写入他们1902年有关教育的奏折中<sup>⑩</sup>。

139

1902年4月号到8月号的《教育世界》,登载了罗19篇系列性文章,从教育系统到课程安排等方面,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罗对初等教育的看法,本质上只是1900年日本《小学校令》的翻版,而罗的版本又差不多一字不易地成为1902年8月15日中国的《初等教育章程》<sup>⑪</sup>。陈毅是张之洞筹拟的1903年新学校规定的主要参与者,这规定又成为1904年1月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具名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的基础<sup>⑫</sup>。这足以证明,罗的考察团是极富成果的,也表明了以日本为模式而形成中国现代学校系统的

过程中,这影响是通过什么渠道实现的。

1902年初,京师大学堂校长张百熙,劝说吴汝纶任大学堂的总教习、或任分管人事及训导的副校长,由于吴与日本已有联系,故而提出先行赴日调查教育系统,作为接受任命的条件。张表示完全同意,并于2月的奏折中郑重地奏报。吴汝纶的日本之行是非常出众的,从他7月20日抵达长崎到三个月后离日回国,所到之处都受到知名人士式的欢迎。63岁高龄的吴汝纶,参观了东京、大阪、京都从小学到高等学校等44所现代学校。他的所见所闻,包括(1)在文部省讲演摘要;(2)日记摘抄;(3)学校图表;(4)学科课程表;(5)笔谈书简,他和当时社会杰出人士以文言文通信和笔谈中,就军事和民事问题,实事求是地表述的主要观点,都收录在他的长达568页的《东游丛录》中。该书在他离日返国的时候,由东京最大的出版社三省堂出版<sup>⑩</sup>。

日本现代生活的一切,无不在吴的详尽研究之中:全国及地方行政管理的长处,军队及参谋本部,工业和商业,报社、图书馆和医院。日本方面则竭尽所能,除了安排参观重要机构及各方面负责人外,并安排日皇接见,这对吴这样低级官员是罕见的荣誉。吴所到之处,有无数的社交晚会、招待会,都有新闻报道。新加坡学者容应萸在其慎重的分析中称,吴具有“传统的”和“现代的”双重身份——既是精通文学的人物,又是教育改革者——使日本如此隆重地奉承和欢迎。他的古典文化依然博得尊重,但他的近代祖国却备受奚落<sup>⑪</sup>。

《东游丛录》以详细的图表,细致地描述了日本的教育系统,这些图表和吴的许多分析,构成了1904年1月3日权威性的《奏定学堂章程》<sup>⑫</sup>。是否应为此表彰某人——吴汝纶,罗振玉,陈毅,藤田丰八,某一位译者、教育工作者、官员,或1903年前热情地报道日本教育系统的中国学生们<sup>⑬</sup>——终究是无关宏旨的。具有意义的和应该强调的是,来自日本的影响是复杂多样的,流入中国也

同样经过复杂多样的渠道。不同的领导者朝着共同的方向前进，终于推出了1904年1月的《章程》，而最终结果是意外无惊无险地对教育问题达致全国一致的共识。

《奏定学堂章程》发布后不到两个月，美国教会的教育家、以后又当外交官、一度出任袁世凯教育事务顾问的丁家立(Charles D. Tenney)，在1904年2月21日从天津写信给莫理循(G. E. Morrison)，认为这是“革命性的政令”<sup>④</sup>。日本著名的教育官员，其后任职文部省的泽柳正太郎(1865—1927)，于其1905年3月题为《清国的新教育制度》的演讲中，宣称中国新的制度与日本现行制度“没有一点”不同——“实在是毫无顾忌地大胆全盘采用日本制度”的结果<sup>⑤</sup>。

历史学家沃尔夫冈·弗兰克(Wolfgang Franke)了解到1904年改革的概括性和源流，说“《章程》容量极大，包括从京师大学堂到幼稚园各类学校的章程、考试、教师、教科书等，大都是摹仿日本模式的”<sup>⑥</sup>。当代一流权威阿部洋在全面研究了文件后，其观点与泽柳看法相似，认为“《奏定学堂章程》表述了学校系统基本的和最重要的特性，是完全仿照当时日本系统的”<sup>⑦</sup>。阿部于1990年又称，“实际上，除了日本的教育制度以外，再找不到中国人参考其他外国制度的痕迹了”<sup>⑧</sup>。

中国采用这些章程，或把日本作为自己的模式，绝不是受到任何压迫，而是因为事实证明日本系统是成功的和实用的，并认识到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这一致性包容在“同文”这一词语中。

## “同文”和“体用”：保守改革的生命力

今天的许多学者都随便否定“同文”或共同文化的概念，认为是在过去悲惨的日子里，日本人虚构来欺骗中国人和日本帝国主义合作的。毫无疑问，在本世纪20及30年代，乞灵于“同文”确有

其恶毒用心,但不应把这事实往后推到新政年代。“体用”一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同样也受学者认为天真幼稚、自相矛盾而否定了<sup>④</sup>。

当前研究中有意义的发现是,晚清的学者和改革者在使用“同文”及“体用”两词时,都赋予了实际意义和生命力。“同文”用于表述中日显然共有的许多文化、思想和社会特征,特别集中于儒家价值观;“体用”是意味着依据日本明治的成功经验,把西方的制度(用)移植于儒家模式的价值基础(体)上。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同文”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能使中国立即能够达到日本“已经做到的东西方融合”<sup>⑤</sup>,是“体用”的另一种说法。“体用”本来就存在不同的配方,韩国学者闵斗基在其重要文章《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再评价》中<sup>⑥</sup>,检视了中日双方的版本,他的研究集中在思想容量和逻辑含义;我的研究强调实践和实践中的认识过程。他对我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内涵。

142

在涉及“体用”问题时,人们不应忘记中国 19 世纪时,按照邓嗣禹和费正清的研究,处理西方问题的顽固的绊脚石,是它“不能理解基督教和其他西方文化的区别”<sup>⑦</sup>。这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曾在外国生活的中国人极少,对外国事物有兴趣的人们得不到鼓励和报酬。除极少数边缘人外,对西方全都只是一片模糊印象。在中国推广西方学识的又全都是基督教传教士,他们认定宗教(亦即基督教)与现代生活,有着密切的、甚至必不可少的联系。以至由前传教士林乐知于 1875—1907 年在上海主办的先进的《万国公报》,在其自白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要“致力于传播有关地理、历史、文化、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西方国家全面发展的知识”<sup>⑧</sup>。

日本则完全相反,长期以来已经认识到,而且坚持严格区分西方知识和西方宗教。在漫长的江户时代(1603—1868 年),日本即使双脚狂热地践踏基督教,也双手欢迎西方的科学和医学<sup>⑨</sup>。中



国却没有类似的经历,而在 1842 年鸦片战争失败、受到不平等对待后,更不可能有这样的奢望了。

143 由于“帝国主义性的基督教”<sup>⑤</sup>于 19 世纪末在中国加速前进,这使中国人反抗基督教和与宗教相连的改革。在 1899 年 12 月义和团爆发前夕,刘坤一向东亚同文会代表们表示,感谢他们对教育方面的努力是“与宗教无关的”<sup>⑥</sup>,由此反映了刘对这问题的关注。半年后,刘致函近卫笃磨公爵,赞扬根津一为南京同文书院、即日后的东亚同文书院订立了《立教纲领》,认为“其立教纲领则以五经四书为宗,辅之以西学诸科,方为有体有用”<sup>⑦</sup>。

《立教纲领》的作者根津一立志献身儒学<sup>⑧</sup>,直至他 1923 年作为校长退休前,在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向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宣讲”作为必修科的儒家道德伦理。他在《纲领》中宣称,“德育为经,智育为纬”,是现代教育的精髓。因而他进一步表明,教育高尚的道德基础,是中国经典所概括的“先圣先儒之大道”<sup>⑨</sup>。根津一的同事认为,《兴学要旨》坚持,儒家的中心思想仁、义、忠、孝是学识的根基,和达致富国强兵的现代中国的梦想完全一致<sup>⑩</sup>。

回顾 1896 年的日本,喜爱中国文化的宫岛大八(1867 年生),他在 1887 至 1894 年间到中国学习儒学及书法,回国后在东京建立“咏归会”教授中国语和汉学,会名出自孔子《论语》的“咏而归”<sup>⑪</sup>,1898 年易名为善邻书院。这学校在讲授现代中国语言方面,在日本起了重要作用;在指导纲领上,也以儒学为核心<sup>⑫</sup>。如上所述,嘉纳治五郎于 1899 年把他为中国学生而设的学校,按《论语》命名为亦乐书院。近卫笃磨公爵在 1901 年 1 月开设东京同文书院宿舍时,也以儒家礼节(包括祭孔)规范学生的德育<sup>⑬</sup>。

144 读者还会同时想到寺尾亨这位研究国际法的先驱,他在 1903 或 1904 年为中国学生建立了东斌学堂;明治大学校长岸本辰雄把他的学校命名为经纬学堂;以及为日本及中国妇女开办贵族女子

教育的先行者下田歌子。这些现代教育家,每一位都是受儒家价值观浸润并激励的。又有哪些西方教育家或学校,能够和中国儒家情感如此协调的呢?

1901年1月的新政改革上谕,一开头便宣称,“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五常:仁、义、礼、智、信),昭然如日星之照世”。它指责没有经验却侈谈富强的官员,“往往自迷始末;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需要的是“酌中发论”,提出既有原则又有实际办法的改革建议<sup>④</sup>。

新政改革上谕明确信奉儒学却并不专横,新政每一项改革最终都是构建并解释儒学自身的部分学说。教育方面,在张百熙指导下写成的1902年8月15日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已确定了道德核心。同时公布的中国第一套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及蒙学堂的章程<sup>⑤</sup>,每一种章程的《全学纲领》都规定,“(某某)学堂一律遵守《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之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sup>⑥</sup>。

《大学堂章程》的第一章泛泛地题为《全学纲领》,针对的不仅是现代的大学堂教育——毫无疑问,是要把“大学”过去中文的含义、“伟大的学问”延续下去。第一节说:“京师大学堂之设<sup>⑦</sup>,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第二节说:“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外国学堂于智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本有相同之理。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植人材之始基”。第三节说:“欧美日本所以立国,国各不同,中国政教风俗亦自有所立国之本;所有学堂人等,自教习、总办、提调、学生诸人,有明倡异说,干犯国宪,及与名教纲常显相违背者,查有实据,轻则斥退,重则究办”<sup>⑧</sup>。由此可见,对儒家价值的重视是无处不在的,其要点与日本不相伯仲。

早期从日文译为中文的著作中,有些论及西方及东方的道德伦理问题,这些日文著作的优越性之一,在于参考了中国的教义。

最好的例子之一是元良勇次郎(1858—1912)的《中等教育伦理学讲话》(1902年译成中文)。曾翻译不少日本伦理学著作、后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认为这部著作“适用于”中国教育工作者需要,因为它“时时引我国儒家之言以相证”,并极其关注“我国祖先教育之旨”<sup>④</sup>。

146 按照上述的评论和态度,1904年1月13日的《奏定学堂章程》自然引起一定的震动。骤眼一看,这章程似乎没有明显地参照儒家价值观,找不到1902年各《钦定学堂章程》中总括了道德的《全学纲领》,也没有开宗明义的训诫,但儒家教义是牢固地扎根在课程中的。例如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大学堂分为八科,第一科便是“经学科”<sup>⑤</sup>;高级学校和师范学校都要开设儒家经典著作课程;在中学和初级师范学校里,36课时中规定9节课用于阅读及讲解经典;初级学校的高年级班36课时中的12节课,低年级班30课时中的12节课,规定用于讲授经义<sup>⑥</sup>。

中国人强调道德教育,是日本现代体系的反照。署理陕西省提学使刘延琛在对日本官式考察后,疑虑全消,1907年1月向皇帝奏称:

凡修身立行,忠君爱国之道,皆编入教科书,童而习之,用能人知自爱,国鲜衅民。近年尤重德育,大小各校,皆首重人伦道德。文部省所讲述亦谓教育不源于道德,犹树木有枝叶而无本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接见彼都人士,或谆谆以为言谓其国欧化盛时不免弊害,赖以道德救之。其推崇我孔孟甚至,斯其进步之良者也。

至规制,尤严整有法,教员非试验不许滥充,无请托之弊;学生必约束纳于规矩,无骄纵之风。日本人性习勤俭,服食刻苦……

147 政术与时变迁,必广求知能于世界,斯理万世不易,必当奉圣道为依归。盖风教略殊,凡纲常名教之大经,我自有立国

之道；而规模灿著，彼设备训练之陈迹，实足为前事之师<sup>⑳</sup>。

以阿部洋的话说，“独特的日本学校教育，以儒家道德为本的修身教育与近代诸学科结合起来，已成为中国的理想楷模”<sup>㉑</sup>。

在事后看来，如果没有日本的文化改良，中国要迅速、平静、彻底地完成教育体系的全面重新构建，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含意为共有儒家文化的“同文”一词所具有的份量和要义，在新政年间尤具有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随着清朝崩溃，“同文”在中国已失去了一切意义。在1911年后，进步的中国人反对他们自己儒家过时的、特别是僵化的、腐朽的思想方式和社会实践，认为是现代化的障碍，国家生存的威胁，1912年中国教育部下令在学校课程中剔除儒家经典，就直接反映了这种态度<sup>㉒</sup>。在本世纪10至20年代，中国在反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极端地把儒家的精华和糟粕一并抛弃，把自己和自己的过去疏离——还应强调的是——和日本的“现代神话”<sup>㉓</sup>疏离，这“神话”是在儒家学说和本地因素有选择地融合的基础上构建的。

以1915年提出21条要求为象征，日本加速侵略中国，同时又愚弄地表白日本的友谊，利益分享，相互关注，然而都只是为了掩饰侵略。在帝制崩溃后和儒学受批判的中国，“同文”的概念既然是危险敌人的宣传，也就被视为骗局和诡计，较早时的含义也受到遗弃。

但在“同文”和“体用”丧失其意义之前，在那令人惊异的和谐密切时期，是这两个概念把中日两国联结在一起。学者们如果打算了解中国保守的新政革命的成就，了解这场革命得以定位的与日本有机的联系，就应该重新正确理解“同文”和“体用”在这世纪之交时的意义。

## 科举制度的废除

受人民及来自日本思想的推动,又因朝廷在1902至1904年间对教育采取主动而得以合法化,这些变化把教育问题推到首位,速度之快是任何人无法预料的。早在1903年3月,张之洞和袁世凯联名上奏,促请彻底废除传统的科举制度,说“其患之深切著名,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sup>⑥</sup>。这是极其激进和冒险的建议,新学制既未能使人完全放心,也未充分证明与中国传统思想和谐一致,极可能被束之高阁。张之洞深知日本教育系统的改良性,他在1902年10月31日的奏折中称:“(课本)有必须另行编纂者,有不得不译外国书者。日本教学全仿西法,惟宗教则改为修身伦理,自编课书。”<sup>⑦</sup>

张之洞不了解的、或者他不必要了解的是,直至1868年止德川幕府的正教——儒教,在19世纪70年代已被日本视为“落后”而排斥,大胆试行西方的自由价值观和体制。到19世纪80年代,保守势力为了在政治上反击信仰和行为上的分裂,由国家发起重新引入儒家价值观(虽然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已受玷污的“儒家”标签)。1890年强调中央集权及浸润了儒学的《教育敕语》,把这一切推到高潮<sup>⑧</sup>。这解决了日本在教育方面的“体用”难题,也为中国解决同一难题提供了公式<sup>⑨</sup>。

149 在张之洞、袁世凯及其他主要官员的一再催促下,1905年9月2日突然颁布了皇帝上谕,结束了中国历时达1200年的科举制度,于1906年执行。较之仅在一年前提出的十年内分阶段逐步废除的时间表,是大大地提前了<sup>⑩</sup>。

对在学堂读书的学生来说,这道政令是天赐鸿恩,解决了从其他方面无从解决的难题。中国学生的实际想法是,既到学堂就读,也追求通过科举进入官场。于是,每当开闱考试的三四个内,雄

心壮志的学堂学生便缺课回本省,参加当年的院试(按关本幸太郎的说法,保定的直隶师范学堂在1903年缺席的学生竟占一半)。关本形容这些备受折磨的学生是“首鼠两端”<sup>①</sup>,互相矛盾的出路都得参加。中国学生最稳当的选择便是考入京师、上海和广州的同文馆<sup>②</sup>。废除科举的政令,完全打消了通过科举谋求出路的希望,难题也就解决了。

这令人震惊的举动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波澜。一直在上海注视整个过程的根津一<sup>③</sup>说,“废止科举是近来非常极端的措施,但未发生激烈的反对……反对者也没有出头,读书人都满心欢喜”<sup>④</sup>。

这大胆的一步,为中国在1906年间的第一个现代教育系统标准化扫清了道路,从全国的学部到省和府县级的教育机构,全都以日本为样本<sup>⑤</sup>。为了最后润色,从1906年8月至11月,最新任命的23位省级教育长官提学使有一半以上到日本广泛地考察日本学校及学校行政<sup>⑥</sup>。

在谈及1906年末发生的一切后,有必要谈及中国教育系统的“日本化”:从学校章程到章程下的教育纲要,从中央和省的行政架构到学校课程和教科书的内容<sup>⑦</sup>。有意义的是,这个受日本影响的晚清系统沿用到1922年,除1912年废除儒学教义外,并没有重大的改变。到了1922年,就改为采用美式教育结构及系统了<sup>⑧</sup>。

#### 注 释

- ① 见第四章注<sup>②</sup>弗兰克著第48页。
- ② 见《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卷总第4601—4602页及本书附录。
- ③ 有关事实及关系,见第三章注<sup>④</sup>陆光及阎小波著。
- ④ 见史远芹、曹贵民及李玲玉著《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演变》(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77、293页;萧公权著《现代中国与新世界:维新派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Hsiao, Kung-chuan, *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5)第 275 页;及第四章注⑩第 57—58 页。

- ⑤ 刘、张三折全文载《张文襄公全集》(北京,新华书店,1990年)卷 52、53、54 (第一册第 908—952 页);《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 4727—4771 页刊载了三折全文,并加断句;又见东亚同文会译《刘张变法奏议:清国改革上奏》(东京:东亚同文会,1902年)。在邓嗣禹、费正清合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 年文献概览》(Teng, Ssu-Yu,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195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 197—205 页,载有这三份奏折的选译。注①弗兰克著第 48—52 页对 7 月 12 日的奏折有较详细的讨论。
- ⑥ 所引上谕,见《光绪朝东华录》第 4 册,总第 4771 页,及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54 第 35 页。“蓝本”一词见注④史远芹等著第 77 页。
- ⑦ 邓嗣禹、费正清合著《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 年文献研究指南》(Teng, Ssu-yu, and John K. Fairbank, *Research G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第 22 页注①。
- ⑧ 1043 年以来对科举批判的例子及 1895 年后的建议,见注①弗兰克著第 16—43 页。
- ⑨ 见上注第 45—46 页,及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 991—995 页。
- ⑩ 见第四章注⑩田正平、霍益萍著第 3—4 页。
- ⑪ 在 1866、1873、1879、1882、1891 及 1892 年,中国各类报告屡有出现日语的标准用词“学校”,这些报告见于第三章注⑩朱有璈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1—7 页。张之洞 1896 年 2 月 17 日的《选派学生出洋肄业折》,也使用了“学校”一词(同时也使用“学堂”),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43 第 10—13 页。梁启超于 1896 年 9 月 17、27 日在《时务报》(第 5、6 册)发表了《学校总论》。这样,中国便广泛认识“学校”一词,但在 1912 年前并未采用为标准用词。辛亥革命以后,仍有愿意使用“学堂”的。
- ⑫ 改革上谕中两次提及“人才”。
- ⑬ 见《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第 136 页,并见本书附录。
- ⑭ 同样地,直到 1905 年止,有关教育改革的官方政令及规定的数目,远远超

过其他,而且一直公开发布。收集最齐全的是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1898—1928)(上海,1928年);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1852—1922)(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及第五章注⑩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

- ⑮ 嘉纳治五郎著《列强的竞争》,载《国土》。引文见中村义著《嘉纳治五郎与杨度》第51页。
- ⑯ 引文见第三章注⑳细野浩二著第56页。三个月后,根津一把这一思想发挥为《清国教育谈》,载1901年10月25日《教育时论》。
- ⑰ 奏折全称是《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59第9页;参阅注①弗兰克著第50、52页。
- ⑱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52第28页。
- ⑲ 该上谕称:“选派学生……学成领有凭照回华……按其所学,分门考验。如果学有成效……咨送外务部覆加考验,据实奏请奖励。……自备旅资出洋游学者……如果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见《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第4720页。
- ⑳ 第四章注㉑容应莢著第50—51页,第58—59页,第65页;及第五章注㉒多贺编著1,第37—39页,《章程》影印本见该书第128—184页。
- ㉓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54第2—3页。(第一册,第935—936页)
- ㉔ 注①弗兰克著第54页。有关其后进展的研究,见第54—59页。
- ㉕ “新一代”一语见第三章注㉖贝斯著第129、182页;“国家官吏”一词,见同书第2、182、216、218页;“积极的新中央政府”,见同书第218页。
- ㉖ 第四章注㉗阿部洋著第41、62页。又见“留日学生等翻译日本有关学制的书籍(1898—1911年书目)”,载第三章注㉘朱有璩编著第二辑上册第26—27页,及第三章注㉙王晓秋著第387—397页。
- ㉚ 同上注第6页;及第五章注㉛苏云峰著第174页。
- ㉜ 第四章注㉝第6、11页。
- ㉞ 在第五章注㉟谭汝谦编著第290页注520、151;287页注520、127及291页注520、161,谭汝谦分别列表说明。《教育行政》已收入此编著,《胎内教育》及《教育史》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单行本。
- ㉟ 对罗振玉考察团的一般评论,见王晓秋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代



日本游记研究札记》，编入王著《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第231—233页。

- ⑳ 发表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陶模、夏偕复，他们的文章题目见第六章注㉑荫山雅博著第28页。
- ㉑ 同上注第27—28页；及“《教育世界》介绍日本教育法规目录（1901—1903）”，载第三章注㉒朱有焜编著第二辑上册第21—26页。
- ㉒ 有关罗振玉与藤田丰八的亲密工作关系和他们就《教育世界》的合作，见注㉓。
- ㉓ 有意义的是，在藤田丰八任职期间，这些译著都用作苏州的江苏两级师范学堂的教材。见阿部洋著《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第173—174页。
- ㉔ 见田正平、霍益萍著《游学日本热潮与清末教育》第6页；注㉕第27—32页。
- ㉕ 注㉕第28—29页。
- ㉖ 这些主要著作的书目见上注第29页。
- ㉗ 注㉕田、霍合著第6页。
- ㉘ 同上注第12页。
- ㉙ 这些看法见上注第12—12页。《初等教育章程》全文，见朱有焜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166—177页。
- ㉚ 见注㉕田、霍合著第11页。
- ㉛ 见注㉕第43页。吴参观的学校类别和校名，会晤的最重要人士的姓名及会晤日期，见注㉜容著第53—55页。
- ㉜ 见上注第56—58页。
- ㉝ 吴的图表和《奏定学堂章程》比较表，见上注第66—67页。
- ㉞ 注㉕田、霍合著第9页，列举了一些人的姓名和他们的情况。
- ㉟ 全信原文见罗惠民编《莫理循通信集》（Lo Hui-min,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vol. I: 1895-19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第225页。
- ㊱ 引自第四章注㊲阿部洋著第33—35页。
- ㊲ 见第四章注㊳弗兰克著第65页。
- ㊳ 见第四章注㊴阿部洋著《向日本贷入》第62页。
- ㊴ 见注㉕第35页。

- ④ 西方学者中,最极力坚持这一观点的莫过于约瑟夫·列文森,他乏味的文章强使读者相信“体用”的程式,只不过是“谬论”(第60页)和“庸俗化”(第65页)。见约瑟夫·R·列文森著《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理智的连续性问题》,第四章《体与用——“本体”与“作用”》(Chapter 4, “T’i and Yung-‘Substance’ and ‘Function’”, of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Continu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第49—78页。
- ⑤ 马里乌斯·詹森对后藤新平(1857—1929)于1900年4月官式考察福建省时言论的评述。见序言注②詹森著《日本人与孙逸仙》第100页。
- ⑥ 日本人并没有说“体用”,但至少有两种相同的表述:“和魂洋才”,和“东洋道德,西洋技术”。引自 Teruhisa Horio 著《现代日本的教育思想及思想意识:国家的权威与思想的自由》(Teruhisa Horio,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Modern Japan: State Authority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Steven Platzer, ed., and tr. (Tokyo, 1988))第28页。对“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富有洞察力的见解,见冈斗基著《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再评价》(Chinese ‘Principle’ and Western ‘Utility’: A Reassessment. in Min Tu-ki,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第58—64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中国运用的基本资料,喻本伐、熊贤君作了有用的探索,见其《中国教育发展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92—394页。
- ⑦ 注⑤邓与费正清编著第135页。
- ⑧ 引自上注第134页。
- ⑨ 仿效单独处理基督教的事例,见唐纳德·坚尼著《日本对欧洲的发现,1720—1830年》(Donald Keene, *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 1720-1830*, rev. 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及约翰·Z·包华士著《两者相遇:西方医学在日本的兴起》(John Z. Bowers, *When The Twain Meet: The Rise of Western Medicine in Japa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1600年后,日本对基督教的官方政策,见乔治·埃利森著《神的毁灭:近代日本初期基督教的形象》(George Elison, *Deus Destroyed: The Image of Christianity in Early Mordern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⑩ 该词语源自 J.A. 霍布森(J.A. Hobson),见第五章注⑩埃谢力克著第92、

93 页。

⑤ 引自《东亚同文会史》第 204 页。

⑥ 引自上注第 210 页。

⑦ 根津一同时信奉禅宗,又是日本渗透中国的积极推动者。本文无法顾及这两方面,留待日后分析。

⑧ 引自《东亚同文会史》第 326 页。

⑨ 引自上注第 325—326 页。

⑩ 此语出自《先进》篇第十一章末,孔子问四名学生的抱负,最后一名学生点(曾皙)在回答时,融合了道家对自然的赞美和儒家对社会和道德的迫切感,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着重点为作者所加)选择“咏归”为校名,是要表示创办者对中国古代教诲和文化的向往。

⑪ 有关宫岛大八及其学校的情况,见第五章注⑩六角恒广著第 204—210 页。

⑫ 《东亚同文会史》第 74 页。

⑬ 《光绪朝东华录》第 4 册第 4601、4602 页,又见本书附录。

⑭ 五种钦定学堂章程的全文,分载于第三章注⑩朱有珮编著第二辑七册各类学堂栏目内,又见多贺编著 I 第 128—148 页。

⑮ 每种章程的《全学纲领》,分别见上注朱编著第 559、374、163、157 页;又见多贺著第 146、157、166、178 页。

⑯ 有意义的是,1901 年的改革上谕便以“中国”一词指中国,见本书附录。

⑰ 见第三章注⑩朱有珮编著第二辑上册第 753 页;又见多贺编著 I 第 128 页。

⑱ 见第六章注④谭汝谦著第 63 页引蔡元培语。

⑲ “经学科”的内容又差不多全是儒学,见第三章注⑩ II、下,第 771—776 页;又见多贺编著 I 第 227—231 页。

⑳ 有关授课时数,见第五章注⑱多贺编著 I 第 43 页。

㉑ 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70 第 11 页(下册总第 1342 页)。引自第三章注⑲黄福庆著第 3—4 页(刘廷琛的职衔,黄注第三页为“署理陕西学政”,而在第 10 页注⑥,则是“署理陕西提学使”。按张德泽编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二次印刷)第 298 页,“光绪三

十二年(1906年)四月,政务处与学部会奏‘遵议裁撤学政,请设直省提学使司’……从此,原设学政者,一律改设提学使司”。刘廷琛是在1906年8日后才赴日考察,上奏奏折为1907年1月,故职衔应为“提学使”——译者注)。

- ⑳ 见第五章注⑱阿部洋著第65页。阿部洋另一相同的说法,见第四章注⑱第37页。吴汝纶在1902年访日期间,与著名哲学家井上哲次郎讨论东西文化与日本教育精神有关问题。井上认为,“敝邦教育以融合调和东西洋之思想为目的”,主张“东洋道德,西洋工技,合之始成。贤者当合并东西,陶熔一冶。”引自第三章注⑱王晓秋著第393页。
- ㉑ 见《教科书之发刊概况》第65页。同时,教育部肯定了晚清的学校章程,并正式采用日本词语的“学校”取代中国的“学堂”。在袁世凯统治的1913年和1915年,在课程中部分恢复了儒学和中国经典(第246、248页),1916年袁死后才取消(第249页)。
- ㉒ 这一论点的展开,见卡洛尔·格勒克著《日本的现代神话:明治晚期的意识形态》(Carol Gluck, *Japan's Modern Myths: Ideology in the Meiji Perio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㉓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57第14页。
- ㉔ 见第三章注⑱朱有璘编著第二辑上册第104页。
- ㉕ 英译《敕语》全文见注⑱第121页,书中对《敕语》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19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日本从自由主义的实验转向中央集权的保守主义的讨论,见第102—127页。
- ㉖ 有关中国人运用日本的《教育敕语》,作为教育及其他文化上的保守指导方针,见第四章注⑱第37—38页阿部洋简要的评述。
- ㉗ 详见第四章注⑱弗兰克著第59—71页。废除科举的上谕,见《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392页。
- ㉘ 引自第五章注⑱阿部洋著第17页。
- ㉙ 据郭廷以著《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载费正清编《剑桥中国史》第10卷:晚清史,1800—1911上册(Ting yee Kuo, “Self-Strengthening: The Pursuit of Western Technology”. in Fairbank, John 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第527、532、537页。

- ⑳ 干事长向东亚同文会 1905 年 12 月 23 日会员大会的报告,载《东亚同文会史》第 403 页。
- ㉑ 参阅第五章注㉑多贺秋五郎编著附文件表,多贺将有关文体按日期编排,并加简短说明。
- ㉒ 见第四章注㉒第 44—45 页,第五章注㉒阿部洋著第 65—66 页。
- ㉓ 见第六章注㉓林明德著第 211 页。林明德的“日本化”一词,仅指中国新学校所用教科书的内容。我扩展为指整个教育系统。
- ㉔ 同上注第 213 页。1922 年的阶段性,见朱有璘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说明,称“本书所选资料的年限,系从 1862 年京师同文馆成立起,到 1922 年壬戌学制公布止。”

日本人提议在日本军校训练中国人,建议由日本军官及教师在中国军校任教,对在1897至1898年以后开展合作的“黄金十年”是十分重要的。日本履行了它的承诺,通过武官和文官的帮助,为新的关系打下了实质性的基础。例如1899年3月8日,在福岛安正大佐抵达武昌前,张之洞便收到了日本赠送的差不多100本军事书籍的礼物。张的官员对此特别欢迎,似乎因为张的德国军事顾问及教习擅长于实地演习,反对筹备军事理论和战略的中文书籍<sup>①</sup>。

同样预示中日良好新关系的,是接受四名浙江军校学生作为第一个省级学生团体到日本留学,这是1898年6月的事。以如此节制的态度为开端,涌向日本的中国军校学生日渐增加,汇成令人难忘的洪流。其中重要的军事人物有蔡锷(1882—1916),孙传芳(1885—1935),阎锡山(1883—1960),李烈钧(1882—1946)和他们众多的高级助手。日本军校还培养了蒋介石,他在日本受训了差不多四年,到1911年才完成。蒋自己认为,他在日本的经历影响了他的思想和一生<sup>②</sup>。

略为浏览按出生年代排列的以上名单,自然会想

到 19 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一代中国军事“伟人”们，他们多是在日本受训的。1915 至 1916 年间以云南为基地的倒袁运动，也是由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们领导的<sup>③</sup>。还必须注意到，虽然云南受惠于日本军事教育，却从内心深处怀疑日本的意图和动机，和日本保持距离。<sup>④</sup>这虽然是仅有的例子，但这案例也足以减少过分简单化，认为在日本接受军事训练的，就必然与在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互相勾结。<sup>⑤</sup>

## 中国人在日本的军事训练

自 19 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叛乱”以来，中国便没有全国性的军事训练政策或方案，仅个别省份及地区首脑如李鸿章和张之洞，在获皇帝批准后，首先在其管辖地区建立军事学校。一直坚持这一道路的张之洞，在中日战争失败后的觉醒中，于 1896 年 2 月 2 日上奏朝廷，呼吁在全国建立军事学校，并特别指出应按照当时最优秀的德国模式。<sup>⑥</sup>这倒反而为中日军事合作清除道路，因为自 19 世纪 70 年代初期以来，日本便一直依照德国即普鲁士模式了。

在 1898 年浙江首次派军校学生赴日后，接着张之洞从湖北、湖南派出 24 人，北洋大臣及南洋大臣各派 20 人，浙江又多派 8 人。其后，中国各省差不多都派出军校学生了<sup>⑦</sup>。在 1903 年 12 月中国重新集中军务之前，各省的主动性是受到鼓励的。具有意义的是 1901 年 8 月 29 日谕令停罢武科，责令各省总督、巡抚在其管辖地区重组军队，设立武备学堂。<sup>⑧</sup>

1898 至 1903 年间，在日本军事当局授权下，成城学校<sup>⑨</sup>为中国学生开设军事预科教育，以便他们能考取士官学校——日本一流的中级陆军军官学校<sup>⑩</sup>。到 1903 年成城学校不再招新生时，已有 175 名中国人完成了最低限度的 16 个月军事课程。仅在 1902—1903 年度，成城学校不同班级的中国学生总计近 200 人，

其中官费生 115 人,自费生 77 人<sup>⑩</sup>。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 1903 年成立振武学校即武备学校<sup>⑪</sup>,专门初步培训中国军校留学生,由日中军事合作政策制订者之一福岛安正任校长。从 1903 年 7 月开办到 1914 年因缺乏学生而结束,估计有 1000 名中国人在振武学校受到严格训练,他们成绩优秀,受到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称赞。最显赫的是 1900 年至 1911 年间,690 名成城和振武的毕业生考入士官学校,其中 647 人完成了全部训练课程<sup>⑫</sup>。各级毕业生及专科毕业生人数见表三。拉尔夫·鲍威尔于 1955 年的估计是不大准确的,他说“到 1911 年,可能已有 800 名陆军军官曾在日本受训。由于他们不少是部队司令、参谋长或教官,他们的影响是很广的”<sup>⑬</sup>。

表三：士官学校的中国毕业生

154

班次	入校		学制	每班 人数	科目				
	年月	年月			步兵	骑兵	野炮	机械	后勤
1	1900.6	1901.11	1 年半	40	22	4	9	5	
2	1901.6	1902.11	1 年半	25	16	2	4	3	
3	1903.6	1904.11	1 年半	95	51	12	12	16	4
4	1906.6	1908.11	2 年	83	37	14	20	9	3
5	1907.1	1908.11	2 年	58	23	8	11	12	4
6	1907.6	1908.11	1 年半	199	111	23	40	17	8
7	1908.4	1910.5	2 年	55	28	10	12	5	
8	1909.6	1911.5	2 年	55	28	10	12	5	
9	1910.6	1911.11	1 年半	37	29	6	1	1	
合 计				647	345	89	121	73	19

资料来源：田久川著《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该校中国留学生》第 214 页。

振武学校第三中国班的学生蒋方震(1882—1938),成绩出众,



于1904年11月考全班第一名,使日本同学也为之惊叹。他和同班的蔡锷和张孝准,被称为“中国三杰”<sup>⑮</sup>。才华横溢的蒋没有成为军阀,而且在1911年后避开政治,“在日本军事理论家影响下”<sup>⑯</sup>,成为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和军史学家。蒋在军校的成绩使人惊讶,也使日本东道主感到为难,可能是由于日皇总在毕业典礼上为拔尖的学生颁赠神圣之剑。《中华民国人物大词典》谈到典礼时说,“日本军校领导由于中国人赢得最高荣誉而感到尴尬,因而把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分隔开来”<sup>⑰</sup>。

由于张之洞及其他官员的催促,也由于中国政府力图更严格地管理学生,清政府于1904年5月19日下令,必须严格地经由总督及巡抚个别推荐,并经由1903年12月成立的练兵处进一步审查考试,才能获准到日学习军事;未经政府批准的自费生,绝对禁止入读军校<sup>⑱</sup>。

禁止未经批准的学生学习军事,完全是中国人的主意,也说明对日本全无恶意。而且仅在几个月前,中国公使杨枢在1904年1月20日的奏折中就赞扬了日本的军事教育以“忠君爱国,顺服长官为主旨,并无侈言反对政府之弊”<sup>⑲</sup>。在学生们为政治目的而采取行动和政府的压制都在逐步升级的时候,这样的话语,自是为了取悦最高阶层。

## 在中国的日本军事教官、顾问 及日本军事模式

日本专家受中国官员聘请,在军事学堂及军医学堂、军械厂等附属机构扮演了短暂的、但却非常重要的角色。1903年2月4日浙江巡抚的奏折代表了这种见解,他极力赞同雇用日本教官,“现时日本军事之先进,已足以与欧洲并列。且两国同文,便于教学;薪酬支出,利于节省”<sup>⑳</sup>。

由于对这问题缺乏研究,因而任何讨论都只是尝试。学者们该感谢日本外务省的纪录,它记下了与中国签署了雇佣合约专家们的姓名、官阶、教育程度、薪酬和职务。

在张之洞辖下的湖北武昌,早在1899年便有一名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官员大原武庆,到湖北武备学堂,任职五年<sup>②</sup>。到1900年1月,又有五名军官到该校任教官<sup>③</sup>。1902至1903年间,其他日本军官陆续到达,使所有基础科目,步兵、骑兵、炮兵、士兵、后勤以至军医药物,日本专家按编制全部满员<sup>④</sup>。由于他们就任,张之洞得以把自1896年来奉行的德国模式,转换为日本常备军的模式<sup>⑤</sup>,也有助于1904至1905年全国正规化的军事改革。1905至1906年间,约有20名日本专家一下子涌到湖北,大多签署两至三年的合同<sup>⑥</sup>。西方报导注意到,在1904至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后,“日本对满清帝国的影响已明显地在扩张,尤其是军事方面”<sup>⑦</sup>,这是毫不奇怪的。据说到1906年,仅剩两名德国教官留在武汉了<sup>⑧</sup>。

从中国纪录看,日本教官是最好的、无与伦比的。陆军中佐铸方德藏(1864—1933)就是很适当的例子。他在武昌任炮兵专家和军事顾问,合约期为1902年2月1日至1904年2月7日,薪酬颇为可观,每月400两<sup>⑨</sup>。1904年3月20日,暂摄湖广总督端方朝廷建议授予铸方二等第三宝星,这一般是给高级官员的。端方列举了铸方优越的工作,证明他的破例建议完全得当:“再日本陆军炮兵中佐铸方德藏光绪二十八年经本任督臣张之洞延聘来鄂,充当军幕僚。遇有鄂省练兵应行咨问、筹划、考察之事,悉责其切实陈告,又因其学问优裕,聘为高等学堂教习<sup>⑩</sup>。两年以来遇有要事咨询,均能尽心擘画;教授各学堂兵法,亦能勤加指示。”<sup>⑪</sup>日本教官、顾问这样多方取胜,有助于解释拉尔夫·鲍威尔对1901至1903年中国“军事转型”期间,日本处于“支配地位”的概念<sup>⑫</sup>。

这一阶段的军事改革,受到发动现代教育改革的刘坤一、张之

洞 1901 年 7 月三道奏折的同样支持,7 月 20 日的奏折中提出一项措施,成立日本式的参谋本部,“其(参谋本部)章程请敕出使大臣李盛铎(1859—1937),向日本索取译寄,采择用之”<sup>④</sup>。

1901 年 11 月至 1907 年任直隶总督期间,袁世凯把北洋常备军或简称北洋军建成现代式的军队。史提芬·麦克金朗(Stephen Mackinnon)写道,“它的组织是经过周密思考的,是以日本现代军队为模式的”<sup>⑤</sup>。天津出版英语的《京津时报》周刊于 1902 年 3 月 1 日报道称,袁于近期已派送 55 名学生到成城学校接受军事训练<sup>⑥</sup>,并称袁已雇请 14 名日本教习到保定任教。日本的消息来源证实,保定在 1902 年任命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教习,大多是非军事方面的<sup>⑦</sup>。有关军事教习方面,上海的英语《华北先驱报》于 1902 年 1 月 15 日报导称,袁本已为北洋军雇请若干日本军事顾问,但在俄国抗议此举违反与李鸿章的协议之压力下,被迫放弃该项计划<sup>⑧</sup>。

且不说俄国的压力,在 1901 年 12 月至 1902 年 8 月之间,一名在义和团骚乱时表现杰出的日本少佐(后升将军)立花小一郎(1861—1929)和两名上尉,以高薪受聘于袁在保定的军政司,表面上是充当翻译。在 1903 年 6 月寺西秀武少佐(1870 年生)受任为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总教习之后,于 1905 至 1907 年间,至少有 12 名日本教习分别受雇于该校,另外还有 12 名受雇于陆军马医学堂及保定、天津的其他军事设施<sup>⑨</sup>。

1902 年 11 月天津开办北洋军医学堂,平贺精次郎(1866—1916)受任为总教习,同时兼任直隶省卫生顾问。其后十年内,平贺以其工作成绩获日、中两国皇帝嘉奖<sup>⑩</sup>。根据纪录,在平贺任职期间,还有 10 名日本人在平贺领导下在该校工作。1904 年初,天津成立督练处或督练所,作为北洋军的中央管理机构,取代保定的军政处,一名少佐和两名高薪的大尉,以及一些军阶较低的军官受聘为该处的“兵书翻译”等<sup>⑪</sup>。

拉尔夫·鲍威尔是一位绝无仅有的、根据当时中外文字资料，发现了日本在清末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原因的人士，他在1955年评论称：

“使用日本顾问还有特别有利之处。和大多数外国人相比，日本雇员更为愿意学习华语，雇用他们减少了语言障碍。日本官员愿意接受比西方官员较低的待遇，雇用他们可以减少开支，他们也较能适应中国的现实。日本军队是仿效德国的，把德国教官改为日本教官，在训练方法和技术方面都不需要太大的改变；而且日本人已颇为成功地说服了中国，说日本已经容纳了欧洲军队所有的优点，日本的军队系统是最适合亚洲人的。最后，改用日本顾问，表明了这样一种想法日益增长：东方人能与西方列强匹敌。由于1904至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这一想法更是无边无际地膨胀。总的结果是形成日本增强对中国内部事务影响的趋势。”<sup>④</sup>

H. S. 布鲁恩纳特(Brunnert)和 V. V. 赫格尔斯特朗(Hagelstrom)对新政末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详细论述了中国“原来的内部组织和这些组织的改革”，包括军事在内的“新建机构”。对多得使人头晕眼花的军事术语，他们发表评论称，“近来由于任命军衔，中国的印刷品(尤其是报纸)上，日本的术语越来越通行”。一连串陆、海军军阶的日本术语，其中部分成了日后中国军阶的标准用语了<sup>⑤</sup>。

## 中国军事史学家的观点

1988年10月，军事史学家鲍世修发表了简短而触目的文章，题为《日本对晚清军队改革的影响》，他列举了六点理由，说明日本在新政年间对中国军事改革具有“卓越性”的影响<sup>⑥</sup>。第一，日本的军事编制和操法，是中国新型军队的蓝本。鲍说的是1905年1

月初颁布的军事改革。拉尔夫·鲍威尔曾对此写道，“1904年夏天，练兵处草拟了一份冗长而详细的军队重组及现代化的计划，9月12日朝廷批准了练兵处的报告。它包括了现代军事史的两项最重要内容：一是提出建制表、军饷等级，和建立陆军的总政策，陆军将成为中国主要的军事力量；二是提出建立军事学堂等级制的计划”<sup>④</sup>。关于军校，鲍威尔认为“和军官训练系统一样，都是按日本模式的”<sup>⑤</sup>。我们需要知道哪些人在练兵处工作，特别是谁草拟这些奏章，还需要进一步把中国新的军事组织和日本的系统地比较，但鲍世修只是提到1905年的中国体系“是仿效日本军事组织蓝图的”。他还说，“从这时开始，军队操练也从德国制转为日本制了”<sup>⑥</sup>。

第二，大量雇用了日本顾问和教习在各军事学堂、学院任职。到1902年，张之洞和袁世凯的一些军事学校，已经有意识地、直率地模仿日本士官学校等军事学院，或更高水平的户山学校。在这方面，袁世凯曾表示，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日本的解决办法比西方办法“更为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sup>⑦</sup>。

第三，大量派出学生到日本受训，派遣高级军官组团进行调查。鲍提到日本在1911年前协助训练中国海军军官，这是甚少人提及的<sup>⑧</sup>。

第四，经翻译日文版本，把西方军事经典著作介绍到中国。鲍的主要例子是1911年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的《战争论》译本<sup>⑨</sup>。出版的时间太晚了，但对本文讨论却是密切相关的。

第五，在受雇于中国的日本人指导下，军事理论发展为独立的科目。鲍具体提到四名日本人的姓名，简述了他们的著作及教职，充分赞扬了他们把中国军事理论提到新的高度<sup>⑩</sup>。

最后，中国直接借用了日本的军事术语，鲍认定像师、旅这些标准术语，都是在军事改组期间从日本拿过来的。他进一步把这

些术语和原先中国使用的术语相对照,并指出,“这些术语大多数今天仍在继续使用”<sup>④</sup>。

在晚清时期,中国在军事现代化方面受到日本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是否需要谈及中国军事的“日本化”,如同谈及中国教育方面的日本化呢?

### 注 释

- ① 见第五章注<sup>⑤</sup>苏云峰著第115—116页。
- ② 见张宝树著《蒋介石与日本(上)》,载《亚太展望》(台北,1986年10月)。
- ③ 唐纳德·S·塞顿著《各省黠武主义和中国人的民国:云南军,1905—1925》(Donald S. Sutton,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Yunnan Army, 1905-192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 在1903至1905年间,40名云南中国人被派送日本接受军事教育,其中30人是1904年一年内派出的。(第14页)书中列举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职业。
- ④ 欧内斯特·杨著《民国初期日本人对中国领袖的帮助》,载入江昭编《在政治及文化交流中的中日文著》(Ernest P. Young, *Chinese Leaders and Japanese Aid in the Early Republic*, in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第133—134页,对此有简短而颇饶兴趣的讨论。
- ⑤ 在中国的日本军事顾问,他们分属不同的方面,而且在努力为推进他们中国领袖的事业时彼此竞争。其结果使日本的处境处于“死结”。这是专家北冈伸一在《中国军队中的专家》书中的观点。(Kitaoka Shin'ichi, “China Experts in the Army”, in Peter Duus,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60, 366-367。
- ⑥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41第8—9页,又见第三章注<sup>⑦</sup>鲍威尔著第67页。有关建立在中国新的军事学校受训的新型军队、及建立的背景,见同书第51—89页。

- ⑦ 见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第33—34页,第136—138页。
- ⑧ 见第三章注⑩朱编著第152页,又见序言注⑤Cameron著第89页,及第三章注⑦鲍威尔著第133—134页。到1903年12月,在袁世凯要求下,成立了全国练兵处,才改变了军事现代化的分散政策,至少在纸面上如此。见导言注③麦金朗著第73页,及第三章注⑦鲍威尔著第166—169页。
- ⑨ 对成城学校作最详细的学术探讨,见中村孝志著《成城学校与中国留学生》。
- ⑩ 有关士官学校,见田久川著《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该校中国留学生》,载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中日关系史论丛》第205—214页,及小林共明著《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中国留学生》(Hitori Kara 6:62—75, Nov. 1985)。
- ⑪ 见注⑦第36—37页、第42页。1900至1903年每年毕业人数,见同书第36页表1。同书第42页列有极其有用的统计表,表中分列官费及自费学生,及学生的来源。
- ⑫ 对振武学校权威性的研究,是小林共明著《振武学校与留日清国陆军学生》,载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现代史论集: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85年)。
- ⑬ 入学人数数据注⑦第39页。毕业生647人,系据注⑩第214页田久川所列的更为详细的统计表,少于黄福庆所列673人。
- ⑭ 见第三章注⑦鲍威尔著第291页。
- ⑮ 第四章注⑭李喜所著第205页。蔡锷毕业时,于同班骑兵科名列第三。见注③第81页。
- ⑯ 第四章注⑭李喜所著第205—206页。
- ⑰ 见第五章注⑭ I,第313页。这饶有兴趣的说法并无其他资料佐证。蒋入读及毕业于士官学校的实际日期,比波文说的早一年。
- ⑱ 见注⑦第41—43页。
- ⑲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8第8—9页。引自注⑦第34—35页。
- ⑳ 引自鲍世修著《日本对中国晚清军队改革的影响》(1988年10月25至28日于北京召开的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论文)。
- ㉑ 有关大原武庆,见第五章注⑰ III,第140—141页。
- ㉒ 他们的姓名,授课科目,军阶,月薪及受聘日期,见第五章注⑲第248—249

页,苏云峰的主要资料之一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统计,该统计全文见第三章注⑩南里知树编著附录 1,第 25—28 页。但苏的资料参照了中国的记录。

⑬ 见第五章注②第 249 页的数字。

⑭ 同上注第 240—256 页中,处处可见有关论述。

⑮ 见上注第 249—250 页。在武汉及其他各地军事设施工作的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生的名单,见《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第 410 页。但在苏云峰的名单上,仅有其中一人。

⑯ 见第三章注⑦鲍威尔著第 191 页对各种西方报导的综述。

⑰ 同上注第 191 页,由于第五章注②苏云峰著第 248—250 页有关 1906 年的名单上并无德国人,故不知道两名德国人情况。

⑱ 关于铸方的正式职务,合约期限及薪金,按第五章注②第 249 页的记载。

⑲ 1898 至 1912 年间,湖北省成立的军事学校及成立日期,见上注第 251 页附表。

⑳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68 第 10 页(下册总第 1304 页)。

㉑ 分见第三章注⑦鲍威尔著第 162、165 页。

㉒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54 第 9 页,该建议并未实行;又见第三章注⑦鲍威尔著第 132 页。

㉓ 见导言注③麦克金朗著第 135 页,又见第 97 页。

㉔ 引自上注第 94 页。这 55 人实际已入读成城学校,见注⑦第 42 页表 3。

㉕ 见第三章注⑩南里知树编著附录 I,第 16—17 页。

㉖ 见序言注⑤卡梅伦著第 90 页。

㉗ 见第三章注⑩南里知树编著附录 I,第 16—19 页。

㉘ 《对支回顾录》II,第 943—944 页。

㉙ 见第三章注⑩南里知树编著附录 I 第 12—16 页。

㉚ 见第三章注⑦鲍威尔著第 162 页。有关各点,见同书第 152、158、160 页,第 161—162 页。

㉛ 见序言注⑤伯鲁纳特与哈格尔史特朗著第 293 页,第 293—294 页及《前言》。

㉜ 见注②第 2 页,该论文长仅 8 页。

㉝ 第三章注⑦鲍威尔著第 172 页。



④ 同上注第 172 页。

⑤ 见注②第 2 页。

⑥ 同上注第 2—3 页。

⑦ 同上注第 5 页。

⑧ 同上注第 5—6 页。

⑨ 同上注第 6—7 页。

⑩ 同上注第 7 页。及见第六章注⑩高名凯、刘正琰著第 130 页军事外来语简表。在这简表及伯鲁纳特与哈格尔史特朗的著作中,都没有“师”和“旅”,建议对此两词需作进一步研究。

警察和监狱系统在机能上是截然不同的,而在新政改革中却又常常联系在一起,为方便起见,本章一并研究。

### 中国新的警察系统

中国人是从外国租界的“巡捕”开始知道现代警察系统的<sup>①</sup>。在 1897—1898 年,湖南省首先采取措施,把腐败的保甲连坐制改作称为“巡捕”的警察系统,成为著名的改革运动的一部分。指导湖南的计划,是由曾驻日、美,经验丰富的外交官黄遵宪起草的,他的计划是把国外和上海的办法要点结合起来,并加以改革<sup>②</sup>。历史学家王家俭坦然表示,“最先把现代西方警察系统介绍到中国的”是黄遵宪<sup>③</sup>。丹尼尔·贝斯也说,“这是(张之洞)企图把湖南 1898 年改革失败中挽救出来的一项制度,也是他在 1900 年后在武昌实行的制度”<sup>④</sup>。与此同时,上海道台蔡钧鉴在 1898 年把东京一个警察管区的警长永谷隆忠带到上海,帮助把城市保甲制度改为现代警察系统,由于蔡在百日维新中去职,他的努力也因而失败<sup>⑤</sup>。康有为同样于 1898 年

在其总的改革建议中,提出建立“巡捕”<sup>⑥</sup>。

163 在1900年前,在朝廷的思想中,对警察问题似乎并不想采取什么措施,既不提倡,也不推广经验。只是义和团的惨败,特别是联军占领北京后,外国警察辅助部队迅速而有效地恢复秩序,使高层人士思想有所转变。像庆亲王和肃亲王(善耆,1866—1922)等宗室高官,对在外国占领北京期间警察保护皇室财产的印象甚深,这样,他们便为了自己而采取步骤,实行现代警察制度<sup>⑦</sup>。就全中国而言,其他地方是到1901年1月新政改革上谕颁布后,才奏请实行现代警察制度。

张謇是最先促请迈出这一步的一员。这位迅速上升的改革明星,拥有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进士学衔,1895年受中国战败的刺激,决心走在政府前面,在长江沿岸、上海西北面南通、他的家乡兴办私人企业报国<sup>⑧</sup>。在2月4日至20日,他以惊人的努力写出《变法平议》呈送刘坤一,刘又转奏皇帝<sup>⑨</sup>。文章洋洋洒洒,广征博引,传诵一时。其中把警务列为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建议中国各府、各县、各区、各市都应建立警察局——他使用了日本的术语,“警察”——和警察学堂,并推荐各类日本警察章程作为教科书<sup>⑩</sup>。

## 警察的职能

163 刘坤一和张之洞在张謇协助下,在他们三道奏折的第二折中,也鼓吹现代警察制度。在剖析中国民防体制最突出的缺点后,指出“日本名为警察,其头目名为警察长,而统之以警察部。其章程用意,大要以安民防患为主,与保甲局及营兵堆卡略同。然警察系出于学堂,故章程甚严,而用意甚厚。凡一切查户口、清道路、防火患、别良莠、诘盗贼,皆此警察局为之”<sup>⑪</sup>。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现代警务完全承担了一切五花八门的职能<sup>⑫</sup>。大卫·史特兰特对20世纪最初数十年城市警务的情况,作了真实的描述:

(北京)新的警力不但受权逮捕,而且可以对不大严重的民事及刑事案件作出裁决,可以处以罚款或短期监禁……此外还得调解纠纷,管理交通,扑灭罪行,规范经济、文化及政治活动……警察监管饮食卫生标准,保证按时清洁公厕,发给医生开业许可证,监管停放寺庙等待运回故乡的棺柩,防止随意倾倒有毒或有污染的废物,检查公共娱乐场所及政治言论,监管受命管理控制最贫穷市民的各种各样机构,包括赈粥厂、私塾、学校及教导所。悉尼·甘保尔是最早研究民国期间北京社会的西方学生,他在研究后认为,警察“承担了(政府)城市工作的大部分责任,差不多触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sup>⑭</sup>。

对于袁世凯的直隶省,史蒂芬·麦克金朗认为,“就像在城市一样,农村警察的责任也极端广泛,除调查人口、收集情报、保卫生命财产、拘押及起诉小偷小摸罪犯、维护公众道德外,还得兼任消防员”<sup>⑮</sup>。

这大多是依据日本模式的。王家俭在论述 1901 至 1916 年间新的中国警察系统、长达 65 页的文章得出结论,“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在清末民初期间,中国警务受日本巨大的影响。派遣中国学生到日接受警务训练,雇请日本教官并采用日本的警察规条和法律,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做的”<sup>⑯</sup>。

164

## 在日本受训的警察

派遣学生到日本接受警务训练,是王家俭经常提及、却从未系统地研究的题目。他说张之洞于 1902 年 7 月派了 20 名学生到宏文学院学习为期一年的特别警务课程,1905 年又派出 97 人,这一批于一年后转到警察学校<sup>⑰</sup>,于 1907 年 9 月返回中国。袁世凯在 1902 年 12 月派出的 27 名学生也是到宏文书院学习警务课程<sup>⑱</sup>,江苏、福建、安徽和广西也同样派学生到日本接受警务训练<sup>⑲</sup>。

(必须指出,到了1904年,由于中国到日本接受警务训练的需求大增,宏文学院开设了两所分校,专门接待中国学生。两所分校的教学和管理都是专业化的,是委托东京警视厅主办的<sup>⑩</sup>。)王提到为本省新的警力而招募学生到日本受训的有江苏、湖北、湖南和四川<sup>⑪</sup>。

## 在中国训练的警察：川岛浪速和北京警务学堂,1901—1912

1901年,庆亲王在义和团“骚乱”后负责北京治安工作,他和川岛浪速签订合约,继续担任警务行政及警察训练工作。川岛能说华语,早就和庆亲王相熟,并得庆亲王信任<sup>⑫</sup>,而且在1900年8月便已担任此项工作,问题是川岛原来在军事警务衙门工作,把警务衙门改变并易名为警务厅即北京警察总部,川岛便可继续完成他的训练中国警官的任务。

165 川岛当年虽然只有36岁,但能力绝不亚于任何“支那通”,1882年当他17岁时,已在东京外国语学校支那语科修读,由于该校于1885年彻底改组,按期应在1886年毕业的川岛不得不提前退学<sup>⑬</sup>,在福岛安正资助下,到了中国。福岛出身于信浓(今长野县)松本藩的武士家庭,本身也是该藩的武士。他给同乡的川岛的任务,是报告中国的沿海防务,他以天生侦探的本能完成了这一工作<sup>⑭</sup>。

1889年川岛因病返日,在1894至1895年战争中,又被动员到中国担任军队翻译。战争结束后,他和其他有着中国背景的人一样,被派到日本的新殖民地台湾。他从1896年开始监督强制禁止鸦片,工作中获得重要的实际警务经验。1897年辞职返回东京,马上受聘为士官学校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华语教师<sup>⑮</sup>。估计他在这段时间把东条英教(1855—1913)编纂的文集译成中文,

这就是 1898 年在杭州出版的《日本陆军大学校论略》<sup>⑤</sup>。

在义和团“骚动”时，日本派遣军司令官福岛安正一再要求川岛担任军队译员。川岛当时 35 岁，正值壮年<sup>⑥</sup>，1900 年 6 月 26 日到达中国，8 月在北京日本占领地区训练中国人，协助日本官员处理警务。福岛对川岛的表现印象甚佳，又面对裁减军事人员，于是推荐川岛担任军事警务衙门的多项职务，川岛处理一切任务无不极为熟练。最重要的是，他从 1900 年 10 月到 1901 年 1 月，安排了一个警务速成训练课程，40 名有文化的中国人参加，接着又训练了 50 人<sup>⑦</sup>。到了 4 月，川岛说服福岛和日本师的指挥官，资助成立警务教育所，在中国军队配合下挑选 340 多名学员受训，希望警务能从联军转回中国人手上<sup>⑧</sup>。 167

这时正值庆亲王负责对外事务，谈判解决义和团问题及治安问题，并着手安排把权力从日本及其他七国转回到中国人手上，他以警务厅的名义把军事警务衙门保存下来，让川岛担任有实无衔的厅长，并按日本模式组织，每个部门都让日本人当第一把手。在这个帝国的核心，警务职权突然控制在日本人手上，这使德、法、俄代表们暴跳如雷，迫使庆亲王于 8 月解除上任仅只两个月的川岛的职务。庆亲王为给川岛补偿，和他签了为期五年的合约，任命他当北京警务学堂校长，从 8 月生效。这学堂是川岛曾协助筹划及组织的<sup>⑨</sup>。

北京位于直隶省的腹地，属顺天府而不是直隶省管辖<sup>⑩</sup>。警务改革，总是某地开展后便很快辐射到其他地方。袁世凯于 1901 年 11 月受任直隶总督，直隶警务改革的功劳也应主要归于袁世凯。他上任后最迫切的工作，就是从外国占领军手中收回天津，这在 1902 年 8 月 15 日完成了<sup>⑪</sup>。在此之前，袁的总督府在保定，这也是直隶总督传统的驻地，这就是为什么袁任直隶总督时，许多改革总是保定先走一步的缘故。

## 在袁世凯管治下，直隶省的警务改革

也许袁世凯对他的军队改革有着最美好的回忆，他控制的北洋军在1912年首先将他送上最高权力的宝座，当上新任的民国总统；又在1916年后军阀混战中，给他的军事门徒送上权力。但在警务方面，袁同样是出色的，的确，现代警察力量，对于他收回天津是必不可少的。

168 为了收回天津，袁需要有足够的权力在全省维护法律和秩序，保障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从保定到天津，袁在警务方面的得力助手都是赵秉钧(1859—1914)。赵在北京和北京附近镇压义和团分子中，便受到河南同乡袁世凯的重视。他在保定任巡警局总办，建立了警察力量，使他赢得正直能干的美誉，1902年中建立的保定巡警学堂，更有助于他的成功。

保定巡警学堂很像是北京警务学堂的附属机构，川岛浪速在开始时也确曾协助。例如他曾批准警务学堂一位高级教官镰田弥助转到新的警校；袁通过川岛，才能以高薪聘请到东京警视厅的“警视”(警察监督)三浦喜伝出任警务顾问和保定巡警学堂的总教习<sup>②</sup>。随后三浦和袁世凯、赵秉钧一道去了天津，任著名的天津巡警学堂的筹划者和总教习，该校于1904年扩展为北洋高等巡警学堂<sup>③</sup>。天津警校还有9名日本人在三浦领导下工作，他们大多和三浦一样，是签订无期限合约的<sup>④</sup>。史蒂芬·麦克金朗以这些材料为基础，经细心研究直隶省的警务改革后，认为袁在担任总督后期已经建成了现代警察力量，并形成“真正立足地方的运动，并迅速扩展到全省”<sup>⑤</sup>。

王家俭认识到直隶在警务改革方面的重要性，说1902年10月的《直隶警务章程》已由朝廷颁令转发，作为全国范本<sup>⑥</sup>。他进一步指出，北京极其重视警务改革，“坚定地决意”推行<sup>⑦</sup>。“朝廷

的积极态度和计划推动(警务改革),对警务发展有极大的帮助”<sup>⑧</sup>。王还同意其他一些人的看法,例如梅里贝夫·卡梅伦(Meribeth Cameron)说的,“西方的、或者更恰当地说日本模式的警察力量,最终方便了袁世凯在直隶树立榜样,而各省也受命组织这样一批人”<sup>⑨</sup>。史蒂芬·麦克金朗断定,直隶在袁领导下,成为“警务改革的领先省份”,成为“全国典范”<sup>⑩</sup>。

## 有名有实

尽管王提出了自己的论证,他最后的论断却是“只不过像其他由上而下的晚清新政改革一样,一切都只是有名无实”<sup>⑪</sup>。王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谈到即使按照袁世凯的命令,在1905年10月10日成立了全国性的巡警部,企图使全国警政标准化<sup>⑫</sup>,但各省行动依然缺乏一致性时,王找到了论据。不过他未能按照自己的思路,证明名义上的改革何以产生持久的影响,即如在川岛浪速指导下的直隶省警务改革<sup>⑬</sup>,和北京警务学堂<sup>⑭</sup>。王一定是弄错了。

“有名无实”是中国惯用的成语,用以否定政府毫无意义的纸面声明,这些东西在文献纪录中是随处可见的,学者对此自当保持警觉。但这样的批评要能经受历史的检查,就要证明这声明并未实行或生效,即如软弱无力地倡议后,实际上又退到原封不动。

“有名无实”不适用于新政改革,包括警务改革。在认真检查下,可能发现个别改革摇晃不定,踌躇不前,但无论如何,在1911年革命后,一切都被确认了,这证明当时立法的实际作用。这绝不是要回到过去建立的道路,而是从新政的基础上,朝不同的方向前进。对中国来说,它们是“有名有实”的,或者说是兼有形式和实质的。



## “组织性移植”对比研究的必要性

关于警务问题,需要进一步系统研究,并特别注意日本警察系统如何移植,及如何适应中国的情况。这过程不同于简单的技术或文化转移,涉及 D·埃莉诺·韦斯特尼(D.Eleanor Westney)称之为“组织性移植”<sup>④</sup>,或在她以后研究中称为“组织模仿”<sup>⑤</sup>。韦斯特尼把这些词语用之于现代警察制度,特别是如何把巴黎城市警察制度移植到东京警视厅。她的著作直接与本研究有关,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成熟的模式。

韦斯特尼最早的研究是她 1982 年的文章,《日本明治年代对西方组织的模仿:巴黎城市警察与警视厅的案例》,她在文章中逐步地检核了日本为其现代警察系统所作的抉择,它模仿原来的模式,又离开了模式。最后,她在《四十年以后:1914 年的对比》一文中,对警视厅的评价是“组织发展的案例”。她认真反复研究了原有的资料后,于 1987 年写成了《模仿与创新:西方组织模式对明治日本的移植》。这本书为研究其他机构有计划地模仿、创新,指出了方向。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工作或可称之为“模仿与创新:日本组织模式对中国晚清的移植”。不幸的是,这样的研究是行不通的。在中国,机构和组织的主要内容是从日本搬过来的,这些机构虽然存在,但在政治和社会骚乱中,它们难以熟练地运作,造成纪录分散及遗失。而韦斯特尼研究的日本机构(警察、邮政、及新闻界),在相对稳定和有秩序的环境中,得以日渐成熟,文件纪录也得以保存。

有趣的是,在新政年间,中国人对移植的态度——深思熟虑,老于世故,却又匆匆忙忙——,和明治日本的模式没有不同,为韦斯特尼有关日本“为选择而研究”、“选定模式”的论述<sup>⑥</sup>,提供了对照。然而,韦斯特尼在《建造新系统》和《超越模式:19 世纪 80 年

代中期的改革》等著作的丰富材料中<sup>④</sup>，却没有明确的中国对照例子。帝制崩溃后的中国，在不安定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允许体制转换后能稳定地成熟，像明治日本那样令人印象深刻。这不幸的事实，排除了认真精细地作对比研究的可能性。

## 北京警务学堂与对比性研究

对以上论述，北京警务学堂由于仍有第一手原始资料，可能是个例外。该校成立于1901年年中，是1949年解放前中国杰出的警察学校。如上所述，1912年前由川岛浪速当校长，在这段期间，该校曾有两个名称，从1901年7月到1906年8月，它就叫警务学堂。在那段时期，用王家俭的话说，学校“由外国人管理”，“中国丧失了主权”<sup>⑤</sup>。或者按川岛的解释，“是我一个人监督警务学堂……警察教师和军事教习，大多数是我随意聘用的”<sup>⑥</sup>。

弘谷多吉夫把注意力集中于事情的重要部份。川岛浪速于1901年接受了罕有的五年合约（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份五年合约），担任“监督”这最高职务（这又是我知道的中国主要机构中，唯一由外国人担任的“督督”）。当他第一份合约即将期满时，中国已进入“对日本日益警戒”和“收回权利运动”的时期<sup>⑦</sup>，加上其他原因，中国仿效日本的做法，把学校交由新成立的内务部直接管理，并更改校名，这就开始了川岛年代的第二阶段。与此相关的变动是，决定把日本教师和中国教师的比例倒转过来，把日本教师减去一半以上，从十人减为三至四人，而中国教师则由三至四人增为十人<sup>⑧</sup>。

川岛在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已经利用学校作为反俄政治宣传的基地，并作为要打蒙古主意的日本冒险家的集合场所<sup>⑨</sup>。即使清朝当局知道这些颇有问题的活动，他们也会置之不顾而为川岛重订另一个五年合约的。他们把川岛的薪酬大大地提

172

高一半,由每月400银元增为600银元,还加上每月60银元的额外住房津贴。他的正式职衔和职责保持不变<sup>④</sup>。

从1906年8月至1912年10月,学校改称为京师高等巡警学堂<sup>⑤</sup>,在民国时期的1912年又改名为警察学校,采用了日本术语的“警察”和“学校”,使校名与日本的警察学校完全相同<sup>⑥</sup>。在川岛浪速任职的11年内,到1912年10月止,共有1600多名警官在该校毕业,王家俭称之为“卓越的贡献”<sup>⑦</sup>。

这警校于1914年12月曾一度短期关闭,1915年7月至1916年12月再开办,期内又有344名警官毕业。1917年9月又再开办,直至1928年北伐战争。在此期间,该校并入内政部,称为内政部警官高级学校。王家俭写道,“该校大量的毕业生成为日后全国高级警务人员的骨干”,这证实了该校的重要性在延续,也证实了进行对比研究是可行的<sup>⑧</sup>。

## 中国新的监狱制度

“狭隘污秽,凌虐多端”<sup>⑨</sup>,这些话描述了中国监狱在这世纪之交的情况,也说明大量的判案不为高级官员所知。但在刘坤一和张之洞1901年7月19日的第二道奏折中,仍以《恤刑狱》的副题列出详细资料<sup>⑩</sup>,促请朝廷注意监狱改革的迫切需要。在玛里诺斯·梅杰(Marinus Meijer)对现代中国刑法的论著中,已把奏折的全部论点译成英文<sup>⑪</sup>。

刘和张不是最先鼓吹监狱改革的,把监狱改革和警务改革结合在一起的也不只是他们。在1897至1898年,作为警务工作的一个方面,黄遵宪成立了称为“迁善所”的教养院。这机构具有开导功能,不只拘禁犯人,使犯人恢复正常生活,而且为游民和流浪者提供手工艺技能的训练<sup>⑫</sup>。在刘、张奏折中同时提到“迁善所”和“改过所”(教养院的别称),赞扬其工作目的<sup>⑬</sup>。“迁善所”的思路

是一种建设性的改变,把“工艺房”和监狱联系在一起,使犯人能在狱中学到一门手艺,发挥他们良好的一面<sup>64</sup>。

赵尔巽于暂署山西巡抚期间,在1902年12月12日奏请监狱改革,有着实际效用和重要影响。梅佐在论刑法时,认为赵的奏折十分重要,全部译成英文,并在结尾部分加上副题:《为各省罪犯建立习艺所》<sup>65</sup>。赵的奏折有两点值得注意,并已成为中国著名的监狱制度的特征:第一是赵使用了,可能是首先使用“习艺所”一词(全称是“罪犯习艺所”)表述教养院<sup>66</sup>;其次是赵提出广泛地以监狱劳役取代流放。1903年4月29日获朝廷批准后,刑部便把部分流放废除<sup>67</sup>。

## 直隶一例

按学术界一致的看法,直隶的监狱改革发展最全面,该省新的警察制度发展也是最全面的。直隶把警务和监狱改革两者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史蒂芬·麦克金朗一口气指出,“在1902至1904年的最初阶段,袁和赵秉钧实际以天津、保定为中心,训练了大批警察,建立了警察学堂、模范监狱和习艺所”<sup>68</sup>。还应提及的是,赵擢升很快,1905年全国巡警部成立时,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的赵秉钧,受任为该部右侍郎,兼任天津巡警局总办<sup>69</sup>。

作为天津警察的最高领导,赵秉钧参与了直隶省早期监狱的筹划和建设,但他却不是主要执行者,这是天津府知府凌福彭的光荣。1903年4月29日,袁世凯奏报建立“罪犯习艺所”,这正是赵尔巽于1902年奏折中对教养院所用的词。同时,袁派凌福彭到日本考察东京、大阪等五个城市的监狱设施。凌按考察结果,于1904年7月开设天津习艺所。在刚好一年之后,保定习艺所于1905年7月开设<sup>70</sup>。前东京警视、曾一度任保定巡警学堂总教习的村田宜宽,担任两所或其中一所的监督<sup>71</sup>。

1905年,凌等人又受命到日本调查监狱法规、设施、训练方法和经费等。根据这次调查结果,赵秉钧、凌福彭和同事们提出了四项改革意见:“(一)应分已决、未决、拘置等监;(二)培养狱官人才;(三)改良监狱设备;(四)宜广设习艺所、工厂、教诲室、自新监等,注重感化教育。”<sup>②</sup>

## 国家级的改革和小河滋次郎博士

175 1905年4月20日,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1842—1922)奏请在各省成立罪犯习艺所,由于经费及人才缺乏,两年后只有直隶、河南、山东及云南建立<sup>③</sup>。更具意义的是,10月15日,修订法律馆伍廷芳等大臣呈奏了精练而具深远启示性的奏折,奏称:“是以自上年四月开馆以来,自德、法、日、俄各国刑律,均经陆续译齐。并以英、美两国向无刑法专书,大半散见他籍,亦经依次搜讨,编译成书。惟立邦之法制,虽知其大凡;而刑政之执行,尤资于试验。考查日本改律之始,屡遣人分赴法、英、德诸邦,采取西欧法界精理,输入东瀛。然后荟萃众长,编成全典。举凡诉讼之法,裁判之方,与夫之监狱规则刑制,莫不灿然大备……我国与日本相距甚近,同洲同文,取资尤易为力,亟应遴派专员前往调查,藉得与彼都人士接洽研求。至诉讼裁判之法,必亲赴其法衙狱舍,细心参考,方能穷其底蕴;将来新律告成,办理乃有把握。然非得有学有识、通达中外之员,不能胜任。兹查有刑部候补郎中董康(1867—1947)、刑部候补主事王守恂、麦秩严通敏实质,平日娴习中律,兼及外国政法之书,均能确有所心得。拟请派令该员等前赴日本,调查法制刑政……借助他山,事半功倍。”<sup>④</sup>

董、王、麦三人因而组成官方代表团,赴日调查刑法及司法各方面情况,包括日本修订后颁布的本国新刑法。在归国途中,代表团高级成员董康写了两本著作,一本写参观日本法庭,一本写参观

日本监狱。后者由沈家本作序称：“小河滋次郎为日本监狱家之巨擘，本其生平所学，为我国忠告。”<sup>④</sup>

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法政大学中国学生的讲师，日本研究监狱学的先驱，的确是监狱学的权威，是日本明治期间到处受欢迎的显著人物之一。他在东京专门学校毕业后到德国留学，1886年返日后在内务省工作，其后转到司法省，1891年任监狱课课长。根据人物辞典，他在1895至1898年间周游欧洲及美国，“调查监狱情况”<sup>⑤</sup>，1906年获东京帝国大学授予法律博士学位。1905至1907年间，他的权威性著作《监狱学》的两种不同中文译本先后出版<sup>⑥</sup>，中国大众也开始对他有所认识。董康的代表团访日时，也正值小河滋次郎的全盛期。从他的著作，从他对法政大学中国学生的授课，和他对董康代表团的帮助中，清政府对他有所了解，并作出了最明智的选择，聘请他担任监狱事务的顾问。小河就是以这样的资历，于1908年5月至1910年间<sup>⑦</sup>，在晚清监狱改革上成为无可争辩的最重要的人物。

176

邀请小河博士到北京的是沈家本，小河的月薪高达800银元<sup>⑧</sup>，给他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协助沈家本努力改善中国监狱<sup>⑨</sup>；把监狱学列入法律学堂（1905年底成立）<sup>⑩</sup>的课程；协助具体策划沈家本雄心勃勃的“模范监狱”的体制，这是沈在1907年6月11日已经奏明，并明确以东京巢鸭监狱作为样本的<sup>⑪</sup>。模范监狱不是要取代“习艺所”，而是用以囚禁经中国新法庭判决的较危险的罪犯<sup>⑫</sup>。

按小河自己的想法，他主要工作是为中国监狱系统草拟新的法律。他起草的《大清监狱律》完稿后上送审查，于1910年正式颁布。小河当时写道，这部法律颁布前“作了多少变更”，“但在原则及组织方面，大体上是按照我的文本的”<sup>⑬</sup>。小河又是依据1907年3月28日日本修订的监狱法而草拟的<sup>⑭</sup>。在1911年后，中国在1913、1928和1946年都颁布了新的监狱法。据法律学者岛田

正郎研究,这些后来的监狱法和小河草拟的没有多大的偏离<sup>⑧</sup>。

177 小河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为中国设计模范监狱的蓝图。1907年,法部新设典狱司,专掌狱政,由留学日本警监学校的田叶任郎中(司长)。1908年5月,法部建议兴建模范监狱,1909年3月31日,法部奏报北京模范监狱的选址和详细的建造计划;1913年的一份报道透露,北京模范监狱于1910年5月已开始兴建,负责监督的不是别人,正是麦秩严<sup>⑨</sup>。按当时的中国记载表明,小河受到应有的信任,“(北京模范监狱的)图式为日本小河(滋次郎)博士所规划”<sup>⑩</sup>。小河博士保存的在北京时的记事录证实了这一说法,还透露了他工作上受到的限制和潜在的问题:“北京正兴建一所新的监狱,称之为‘模范监狱’,这是由我设计的。按照计划,工程约在两年内完成。从外表上看是像我所设计的,但内部是否按照设计,那就谁也说不清了。我的工作,限于设计外形,内容构造则完全受到排挤。清国人既没有了解监狱(需要)的建筑师或工程师,这就意味着整件事情由外行人监督管理,后果是难于想象的”<sup>⑪</sup>。

小河滋次郎于1910年离开中国,北京监狱还未建成,其他地方的模范监狱在小河回国前已经在兴建中:河南是1908年8月,东北是1909年1月,江宁是1909年7月,山东是1909年7月,云贵是1909年9月,广西是1909年12月,江西是1910年5月,闽浙是1911年5月,热河是1911年5月,安徽在1911年5月。<sup>⑫</sup>

岛田正郎于40年代在北平读书时,收集到一批1919年发表的照片图册,用英文标明“中国十三所新监狱”,显示了北京第一、第二、第三监狱和直隶、奉天、吉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及湖北监狱的外貌和内部情况。岛田受晚清监狱改革时领导人的远见所鼓舞,希望收集有关资料,然而却落空了<sup>⑬</sup>。把对晚清任何好的回忆一笔抹煞,过程是很顺利的,对日本所起的关键作用的回忆,也就同样抹煞了。

不管监狱的房子盖得如何,林明德对监狱的监管人员作了重

要的研究。他的结论是,事实上中国所有监政人员,“都是由直接或间接接受过日式教育者担当”。在谈到刑罚问题时,林认为,中国从长期以来强调严厉惩罚,转为使犯人日后有一技谋生的方案,是受日本影响的结果<sup>⑫</sup>。

### 注 释

- ① 王家俭著《清末民初我国警察制度现代化的历程,1901—1916》(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 10:307—308,1982年6月),我蒙苏云峰惠赠一册。
- ② 黄遵宪建立的系统,见上注第308—309页。
- ③ 同上注第308页。
- ④ 第三章注⑤贝斯著第77页、113页。
- ⑤ 注①第324页。
- ⑥ 同上注第308页。
- ⑦ 王振坤与张颖著《日特祸华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谋略谍报活动史实》第一卷,(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第190—191页;第五章注⑩弘谷多吉夫著第95、101页。
- ⑧ 见第五章注⑨波文编著I第35—36页“张睿”条目。
- ⑨ 第五章注⑩第26—28页;藤冈喜久男著《张睿与辛亥革命》(东京,1985年)第195—199页。
- ⑩ 注①第310—311页。
- ⑪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53第13页,又见注①第309页。
- ⑫ 注①第312、353页。
- ⑬ 大卫·斯特朗德著《北京的黄包车:20世纪20年代的市民和政治》(Berkeley, 1989)第70—72页。
- ⑭ 导言注③麦克金朗著第156页。
- ⑮ 注①第353页,可惜(也令人奇怪)的是,王对这些问题只是一掠而过。
- ⑯ 注①第330页。这里王的说法有误,因为这警察学校于1904年底至1909年停办了,据D·埃莉诺·韦斯特尼的权威性著作,《模仿与创新:西方组织模式对明治日本的转移》(D. Eleanor Westney,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Transfer of Western Organizational Patterns to Meiji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⑰ 注①第311—312页。
- ⑱ 注①第325页(江苏),第327页(福建),第329页(安徽),第344页(广西)。
- ⑲ 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第124页。
- ⑳ 注①第323页(江苏),第331页(湖北),第332页(湖南),第333页(四川)。
- ㉑ 有关这一要点,见注⑦王振坤及张颖著第191页。
- ㉒ 见上注第93、103页。
- ㉓ 同上注第93—94页。川岛在华经历中引人注目的一段,详见同书第187—189页。
- ㉔ 第五章注⑳弘谷多吉夫著第94、103页。
- ㉕ 见第五章注㉑谭汝谦编著第422页(no. 590.040)
- ㉖ 第五章注㉒弘谷多吉夫著第94页。
- ㉗ 同上注第94—95页。
- ㉘ 同上注第95页。
- ㉙ 同上注第95页,第93—94,第103页;又见注⑦王振坤、张颖著第191—194页。
- ㉚ 见导言注③麦克金朗著第38页附地图。
- ㉛ 这些日期见上注第36、40页。
- ㉜ 第五章注㉕弘谷多吉夫著第95页。
- ㉝ 上注第95页中,弘谷多吉夫称这些警察学校为警务学堂;在第六章注㉞第204页中,林明德也称保定警校为警务学堂;在注①第321页中,王家俭则把保定及天津的警校称为巡警学堂,称北洋警校为北洋高等巡警学堂。本书依据王说。有关赵秉钧,见《民国人物大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6页。
- ㉞ 见第三章注㉟南里知树编著附录I第12—15页。
- ㉟ 导言注③麦克金朗著第160页。
- ㊱ 注①第311、312页。
- ㊲ 注①第313页。
- ㊳ 注①第345页。

- ⑳ 序言注⑤卡梅伦著第 63 页。
- ㉑ 导言注③麦克金朗著第 160、154 页。
- ㉒ 注①第 312 页。
- ㉓ 注①第 312—315 页。有关缺乏一致性,见第 317 页,第 345—346 页。
- ㉔ 王在讨论直隶警察改革的实质时,只用了 2/3 页的篇幅(第 321—322 页),却用一页以上探讨安徽(第 329—330 页),湖南(第 331—332 页),山西(第 334—335 页)和奉天(第 337—338 页),而这些地方的实际成就是远不及直隶的。麦克金朗则在《警务改革》标题下(第 155—163 页),用可能得到的一切有用资料,认真地分析了直隶的情况。
- ㉕ 对川岛浪速,王只是约略提及,见上注第 311、318 页。
- ㉖ D·埃莉诺·韦斯特尼著《日本明治年代对西方组织的模仿:巴黎地区警察与警视厅的案例》(D. Eleanor Westney, "The Emulation of Western Organizations in Meiji Japan: The Case of the Paris Prefecture of Police and the Keishi-chō,"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8. 2: 308 (Summer 1982))。
- ㉗ 韦斯特尼在《模仿与创新》书中用以作为副题,见第 24 页,亦见于书中各处。
- ㉘ 同上注第 37—40 页,第 40—44 页。
- ㉙ 分别见上注第 44—74 页及第 74—92 页。
- ㉚ 注①第 318 页。
- ㉛ 引自第五章注⑩弘谷多吉夫著第 98 页。
- ㉜ 见上注第 101 页。
- ㉝ 弘谷多吉夫运用了各方面的材料,包括毕业生合照,估算 1901 至 1906 年间在北洋警务学堂的日本教师平均每年为“12.3 人”,中国教师 7—8 人,而不是 3—4 人。见上著第 96—98 页。
- ㉞ 见上注第 99—100 页。
- ㉟ 同上注第 97、101 页。
- ㊱ 有关日期见上注第 96 页,及注①第 350 页。
- ㊲ 据注①第 330 页。
- ㊳ 注①第 318 页。
- ㊴ 注①第 351 页。

- ⑤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53 第 17 页。亦引用于第六章注⑤ 岛田正郎著第 133 页。岛田在学术上一般非常谨慎细致,但却把这一奏折的日期误写为 1901 年 10 月 2 日。
- ⑥ 见《张文襄公文集》卷 53 第 13 页。
- ⑦ 英译本见序言注⑤ 梅佐著附录 1 第 127—136 页。
- ⑧ 注①第 308—309 页。
- ⑨ 引自第六章注⑤ 岛田正郎著第 135 页。
- ⑩ 同上注第 133—134 页,及序言注⑤ 梅佐著第 132 页。
- ⑪ 载序言注⑤ 梅佐著第 137—152 页。刑部按皇帝命令,就有关奏折内容提出报告,赵的奏折被引用为报告的一部分。
- ⑫ 见第六章注⑤ 岛田正郎著第 134 页。
- ⑬ 见序言注⑤ 梅佐著第 22、122 页。赵对流放的意见及一些处置详情,见梅佐著第 22—24 页,第 141、150 页。又见第六章注⑤ 岛田正郎著第 134 页。
- ⑭ 见序言注③ 麦克金朗著第 160 页。
- ⑮ 见《民国人物大辞典》第 1316 页。
- ⑯ 引自第六章注⑤ 岛田正郎著第 140 页。
- ⑰ 见第六章注⑩ 林明德著第 204 页;及第三章注⑩ 附录 1,第 16 页。
- ⑱ 同上注。
- ⑲ 第六章注⑤ 岛田正郎著第 143 页。
- ⑳ 见《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 5412—5413 页。上注第 151 页有简略日文译文。
- ㉑ 第六章注⑤ 岛田正郎著第 151—152 页。
- ㉒ 《简明人名辞典:日本》(东京,三省堂,1976 年)第 247 页。奇怪的是,岛田正郎并无提及小河到外国留学,只说他在 1895 至 1899 年间相继参加了五次世界监狱会议。《大人名事典》在小河条目内,既未提到他出国,更未提及参加会议事。
- ㉓ 译著书名,翻译者及出版商,见第五章注⑩ 谭汝谦编著第 394、395 页(nos. 570.277 及 570.280)。
- ㉔ 据第三章注⑩ 南里知树编著附录 1,第 8、10 页,称小河的合约期为一年半;但据第六章注⑤ 岛田正郎著第 158 页,小河抵达北京是 1908 年 5 月

13日,于1910年返日本。这样小河在中国为时两年,这正是标准合约的期限。

⑳ 第三章注㉑南里知树编著附录 I 第 10 页。

㉒ 见沈家本 1907 年 5 月 11 日奏折,载第六章注㉓ 岛田正郎著第 155—156 页。

㉔ 同上注第 153 页,第 17 页,尤应参照 219ff。法律学堂研究监狱,这是沈家本的另一构思,见其 1907 年 12 月 30 日奏折,载上注第 156 页。

㉕ 部分引自第六章注㉓ 岛田正郎著第 155、159 页。

㉖ 同上注第 155 页。

㉗ 引自上注第 162 页。

㉘ 同上注第 163 页。

㉙ 这一要点见上注第 163 页,第 164—165 页,第 165 页注④。

㉚ 同上注第 159 页,及第六章注⑩ 林明德著第 204 页。

㉛ 第六章注㉓ 岛田正郎著第 159 页,引自中国官方文件。

㉜ 引自上注第 159—160 页。

㉝ 列表见上注第 160 页注③。

㉞ 同上注第 161 页注⑦。

㉟ 见第六章注⑩ 林明德著第 205 页。

## 第十章 中国的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 日本的蓝图和顾问

就像警察和监狱改革一样，法律和司法改革也趋于同步前进。当把新法的违反者交付审判时，中国官员和法律改革者们必须顺应法院机制；外国列强也不可能漠视（正是在列强压力下，中国才进行法律和司法改革的）。这样，法律和司法改革密切结合是不足为奇的。

清廷至少在 1902 年初便公开表示关注法律改革，但在 1905 年 9 月到 1906 年 9 月这一年里，朝廷趋向赞同立宪，法律和司法改革才有新的实质性进展。由于宪政、法律和司法改革相互关连，所以本章就三方面一并讨论。

### 中国的法律改革

市古宙三曾写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和现代行政法和刑法一致的法律，但就没有或极少与现代民法或商法一致的，而且也不像现代西方那样，司法和行政权力分离。”<sup>①</sup>很明显，要使中国的法律、司法和外部世界一致，是很不容易的。

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颁布重要的《预备立宪之诏》后,法律改革才能持续进行。而在此之前的五年间,已经孕育着改革中国法律的希望,希望像日本法律改革那样,能最终全面修订和西方签订的受到憎恨的不平等条约。早在1901年7月20日,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名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三道奏折中,就提请朝廷注意,中国需要现代的“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sup>②</sup>袁世凯于1902年初也奏请关注这个问题,在回顾日本1899年成功地修订条约并全面恢复法权后,建议向日本寻求帮助,“近来日本法律学,分门别类,考究亦精,最为西人所叹服”。在同一奏折中,袁还提出在民法和刑法方面,分别聘请一名日本法律博士帮助中国编制现代的法律。“(日本)系同文之邦,其法律博士多有能读我之会典律例者,且风土人情与我相近,取资较易。”<sup>③</sup>

1902年5月13日的简短上谕诏令,“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法例,按照交涉情况,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俟修定呈览,候旨颁行”<sup>④</sup>。1907年前,一直是有法律改革机构而无名称的<sup>⑤</sup>,在袁世凯、刘坤一和张之洞共同敦促下,朝廷于1907年成立修订法律馆,由沈家本和伍廷芳任修订法律大臣。有史学家称沈、伍为“整个改革运动栋梁”<sup>⑥</sup>,他们是袁世凯尊重、赏识的,富有经验及学识的法律学家。

伍廷芳生于新加坡,19世纪50年代在香港受教育,1874—1876年在伦敦学习现代法律,成为中国第一位有资格出席高等法庭的现代律师<sup>⑦</sup>。他后来的业绩使他成为令人钦佩的中国法律改革的指导者。不过“由于任职务甚多,各方面都需要他关注,花的时间不少,因此沈(家本)差不多是单独负责全部法律改革工作的”<sup>⑧</sup>。

沈家本的父亲是刑部里备受尊重的中国法律权威,沈早年受其父影响,专注法律研究,1883年考取进士,1901年任刑部左侍

郎<sup>⑨</sup>。他虽然思想开放, 毕竟缺乏西方法律的专门训练, 伍廷芳又不是经常在身边, 他在改革工作中不得不依靠日本法律顾问。

经过谈判, 1902年9月5日修订了《英中通商行船条约》, 条约中的一些条款, 增强了法律改革的愿望, 例如第十二款中提到, “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 以期与各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 以成此一举。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检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 英国即允放弃其治外法权”<sup>⑩</sup>。在1903年10月, 与美国及日本以相同方式修订通商行船条约时, 中国改革者们提出了“通过法律改革收回法权”<sup>⑪</sup>。在花了两年时间后, 伍廷芳等人终于在1905年10月15日联名上奏, 这才有第九章提到的1906年董康的赴日法律考察团。

因而1905至1906年间代表着一个分水岭, 人们看到, 一方面是自1901年以来的反复无常, 兴风作浪达到极点; 而另一方面, 是大多数人赞同法律和司法改革。1906至1911年间的改革, 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卓著的。首先是它的全面性, 包括起草了全新的刑法, 中国第一部民法和第一部全面的商法; 其次是日本起了主要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每一套法律的编纂都是以日本专家为首并由他们积极指导。这些专家都是学识高深、经验丰富(也都是以高薪聘请)的, 最初都签了三年合约的。

傅秉常(1894—1965)当时是年轻的法律学者, 1928年底开始在南京政府立法院民法编纂委员会任职, 在1930年介绍英文版的《1929年中国新民法》时, 罕见而公正地赞颂了日本, 表达了在新政年间法律改革方面对日本沉重的负疚感:

“修订法律馆所需的一切, 主要是从日本借来的, 这样做的原因也很明显……成千上万追求现代知识的中国人进了日本大学, 主要是法政学校。两国语言极其相似, 也便于他们学习。当时日本已经以德国法律为主要样本, 写成了自己的民法和商法, 创造了日本的法律术语、词汇, 翻译了大量欧洲一

流的法律学教材,出版了大量日文的法律文献,中国人可以在日本找到适合远东思想、又代表当时西方科学的法律科学最先进的东西,而在语言上又是密切相连的。”<sup>⑫</sup>

## 刑法改革与冈田朝太郎博士

在刑法改革方面,早在1906年9月冈田朝太郎抵达北京时,日本人便开始指导改革。冈田是法学博士,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法政大学中国学生的刑法讲师,1897—1900年在德、法研究法律四年,成为刑法方面的一流权威。他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刑法时,是1905年“帝大七博士”之一,他们因公开批评政府在朴茨茅斯和平条约谈判中“对俄软弱”,全部被免职<sup>⑬</sup>。

和小河滋次郎一样,冈田于1905至1906年间,通过他的译著《刑法各论》和《刑法总论》<sup>⑭</sup>,备受中国公众了解。在其后1906—1915的十年内,冈田博士在中国任修订法律馆顾问,京师法律学堂的总教习,京师大学堂及京师法政学堂的刑法教授,及其他与法律有关的职务<sup>⑮</sup>。

冈田博士于1906年9月到修订法律馆任职,月薪是前所未有的850银元,签了三年合约<sup>⑯</sup>。到任后,马上改弦易辙,坦率地、也完全不恰当地否定了该馆已经完成七八成的刑法初稿,在沈家本和伍廷芳同意下,重新草拟新的刑法<sup>⑰</sup>。1907年12月30日沈家本奏报《大清刑律草案》时,尽了最大努力,恰当地表彰冈田<sup>⑱</sup>。虽然并非唯一,却主要是采纳现代日本刑法的冈田草案,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认为对若干罪行过分宽厚,特别是正统儒家极其痛恨的罪行:弑亲罪,背叛祖先及陵墓罪,阴谋叛乱罪等<sup>⑲</sup>。还有人反对在草案中过多使用日本术语<sup>⑳</sup>。

到1911年1月颁布时,冈田初稿中的敏感部分已进行过五次修订,但仍有待于时间的考验。1912年后,中国不同的政府此起



彼伏,新旧条文此增彼改,但按林明德的看法,冈田博士的《大清刑律》或简称《新刑律》的“主体”,仍保留在中华民国年代的刑法中<sup>②</sup>。

## 民法与松冈义正

中国最先的第一部民法,是法学士松冈义正于1906年到中国后协助写成的。原任东京控诉院判事的松冈,接受了动人的月薪800银元的三年合约<sup>③</sup>,为中国筹备现代民法。在他的指导下,篇幅庞大的《大清民律草案》于1910年完成。草案分五编,包括总则、义务、产权、家庭及继承,共1316条。由于这部法律草案主要依据西方法律理论和日本及德国的民法,某些部分忽视了中国社会传统和习俗,错误地对待中国过去的法律,中国人自然要挑剔一些疏忽和遗漏。但诚如傅秉常于1930年写道:“直至目前的法律(于1929年)公布前,(1910年的民法)并未被中华民国的法律修改或废除,而且它始终是民法的基础。在新的民法公布前,这部民法仍在全国执行”<sup>④</sup>。

## 商法改革和志田钾太郎

商法方面,修订法律馆以破纪录的950银元月薪聘用了志田钾太郎,合约期为三年<sup>⑤</sup>。志田于1908年10月开始在德、法攻读法学博士,曾任日本学修院、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的商科及法律教授,法政大学中国学生的优秀讲师,1938—1943年任明治大学校长<sup>⑥</sup>。他到中国受任筹备草拟全面的、完全现代的商法,以取代1902年草率写成的《大清商律》。

志田也和小河滋次郎和冈田朝太郎一样,在到中国前,已因在1905至1907年间出版了他的三本译著:《商法》、《商法商行篇》及

《商法总则》，使他获得盛誉<sup>⑧</sup>。虽然“惟印行于世者，仅有商总则与商行为两编而已”，但他的篇幅庞大的《商律草案》，已被认为是一切后来编纂者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据林明德认为，“这些例则在体裁上均仿日本商法而来”<sup>⑨</sup>。

## 中国的司法改革

由于上年风起云涌的多方面行政改革的推动<sup>⑩</sup>，在法院改革方面，1906年同样是标志性的年份。到了1907年底，《法院编制法》至少在纸面上建立了等级齐全的日式法院系统，从初级庭、地方庭、高等审判庭到大理院。

冈田朝太郎和松冈义正共同直接参与了这一法律及其他有关新法院系统法律的起草工作。有意义的是，1909年的法律指令各省，第一次把司法和行政划分开来<sup>⑪</sup>。民国以后，中国法院法律，用林明德的话说，“仍直接取法日本”<sup>⑫</sup>。由于财力和人力的实际问题，迫使民国新政府于1914年4月5日颁布《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sup>⑬</sup>。

## 中国的宪政改革：来源与解释

在本书研究的所有题目中，像我这样构思的英文专著，只有宪政改革。在罗伯特·梅恩伯格(Norbert Meienberger)的《立宪政府在中国的出现(1905—1908)：慈禧太后认可的概念》一书中，开头便列举了对立宪运动各种惯常的解释。他指出，这些解释都受“着眼于反对清政府”的观点支配<sup>⑭</sup>，接着他提出了相反的意向，应“着眼于清政府”研究立宪运动，只要这样做，“事实便表现出不同的见解，从这样有利的角度看，不符事实的非难便站不住脚，拖延迟误的谴责也就毫无根据”<sup>⑮</sup>。

186

换句话说,梅恩伯格为宪政所做的工作,正是陆光为 1898 年百日维新所做的:让学术研究从当时和日后批评家们的掌握中解脱出来,直接依据原始材料和当时的看法。梅恩伯格是立足于公开文件纪录上的,他认为那些纪录有着非常好的原始英文资料,例如《北华捷报》<sup>⑳</sup>,问题是他的资料只是模模糊糊地提到日本在宪政问题上与清政府合作。梅里伯夫·卡梅伦的卓越研究受到梅恩伯格的称赞,因为他得到和自己“相同的结论”<sup>㉑</sup>,也都完全忽略了和日本的联系,忽视了日本和它的作用。按照林明德有力的论证,最主要的忽略是明治宪法是清《宪法大纲》的“蓝本”<sup>㉒</sup>。

## 向立宪政府迈进

1904 年,中国广泛地讨论实施宪政的可能性。精力充沛的张謇,由于他能直接与朝廷和总督们接触,把基本材料收集后汇总送交高级官员们,因而获得称赞。1903 年底,他趁参观大阪博览会之便,调查了日本现代工业、教育和政府。此行使他加强了对立宪政府效能的认识,进一步了解日本明治期间取得进步的原因,为此,他写了《东游日记》<sup>㉓</sup>。

张謇回国后,受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燾(1837—1916)说服,经征询罗振玉等朋友意见后,于 1904 年花了 5 月份的大部分时间草拟了支持立宪的奏章。6 月底,张謇与袁世凯在分隔 20 年后再次会晤,促请袁支持立宪政制<sup>㉔</sup>。

此外,从 1902 年起任中国驻法公使,民国后任重要官员的孙宝琦(1867—1931),于 1904 年 7 月前正式奏请立宪。这引起了具有影响力的《东方杂志》和《大公报》公开争论<sup>㉕</sup>。

可信的资料有助于中国人取得成功。1904 年夏天,张謇和张之洞能干的幕僚赵凤昌(1856—1938)一道,印制了明治宪法的译本送给慈禧,据说慈禧甚表赞同。与此同时,张还印了他自己写的

(日本)《新法义解》和《日本议会史》，10月，他把这些书送给满族高级官员铁良(1863—1910)，并亲自和他讨论。铁良于1905年任兵部左侍郎，其后是立宪政制的主要支持者<sup>⑩</sup>。

在此期间发生日俄战争(1904年2月至1905年6月)，1903年10月至1907年10月，杨枢任中国驻日公使。他在何如璋(1877—1880)、徐承祖(1884—1887)任公使期间，任驻日使团英语翻译、参赞，对日本明治维新有相当认识。以下所引1905年1月9日杨枢的奏折，相信读者会认为是具有真知灼见的：“日本于明治维新之初岁……又宣发誓命，先定为立宪之国，然后开议会决公论一切。变法之事，皆依立宪政体而行……中国与日本地属同洲，政体、民情最为相近，若议变法之大纲，似宜仿效日本。盖法、美等国，皆以共和民主为政体，中国断不能仿效。而日本立国之极，实遵夫中国先圣之道，因见列强逼处，非变法无以自存。”<sup>⑪</sup>日本成功地战胜沙俄力量，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标志着“立宪政治战胜独裁统治”<sup>⑫</sup>，大大促进了立宪运动。中国实现宪政的呼声汹涌澎湃，中国各方面的领袖越来越多地把立宪政府，包括全国的和各省的议会，视为能够促进全国团结、国家强大的基本政府形式<sup>⑬</sup>。1905年6月4日，在日本最后战胜独裁俄国的前夕，袁世凯、张之洞和新任两江总督周馥联名上奏，要求立宪。在仅仅六周后，朝廷于1905年7月16日上谕称，派遣四名高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正如闵斗基指出，这个使团“暗示着政府正在考虑不久便将同意立宪”<sup>⑭</sup>。到1905年年中，出现了积极支持立宪政制杰出人物组成的联盟，他们有主要的省级官员、高层官僚、外交官员及进步的满族人<sup>⑮</sup>。

188

在这重要的年份，朝廷在各方面挤迫下前进。1905年9月2日发布了重要决定，废除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9月18日指令中国驻外公使隆重接待出洋考察政治代表团。代表团定期9月24日从北京出发，由于发生暗杀事件，两名大臣受伤，致使出发日期

延至12月11日。同时,朝廷于11月19日指令成立内阁会议政务处(前身为督办政务处),负责审查改革建议,提出宪政大纲,11月25日又成立了考察政治馆<sup>④</sup>。

1905年12月11日,五名考察政治大臣,其中两名满族人(镇国公戴泽及湖南巡抚端方),三名汉人(户部右侍郎戴鸿慈(1853—1910),山东布政使尚其亨(1866年生),和顺天府丞李盛铎),从北京平安无事地启程。他们分为两组,带着80名以上随同人员,包括使馆馆员、秘书和顾问<sup>⑤</sup>。他们考察了6个月,1906年7月回国后,慈禧接见戴鸿慈、尚其亨一次,接见戴泽两次,端方三次。戴泽单独上奏,端方三上奏章。他们五人都一致建议中国实行宪政<sup>⑥</sup>。

8月27、28两日,慈禧召开了高层会议,讨论立宪事宜,结果,于9月1日公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慈禧《预备立宪之诏》,这主要是由袁世凯、铁良和端方写的。同时决定成立官制编制馆,委派23名有权威的高官任编纂、参议、总司<sup>⑦</sup>。据闵斗基说,官制编制馆的起草委员,“大多是曾在日本学习或曾接触新思想的学生”<sup>⑧</sup>。也就是这些委员,草拟了1906年11月6日的厘定官制上谕,在究竟应走多远、多快的无穷争议中<sup>⑨</sup>,实质上在重组中央政府<sup>⑩</sup>。

在立宪政府问题上,一些顾问曾告诫慈禧,只有英国、德国或日本模式的政体,才能保障皇帝的特权。如此严峻的警告自然受到重视,在《预备立宪之诏》发布一年多以后,慈禧于1907年9月9日又派了三名考察政治大臣,分赴英、德、日三国考察。梅恩伯格认为,这些考察团“没有像1905—1906年代表团那样被人注视”,因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它们“绝不那么重要”<sup>⑪</sup>。实际结果表明,正是这些考察团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才为立宪思想和计划最后定型。要知道这些考察团是故意不作大肆吹嘘的。

朝廷根据考察团的报告,认定英国制度不切实际,不能仿效,因为它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而没有把一切集编成典;德国(普鲁士)的宪法虽已集编成典,但仅在帝国议会审核通过后便施行,是

强加于皇帝的；只有日本的宪法，既已清清楚楚地集编成典，又绝不侵犯皇室特权，事先既不必受公众查核评论，皇帝公布时还俨然是给臣民的赠礼。经过一再比较日、德制度，一致决定采用日本形式的宪法，全面保留皇帝特权<sup>④</sup>。据林明德称：

达寿(1870年生，学部满籍侍郎)于1907年底出使日本，历时半载，曾与伊东已代治(1857—1934，明治宪法的建造者，信任伊藤博文，并曾在伊藤内阁任要职)协议，接受穗积八束(1860—1912)、有贺长雄(1860—1921)、太田峰二郎等的指导，分日本宪法史、比较宪法、议法院、司法、行政、财政等六门，整理成五编15册奏呈，条陈宪政事宜，并主张采取立宪政体，以钦定宪法为宜。 190

达寿之所以主张宪法必须钦定，实有鉴于欧洲各国宪法大体均出于协定或民定，不是以行“大权政治”，唯有仿行日本明治宪法，始能“存国体而固主权”<sup>⑤</sup>。

为使臣民对即将到来的宪法有所准备，清政府于1907至1908年间出版了一系列的书籍，解释日本宪法和行政制度，其中一些出自1907年8月13日成立的宪政编查馆。该馆是由1905年11月25日成立的考察政治馆改组而成，主要负责以1885年明治做法为榜样，草拟宪法大纲。它有职员160人以上，其中50人是国外留学的专家或曾参加调查团，而这50人中有40人曾到日本。更有意义的是，该馆重要的编制局有29人，在曾到外国的19人中，16人是曾到日本的<sup>⑥</sup>。

就是这个宪政编查馆编写了1908年8月27日采纳的23条《宪法大纲》。这一根本性文件的第一、第二条，差不多是直接来自1889年明治宪法第一条和第三条翻译过来的：“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二、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sup>⑦</sup>必须注意，构成这两条的是日本的概念，是完全不同于中国古老概念的，即皇帝是“天子”，按“天命”而“统治”。

在这 23 条的大纲中,有 14 条是关乎“君上大权”的,林明德把这 14 条列成表格,逐一和明治宪法对照,这是很有价值的。经系统地比较后,不但证实了明治宪法是《大纲》的蓝本,而且清室对统治权力的需索,甚至超越了它的良师<sup>⑤</sup>——当时世上最严厉的君主立宪政体。

深知政治内情的伊东已代治,对达寿向皇帝的建议,可能是认真负责的。为了忠于日本模式,由皇帝直接决定清宪法,即使自己政府的大臣们也不容干预<sup>⑥</sup>。而且还明显地按照日本模式,订出所谓九年预备立宪的时间表,最后才颁布宪法<sup>⑦</sup>。计划 1916 年进行全国选举,1917 年召开国会。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很快相继于 1908 年 11 月 14、15 日逝世。在此之前的四年内,中国“没有重大的外国干预”<sup>⑧</sup>,得以朝着立宪政府的方向,沿着梅恩伯格称之为“在传统内改革”的道路,取得显著的进步<sup>⑨</sup>。梅恩伯格写道,在 1908 年后,“清政府于 1909 年各省谘议局第一届会议后,开始感受谘议局的影响,1910 年又受资政院批评,无力在 1911 年第二届会议上控制这些国会先驱者了”<sup>⑩</sup>。

在问题已变得更难解决时,慈禧死后又滋长了偏执狂热,朝廷狭隘地把“维护(清)王朝”作为压倒一切的大事<sup>⑪</sup>。政府内外的中国改革者要求通过宪政取得发言权,并分享权力。满洲朝廷漠视这些要求,固执地以明治宪法为蓝本,对特权的需索甚至超过日本版本,狭隘地为惶恐不安的满族人维持高官厚禄。

这样,皇朝因其君主集权立宪制,受到它的强大敌人、反清革命力量毫不留情的攻击,那就不足为奇了。无关大局的损害本来是应该容忍的,但朝廷因为宪法和围绕宪法受到的误导,疏远了它最忠诚的保守的中国人和官员们,这就是皇朝的致命伤。

就这样,在 1911 至 1912 年间,在革命者、不再抱幻想的改革者、新军士兵、各省吓坏了的官员和城乡杰出之士共同但并非有组

织的反对下,2100年来古老的帝制政府突然崩溃了,还有谁来挽救满族皇朝呢?

#### 注 释

- ① 市古宙三著《1901至1911年政治和制度改革》,载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史》第11卷《晚清史,1800—1911》下册第413页。
- ② 见《张文襄公全集》卷54第18页(第一册第943页),及第七章注⑤邓与费正清编著第203页。
- ③ 引自第六章注④林明德著第200页,林奏折于1902年写成。邀请日本刑法及民法两名日本学者的意见,是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于1902年4月或5月间共同提出的。见序言注⑤梅佐著第10页。
- ④ 见《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4864页;又见序言注⑤梅佐著第10—11页;有关日期,见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第1162页。
- ⑤ 1902年3月11日上谕,载《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4833页;又见序言注⑤梅佐著第9—11页。有关修订法律馆模糊不清的渊源及前身名称的问题,见第六章注⑨岛田正郎著第13—18页、第18页注②、及同书“修订法律馆”条目下众多的参考材料。
- ⑥ 见序言注⑤梅佐著第33、101页;及见渡边惇著《清末袁世凯与北洋新政:北洋派的形成》。蒲地典子等著《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19及20世纪历史及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物指南》第223页中肯地认为,渡边惇创新的著作,用材料表明了袁世凯培养并擢用全国的人才,及大量使用了日本顾问的先进方法。”
- ⑦ 第五章注⑥波文编著Ⅲ第454页。
- ⑧ 同上注Ⅲ第96页。
- ⑨ 同上注Ⅲ第95—96页;及《民国人物大辞典》第431页。
- ⑩ 见《清季外交史料》,王彦威纂辑、王亮编(1932;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卷162第26页(第三册,总第2611页)。英译文见序言注⑤梅佐著第11页。
- ⑪ 序言注⑤梅佐著第11页,及第六章注④林明德著第199页。“通过法律改革收回法权”是作者自己的话。



- ⑫ 见中国立法院民法编纂委员会编英文版《中华民国民法》(1930年,上海)第11—12页,傅秉常写的《导言》。
- ⑬ 《大人名事典》“冈田朝太郎”条目。
- ⑭ 分别于1905年及1906年出版,见第五章注⑩谭汝谦编著第407、408页(nos. 580.084, 580.085; 及 580.094, 580.095)。
- ⑮ 汪向荣著《日本教习》第69页。
- ⑯ 第三章注⑩南里知树编著附录1第8页。
- ⑰ 第六章注⑩林明德著第200页。
- ⑱ 奏报译文见序言注⑤梅佐著190—198页。有关冈田参考资料见同书第190页;冈田草案的原则,见同书第66—78页。
- ⑲ 详见序言注⑤梅佐著第79—100页。由于1907年7月11日礼学馆的建立,传统价值成为政府密切注视的问题。礼学馆是依礼部的要求而成立的,它的目的,用梅恩伯格的话说,是“研究人民旧的和现代的习俗,从中选择最好的供皇帝决定”,以为立宪政府奠定一定基础。见罗伯特·梅恩伯格著《中国立宪政府的出现(1905—1908):慈禧太后认可的概念》第62页(Norbert Meienberger, *The Emergenc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 (1905-1908): The Concept Sanctioned by the Empress Dowager Tz'u-hsi* (Bern, 1980))。对礼学馆较详细论述,见序言注⑤伯鲁纳特与哈格尔史特朗著第129—130页。
- ⑳ 见序言注⑤梅佐著第95页。
- ㉑ 第六章注⑩林明德著第202页。有关冈田插手草拟中国新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违警司法及对冈田刑法的几点争论见同书第200—202页;及注①第408—409页。
- ㉒ 第三章注⑩南里知树编著附录I第8页。
- ㉓ 注⑫《导言》第9页;1912年后曾拟草拟新法典,见《导言》第12页。直至1929年,中国政府及法庭仍主要参照松冈的法典,见第六章注⑩林明德著第203页,及注①第40页。
- ㉔ 第三章注⑩南里知树编著附录I第10页。
- ㉕ 同上注,及《大人名事典》“志田伊太郎”条目。
- ㉖ 有关这三本译著,见第五章注⑩谭汝谦编著第413、414页(nos. 580.145, 580.149 及 580.160)。

- ⑳ 第六章注⑩林明德著第 203 页, 及注①第 409—410 页。
- ㉑ 有关行政改革, 见注①第 389—396 页。
- ㉒ 第六章注⑩林明德著第 203 页。
- ㉓ 第六章注⑩林明德著第 204 页。
- ㉔ 这条例的英文译文, 载治外法权委员会编译的《中华民国司法行政之法律、法令、法规及法则》(北京, 1929 年)第 343—345 页。1914 年的法规 13 条, 增加为 44 条, 于 1923 年 3 月 30 日公布, 译文见同书第 346—357 页。
- ㉕ 注⑩梅恩伯格著第 11 页。
- ㉖ 同上注, 又见第 82 页。
- ㉗ 梅恩伯格创造性地运用有关资料编成《清政府内的改革派和反对派 (1905—1908 年)》, 列表说明对宪政改革的各种态度。载上注第 95—100 页, 第 59 页。
- ㉘ 同上注第 12 页。
- ㉙ 见第六章注⑩林明德著第 192、194 页。
- ㉚ 张謇的叙述, 简见王晓秋著《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第 235—237 页。
- ㉛ 见第九章注⑨藤冈喜久男著第 199—202 页; 及闵斗基著《晚清期间的省议会》, 载闵著《国家政体与地方势力: 中国皇朝晚期的改革》第 140 页。
- ㉜ 同上注闵著第 140 页, 第五章注⑧波文编著Ⅲ第 169—170 页。
- ㉝ 第九章注⑨藤冈喜久男著第 202 页; 注⑩闵斗基著第 140 页。
- ㉞ 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68 第 34 页(下册, 总第 1316 页)。关于杨枢多次在驻日使团工作, 见 Chow Jen-hua, *China and Japa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iplomatic Missions in Japan 1877-1911* (Singapore: Chopmen Enterprises, 1975), pp. 96, 235。
- ㉟ 注①第 388 页。
- ㊱ 有关地方自治政府及各种类型议会的重要争论, 见闵斗基著《清代政治封建主义的理论》, 载闵著《国家政治形态与地方势力》第七章第 89—136 页; 有关 1898 年改革期间的争论, 见第 122—136 页。概括性的讨论, 见注⑩梅恩伯格著第 22—25 页。
- ㊲ 见《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 5364 页; 及注⑩闵斗基著第 141 页。
- ㊳ 各类人物的姓名, 见张朋园著《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9 年)第 3—4 页; 注⑩梅恩伯格著第 22、96、97 页; 第九章

注⑨藤冈喜久男著第 195—230 页。

④⑥ 见第九章注⑨藤冈喜久男著第 202—203 页,注⑳闵斗基著第 144、153 页,序言注⑤伯鲁纳特及哈格尔史特朗著第 46—47 页,注㉑闵斗基著第 192、194 页。由于闵斗基说的日期偶有错误,故此处从藤冈喜久男说。

④⑦ 见注⑲梅恩伯格著第 29 页。

④⑧ 对考察团的报告和建议,见上注第 29—38 页。慈禧接见他们的次数及他们的奏折,见注㉒闵斗基著第 147—148 页。有关考察政治大臣的职位,见第九章注⑨藤冈喜久男著第 204 页。

④⑨ 见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第 1258—1259 页;又见注㉓闵斗基著第 148—149 页,第 252 页注㉔。注⑲梅恩伯格著第 39—47 页有更详细的讨论。

④⑩ 注㉓闵斗基著第 149 页。

④⑪ 见注⑲梅恩伯格著第 56—61 页。

④⑫ 详情及对此分析,见上注第 48—55 页;又见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第 1262—1263 页。

④⑬ 同上注郭廷以编著第 57 页注⑧。

④⑭ 第六章注④林明德著第 193 页。

④⑮ 同上注。

④⑯ 同上注第 194 页。

④⑰ 同上注第 195 页;及见《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卷总第 5979 页。

④⑱ 这极其有用的比较表载第六章注⑥林明德著第 195—196 页。

④⑲ 见上注第 194 页。

④⑳ 详见注⑲梅恩伯格著第 76—82 页。

㉑ 同上注第 13 页。

㉒ 同上注第 13 页,第 14 页(该章标题)及第 18 页。闵斗基在《晚清期间的省谘议局》第 177 页中,特别提及 1908 年 8 月后全中国建立的省谘议局,坚持认为这一创举仍“在中国历史传统的范畴中”。

㉓ 同上注第 75 页。

㉔ 见注①第 413 页。

在 1898 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 12 年后,到了 1910 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与制度。

如果把 1910 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 1925 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 1910 年和 1898 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这是新政革命的成果。

## 对晚清革命的解释

如果本研究成果还有一定的意义,为什么那些对中国革命的标准解说却忽视了它们呢?这可能有些不可改变的原因:首先,新政改革是与一个政权“失败”相联系的,既已失败,何必再研究? 194 第二,1911年后学术界论及革命领袖时,只是集中于革命家与其他人物的对垒,围绕着设想得非常狭隘的范畴。对复杂的人物,甚至复杂的革命人物如章炳麟,都加以贬斥或漫画化<sup>①</sup>。新政的演员们只不过是些“改良者”,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又并不确定,一生中多次改变,严谨的研究也就把他们排除在外了。

第三,中国学术界已倾向于认为与革命相联的现代发展才是重要的,又把革命狭隘地限定为对过去无秩序的、不妥协的否定。有秩序的改变和带传统色彩的思想,都被学者们排斥在学术视野之外。

第四、研究者未能正确评价晚清成就中的极端复杂性。今天,即使一般人也懂得国家之间技术转移的复杂性。晚清新政改革涉及的转移,远比技术转移复杂,是思想、文化、组织机构大量的、集中的转移。无论如何复杂,新政改革悄悄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令人注目的声势如此地少,受到评价或严肃研究也不多。改革的存在仅仅是因为势在必行。

最后,学术界的禁忌严重地阻碍了不偏不倚的理解,妨碍了考虑日本这主要因素,但只有这因素才能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和如何发生。战后的学术界,把全世界的专家们训练成将20世纪的日本视为侵略者、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敌人,其他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没有表现出来的——而且也在视野和记忆中消失了的,却正是那个日本,在对华发动长期侵略之前,为了在这敌对世界里共同生存,和平地和中国合作,并热切地把中国带进20世纪。

## 日本：缺掉的关键

如果没有日本，这段故事便缺掉了一个关键部分，新政取得的成就将会极为有限。日本扮演了多方面的角色，每一方面又包含着各种因素复杂的联结，学者们只评论某一点是不适当的。首先，日本起了典型的作用：在 19 世纪末，日本已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现代革命，在这过程中设计了“体用”的合成物，它的“体”或基本原则是改造过的儒学；它的“用”或实践，是改造过的西方因素。这一合成物在中国赢得赞同，也为中国接受新思想和新体制清除道路。在此之前，这些新思想和体制与西方异端相联，是受到抗拒的。 196

第二，日本为中国提供了“门户开放”一课：出于广泛的各种各样原因，从天真的利他主义到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日本替中国训练军官、现代教员和政府行政人员，藉以吸引中国；其后涌到日本的中国人，也受到日本人、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的真诚感人的接待。有哪一个刚刚现代化的国家能为其他国家如此热烈地尽自己力量的？

第三，日本是为中国提供受过高级训练、富有经验人才的来源。这些在日本自身现代革命中产生、为数不少的剩余人力资源，正好有机会帮助中国，热衷于受雇为中国教习或顾问。他们既是受中国高薪的诱惑，也是出于对明治成就理所当然的骄傲，出于日本对中国历史上的报恩感。在国家层面上说，是出于国家自身利益的计算及启发，和出于正在出现的民族使命感（这是具有潜在危险性的）。

第四，日本的现代词汇。这一因素通常都被忽视，但无论改革者或革命者都同样完全依赖它的。在此之前，中国要把西方概念和词汇译为中国惯用语的一切努力，从林则徐（1785—1850）和魏源（1794—1856）在 19 世纪 30—40 年代粗陋的翻译<sup>②</sup>，到西方传

教士们翻译中各种各样而并不协调的新造词语,以至严复在这世纪之交的、颇为优雅但同样无效的创造,全都失败了。明治时期日本的汉字现代词汇于19世纪90年代已完全标准化,机能上也连贯一致。如果没有这些词汇,中国任何改革的努力,都要在词汇战争和争吵中失败。

196 第五点与第四点有关,大批西方著作精细地译为日文,加上现代日本学术著作、思想、文学及教科书,于晚清期间一时竞相译成中文,中国人对日本现代文学、现代艺术和现代思想的仿效,引发了中国1911年后的“新文化运动”,构建了“文学革命”的范畴<sup>③</sup>,使中国在思想方面,猛然进入现代世纪。

## 今后研究的方向

学术界应该向哪里去?在思想领域而言,上述第五点的各方面仍迫切地需求更多的探索:晚清的艺术、文学、思想、道德伦理及宗教,包括中国的佛教。学者们应该探讨梅布尔·李(Mabel Lee)和曹贵民提出的问题,例如梁启超及其他晚清期间文化和思想的开拓者们,是否被剥夺了“他们应得的荣誉”<sup>④</sup>而被“五四运动”的人物所取代。至于体制方面,还需更有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工商会<sup>⑤</sup>,农业和工业的动力,地方自治运动<sup>⑥</sup>,这些都是受日本影响的。同样重要的是,本书第二、第三部分的每一章都需要全面的专题研究,最理想的是国际研究机构都共同进行<sup>⑦</sup>。

研究在日本参与下中国转变的最终目的,自然是更全面、更客观地理解近代中国本身。这要求精确地理解体制和思想在不同层次的转化:全国的、地区的、省的、地方的。它们是分隔的、并无联系的实体,但又能动地跨越层次相互作用。横山英认为从1898年开始,便给1911年前后“地方政治现代化”定下模式<sup>⑧</sup>。玛丽·兰京(Mary Rankin)认为,新政的创举有助于在浙江省重新规限国家

与地方士绅的关系<sup>①</sup>。杜赞琦(Prasenjit Duara)的分析认为,“国家在华北农村强化权力机构”,是新政改革的开始<sup>②</sup>。张朋圆仍在调查新旧名流对政治的参与<sup>③</sup>。闵斗基透彻地洞悉晚清期间,有关地方自治政府和建立谘议局的争论,认为这是按中国传统还是按外国模式之争<sup>④</sup>。岛田虔次坚持研究“中国本土思想对中国革命思想的影响”<sup>⑤</sup>。所有这些,对于将来的研究方向都有指导性。

晚清革命本身便足以使人惊叹不已。那已经发生的转变,无论在速度、范围和持久性方面,在到当时为止的近代世界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使康有为在1898年荒谬的论断差不多成了预言:“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康接着认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sup>⑥</sup>。疾如闪电的新政革命,它的主要因素——本书已研究过的思想和体制及其他延伸的范畴——出乎意外地坚持下来,1911年革命也确认了它们的地位。只有时间才知道,它们能否坚持漫长的岁月,像被它们取代的制度那样延续2100年。那制度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21—226年,同是在疾如闪电的秦王朝革命中建立的<sup>⑦</sup>。

#### 注 释

- ① 见乔舒亚·A·福吉尔(Joshua A. Fogel)为岛田虔次著《中国革命的先驱:章炳麟与儒家学说》所写《导言》上中肯的评论(第11—14页)。
- ② 佐佐木正哉著《近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宪政思想的发展》一书(Sasaki Masaya, “Knowledge of the Outside World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itutional Thought”,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44:38—39, 45—47(1986)),对这问题有才华横溢的阐述。
- ③ 对日本文学的模仿,见C. T. Hsia著《新小说鼓吹者严复与梁启超》(C. T. Hsia, “Yen Fu and Liang Chi-ch'ao as Advocates of New Fiction”. In Adele Austin Rickett, ed., *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 - ch'ao, pp. 221-25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及第三章注④陈应年著。对日本艺术的模仿, 见第六章注⑥克鲁茨尔著, 及第六章注⑥徐昆平著。对现代日本思想的模仿, 见第六章注⑩陈应年著。“新文化运动”一语, 是第六章注⑥曹贵民著的标题。“文学革命”一语, 是第六章注⑩梅布尔·李书中的标题。

- ④ 见第六章注⑩梅布尔·李著第 204 页。
- ⑤ 参阅约瑟夫·菲史密斯著《中国共和主义的党派, 国家及地方名流: 上海商人的组织及政治活动, 1890-1930 年》(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第 33—36 页。这研究只是开始, 期望中的研究现正在中日两国进行着。
- ⑥ 有关自治政府运动, 见约翰·H·芬卓尔著《中国的民主: 地方和省的自治政府运动及全国政治活动, 1905—1914 年》(John H. Fincher, *Chinese Democracy: The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in Local,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Politics, 1905-191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及导言注③罗杰·汤普森著。
- ⑦ 例如第六章注⑥谭汝谦著第 344 页中, 号召中日合作, 以确定汉语中现代日语外来语的范围。
- ⑧ 横山英著《20 世纪初期的地方政治近代化札记》, 载横山英编《中国的近代化与地方政治》(东京: Keisō shobō, 1985) 第 i—iii 页, 第 1—27 页。
- ⑨ 玛莉·巴克斯·兰京著《杰出人士的行动主义与中国的政治改革: 浙江省, 1865—1911 年》(Mary B.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⑩ 杜赞琦著《文化, 权力与国家: 华北的农村, 1900—1942 年》(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⑪ 例如张朋圆著《省议会: 政治参与的出现, 1909—1914 年》, 载《中国历史研究》1984 年春季号第 3—28 页; 及张朋圆著《晚清立宪主义的概念与实践》, 载《中国历史研究》1989 年秋季号第 3—22 页。
- ⑫ 分别参阅冈斗基著《清代封建主义的理论》及《晚清的省议会》, 载冈著《国

家政治形态与地方势力》第 89—136 页,第 137—139 页。以相同概念,分析延续至 19 世纪 30 年代的相同问题,见菲利普·A·库恩著《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政府:控制权,自治权与灵活性的问题》(Philip A. Kuhn, *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 Problems of Control, Autonomy, and Mobilization*. 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第 257—298 页。

⑬ 见注①第 9 页。

⑭ 引自第三章注⑩王晓秋著第 321 页。

⑮ 就如德克·博特对第一代皇朝成就的评价那样,“使人惊奇的是,(秦朝)虽则短暂,却成功地为政治后继者留传了国家官僚系统,经汉代加以完善及巩固,在公元 220 年汉朝崩溃后,再经不断地修改,又继续繁荣了 1700 多年……尤论对秦朝的成就赞赏与否,它在数量和质量上对中国面貌改变之大,堪称之为‘革命’……这是中国古代真正的革命。自然,中国到了这个世纪才有名符其实的革命的”。(Derk Bodde, “The State and Empire of Ch’in”, in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I: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 C.-A. D. 2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第 90 页。

## 附录：

### 《新政改革上谕》

(标题为作者所加)

谕。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谕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当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sup>①</sup>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自丁戊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巾。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奸谋。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得救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叛逆。皇太

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sup>②</sup>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睹。今者恭承慈命。壹意振兴。严法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语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至西幸太原。下诏求言。封章屡见。而今之言者率出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浅见。指其病未究其根。尚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悉归于窒碍难行。新进讲富强。往往自迷始末。迂儒谈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尔中外臣工。当鉴斯二者。酌中发论。通变达权。务极精微。以便甄择。特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苟无其法。敝政何从而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使不分别人有百短。人有一长。以拘牵文义为守经。以奉行故事为合例。举宜兴宜革之事。皆潜废于无形。旅进旅退之员。遂酿成不治之病。欲去此弊。慎始尤在慎终。欲竟其功。实心更宜实力。是又宜改弦更张以祛积弊。简任贤能。上下交儆者也。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物穷则变<sup>③</sup>。转弱为强。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遇事偷

安。宪典具在。决不宽贷。将此通谕知之。

### 注 释

- ① 由于一般多用具有朝代性的词语表述中国,如“我朝”(本谕仅出现一次),或“清国”(表述对外关系时用),或古语词“天下”(本谕两次使用),在这新政改革上谕中三次以政治上中性的“中国”以指称中国,是具有意义的。〈译者按:在这上谕中三次使用“中国”一词,均为与“外国”前后相对。如:“……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浑融中外之迹。中国之弱……”;“……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天下”与“国家”本为同义,行文时为了变文避复而替用,如“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谕中的“我朝”,是指“入关以后”一段,其下又历数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是不可能用“中国”以代的。〉
- ② 上谕首段引用的“损益”一词为关键词语,原出《论语》,是针对那些反对对清朝法律和体制作任何调整的极端保守主义分子的。〈译者注:“损益”一词,见《论语·为政第二》,“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 ③ “物穷则变”引自《易经》的“穷”和“变”,已见于上谕首段,末段又再引用,显见首尾呼应。关键词语“穷”、“变”和“损益”的重复引用,是要表示容易过敏的改革事宜本是遵循圣贤古训的。〈译者按:“穷”、“变”,见《易经系辞·下传》“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 参考书目

Abe Hiroshi 阿部洋 . “Giwadan baishōkin ni yoru Amerika no tai-Ka bunka jigyo” 义和团赔偿金によるアメリカの对华文化事业 (American Cultural Activities in China Utilizing Boxer Indemnity Funds). In Abe Hiroshi, ed. *Bei-Chū kyōiku kōryū no kiseki: Kokusai bunka kyōryoku no rekishiteki kyōkun* 米中教育交流の轨迹: 国际文化协力の历史的教训 (U. 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 Historical Lessons i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pp. 155-205. Tokyo: Kazankai, 1985.

阿部洋:《美国运用庚子赔款的对华文化事业》, 载阿部洋编:《美中教育交流的轨迹: 国际文化合作的历史教训》。

——, “Borrowing from Japan: China's First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 In Hayhoe and Bastid, eds., pp. 57-80.

阿部洋:《向日本贷入: 中国第一个现代教育体系》。载露斯·海浩及玛丽安尼·巴斯蒂特编著。

——, “Shinmatsu Chokurei shō no kyoiku kaikaku to Watanabe Ryūsei” 清末直隶省の教育改革と渡辺龙

圣(Late-Qing Educational Reforms in Zhili Province and Watanabe Ryūsei). In *Oyatoi Nihonjin kyōshū no kenkyū*, pp. 7—25.

阿部洋:《清末直隶省的教育改革与渡边龙圣》。载《受雇的日本教习之研究》。

——, *Chūgoku no kindai kyōiku to Meiji Nihon* 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Chinese Modern Education and Meiji Japan). Tokyo: Fukumura Shuppan, 1990.

阿部洋:《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

——, ed. *Nit-Chū kyōiku bunka kōryū to masatsu: Senzen Nihon no zai-Ka kyōiku jigyō* 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摩擦:战前日本の在华教育事业(Japanese-Chinese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nflict: Japanes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Prewar China). Tokyo: Daiichi Shobō, 1983.

阿部洋编:《日中教育文化交流与冲突:战前日本在华的教育事业》。

——, ed. *Meiji kōki kyōiku zasshi ni mirareru Chūgoku · Kankoku kyōiku bunka kankei kiji mokuroku* 明治后期教育杂志にみられる中国·韩国教育文化关系记事目录(Index to Articles Related to Chinese and Korean Education and Culture, As Seen in Late Meiji Educational Journals). Tokyo: Ryūkei Shosha, 1989.

阿部洋编:《明治后期教育杂志刊载有关中国·韩国教育文化关系文章索引》。

Ayers, William. *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亚耶士,威廉:《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

Bao Shixiu 鲍世修:日本对中国晚清军队改革的影响(1988年10月25至28日北京召开的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论文)。Japanese Influences on Late-Qing Military Reforms.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Beijing, 25 – 28 October 1988.

Bastid, Marianne. *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20th-Century China*, Paul J. Bailey, tr.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71.

巴斯蒂特, 玛丽安妮: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教育改革》。

Bays, Daniel H. "Chang Chih-tung after the '100 Days': 1898 – 1900 as a Transitional Period for Reform Constituencies." In Cohen and Schrecker, eds., pp. 317 – 325.

贝斯, 丹尼尔·H: 《百日维新后的张之洞: 改革者转变期的 1898—1900 年》载科恩与施卓格编: 《中国 19 世纪的改革》。

——, *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 1895 – 1909*.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8.

贝斯, 丹尼尔·H: 《中国进入 20 世纪: 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

Beauchamp, Edward R., and Richard Rubinger. *Education in Japan: A Source Book*.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89.

博章普, 爱德华·R 及理查德·鲁宾格: 《日本教育的原始资料集》

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编: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Bland, J. O. P., and E. Backhous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si, Compiled from State Papers and the Private Diary of the Comptroller of Her Household*.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10.



布兰特, J. O. P. 与 E. 贝侯斯: 《慈禧家长统治下的中国: 慈禧年代的生活史实, 国家文件及私人日记汇编》。

Bonner, Joey.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邦纳, 乔意: 《王国维, 一位知识分子的传记》。

Boorman, Howard L.,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5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 1971.

波文, 霍华德·L 编: 《中华民国人名辞典》。

Borthwick, Sally.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The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Er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3.

波夫域, 莎莉: 《中国教育和社会的变化: 现代纪元的开端》。

Brunnert, H. S., and V. V. Hagelstrom. *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 rev. by N. Th. Kolessoff, tr. A. Beltchenko and E. E. Moran. Shanghai, 1912.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伯鲁纳特, H. S. 与 V. V. 哈格尔史特朗: 《中国目前的政治组织》。

Burks, Ardath W., ed. *The Modernizers: Overseas Students, Foreign Employees, and Meiji Japa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Inc., 1985.

柏克斯, 阿达夫·W. 编: 《明治日本的维新者: 外国留学生, 受雇的外国人员》。

Cameron, Meribeth E.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 - 191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卡梅伦, 梅里贝斯·E.: 《中国的改革运动, 1898—1912年》

Cao Guimin 曹贵民: 《中国留日学生与“五四”前的新文化运

动》(Japan-Trained Students and China's Pre-"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中日关系史研究, 1983年第2期。

Chang, Hao. "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 - 8." In Fairbank and Liu, eds., pp. 274 - 338.

张灏:《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 1890 - 1898年》载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史, 晚清史》。

Chang Pao-shu (Zhang Baoshu) 张宝树. "Sho Kaiseki [Jiang Jieshi] sensei to Nihon (jō)" 蒋介石と日本(上)(Chiang Kai-shek and Japan, Part 1), *A-Tai tenbō* 亚太展望(Taipei) 3. 10: 21 - 41 (October 1986).

张宝树:《蒋介石与日本(上)》

Chang Peng-yuan (Zhang Pengyuan) 张朋圆:《立宪派与辛亥革命》("Constitutionalist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 China").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9年。

Chen Yingnian 陈应年:《近代日本思想家著作在清末中国的介绍和传播》, 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编

陈应年:《梁启超与日本政治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及评价》(Liang Qichao and the Japanese Political Novel's Dissemination to China, With and Appraisal), 《中日文化与交流 I: 110—129页(1984年)》

China, The Commission on Extraterritoriality. *Laws, Ordinances, Regulations and Rules Relating to the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ission on Extraterritoriality, tr. Beijing: The Commission on Extraterritoriality, 1923. 中国治外法权委员会编译:《中华民国之法律、法令、法规及法则》(北京, 1923年)

China, Legislative Yuan, Civil Codification Commission. *The Civil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0.

中国立法院民法编纂委员会：《中华民国民法》（上海，1930年）

Chung, Sue Fawn. "The Image of the Empress Dowager Tz'u-hsi." In Cohen and Schrecker, eds., pp. 101-110.

苏仿春：《慈禧太后的形象》，载科恩及施卓格编：《中国19世纪的改革》

Cohen, Paul A. "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 In Fairbank, ed., pp. 543-590.

科恩，保罗：《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载费正清编《剑桥中国史——晚清史》

——and John E. Schrecker, eds.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科恩，保罗与约翰·E·施卓格编：《中国19世纪的改革》

Croizier, Ralph. *Art and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Lingnan (Cantonese) School of Painting, 1906-195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克鲁茨尔，拉尔夫：《近代中国的艺术与革命：岭南美术学校，1906—1951年》

*Dai jinmei jiten* 大人名事典 (Great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10 vols. Tokyo: Heibonsha, 1955.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

《中日关系史论丛》第一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日关系史论集》第二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中日关系史论文集》第三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与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合编：《中日关系史论集（上

下)》第四辑(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增刊)

与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合编:《中日关系史论集》第五辑(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增刊)

与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合编:《中日关系史论集》第六辑(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增刊)

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杜亚拉,普拉显吉:《文化,权力及国家:华北的农村,1900—1942年》

Duus, Peter,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邓斯,彼德,雷蒙·H·迈耶斯,及马克·R·皮蒂编:《非正式的日本帝国在中国》

Esherick, Joseph W.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埃谢力克,约瑟夫·W:《义和团起义的由来》

Fairbank, John 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5.

费正清,埃德温·O·莱斯曹尔,及阿尔伯特·M·克雷格合编:《东亚:现代的变革》

——,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and Kwang-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费正清、刘广京合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

——, Katherine Frost Bruner, and Elizabeth MacLeod Matheson, eds. *The I. 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 2 vol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费正清、凯瑟琳·弗罗思特·布罗恩纳、伊莉沙白·麦克劳德·马迪森合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

Feuerwerker, Albert.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6.

费维恺：《20世纪初外国在华机构》

Fewsmith, Josep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菲史密斯，约瑟夫：《中国共和主义的党派，国家及地方名流：上海商人的组织及政治活动，1890—1930年》

Fincher, John H. *Chinese Democracy: The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in Local,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Politics, 1905-191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芬卓尔，约翰·H：《中国的民主：地方和省的自治政府运动及全国政治活动，1905-1914年》

Fogel, Joshua A. "On Japanese Expressions for 'China,'" *Sino-Japanese Studies* 2.1:5-16 (December 1989).

福吉尔，乔舒亚·A：《中国应用的日本词语》

Franke, Wolfgang.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Cambridg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60.

弗兰克·沃尔夫冈：《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

Fujioka Kikuo 藤冈喜久男. *Chō Ken to shin'gai kakumei* 张謇と辛亥革命 (Zhang Jia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Sapporo: Hokkaidō Daigaku Toshō Kankōkai, 1985.

藤冈喜久男：《张謇与辛亥革命》

Futami Takeshi 二见刚史. “Kyōshi Hōsei Gakudō to Matsumoto Kamejirō” 京师法政学堂と松本龟次郎 (The Beijing College of Law and Administration and Matsumoto Kamejirō). In Abe Hiroshi, ed., *Nit-Chū kyōiku bunku kōryū to masatsu*, pp. 75-97.

二见刚史：《京师法政学堂与松本龟次郎》

——, “Kyōshi Hōsei Gakudō no Nihonjin kyōshū” 京师法政学堂の日本人教习 (Japanese Teachers at the Beijing College of Law and Administration). In *Oyatoi Nihonjin kyōshū no kenkyū*, pp. 75-89.

二见刚史：《京师法政学堂的日本人教习》

——, and Satō Hisako 佐藤尚子. “(Fu) Chūgokujin Nihon ryūgaku shi kankai tōkei” (付)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关系统计 ([App.] Statistics Relating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Kokuritsu Kyōiku Kenkyūjo kiyō* 94: 99-118 (March 1978).

二见刚史与佐藤尚子：《(附录)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关系统计》

高名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Gluck, Carol. *Japan's Modern Myths: 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格勒克，卡洛尔：《日本的现代神话：明治晚期的意识形态》

关捷,徐迎前:《论中日甲午战争的张之洞》。载《中日关系史论集第二辑》

《光绪朝东华录》朱寿朋编,上海,1909;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台北,1963;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Harada, Rev. J. "Japanese Educational Influence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36.1:356-361 (July 1905).

夏纳达牧师:《日本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Harrell, Paula Sigrid. "The Years of the Young Radicals: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1900-1905."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70.

哈莱尔,波拉·西格丽德:《年青激进分子的年代:日本的中国留学生,1900—1905年》

Hayhoe, Ruth, and Marianne Bastid, eds.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87.

海浩,露斯,与玛丽安尼·巴斯蒂特:《中国的教育与工业化的世界:文化转移的研究》

Hirano, Ken'ichirō (Hirano Ken'ichirō 平野健一郎). "Arao Sei and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ōa Dōbun Kai: An Early Advocacy of the Promotion of Sino-Japanese Trade." Research paper for Seminar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History 285), Regional Studies—East Asia, Harvard University, 1964.

平野健一郎:《荒尾精与东亚同文会的成立过程:促进中日贸易的早期倡导》

——, ed. *Kindai Nihon to Ajia: Bunka no kōryū to masatsu* 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文化の交流と摩擦 (Modern Japan and Asia:

Cultural Exchange and Cultural Conflict). Tokyo: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84.

平野健一郎编：《近代日本与亚洲：文化交流与冲突》

Hirotsu Takio 弘谷多吉夫. "Pekin Keimu Gakudō to Kawashima Naniwa" 北京警务学堂と川島浪速 (The Beijing Police Academy and Kawashima Naniwa). In *Oyatoi Nihonjin Kyōshū no kenkyū*, pp. 91—103.

弘谷多吉夫：《北京警务学堂与川岛浪速》

Horio, Teruhisa.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Modern Japan: State Authority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Steven Platzer, ed. and tr.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8.

Horio, Teruhisa: 《现代日本的教育思想及思想意识：国家的权威与知识分子的自由》

Hōsei Daigaku Daigaku Shi Shiryō Inkaikai 法政大学大学史资料委员会 (Committee on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History of Hōsei University). *Hōsei Daigaku shi shiryō shū, dai ju'ichi shū; Hōsei Daigaku Shinkoku ryūgakusei Hōsei Sokusei Ka toku shū* 法政大学史资料集第十一集、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特集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History of Hōsei University, Vol. 11: The Hōsei University Accelerated Program in Law and Administration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Late-Qing Period, Special Collection). Tokyo: Hōsei Daigaku, 1988.

Hosono Kōji 细野浩二. "Shinmatsu Chūgoku ni okeru 'Tōbun Gakudō to sono shūhen: Meijimatsu Nihon no kyōikuken shūdatsu no ronri o meguru sobyō" 清末中国における「东文学堂」とその周辺：明治末日本の教育权收夺の论理をめぐる素描 ("Japanese Schools" in Late-Qing China and Their Environment: A Sketch of Late-Meiji Japanese Arguments To Usurp Educational Rights in



China). In Abe Hiroshi, ed., *Nit-Chū kyōiku bunka kōryū to masatsu*, pp. 49-74.

细野浩二：《清末中国之东文学堂及其环境：明治末期日本对夺取中国教育权的争论概略》

侯宜杰：《袁世凯评传》（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Howard, Richard C. "Japan's Role in the Reform Program of Kang Yu-wei." In *K'ang r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Jung-pang Lo, ed., pp. 280-312.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

霍华德, 理查·C: 《日本在康有为改革纲要中的作用》

Hsia, G. T. "Yen Fu and Liang Ch'i-ch'ao as Advocates of New Fiction." In Adele Austin Rickett, ed., *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ch'ao*, pp. 221-25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Hsia, C. T.: 《新小说鼓吹者：严复与梁启超》

Hsiao, Kung-chuan. *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5.

萧公权：《现代中国与新世界：维新派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

Hsu, Immanuel C. Y. "Late ch'ing Foreign Relations, 1866-1905." In Fairbank and Liu, eds., pp. 70-141.

徐中约：《晚清的对外关系》

Huang Fu-ch'ing (Huang Fuqing)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Late Ch'ing Period"）.

——,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Late Ch'ing Preiod*, Katherine P. K. Whitaker, tr. Tokyo: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82.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

——，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Japa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Enterprises in China 1898-1945”）。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Jindai Shi Yanjiu Suo, 1982.

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

Hummel, Arthur W.,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D. C., 1943;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阿瑟·汉梅尔编著：《清朝杰出人物(1644—1912年)》

Hunt, Michael H. “The American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A Reappraisa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 3: 539—559 (May 1972).

亨特, 迈克尔·H: 《美国减免庚子赔款的再评价》

Ichiko, Chuzo (Ichiko Chūzō 市古宙三).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1901-11.” In Fairbank and Liu, eds., pp. 375—415.

市古宙三：《1901—1911年的政治和制度改革》

Iriye, Akira, e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入江晃(音)编：《在政治及文化交流中的中日文著》

Jansen, Marius B.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5.

——，“Japa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In Fairbank and Liu, eds., pp. 339—374.

——, “Konoe Atsumaro.” In Iriye, ed., pp. 107-123.

詹森, 马里乌斯·B: 《日本人与孙逸仙》

《日本和中国: 从战争到和平, 1894—1972 年》

《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近卫笃磨》

Japan, Gaimushō 外务省. *Nihon gaikō bunsho* 日本外交文书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Tokyo: Gaimushō, 1936-.

——, *Nihon gaikōshi jiten* 日本外交史辞典 (Dictionary of Japanese Diplomatic History). Tokyo: Ōkurashō Insatsukyoku, 1979.

——, Gaikō Shiryōkan 外交史料馆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 Carefully catalogued holdings, including “Zai honpō Shinkoku ryūgakusei kankei zakken” 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件 (Miscellaneous Documents Relating to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教科书之发刊概况, 1868—1918 年》(1934 年), 收入张静庐编: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

Kageyama Masahiro 荫山雅博. “Kōbun Gakuin ni okeru Chūgokujin ryūga-kusei kyōiku: Shin makki ryū-Nichi kyōiku no ittan” 宏文学院における中国人留学生教育: 清末期留日教育の一端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t Kōbun Gakuin: One Part of Late-Qing Education in Japan), *Nihon no kyōiku shigaku* 23:58-79 (1980).

——, “Kōbun Gakuin ni okeru Shinmatsu Chūgokujin ryūgakusei no kyōiku ni tsuite [I]” 宏文学院における清末中国人留学生の教育について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t Kōbun Gakuin during the Late-Qing Period [part I]), *Kumatsu shū* 句沫集 2:132-154 (July 1980).

——, “Shinmatsu ni okeru kyōiku kindaika katei to Nihonjin kyōshū” 清末における教育近代化过程と日本人教习 (Japanese Teachers and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Late-Qing China). In Abe Hiroshi, ed., *Nit-Chū kyōiku bunka kōryū to masatsu*, pp. 5-47.

——, “Kōbun Gakuin ni okeru Chūgokujin ryūgakusei kyōiku ni tsuite (2)” 宏文学院における中国人留学生教育について (2) (On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t Kōbun Gakuin [part 2]), *Kumatsu shū* 5:116-189 (March 1987).

——, “Kōso kyōiku kaikaku to Fujita Toyohachi” 江苏教育改革と藤田丰八 (Jiangsu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Fujita Toyohachi). In *Oyatoi Nihonjin kyōshū no kenkyū*, pp. 27-43.

荫山雅博:《宏文学院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清末留日教育之一端》

荫山雅博:《晚清期间宏文学院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  
《清末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与日本教习》  
《论宏文学院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  
《江苏教育改革与藤田丰八》

Kamachi, Noriko.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蒲地典子:《中国的改革:黄遵宪与日本模式》

——, John K. Fairbank, and Chūzō Ichiko. *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Since 1953: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蒲地典子、费正清等:《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19与20世纪历史和社学科学研究人名手册》

Kanzaki Kiyoshi 神崎清. "Hoku-Shi ni okeru Nihongo no bunkateki seiryoku (jō)" 北支に於ける日本語の文化的勢力(上) (Cultural Influences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in North China [Pt. I]), *Shina* 支那 ("The China Review") 27.8: 46-69 (1 August 1936).

神崎清: 《日语对华北文化的影响(上)》

Katō Yūzō 加藤祐三. "Chūgoku ni okeru oyatoi gaikokujin" 中国におけるお雇い外国人 (Foreign Contract Specialists in China). In *Shiryō oyatoi gaiko-kujin* 资料御雇外国人 (Materials Relating to Foreign Contract Specialists), Yunesuko Higashi Ajia Bunka Kenkyū Senta, comp., pp. 32-43. Tokyo: Shōngakukan, 1975.

——, "Tō-A jiron" "东亚时论" (*East Asia Review*). In Kojima Reiitsu 小島麗逸, ed. *Senzen no Chūgoku jironshi kenkyū* 战前の中国时论志研究 (Studies in Prewar Japanese Journals of Opinion on China), pp. 3-22 Tokyo Ajia Keizai Kenkyūjo, 1978.

加藤祐三: 《中国按合约雇请的外国人》  
《“东亚时论”》

Kawamura Kazuo 河村一夫. *Kindai Nit-Chū kankei shi no shomondai* 近代日中关系史の諸问题 (Problems in Modern Japan-China Relations). Tokyo: Nansōsha, 1983.

阿村一夫: 《近代日中关系史中的问题》

Keene, Donald.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Its Cultural Effects in Japan." In Donald H. Shively, ed.,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Japanese Culture*, pp. 121-17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坚尼, 唐纳德: 《1894—1895 年中日战争及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Kent, Percy Horace. *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12.

肯特, 珀西·霍勒斯: 《满洲的消逝》

Kimiya Yasuhiko (Mugong Taiyan) 木宫泰彦. *Ri-Zhong wenhua jiaoliu shi* 日中文化交流史 (The History of Japan-China Cultural Interactions), Hu Xinian 胡锡年, tr. Beijing: Shangwu Yinshu Guan, 198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as *Nik-Ka bunka kōryū shi* 日华文化交流史 (The History of Japan-China Cultural Interactions) (Tokyo: Toyama Bō, 1955).

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本, 北京: 商务, 1980年)

Kitaoka Shin'ichi. "China Experts in the Army." In Duus, Myers, and Peattie, eds., pp. 330-368.

Kitaoka Shin'ichi: 《中国军队中的专家》

Kobayashi Kazumi 小林一美. *Giwadan sensō to Meiji kokka* 义和团戦争と明治国家 (The Boxer War and the Meiji State). Tokyo: Kyūko Shoin, 1986.

小林一美: 《义和团战争与明治国家》

Kobayashi Tomoaki 小林共明. "Shoki no Chūgoku tai-Nichi ryūgakusei haken ni tsuite: Bojutsu seihenki o chūshin to shite" 初期の中国対日留学生派遣について: 戊戌政変期を中心として ("On the Early Dispatch of the Students from China to Japan"), *Shin'gai Kakumei kenkyū* 辛亥革命研究 4:1—16 (May 1984).

——, "Rikugun Shikan Gakkō to Chūgokujin ryūgakusei: Nichi-Ro sensō ki o chūshin to shite" 陸軍士官学校と中国人留学生: 日露戦争期を中心として (Japan's Military Academy and Its Chinese Students, Emphasiz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Period), *Hitori kara* ひとりから 6:62-75 (November 1985).

——, "Shinbu Gakkō to ryū-Nichi Shinkoku rikugun gakusei"

振武学校と留日清国陸軍学生 (Japan's Shinbu Gakkō and Its Chinese Military Students). In *Shin'gai Kakumei Kenkyūkai*, comp., pp. 277-309.

小林共明:《中国早期派日留学生》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中国留学生》

《振武学校与留日清国陆军学生》

Kojima Shōtarō 小島昌太郎. *Shina saikin daiji nenpyō* 支那最近大事年表 (A Chronology of Major Events in Modern China [1840-1941]). Tokyo: Yūhi-kaku, 1942.

小島昌太郎:《近代中国大事年表(1840—1941年)》

Kokuryūkai 黑竜会, comp. *Tō-A senkaku shishi kiden* 東亞先觉志士記伝 (Biographical Notes on Pioneer Patriots of East Asia). 1933-1936. 3 vols. Tokyo: Hara Shobō, 1966.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

Konoe Atsumaro 近卫笃磨. *Konoe Atsumaro nikki* 近卫笃磨日记 (The Konoe Atsumaro Diaries), Konoe Atsumaro Nikki Kankōkai, comp. 5 vols. Tokyo: Kajima Kenkyūjo Shuppankai, 1968-1969.

——, *Konoe Atsumaro nikki (fuzoku bunsho)* 近卫笃磨日記(付属文书) (The Konoe Atsumaro Diaries [Supplemental Documents]), Konoe Atsumaro Nikki Kankōkai, comp. Tokyo: Kajima Kenkyūjo Shuppankai, 1969.

近卫笃磨:《近卫笃磨日记》

《近卫笃磨日記(附录文书)》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库恩, 汤马斯:《科学革命的结构》

Kuo, Ting-ye. "Self-Strengthening: The Pursuit of Western

Technology.” In Fairbank, ed., pp. 491-542.

郭廷以：《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载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Kwong, Luke S. K. *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Ideas of 1898*.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陆光：《百日维新的交织图：1898年的人物、政治及观念》

Lee, Mabel. “Liang Ch’i-ch’ao (1873-1929) and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of Late-Ch’ing.” In A. R. Davis, ed. *Search for Identity: Modern Literature and the Creative Arts in Asia*, pp. 203-224.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74.

李，梅布尔：《梁启超(1873—1929年)与晚清文学革命》

Legge, James.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1: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83.

《李雅各英译七经》

Levenson, Joseph R.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Continu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列文森，约瑟夫：《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理智的连续性问题的》

Lewis, Charlton M. *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 1891-190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The Hunanese Elit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5-1898,”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 1: 35-42 (November 1969).

刘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与制度的变化》



《湖南名流与维新运动, 1895—1898 年》

李广健:《清末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以胡元炎为例》(中日关系史论集,第5辑)

李杰泉:《留日学生与中日科技文化交流》,载《日本的中国移民》

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Li Yu-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into China*. New York: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李又宁:《社会主义传入中国》

Liang Ch'i-ch'ao (Liang Qichao) 梁启超.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 tran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Immanuel C. Y. Hsu.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徐中约英译并注释)

林明德:《清末民初日本政制对中国的影响》,载谭汝谦编:《中日文化交流》

Liu Tianchun 刘天春. "Sino-Japanese Studies: Three Problem Areas," Douglas R. Reynolds, tr., *Sino-Japanese Studies* 2.2:57-71 (May 1990).

刘天春:《中日研究的三个误区》

刘学照,方大伦:《清末民初中国人对日观的演变》(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11月号)

Lo Hui-min,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vol. 1: 1895-19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罗惠民:《莫理循通信集》

闻小波:《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载《学术学

刊》1993年第3期,第55—60页。

马勇:《清政府对百日维新的检讨与反省:1898—1901》,载《人文杂志》1993年第1期,第94—100页

MacKinnon, Stephen R.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麦克金朗,史提芬·R:《中国最后王朝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

Meienberger, Norbert. *The Emergenc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 (1905-1908): The Concept Sanctioned by the Empress Dowager Tzu-hsi*. Bern: Peter Lang, 1980.

梅恩伯格,罗伯特:《中国立宪政府的出现(1905—1918年):慈禧太后认可的概念》

Meijer, Marinus Johan.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Criminal Law in China*. Batavia: De Unie, 1950.

梅佐,马里乌斯·祖翰:《中国对现代刑法的引进》

Min Tu-ki 闵斗基.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Philip A. Kuhn and Timothy Brook, eds.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9.

——, “Chinese ‘Principle’ and Western ‘Utility’: A Reassessment.” In Min Tu-ki,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pp. 51-88.

——, “The Late-Ching Provincial Assembly.” In Min Tu-ki,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pp. 137-179.

闵斗基:《国家政治形态与地方势力:中国王朝晚期的改革》

闵斗基:《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再评价》

《晚清期间的省议会》,载闵著《国家政治形态与地方

势力》

Morohashi Tetsuji 诸桥辙次. *Dai Kan-Wa jiten* 大汉和辞典 (Great Chinese-Japanese Dictionary). 13 vols. Tokyo: Shukushaban, 1955-1960.

Munakata Kotarō 宗方小太郎. *Munakata Kotarō bunsho: Kindai Chūgoku hiroku* 宗方小太郎文书：近代中国秘录 (The Writings of Munakata Kotarō: Secret Reports on Modern China). Tokyo: Hara Shobō, 1977.

Mutsu Munemitsu 陆奥宗光. *Kenkenroku: A Diplomatic Record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Gorder Mark Berger, ed. and tr. 1895;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2.

陆奥宗光：《Kenkenroku: 1894—1895 年中日战争的外交纪录》

Nagai Michio and Miguel Urrutia, eds. *Meiji Ishin: Restoration and Revolution*. Tokyo: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1985.

Nagai Michio, Miguel Urrutia 编：《明治维新：复辟与革命》  
Najita Tetsuo. "Conceptual Consciousness in the Meiji Ishin."  
In Nagai and Urrutia, eds., pp. 83-102.

Najita Tetsuo: 《明治维新时的概念意识》

Nakamura Tadashi 中村义. *Shin'gai kakumei shi kenkyū* 辛亥革命史研究 ("A Study of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Tokyo: Miraisha, 1979.

——, "Kanō Jigorō to Yō Do" 嘉纳治五郎与杨度 (Kanō Jigorō and Yang Du). *Shin'gai Kakumei kenkyū* 5:41-58 (October 1985).

——, "Seijō Gakkō to Chūgokujin ryūgakusei" 成城学校与中

国人留学生 (Japan's Seijō Gakkō and Its Chinese Students). In Shin'gai Kakumei Kenkyūkai, comp., pp. 251-275.

Nakamura Takashi 中村孝志. "Tō-A Shoin to Tōbun Gakudō: Taiwan Sōtokufu Kanan kyōiku shisetsu no ranshō" 东亚书院与东文学堂: 台湾总督府华南教育施設之濫觴 (Dongya Shuyuan and Dongwen Xuetang: The Origins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in South China under the [Japanese] Governor-General of Taiwan). *Tenri Daigaku gakuho* 124:1-18 (March 1980).

Nanri Tomoki 南里知树, comp. *Chūgoku seifu koyō no Nihonjin: Nihonjin komon jinmeihyō to kaisetsu* 中国政府雇用之日本人: 日本人顾问人名表与解说 (Japanese in Chinese Government Service: With Name Lists and Explanatory Notes Relating to Japanese Advisers). In the series *Nit-Chū mondai jūyō kankei shiryōshū*, daisankan: *Kindai Nit-Chū kankei shiryō, dainishū* 日中问题重要关系资料集第三卷: 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二集 (Important Materials Relating to Japan-China Questions, Vol. 3: Historical Materials Relating to Japan-China Relations, Part 2). Tokyo: Ryūkei Shosha, (龙溪书舍)1976.

Nish, Ian 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The Diplomacy of Two Island Empires, 1894-1907*.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6.

尼什, 伊恩: 《1894—1907 年的英日同盟》

Ogawa Yoshiko 小川嘉子. "Shinmatsu no kindai gakudō to Nihon joshi kyōshū: Kanton Joshi Shihan Gakudō o chūshin ni" 清末の近代学堂と日本女子教习: 広東女子師範学堂を中心に (Late-Qing Modern Schools and Japanese Women Teachers: Chiefly the Guangdong Female Normal School). In *Oyatoi Nihonjin kyōshū no kenkyū*, pp. 105-114.

小川嘉子：《清末的近代学堂与日本女子教习：广东女子师范学堂》

Ōmori Chikako 大森史子. "Tō-A Dobunkai to Tō-A Dōbun Shoin: Sono seiritsu jijō, seikaku, oyobi katsudō" 东亚同文会と东亚同文书院：その成立事情, 性格および活动 (Tō-A Dōbunkai and Tō-A Dōbun Shoin: Their Founding Circumstances, Character, and Activities). *Ajia keizai* 19.6: 76-92 (June 1978).

大森史子：《东亚同文会与东亚同文书院：成立的环境、性质及活动》

Ono Kazuko 小野和子. "Shimoda Utako to Hattori Unokichi" 下田歌子与服部宇之吉 (Shimoda Utako and Hattori Unokichi). In Takeuchi Yoshimi and Hashikawa Bunzō, eds., 1, 201-221.

——, *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1850-1950*, Joshua A. Fogel, 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小野和子：《1850—1950年革命世纪的中国妇女》

Ōtsuka Yutaka 大塚丰. "Chūgoku kindai kōtō shihan kyōiku no hōga to Hattori Unokichi" 中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之萌芽与服部宇之吉 (The Sprouts of Modern Higher Norm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Hattori Unokichi). In *Oyatoi Nihonjin kyōshū no kenkyū*, pp. 45-64.

*Oyatoi Nihonjin kyōshū no kenkyū: Ajia no kyōiku kindaika to Nihonjin* お雇い日本人教习の研究：アジアの教育近代化と日本人 ("Studies on Japanese Educators in Modern Asia: Their Activities in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pecial issue of *Kokuritsu Kyōiku Kenkyūjo kiyō* 国立教育研究所纪要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115 (March 1988).

国立教育研究所专刊(1988年3月号)《受雇的日本教习之研究：20世纪初期从事教育近代化的日本人》

Parker, A. P. "A New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32.7:356-359 (July 1901).

潘慎文：《日本对中国的新侵略》

Peng Tse-chou (Peng Zezhou; Hō Takushū) 彭泽周. *Chūgoku no kindaika to Meiji Ishin* 中国之近代化与明治维新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Japan's Meiji Ishin). Kyoto: Dobosha, 1976.

Powell, Ralph L. *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鲍威尔, 拉尔夫：《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乔志强：《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3年)

Rankin, Mary Backus.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兰京, 玛莉·巴克斯：《杰出人士的行动主义与中国的政治改革：浙江省, 1865—1911年》

Reynolds, Carol T. "East Meets East: Chinese Views of Early Meiji Japan [ca. 1870-1894]."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86.

泰凯乐：《东方与东方相遇：中国人对日本明治初期的看法(约1870—1984年)》

Reynolds, Douglas R. "Before Imperialism: Kishida Ginkō Pioneers the China Market for Japan," *Proceedings and Papers of the Georgia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1984 5:114-120 (1985).

——, "Chinese Area Studies in Prewar China: Japan's Tōa

Dōbun Shoin in Shanghai, 1900-1945,"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5:945-970 (November 1986).

——, "A Golden Decade Forgotten: Japan-China Relations, 1898-1907,"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fourth series 2:93-153 (1987).

——, "Training Young China Hands: Tōa Dōbun Shoin and Its Precursors, 1886-1945." In Daus, Myers, and Peattie, eds., pp. 210-271.

任达：《帝国主义期前：岸田吟香，谋求中国市场的日本先驱》

任达：《战前中国的地区研究：日本在上海的同文书院，1900—1945年》

任达：《日中关系史中被忘却的黄金十年：1898—1907年》  
《训练年青的中国通》

Richard, Timothy. "China and the West," *Living Age* 248 (1906).

李提摩太：《中国与西方》

Rinbara Ayako 林原文子. "Shinmatsu, minkan kigyō no bokkō to jitsugyō shinsei ni tsuite" 清末、民間企業の勃興と実業新政について (The Sudden Rise of Private Enterprise in the Late Qing and Xinzheng Reforms Related to Industry), *Chikaki ni arite* ("Being Nearby—Discussions on Modern China") 14: 38-52 (November 1988).

林原文子：《清末民间企业的勃兴与有关实业的新政改革》

Rokkaku Tsunehiro 六角恒广. *Chūgokugo kyōiku shi no kenkyū* [1871-1945] 中国语教育史之研究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Spoken-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1871-1945]). Tokyo: Tōhō Shoten, 1988.

Roosevelt, Theodore. "The Awakening of China," *The Outlook* (New York) 90.13:665-667 (29 November 1908).

罗斯福,西奥多:《中国的觉醒》

Sakeda Masatoshi 酒田正敏. *Kindai Nihon ni okeru taigaikō undō no kenkyū* 近代日本における 對外硬運動の研究 (Studies of Movements for a Hardline Foreign Poli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ca. 1888-1905]). Tokyo: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1978.

酒田正敏:《近代日本早期对外政策强硬路线的研究》

Saneto Keishū 実藤惠秀. *Chūgokujin Nihon ryūgaku shikō*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 (Draft 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Tokyo: Nik-Ka Gakkai, 1939.

——, *Nippon bunka no Shina e no eikyō* 日本文化对中国的 影响 (Japanese Cultural Influences on [Modern] China). Tokyo: Keisetsu Shoin, 1940.

——, "Gendai Chūgoku bunka no Nipponka" 现代中国文化的 日本化 (The Japan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In Sanetō Keishū, *Nippon bunka no Shina e no eikyō*, pp. 3-39.

——, "Shoki no Shōmu Inshokan" 初期之商务印书馆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Sanetō Keishū, *Nippon bunka no Shina e no eikyō*, pp. 241-248.

——, *Meiji Nis-Shi bunka kōshō* 明治日支文化交涉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n the Meiji Period). Tokyo: Kōfukan, 1943.

——, *Chūgokujin Nihon ryūgaku shi; zōho* 中国人日本留学 史·增补 (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enlarged ed.). Tokyo: Kuroshio Shuppan, 1970.

——, *Chūgoku ryūgakusei shidan* 中国留学生史谈 (Discou- rs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Tokyo: Daiichi



Shobō, 1981.

——, (Shiteng Huixiu). *Zhongguo ren liuxue Riben shi*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中译本译者谭汝谦、林启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2年)

桑兵:《1905—1912年的国内学生群体与中国近代化》(《近代史研究》, 1989年9月号)

Sasaki, Masaya (Sasaki Masaya 佐佐木正哉). "Knowledge of the Outside World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itutional Thought,"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44:27-56 (1986).

佐佐木正哉:《近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宪政思想的发展》

Sasaki, Yō (Sasaki Yō 佐佐木扬).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t the Tim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4-95): Anglo-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42: 1-74 (1984).

佐佐木扬:《1894—1895年中日战争时的国际环境:英、俄远东政策及中日战争的开端》

Satō Saburō 佐藤三郎. "Nakajima Saishi no Pekin Tōbun Gakusha ni tsuite" 中岛裁之の北京東文學社について (Nakajima Saishi's Dongwen Academy in Beijing [1901-1906]). 1970. Reprinted in Satō Saburō, *Kindai Nit-Chū kōshō shi*, pp. 278-337.

——, *Kindai Nit-Chū kōshō shi no kenkyū* 近代日中交渉史の研究 (Studie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Modern Japan and China).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1984.

佐藤三郎:《中岛裁之的北京东文学社(1901—1906年)》

《近代日中交涉史的研究》

Schwartz, Benjamin.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斯华特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Scott, Paul D. *Japan-China: Arao Sei and the Paradox of Cooperation*. Osaka: The Inter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Kansai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1988.

司各特, 保罗：《日本—中国：荒尾精与合作的悖论》

史远芹、曹贵民、李玲玉：《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演变》（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

Shimada Kenji 岛田虔次. *Pione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Zhang Binglin and Confucianism*, Joshua A. Fogel, t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岛田虔次：《中国革命的先驱：章炳麟与儒家学说》

Shimada Masao 岛田正郎. *Shinmatsu ni okeru kindai teki hōten no hensan: Tōyō hō shi ronshū, dai san* 清末における近代の法典の编纂：东洋法史论集第三（The Compilation of Modern Legal Codes in Late-Qing China: Collected Essays on Oriental Law, No.3). Tokyo: Sōbunsha, 1980.

岛田正郎：《清末中国近代法典的编纂：东洋法史论集》第三卷

Shin'gai Kakumei Kenkyūkai 辛亥革命研究会, comp. *Chūgoku kin-gendai shi ronshū: Kikuchi Takaharu sensei tsuitō ronshū* 中国近现代史论集：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Essay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Memory of Professor Kikuchi Takaharu). Tokyo: Kyūko Shoin, 1985.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上海，1928年）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年)

Spence, Jonathan.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1969;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0.

斯宾士, 约尼顿: 《改变中国: 1620-1960 年在中国的西方顾问》

Strand, Davi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斯特朗德, 大卫: 《北京的黄包车: 20 世纪 20 年代的市民和政治》

Stross, Randall E. *The Stubborn Earth: 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 1898-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斯特罗斯, 兰德尔: 《棘手的土地: 美国农业专家在中国, 1808—1937 年》

苏云峰: 《外国专家学者在湖北(1890—1911 年)》,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 1975 年 4 月 1 日)

苏云峰: 《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6 年)

苏云峰: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湖北省, 1960—1916 年》(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7 年)

孙应祥、皮后锋: 《论维新运动的上、下限》, 载《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1993 年第 3 期, 第 95—104 页。

Sutton, Donald S.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Yunnan Army, 1905-192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

塞顿, 唐纳德: 《各省黥武主义和中国人的民国: 云南军, 1905—1925 年》

Suzuki Masasetsu 铃木正节. *Hakubunkan "Taiyō" no kenkyū*

博文馆“太阳”之研究 (Studies of *Taiyō* [“The Sun”] Published by Hakubunkan [1895-1928]). In *Chūgoku kankei shinbun zasshi kaidai III* 中国关系新闻杂志解题 III (Annotated Studie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Relating to China, III). Tokyo: Ajia Keizai Kenkyūjo, 1979.

Taga Akigorō 多贺秋五郎. *Kindai Chūgoku kyōiku shi shiryō* [1902-1960] 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 (Source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1902-1960]). 5 vols. [Vol. 1: 清末编 (1902-1911)]. Tokyo: Nihon Gakujutsu Shinkō-kai, 1972-1976.

Takanishi Kenshō 高西贤正, comp. *Higashi Honganji Shanhai kaikyō rokujūnen shi* 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 (Sixty Years of the Higashi Honganji in Shanghai). Shanghai: Higashi Honganji Shanhai Betsuin, 1937.

Takeuchi Yoshimi 竹内好 and Hashikawa Bunzō 桥川文三, eds. *Kindai Nihon to Chūgoku* 近代日本与中国 (Modern Japan and China). 2vols. Tokyo: Asahi Shinbunsha, 1974.

Tam, Yue-him (Tan Ruqian), ed. *Sino-Japanese Cultural Interchange*, vol. 3: *The Economic and Intellectual Aspect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5.

谭汝谦:《中日文化交流》第三卷:《经济与知识分子概况》(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研究院, 1985年)

谭汝谦:《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香港, 香港日本研究所, 1988年)

谭汝谦:《现代汉语的日语外来词及其搜集和辨认问题》, 载《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

谭汝谦:《中日之间翻译事业的几个问题》, 载《中日关系史论

文集》第四辑, I, 又载谭著《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

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谭等编著《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一书的《导言》

谭汝谦、实藤惠秀、小川博合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Teng, Ssu-yu,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195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Research G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概览》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研究指南》

Thompson, Roger. "Visions of the Future, Realities of the Day: Local Administrative Reform, Electoral Politic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1985.

——, "Statecraft and Self-Government: Competing Visions of Community and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14.2:188-211 (April 1988).

汤普森,罗杰:《未来的幻想,当时的现实:地方行政改革,选举的策略,及1911年革命前夕的中国传统社会》

:《管理能力与自治政府:中国末代王朝国家和社会竞争的梦幻》

田久川:《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该校中国留学生》,载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中日关系史论丛》

田正平、霍益萍：《游学日本热潮与清末教育》，1988年10月25—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论文

Tō-A Dōbunkai 东亚同文会, comp. *Tai-Shi kaikoroku* 对支回顾录 (Memoirs Concerning China). 2 vols. 1936; Tokyo: Hara Shobo, 1968.

*Tō-A Dōbunkai shi* 东亚同文会史 (A History of Tō-A Dōbunkai), Tō-A Bunka Kenkyūjo 东亚文化研究所, comp. Tokyo: Kazankai, 1988.

*Tō-A Dōbun Shoin Daigaku shi: Sōritsu hachijū shūnen kinen shi* 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创立八十周年纪念志 (History of Tō-A Dōbun Shoin University: Commemorating Its Eightieth Anniversary), Koyūkai 沪友会, comp. Tokyo: Koyūkai, 1982.

Tsien, Tsuen-hsiun (Qian Cunxun 钱存训). "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13.3:305-327 (May 1954).

钱存训：《西方通过翻译对中国的冲击》

Tsou, Mingteh (Zou Mingde 邹明德). "From Missionary to Reform Advocate: Gilbert Reid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in Late Qing."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Projec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Lawrence, 18-23 June 1988.

邹明德：《从传教士到改革鼓吹者：李佳白与晚清改革运动》

Tsunoda, Ryusaku, and L. Carrington Goodrich. *Japan in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Later Han through Ming Dynasties*. South Pasadena, Calif.: P. D. and Iona Perkins, 1951.

角田龙作(音), L·卡灵顿·古德里奇：《中国王朝史上的日本：从后汉到明朝》

Uenuma Hachirō 上沼八郎. "Uchibori Korefumi to Santō

Shihan Gakudō” 内堀维文と山东师范学堂 (Uchibori Korefuni and Shandong Normal School). In *Oyatoi Nihonjin kyōshū no kenkyū*, pp. 65-73.

——, and Hirotsuni Takio. “Taiwan Sōtokufu no Kanan kyōiku taisaku ni tsuite: Fukken. Kanton ryō shō ni okeru sekimin kyōiku no seisui”台湾总督府の华南教育对策 について: 福建・广东两省における籍民教育の精粹 (Educational Measures of the Taiwan Colonial Government in South China: The Vicissitudes of Educating “Japanese Citizens” in the Provinces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In Abe Hiroshi, ed., *Nit-Chū kyōiku bunka kōryū to masatsu*, pp. 259-308.

上沼八郎:《内堀维文与山东师范学堂》

上沼八郎与弘谷多吉夫:《台湾总督府对华南教育政策: 福建广东两省日籍教员的代谢》

王家俭:《清末民初我国警察制度现代化的历程, 1901—1916年》(《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 1982年6月)

Wang, Feng-Gang (Wang Fenggang 王风岗). *Japanese Influence on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from 1895-1911*. Peip-ing: Authers (sic) Book Store, 1933.

王风岗:《日本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1895—1911年》

汪向荣:《日本教习》, 北京三联书店, 1988年, 其日译本为:

——, (Ō Kōei). *Shinkoku oyatoi Nihonjin* 清国お雇い日本人 (Japanese Teachers and Advisers in Late-Qing China). Trans. into Japanese of *Riben jiaoxi*, by Takeuchi Minoru 竹内実 and others. Tokyo: Asahi Shinbunsha, 1991.

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 北京出版社, 1987年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 1992年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近代日本游记札记》, 载

《近代中日启示录》

Wang, Y. C.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汪一驹：《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年》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北京三联书店，1980—1982年

王振坤、张颖：《日特祸华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谋略谍报活动史实》第一卷，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年

Watanabe Atsushi 渡边惇. "Shinmatsu En Seigai to Hokuyō shinsei: Hokuyō ha no keisei o megutte" 清末袁世凯と北洋新政：北洋派の形成をめぐる (Yuan Shikai and Xinzheng Reforms in Beiyang during the Late Q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Beiyang Clique), *Rekishi kyōiku* 16. 1-2: 135-148 (January-February 1968).

渡边惇：《清末袁世凯与北洋新政：北洋派的形成》

Watanabe Ryūsaku 渡边龙策. *Kindai Nit-Chū minshū kōryū gaishi* 近代日中民众交流外史 (Mod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Interactions: An Unauthorized History). Tokyo: Yūsankaku Shuppan, 1981.

Welch, Holmes. *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韦尔奇，霍姆斯：《中国佛教的复兴》

Westney, D. Eleanor. "The Emulation of Western Organizations in Meiji Japan: The Case of the Paris Prefecture of Police and the Keishi-chō,"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8. 2: 307-342 (Summer 1982.)

——,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Transfer of Western Organization a Patterns to Meiji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韦斯特尼, 埃莉诺: 《日本明治年代对西方组织的模仿: 巴黎地区与警视厅的案例》

韦斯特尼, 埃莉诺: 《模仿与创新: 西方组织模式对明治日本的转移》

Wright, Mary Clabaugh,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莱特, 玛莉·克拉宝格: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1900—1913年》

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编: 《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

谢俊美: 《戊戌政变时期日本营救中国维新派的活动》, 载《日本的中国移民》

徐星平: 《弘一大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8年)

杨天石、王学庄编: 《拒俄运动, 1901—190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

杨正光、平野日出雄: 《松本龟次郎传》(北京时事出版社, 1985年)

Yokoyama Suguru 横山英. "Nijūsseiki shoki no chihō seiji kindaiika ni tsuite no oboegaki" 二〇世纪初期の地方政治近代化についての覚书 (Notes on Local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Yokoyama Suguru, ed. *Chūgoku no kindaiika to chihō seiji* 中国の近代化と地方政治 (Modernization and Local Politics in China), pp. 1-27. Tokyo: Keisō Shobō, 1985.

横山英: 《20世纪初期的地方政治近代化札记》, 载横山英编《中国的近代化与地方政治》

Yoshino Sakuzō. "Shinkoku zaikin no Nihonjin kyōshi" 清国在

勤の日本人教师 (Japanese Teachers Employed in China), *Kokka Gakkai zasshi* 国家学会杂志 23.5:769—794 (May 1909).

吉野作造:《清国雇用的日本教师》,载《国家学会杂志》1909年5月号

Young, Ernest P. "A Study of Groups and Personalities in Japan Influencing the Events Leading to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Papers on Japan*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2:229-275 (August 1963).

——, "Chinese Leaders and Japanese Aid in the Early Republic." In Iriye, ed., pp. 124-139.

杨,欧内斯特:《导致1894—1895年中日战争若干事件的日本组织和个人之研究》

:《民国初期日本人对中国领袖的帮助》

Young, Marilyn Blatt. *The Rhetoric of Empire: American China Policy, 1895-190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杨,玛莉莲·布列特:《帝国的花言巧语:1895—1901年美国对华政策》

Yung Ying-yue (Rong Yingyue) 容应萸. "Go Jorin to Tōyū soroku: Aru 'yōmuha' no kyōiku kaikaku an" 吴汝纶と“东游丛录”:ある“洋务派”の教育改革案 (Wu Rulun and *Collected Records of Travels East: The Educational Reform Proposals of a yangwu Reformer*). In Hirano Ken'ichirō, ed., pp. 45-71.

容应萸:《吴汝纶之〈东游丛录〉:洋务派之改革方案》,载平野健一郎编《近代日本与亚洲:文化交流与冲突》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上海群联出版社,1953—1954年

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张力、刘鑑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1977年。

Zhang Zhenkun 张振鵬. “Kindai Nihon no tai-Chū kankei no tokuchō” 近代日本の対中関係の特徴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Nit-Chū sensō to Nit-Chū kankei: Rokōkyō jiken 50 shūnen Nit-Chū gakujutsu tōronkai kiroku* 日中戦争と日中関係：芦沟桥事件 50 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记录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Japan-China Relations: Papers of the Japanese-Chinese Symposium on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Lugouqiao Incident), Inoue Kiyoshi 井上清 and Etō Shinkichi 卫藤沈吉, eds., pp.137—159. Tokyo: Hara Shobō, 1988.

张振鵬：《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特征》，载井上清，卫藤沈吉编《日本战争与日中关系：芦沟桥事件 50 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记录》

张之洞：《劝学篇》

《张文襄公全集》

钟少华：《清末百科全书初探》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8:139—159, 1987年)

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从徐福到黄遵宪》，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

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日本的中国移民》，《中日关系史论文集》之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中日关系史研究》，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中日关系史研究》编辑组编

《中日文化与交流》，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合编

朱有璩：《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下册，第二辑上册，上海新华书店，1983年，1987年

## 译后语

十分感谢袁伟时教授的信任和具体帮助,使我能在退休后的老朽之年,仍能做点自己喜欢、也自以为有益的事,他的信任其实是极具冒险精神的。感谢作者任达教授反复细心校改译稿,甚而增删原著。感谢袁征教授多次为我借阅参考资料;小友黄颖红同学为我就一些拼音日文翻译问题向广州外语学院的教授们请教,他们并不认识我,却仍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尽量为我解答。袁教授告诉我,在本书排印前,近代史研究所雷颐教授又重新校改了译稿。因此,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译的,主要工作也不是我做的。

总觉得历史非常重要,尤其是近代史,窃以为不了解近代史,便无从深刻了解今天的态势。但数十年匆匆而过,竟未能对近代史增多一点确切的认识,未能摆脱一些因循的见解,也未能解开众多迷惑的疑团。从任达教授的著作中,看到从未有人提过的观点,读到前所未见的史料,也触发我思索一些从未想过的问题,于是不揣自陋,斗胆应承了这书的翻译工作。书中的若干观点,我有不同意见,也曾就此与作者讨论以至争辩。但翻译的责任只是尽可能让读者如实地读到作者说的一切,如何评价,读者自会衡量。选择这本书的读者,肯定不是人云亦云之辈的。